

中国地域文化丛书

岭南文化



下著
出版社

岭南文化

袁钟仁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岭南文化/袁钟仁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6 (中国地域文化丛书)
ISBN 7-5382-4795-5

I. 岭… II. 袁… III. 文化-研究-岭南
IV.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9776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七二一二工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211 千字 印张: 9 1/2 插页: 11

印数: 1—5 000 册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中男

封面设计: 郑在勇

李忠孝

责任校对: 刘 璪

美术编辑: 谭成荫

版式设计: 赵怡轩

定价: 15.00 元

马坝人复原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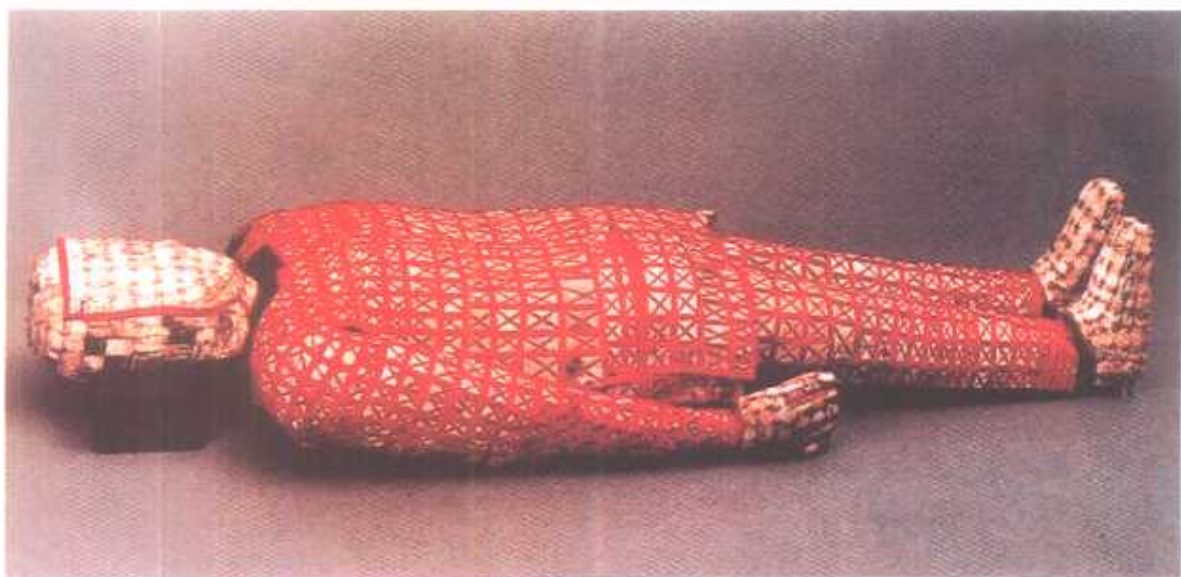


陶器
岭南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陶器。



马坝人头骨化石

此化石距今约12.9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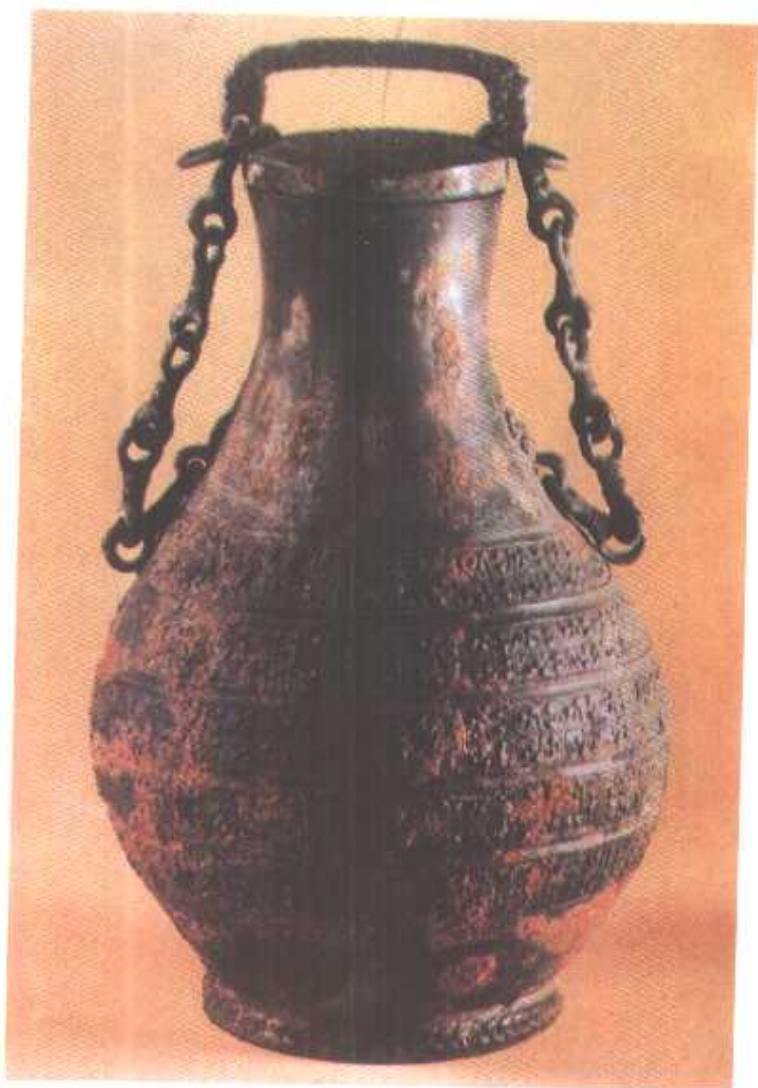


丝缕玉衣

汉初南越文王墓中出土。

提梁壺

肇慶市松
山战国墓中出
土的青铜器。



“文帝行玺”金印及印文
汉初南越文王墓中出土。



石室岩全景

石室岩为七星岩之一，内有唐以来许多书法家的题字作品。



罗浮山

为中国道教胜地，晋朝葛洪曾在此炼丹。



府第式围龙屋

这是广东客家独具特色的民居。



石峡文化遗址



陈氏书院(俗称陈家祠)

建于清光绪年间，集岭南民间建筑艺术之大成



五元宮

传说始建于晋朝的道教寺庙



南海神庙

位于广州黄埔港附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梅关

这是大庾岭上秦汉以来岭南与中原的主要陆路通道。

圣心教堂

为我国最大的哥特式石结构教堂，建于清后期，其样式为法国工程师仿巴黎圣母院设计而成。



秦汉造船遗址

这是日前发现的全世界最古老的造船遗址，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文化局院内。



广寒宫(牙雕)

广州著名的牙雕工艺品，表现出人们想象中的月宫仙境。



双鹰图
为明朝著名画家林良的佳作。



彩瓷花瓶
为清初广州
著名的工艺品。



鍍金水法亭式钟
为我国清代制
造的西欧式时钟。



瑶族妇女



壮族青年

《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序

李 侃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学术界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与现实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因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民情，而国情与民情又都与历史传统有割不断的联系。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但是它又不可能抛开历史文化遗产，完全从头开始。因此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就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任务。对传统文化不分精华和糟粕，“兼收并蓄”、“全盘继承”，当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对传统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一概否定，一概排斥，如果不是思想的幼稚，就是另有用意，而且

同样是办不到的。至于在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中，发生这样那样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论，这就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有益的。对于如此悠久而复杂丰富的传统文化，不要说不可能轻易地做出什么“结论”，就是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头绪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前一个时期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讨论，大多是偏重于宏观的论述，或者就某一个学派（如儒学）、某一种宗教（如佛教和道教）以及某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某些人物的思想等进行研究，这当然也是很必要的。然而中国不但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且又是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的大国。不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文化的发展也很不平衡，而经济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都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这种各具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互相交流和互相融合，就构成了绚丽多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对这些地方文化，进行历史地、具体地考察和研究，从地区文化的特殊性中找出中华文化的同一性，这不仅对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近些年来，随着历史文物的不断发现和整理，随着研究视野的开展和研究领域的拓宽，为地区文化研究提供有利的条件。值得高兴的是，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了这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丛书”将包括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台湾文化、西域文化、徽州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关东文化、岭南文化等等。构成了锦绣中华的历史画卷。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丛书，更全面更具体地了解到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是怎样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

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形成了至今犹存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风貌。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作用。长期积累起来的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精髓，铸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凝聚着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文化也会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然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却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水有源、木有本，文化也有根；只有源远流才能流长，本固才能枝荣，根深才能叶茂。没有根或断了根的文化，也如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是不免于枯萎的。在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不但有悖于炎黄子孙的民族良知，也有悖于历史的科学精神。因为这种数典忘祖的虚无主义，只能导致民族精神的涣散和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因此，出版这套“丛书”的一个重大意义，还在于通过对祖国各地区历史文化的了解，增强人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时代内容，但是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则是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少的。而当今之世，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各种社会思潮此伏彼起，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让更多的人加深对祖国优秀文化的了解，从而增强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心，则尤为重要。

对古代地区文化的探讨和研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付出艰苦的劳动，何况万事开头难。我赞赏《中国地域文化丛书》的作者们勇敢的开拓精神，和他们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所做的有益尝试。也赞赏辽宁教育出版社的远见和气魄，热心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精心

组织、大力支持《中国地域文化丛书》的出版。像任何新的事物一样，对古代地区文化的研究在开始的时候，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世界上哪里会有一开始就十全十美的事物呢！

我自己，有感于作者们勇于探索、刻苦钻研的精神，和出版者勇于开拓、努力创新的精神，在这里说一点粗浅的感想。衷心祝愿作者在坎坷的科学道路上，继续奋进，勇敢攀登。

1990年7月25日

编者札记

我们一直在探讨“文化”。

尤其是近些年，在“交叉科学”的旗帜下，与文化“联姻”的学科纷纷涌现：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文化经济学、文化地理学等等。形式的媾和不排除牵强的因素，但其主体却反映了时代学术的趋向。它既承认传统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又拓宽和丰富了人类的认识视野，为文化学研究带来一片生机。《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地域文化 (Regional Culture) 或称“区域文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大不同于文化地理学 (Geoculturelism)。它们都是以广义的文化领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传播的路线和走向以及人类的行为系统，包括民俗传统、经济体系、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社会组织等等。但在某些方面，地域文化又与文化地理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一般说来，文化地理学是以“地理学”为中心展开文化探讨的，其中的“地区” (District) 概念具有极强的地理学意义，它疆域明确，系统稳定，与现实的“地区”是吻合的。而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

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其“地域”(Region)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它在产生之初当然是精确的，但由于漫长的历史逐渐泯灭了它们的地理学意义，变得疆域模糊，景物易貌，人丁迁移，只剩下大致的所在地区了。如“齐鲁”概指山东，“关东”泛称东北等，在这里“地域”与“地区”的概念是有区别的，这是地域文化与文化地理学的“小异”之处。

岁月的流逝虽然改变了古代区域的精确性，但这种模糊的“地域”观念已经转化为对文化界分的标志，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显然我们不应忽视或轻视这个文化范畴的存在。

古人已发现：不同地区的民俗传统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通过各自的行为系统表现出来。《礼记·王制》中记载了“王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做法，就是要通过诗歌体察各地的民情。《诗经·国风》按照十五个地区汇集诗歌，生动地表现出各个文化区域的风土人情，是将文化按地域类分的先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叙了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的故事：

“……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到，季札观乐，能够准确地领悟各首乐曲表现的“国风”，他对音乐的精通固然令人敬佩，而诗乐中

蕴含的“地域特征”也确实是可以明鉴的。

《汉书·地理志》中已明确地提出了“域分”（即按不同的历史区域划分民俗民风）的概念：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

把人的行为和观念归因于两个因素，即水土的构成和王侯的引导。这个观点是很有价值的，就现实而言，地域文化的形成也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社会结构。

首先说到自然环境。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复杂，大体可划为三个自然区，横跨六个温度带，地理属性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古人早已注意到了水土风候对民俗文化的影响，并多有论述，仅举数例：

“邹人东近沂泗，多质实；南近滕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浮华；北近滋曲，多俭啬”（《邹县志》）。

“平原故址，其地无高山危峦，其野少荆棘丛杂，马颊高津，经流直下，无委蛇旁分之势，故其人情亦平坦质实，机智不生。北近燕而不善悲歌；南近齐而不善夸诈，民醇俗茂，恂悞无华”（《陵县志·序》）。

“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刘禹锡《送周鲁儒序》）。

“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文集》卷十二）。

“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旧《浙江通志》）。

从这里我们已经清楚地感受到自然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当然这仅是一个侧面。明人钱澄之在《记黄檗山居》一文中谈到吴地之人曾笑话他的家乡（桐城龙眠山）园亭简陋，他反诘道：“吾乡有真山水，何以假为？唯任真，故失诸陋，洵不若吴人之工于作伪耳。”山水奇秀之地，当然无须“工于作伪”，而吴人的巧于凿池叠山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看来自然环境不但影响一地的风俗人情，更影响着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甚至民居建筑，它对于一个地域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其次说到社会结构。华夏文明史跨越了几千年的沧桑岁月，历史变迁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仅以“吴越”为例，春秋之际，吴越两国连年征战，尚武习俗蔚然成风。史载：“吴越之君尚勇，故其民好用剑”（《汉书·地理志》）。“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慨之风”（左思《吴都赋》）。但晋永嘉之后，吴越的民风却发生了转变。“永嘉以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文艺儒术，于今为盛，盖因颜谢徐庾之风焉”（明刘槩《成化记》）。“其民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苏轼《表忠观碑记》）。在这个从“尚勇”到“崇文”的社会风气的转变过程中，虽然未必绝对，但晋“永嘉之乱”后文人的大量南迁避祸，无疑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再如：

蕲春人性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隋书·地理志》）。

可见“平陈”对蕲春风俗变更的作用也是明显的。当然，历史的作用不仅限于对传统的改变，更在于对传统的保守和延续。徽州地区宗法制度的保持与传承就是明显的例证：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渗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甲，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合度”（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二）。

“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家，未尝散处；千载之谱，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新安旧志》）。

如此森严的宗法制度，无疑对徽州文化的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这两大因素，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地域文化的形式和发展。“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九十杂述》）。黄宾虹先生一语道破了个中三昧。

当然，作为一门兼济古今的“新学”，地域文化的研究不会仅限于对民俗风情的直观探讨，也不会停滞在对旧说的注释与阐述上。它将用科学的历史观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组合

形式和流变方式，进而探索其深层结构。立足于这一文化视角，我们将从中国传统形式的“大一统”和观念的“大一统”的背景下，看到一组生机勃勃的文化景观。

“新学”的建立，还须要有新的研究方法相伴。在地域文化的构建中，似乎大有改变方法的必要。我们知道人与文化密不可分。但就演化方式而言，人类生灭有序，文化却变衍无常。我们以往许多文化学研究大概是受文化载体的生灭过程的影响，总是以时间为主线展开论说。这种方法便于一个学说的条理化，符合正常的思维方式，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值得申明的是：这不是惟一的途径。以时间为主线的研究是一种线性的（或称“一维的”）研究，这不可能涵盖人类的全部文化。因为某一文化的形成、演变或进步过程，不完全是按照时间排序的，时间仅表现了文化的流变方式，却不能完整地反映文化的组合形式。应当看到：文化既赋予现实以意义，又需要现实的承载。而现实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只有在这种时空构造中，文化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基于所谓“文化时空观”的臆想，我们不妨把文化作为环境的一个“人造部门”，在地理与文化相纽结的背景下，展开一种立体的（三维的）文化学研究。在这里，时间已成为“匆匆过客”，为一幕幕历史活剧提供变换的可能；空间却上升到了主导地位，成为文化存在的根据。只有按照这样的方法展开论说，我们才能认清文化全方位占有人类的事实。其实所谓方法的改变，只是时间与空间的错位，这种主次交换的最基本的心理依据是：地球是人类永难变换的载体，我们不能忽略它的存在和它的文化学意义。

显然，以空间为主线的研究具有非传统的特征，但它不

是反传统的，而是对传统的一种发掘和再认识。其实古代的学术思想流派常常有明显的地域性，《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著作甚至用地名标志学派。侯外庐先生明白地指出：

“各个学派的流传分布，往往也有其地域特点，大略的形势可以描述如下：儒墨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楚、秦发展。道家起源于南方原不发达的楚、陈、宋。后来可能是随着陈国的一些逃亡贵族而流入齐国。楚人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巫鬼’宗教，同样在北方偏于保守的燕国和附近的齐国，方士也很盛行，后来阴阳家就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周、卫位于各国之间的交通孔道，是商业兴盛之区，先后产生了不少专作政治交易的纵横家”（《中国思想史纲》）。

这种带有地域特征的学派分析，使我们进一步感受到强烈的空间意识。

界说已划定，基础已莫立，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当我们拂去岁月的风尘，步入中华文明的千年古殿，一种无名的压迫之感流变于心头：时间逝去了，历史活剧收场了，旷野也在不断地改变着模样。那高耸的山峰可曾记录着古战场铁马金戈的喧嚣？那残存的断壁是否映照着连云接日的霓裳舞姿？美里的著草、天坛的净土、东海的蜃景、西域的驼铃……这些浸润着一个偌大民族古老精神的自然景观，潜藏着哪些深不可测的文化内涵？时间逝而不返，它带走了壮景，淘尽了英雄，也湮灭了平民，留下的只有散在的文化遗迹和如峰

的圣典。在故纸的围迫之中，我们曾困惑，现在我们需要抖擞精神，为构建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再来一次艰难的起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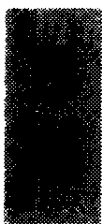
快到世纪末了。

人类在本能的驱动下，开始了又一个百年周期的小结。

我们还在探讨文化！

.....

1991年4月



第一章 绪论	1
一、岭南的得名	3
二、岭南的范围	5
三、岭南的自然环境	7
四、岭南的土著民族	9
五、岭南文化的形成	12
六、岭南文化的区域组合	16
七、岭南文化的特点	24
第二章 鸿蒙初开 大业草创	29
——远古的岭南文化遗存	
一、令人惊喜的重大发现	30
二、洪荒窈冥的石峡文化	34
三、有争议的西樵山文化遗址	38
四、漫长的新石器时代	41
五、不发达的青铜文化	45
第三章 兼收并蓄 源远流长	48
——吸引中原及各地文化	
一、伟大的和平进军	49
二、南越国、南汉国的功绩	54
三、乱世每多南迁客	60
四、外来官员的勋劳	66
五、四方贤俊聚南疆	71
第四章 互相促进 共同提高	76
——长期对外文化交流	
一、扬帆南溟溯自秦汉	78
二、通航西亚在于魏晋南朝	82

三、直达东非畅说隋唐	86
四、舳舻相接喜叙宋元	90
五、远驶欧美共话明清	94
第五章 忧国爱民 与时俱进	101
——提倡改革、革命的政治思想	
一、要求整顿吏治	102
二、倡议维新变法	105
三、发动武装革命	110
四、最早宣传社会主义	117
第六章 赤胆忠心 气贯长虹	122
——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	
一、维护国家统一	122
二、抵抗外族入侵	125
三、高举反帝大旗	128
四、热心乡邦建设	132
第七章 为国育才 济世利民	136
——迎头赶上的教育	
一、政府主持的官学	136
二、民间兴办的私学	141
三、教育与学术研究结合的书院	145
四、仿照欧美教育制度的学校	150
第八章 群贤接踵 硕果丰盛	156
——独树一帜的学术研究	
一、历久不衰的经学	157
二、自成一派的理学	162
三、颇有特色的实学	168

四、富于开拓的史学	172
第九章 才士辈出 鸿篇相继	177
——反映现实的文学创作	
一、朴实明畅的散文	177
二、气势雄直的诗篇	187
三、属辞雅健的词作	198
四、后起之秀的小说	201
五、异彩缤纷的说唱文学	207
第十章 百花齐放 各呈异彩	212
——融合创新的艺术流派	
一、绚丽多姿的地方戏剧	212
二、悠扬动听的各种器乐	220
三、享誉国际的岭南美术	223
四、急起直追的广东书法	229
第十一章 藏于名山 传之宇内	236
——迅速发展的出版事业	
一、岭南印刷术探源	237
二、扬名后世的私家刻本	239
三、显示政绩的官府出版	243
四、促进教学的书院刊印	247
五、牟取厚利的书坊雕鏤	249
六、传播新知的近代报刊	251
第十二章 同声异调 顿挫抑扬	255
——互不相通的方言土语	
一、流行较广的广州话	255
二、系属闽南的潮州话	259

三、接近普通话的客家话	261
四、各种小范围内的方言	262
第十三章 岭峽毓秀 江海钟灵	265
——美不胜收的名胜古迹	
一、浩气长存的革命遗址	265
二、年湮代远的古建筑物	268
三、罗浮青葱韩江萦回	272
四、北江沿岸名刹多	274
五、祖庙、西樵和鼎湖	276
六、名园、古寺及其他	278
附录 岭南古代文献主要书目	281
后记	284
编者后记	285

第一章 绪 论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之一，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卓越贡献；而颇有地方特色的岭南文化，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化增添丰富的内涵，并推动其向前发展。

放眼世界历史，曾经显赫一时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后来均分崩离析。可是两千多年来，尽管中国多次遭到外敌入侵，出现内部动乱，但至今仍保持大一统的局面，诚属人类历史的奇迹！这奇迹的出现，就在于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与同化力。不仅如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华文化善于吸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从而使中华民族能顺应世界潮流而不断前进。

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中华民族便创造了辉煌的黄河流域文化，成为世界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与北非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文化、西亚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文化、南亚古印度的印度河与恒河流域文化互相媲美。而在公元前两百多年，岭南地区就已经成为东、西

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先后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取得直接、间接的联系。

岭南先民冒着狂风恶浪与海盗剿杀的危险，扬帆远航，输出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和其他商品，不仅丰富了世界各地人民的日常生活，活跃了各地的市场贸易，也有助于中国农副业、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及其他发明，也循南方海路传往西方，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由于政府使者的互相访问，贸易团体的彼此往来，宗教信徒的传道取经，人民群众到对方定居谋生，得以弘扬海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岭南热情接待海外来客，积极输入各国特产，大力引进作物品种，先后汲取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的哲学、文学、医药学、数学、天文学、历法、美术、音乐、雕塑、建筑艺术、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对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岭南文化的功绩，如上所述，足以彪炳史册。但是，岭南文化的发展，却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无庸讳言，早期岭南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而僻处边隅的岭南先民，山居野处，至今尚未发现当时的城市遗址，甚至极少发现大型村落遗址，而且没有发现文字！因此先秦时期的岭南情况，缺乏可靠的记载。至于汉魏以后才出现的关于岭南各种传说，则多属荒诞无稽之谈。经过考古工作者长期的艰苦努力，人们从出土文物得知，岭南文化源远流长！

洪荒之初，岭南先民凭着优越的自然条件，过着较好的渔猎生活；依靠简单的石器工具，进行原始的农业生产，渡

过漫长的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以及不发达的青铜时期。当历史进入秦汉大一统的时候,岭南并入中国版图,在中华文化的推动下,岭南社会从此出现重大的变化,不仅同内地密切联系,而且同海外长期交往。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的经济、文化逐渐东移南迁,岭南受益良多。逮及唐宋,海上交往比前频繁,岭南经济蒸蒸日上,文教事业长足发展,浸浸然有后来居上之势。元明两朝,超越前世。尤其是清朝中叶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很多重大事件,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至辛亥革命,均在岭南发生或与岭南有关。岭南文化的潜力经过长期蕴积,终于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领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一、岭南的得名

在辽阔广袤的神州大地,沿着江西、湖南与广东、广西四省(区)的边境,有一系列由东北走向西南的山脉,蜿蜒曲折,人们称为“五岭”。

“五岭”之名,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史记·张耳陈馥列传》:“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疲敝。”然而《史记》没有说明何为“五岭”。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注释是:“裴氏(即裴渊)《广州记》云,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斯五岭。”可是晋朝邓德明《南康记》认为五岭是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后人考证:始安岭即越城岭,临贺岭即萌渚岭,桂阳岭即骑田岭,而揭阳岭则各家说法不一,至今

没有定论^①。到了宋朝，周去非《岭外代答》提出：“自秦世有五岭之说，人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州）入广东之循（龙川）、梅（县），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大馮）逾大庾（岭）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州）入连（县），三也；自道（县）入广西之贺（县），四也；自全（州）入静江（桂林市），五也。”其实入岭之途甚多，决非五路，因此周去非的论点未为大众所接受。

“五岭”在中国南部，亦称“南岭”。“南岭”以南，称为“岭南”，此名始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这是说：“各地物产有少有多，民间习俗也因而不同，太行山之东吃海盐，太行山之西吃池盐，岭南、漠北，有许多地方产盐，情况大致是这样。”“领”、“岭”两字，古代通用。此后关于岭南的称谓甚多，即使同一作者在同一著作中，也有几种不同的称呼，令人眼花缭乱。

先秦时期，岭南的主要居民是百越族，秦末汉初曾建立南越国，因而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称岭南为“南越”。而东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则称岭南为“南粤”。“越”、“粤”两字，古代通用。《汉书》概用“粤”字代替“越”字。时至今日，“越”是浙江的别号，“粤”是广东的简称，两者就大不相同了。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马援列传》：“峤南悉平”。称“岭南”为“峤南”，峤者岭也，容易理解。可是范晔《后汉书·南蛮列传》载：“秦并天下，始开领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接着又载：马援“徙其渠帅三百馀口于零陵，于是岭表悉平。”

^① 徐俊鸣：《岭南历史地理论集》，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90年。

“领外”、“岭表”词义相同，意即五岭之外，均为岭南。一书之内，把岭南称为峤南、领外、岭表，随意性很大，用词极不规范。

唐朝姚思廉《陈书·高祖本纪》：“长驱岭峤，梦想京畿。”称岭南为岭峤，大概是岭南多山之故。宋朝欧阳修等撰《新唐书·李靖列传》：“以岭海陋远，久不见德，非震威武、示礼义，则无以变风。”这是因为岭南北依五岭，南临大海，故有此词。“岭海”两字颇富诗意，遂常见于唐人诗文中。

在行政区域划分上，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十道，在五岭以南地区设置“岭南道”，“岭南”从此成为官方正式确定的地名，因而被长期广泛使用。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分全国为十五路，在岭南设置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为此当时人们称岭南为“广南”。到了元朝，个别人士称“岭南”为“岭广”，此词见于明朝宋濂等撰《元史·郝经传》：“岭广之兵尽集长沙”。由于“岭广”并非行政区域名称，而且元朝统治的时间较短，故“岭广”一词少人使用。

从《史记》开始，两千多年来，“岭南”已经成为众人皆知的地理名词。

二、岭南的范围

岭南的范围，简单地解释，凡属五岭以南，即为岭南地区。其实不然，它因时代递嬗而有所变化。总的来说，从东汉后期开始，其范围逐渐缩小。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进军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其范围包括今广东大部分和广西东部。后来赵佗据此建立南越国，积极向外发展，占有骆越人居住的

红河三角洲^①，辖区较前扩大。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出兵废除南越国，乘胜扩大疆土，在岭南设立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阯、九真、日南等九郡^②。其中儋耳、珠崖两郡在海南岛；交阯郡在今越南北部，郡治羸陵（今越南河内附近）；九真郡在交阯郡之南，即今越南清化、河静两省及义安省东部，郡治不详；日南郡在今越南中部，郡治西捲（今越南广治省广治河与甘露河汇合处）。到了东汉后期（公元2世纪中叶），朝政腐败，国势陵替，无力保护边远地区，日南郡境逐渐为林邑国所占领。其后九真郡境也逐渐缩小，至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被废。隋、唐两朝所设九真、日南两郡，乃是侨置郡，已非汉朝原来的辖境。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府治在宋平（今越南河内）^③。此后人们一直称交州为“安南”，不以“岭南”视之，因为交州距离“五岭”甚远，其间还有高山大河阻隔。唐末五代期间，各地藩镇纷纷割据自立，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年），安南节度使杨廷艺部将吴权据交州独立^④，从此脱离中国版图，这就更不属于岭南范围了。

宋朝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广南西路的辖区包括化州、高州、雷州、钦州、白州、郁林州、廉州、琼州、昌化军、万安军、崖州。到了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上述地区（郁林州除外）设置海北海南道^⑤。其中琼州、昌化军、

①②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

③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地理志》。

④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1；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⑤ 宋濂等：《元史·地理志》。

万安军、崖州位于海南岛，宋朝已有“海南”之名。海南岛在大海之中，少数民族较多，语言、风俗和大陆不同，一向被视为独特的地区，不以“岭南”称之。及至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把海北海南道及郁林州划归广东管辖^①。此后广东与广西之间的省界屡有变动，但广西大部分地区不属于岭南之内。

现在，人们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岭南”作为广东的代词^②。广西东部本应属于岭南地区，只因面积较小，好些有关岭南的书籍往往略而不言。

三、岭南的自然环境

岭南是个奇异的地区，背依逶迤的五岭，面临浩瀚的南海，地形复杂，气候独特，自然景色、居民生活习俗均与外界不同，所以唐朝韩愈诗中对岭南就有“事事皆殊异”的观感^③。

五岭并不险峻，海拔一般为1000米左右，从全国范围来看，算不上是高山，然而它东起大庾岭，西迄越城岭，曲折延绵，长达1400公里^④。尽管有好些低谷山口，但毕竟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对冬季从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有一定的阻挡作用，因此岭南冬季少见霜雪。在古代，五岭还妨碍了南北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① 张廷玉等：《明史·地理志》。

② 陈永正主编：《岭南文学史·编写说明》：“岭南，本指五岭以南地区，……后人沿用岭南为广东地区的代称。”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③ 韩愈：《送郑尚书权赴南海》。

④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岭南地区大部分在广东省内。广东遍布山地、丘陵，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①。在广东东北部有九连山脉、罗浮山脉、莲花山脉，西北部有瑶山、大罗山，西南部有云开大山、云雾山、天露山等。丛山之间，有狭长的谷地和一系列盆地，因而河流纵横，珠江水系流经全省。珠江原指由广州经虎门入海的水道，现为西江、北江、东江的总称，分别流经广东的西、北、东部，西江是珠江水系的主流。广东东部还有韩江，西南部有漠阳江、鉴江、九州江等，直接流入南海。这些高山大河，孳生万物，为岭南先民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先民采食大量蚌、螺等介壳类动物和猎取野兽，留下很多贝丘遗址，其中往往含有石器、骨器和陶器，使后人得以获知岭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情况。

全省水上交通方便，西江上通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北江上通湖南、江西，东江上通江西，韩江上通福建，本省沿海港口从海道可通往全国及世界各港口，这就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大小河流的沿岸形成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农业发达。珠江、韩江带来大量泥沙淤积而成的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是人们乐道的鱼米之乡。

广东位处低纬度地带，冬短夏长，阳光充足，四季实际上不大明显，夏日很少酷暑，冬天没有严寒。隆冬时节，寒潮通过骑田岭、大庾岭的缺口入侵，会出现霜冻，但为时甚短，寒潮一停，很快就大地回暖，因此适宜栽培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由于面临南海，夏秋两季常有台风暴雨。台风较多，洪水为患；台风较少，出现干旱。冬季全省都比较少雨。旱涝频繁，是岭南气候的特点。

^① 吴郁文主编：《广东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值得提出的是：北回归线横贯广东中部，太阳垂直照射，水分蒸发大，因而全世界在回归线附近的地区，几乎都是沙漠或干旱草原，著名的如北回归线附近有西南亚阿拉伯大沙漠、北非撒哈拉沙漠，南回归线附近有澳洲维多利亚大沙漠、南非卡拉哈里沙漠等，故有“回归沙漠带”之称。可是广东蒙受海洋季风之赐，雨水较多，不但没有变成沙漠或干旱草原，而且农、林、牧、渔业都很兴旺。尤其是在北回归线附近的鼎湖山、西樵山、罗浮山等，森林茂密，瀑布高悬，不少珍稀动植物在此繁殖。而且从东晋开始，人们陆续在此建筑寺观、书院，成为佛教、道教胜地和硕学鸿儒传业授徒之所。

广东大陆海岸线长达3368.1公里，海岸曲折，港湾众多，居全国各省（区）之首。在北部湾与雷州湾之间的雷州半岛，是继辽东、山东半岛之后的全国第三大半岛。全省沿海共有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759个，岛屿海岸线长1649.5公里（大陆和岛屿海岸线均不包括香港、澳门和东沙群岛地区）^①，这就为广东的海洋渔业、运输业和对外交往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

得天独厚的岭南大地，孕育出别具一格的岭南文化。

四、岭南的土著民族

岭南的土著居民是越族。越族的得名，多数学者用文化特征来解释，认为该族首先使用“钺”这种工具、武器。“钺”是扁平穿孔石斧，可作砍杀用，以后演变成青铜铸造的

^① 《广东年鉴·基本概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铜钺，成为越族的象征物。也有人认为：春秋末期，有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句践以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为中心，建立越国政权，所以此族被称为越族。越族不是自称，而是中原华夏族对它的称呼^①。

关于岭南越族的来源和分布地区，班固《汉书·地理志》载：“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按照这个记载，越族分布于汉朝岭南九郡，是大禹的后代，来自今浙江绍兴一带。

岭南越族是否大禹的后代，引起人们争论。晋朝臣瓚（其人不可考）《汉书集解音义》不同意《汉书》的记载，他认为：“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按《世本》，越为半姓，与楚同祖，故《国语》曰‘半姓夔越’，然则越非禹后明矣。又半姓之越，亦句践之后，不谓南越也。”其意见可归纳为：一、越族分布甚广，从现在的越南北部到浙江北部，种姓繁多，称为百越；二、百越混合居住，各有种姓，不能都说成是大禹的后代；三、越族与楚族有渊源关系，南越也是如此。唐朝颜师古不同意臣瓚的意见，他认为：“越之为号，其来尚矣。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于越地耳。故此《志》云其君禹后，岂谓百越之人皆禹苗裔？瓚说非也。”这是说：一、越族有悠久的历史；二、《汉书·地理志》说大禹后代少康的庶子封地在越，并非说百越族都是大禹的后代。其实，禹和少康都是传说中人物，传说不等于历史，未可尽信。确实可靠的是，越族来自当地原始居民。至于百越并非同一来源，应属显浅易见，无庸赘议。

^① 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还有人认为：越族与东南亚的马来族同族^①，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岭南的越族，一说是“百越”。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秦始皇“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百越”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代吕不韦辑《吕氏春秋·恃君览》：“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馀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东汉高诱《吕氏春秋注》：“扬汉之南”是“扬州、汉水南”；“百越”是“越有百种”；“敝凯……驩兜之国，多无君”，是“皆南越之夷无君者。”南越在先秦时期只有部落，并无国家，这个记载是可信的，因为岭南至今尚未发现先秦时期的城市遗址。

岭南的越族，另一说是“南越”。“南越”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这一来，岭南的土著民族，究竟是百越，抑或是南越？《史记》就含糊不清。对此，唐朝杜佑《通典·州郡典·古南越》载：“自岭以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唐虞三代纯属历史传说，不足为据。杜佑把百越与南越混为一谈，亦属不妥。

其实，“百越”乃越族的总称，这从东汉高诱和晋朝臣瓚的解释中已很清楚。南越乃百越中的一支。至于百越的分布，根据史籍记载得知：句吴在今江苏南部、安徽东部和浙江北部；扬越在今江西；于越在今浙江；瓯越在今浙江南部；东越在今福建与浙江、江西部分地区；闽越在今福建北部、浙江南部；南越在今广东；骆越在今广东、广西、贵州及越南北部；西越在今广西及广东部分地区；夔越在今湖北西部和

^① 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四川东部；夷越在今云南、贵州及湖南；滇越在今云南。越族在新石器时期以有肩石斧、有段石镞与几何印纹陶器为共同的文化特征，这说明越族之间联系密切。岭南土著居民主要是南越，但也有西越、骆越、闽越居住，以及扬越、夷越、滇越等前来活动，可能是这个原因，岭南土著居民又被称为百越。

从秦末开始，百越族有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另一部分则与现在的壮、侗、黎、水、傣、畲、瑶、布依、仡佬、高山等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到了宋朝以后，中国文献上不再出现关于“百越”的记载。

五、岭南文化的形成

岭南文化是在土著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中原及各地优秀文化，并吸收海外文化精华，从而形成富有活力和地方特色的本地区文化。

早在远古时代，岭南就有人类居住，1958年在广东曲江马坝镇狮子山洞穴中，发现“马坝人”不完整的中年男性头骨化石一具，用铀系法测定，距今约12.9万年，其形态介于“猿人”和“新人”之间，属于早期“古人”，它比“北京猿人”进步，并与“北京猿人”有密切的亲缘关系^①。这个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扩大了中国远古人类的分布范围，而且填补了中国人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②。

1984年清理马坝人化石所在的黄色粘土堆积中，发现两

^①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件用砾石打制的砍砸器，这说明岭南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①。1978年在广东封开县河儿口村黄口山北面的峒中岩内，发现一枚人类臼齿化石，属于“新人”化石，距今约三四万年，或者更早一些。这个发现扩大了岭南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的分布范围^②。1960年在广东阳春县春湾独石仔洞穴、1961年在封开县河儿口村黄岩洞穴发现人工打制简单的砾石石器，这两处均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③。

岭南经历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④。从本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广东全省进行考古普查和探掘工作，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早、中、晚期的发展序列比较清楚，这充分证明岭南有自己的土著文化，并且有它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单从广东来考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粤北始兴、英德、连山和粤西罗定、封开、怀集、阳春等县的石灰岩地区^⑤，当时有的原始居民仍然栖身于洞穴之中，以渔猎为生，主要使用简单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极少，而且制作粗糙，陶器也比较原始^⑥。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以潮安县陈桥村贝丘遗址、

① 宋方义、黄志高：《马坝人化石地点发现石器》，《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4卷第2期。

② 邱立诚等：《广东封开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5卷第4期。

③ 莫稚：《广东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收获》，广东《文博通讯》第11期，1980年。

④ 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⑤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 岭南历史开新篇》，载《考古工作三十年》，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

⑥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县（英德）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61年第11期。

增城县金兰寺下层贝丘遗址为代表^①，出土有打制和磨制的石器、骨器以及彩陶片，渔猎经济比较发达，还可能兼营原始农业^②。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几乎遍及全省，以曲江县石峡遗址（即狮子山的狮头与狮尾之间峡地）、增城县金兰寺中层贝丘遗址、佛山市河宕遗址为代表。金兰寺中层贝丘遗址出土用粗砂红陶制成的陶祖（男性生殖器），说明这时岭南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石峡遗址出土的石镞、石铲、石镢，说明岭南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主要劳动力由原来的妇女转为男子承担；出土的陶器多为轮制和模制，说明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成为相对独立的部门；少数墓主拥有制作精美的玉琮、玉璜、玉璧，象征其特殊地位，显示出阶级剥削和压迫，原始社会走向瓦解。因此，考古工作者确认其为岭南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一，1977年正式命名为“石峡文化”。初步确定其跨越的年代，大约是从公元前三千年至公元前两千年，长达一千年之久。目前所知，石峡文化主要分布在北江、东江流域，与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诸原始文化（如良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甚至与山东沿海等地的诸原始文化（如大汶口文化）有直接、间接的交往和相互影响^③。

岭南多山地、丘陵，百越族长期分散居住在林壑之中，至今极少发现先秦时期较具规模的村落遗址，由于缺少广泛的

①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 岭南历史开新篇》，载《考古工作三十年》，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社会联系，生产技术的交流、提高受到限制，所以社会发展缓慢，很迟才进入青铜时代。目前广东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1974年在信宜县松香厂出土的西周铜盃，工艺精巧，造型、纹饰都具有中原地区文化特点，显然由外地输入。至于广东最早铸造的青铜器，则是1974年在饶平县顶大埔山出土的铜戈，其形制与外地所见差异很大，工艺较劣^①。大概至迟在春秋时期，岭南已能铸造青铜器^②，铸件大多质量粗糙，体形薄小，纹饰简单，兵器较多，农具极少^③，这反映当时岭南农业生产尚属原始状态，农具主要用木、石制成，青铜文化处于不发达阶段。虽然在战国后期发现铁器，但只发现铁口锄、铁斧两件^④。这说明岭南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容易接受外来先进文化。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进军岭南，这是岭南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从此岭南正式并入中国版图，建立郡县，修筑城邑，大量采用铁制兵器农具，中央政府大规模移民前来，以不可阻挡之势，输入内地文化。秦末汉初，龙川令、行南海尉事赵佗（今河北正定县人）在岭南建立南越国，全面采用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严禁百越互相残杀的恶习，百越同“中县民”（即内地移民）相处融洽^⑤，使岭南社会文化迅速向前发展。其后，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出

①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 岭南历史开新篇》，载《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② 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③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考古集刊》第1集，1981年。

④ 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⑤ 班固：《汉书·高帝纪》。

兵废除南越国，此后岭南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更好地吸收中原和各地优秀文化。

由于岭南面临南海，成为中国海上对外交往的重要地区。西汉时期，番禺（今广州）是全国19个都会之一^①，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里长期输出丝绸，输入珠玑、宝石、象牙、药物、香料和精美工艺品^②。两晋南北朝时期，南亚高僧络绎前来广州，译经传教，广州成为当时三大译经中心之一（其余为洛阳、建康），传入印度文化。唐宋时期，大批波斯、阿拉伯商人前来广州贸易，传入阿拉伯文化。明清时期，西方商人、传教士前来岭南，传入欧美文化。岭南长期输入外来文化，不仅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容，而且有助于中华文化的发展。

六、岭南文化的区域组合

岭南地域辽阔，山川纵横，互相阻隔，因而居民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各不相同，这就形成多种不同的文化风格。由于语言是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群体生活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作为社会成员，每个人都要掌握某种语言，这同时也就掌握了语言中所包含的该社会的文化。为此，根据语言来区分，岭南主要有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在小范围内还有雷州文化、海南文化、桂东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它们之间各有特点，也有共性，这就组成岭南文化。

①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②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 广府文化

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主体，它以广州为中心。早在南北朝时，梁、陈两朝均设广州都督府，其后隋、唐设广州总管府，明、清设广州府，因此俗称广州为广府。

秦始皇进军岭南，任嚣率领由“尝逋亡人（曾经逃亡的罪犯）、赘婿（贫穷入赘于女家的男子）、贾人（商人）”组成的军队，首先进驻番禺（今广州），随后由中原和各地前来的移民络绎而至，他们同当地越族人士共处，语言上互相融合，从而产生粤语，也称广府话、广东话、广州话、省城话、白话。历代广府管辖的地区为珠江三角洲，然而粤语流通的范围远不止此，包括广东境内的西江流域和部分北江、东江流域，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的部分地区，以及海外广府侨民聚居之处。

从秦末汉初开始，两千多年来，广州一直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不少中原人士前来贸易致富^①，加上早期移民就有不少贾人（商人），因此居民商业意识浓厚，为了追求利润，勇于冒险，富有开拓精神，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潮，不少人在沿海各大港口经商，以及前往南北美洲、澳洲、东南亚、日本等地侨居谋生，他们不忘故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广府人士重视教育，捐资办学、公款（地方上的学田和家族祭祖的田租收入）助学很普遍。唐、宋以来，人才辈出，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成果斐然。用粤语演唱的粤剧、粤曲和

① 班固：《汉书·地理志》。

说唱文学，广泛流行。手工业产品制作精美，素被称为“广货”，与“京货”相提并论，“京广杂货”脍炙人口，受到高度好评。其中“广绣”全国闻名，与苏绣、湘绣、蜀绣媲美；广州玉雕、牙雕、石雕、砖雕、木雕、角雕精美绝伦；“广彩”（彩图瓷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广式家具”选材名贵，雕工精致。城乡茶楼酒馆众多，讲究饮食制作，广州菜享誉海内外。

2. 潮汕文化

潮汕文化以潮州市为中心。古代潮州府治在今潮安县，西汉初年是揭阳县地，历史悠久；汕头市则是新兴海港城市，潮、汕均位于韩江三角洲，接近福建，当地居民原属闽越。汉朝以来，闽南、中原和各地人士不断移入，逐渐形成近似闽南话的潮州话，也称汕头话、福佬（即福建佬之意）话，流行于韩江、东江流域部分地区和沿海有些地方，以及海外潮汕侨民聚居之处。潮汕风俗也和闽南相近，所以宋朝王象之《舆地纪胜》说：“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漳、潮之分。”可见潮汕与闽南在文化上同属一系。

潮州早在唐朝就是对外通商口岸，所以潮汕人士善于经商，富有创业精神，在沿海及海外进行贸易，十分活跃，尤其是在泰国，前往侨居者甚众。潮汕地少人多，为了增产粮食，实行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技术高超。

潮汕文教事业发达，从唐朝以来就重视办学。用潮州话演唱的潮剧，多姿多彩；潮州音乐优美动听；潮州金木雕是高雅的建筑雕刻艺术；潮汕抽纱工艺精美；民间玩具品种繁多；各种装饰物制作精美，色彩绚丽；枫溪瓷器驰誉海内外。

潮汕人士很讲究饮“工夫茶”，茶具精致小巧，泡茶有一定程式。潮州菜与闽菜同源，兼收广州菜、江浙菜和西餐之长，风味独特。

3. 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以梅县市为中心。关于客家的来源，好些人士认为：客家先民来自中原，由于逃避战乱，两晋时迁往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一带，唐末五代时迁至广东北部、东部，南宋时继续迁徙，明、清两朝迁往广东中部、西部以及广西、四川等地^①。但也有人认为：客家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有的说是苗族的一支（见《四会县志》），有的说是瓯越的后裔（见《中国輿地志》），有的则说是公元前聚居于山东等地的外族，等等^②。但是客家人不同意上述论点，自认是正统汉族。

客家话接近中原汉语，主要流行于广东的东江、北江流域部分地区和粤中、粤西某些地区，以及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台湾、海南等省（区）的局部地区，还有海外客家侨民聚居之处^③。

客家人在长期迁徙中，由于群体观念强烈，宗族思想浓厚，往往聚族而居，在好些地方出现客家村、客家乡，从而保持其客家文化的特征。农村中古老的客家民居，形同城堡，建筑风格独特，给人以很好的安全感。

客家人刻苦耐劳，具有鲜明的开拓意识，不少人离乡别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湾古亭书屋印行，1981年版。

②③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井，创业营生，甚至远走海外，谋求发展。对文化教育很重视，尊师重道，勤奋读书，因此过去梅县有“文化之乡”的美称。客家山歌内容丰富，作为交际工具，彼此唱和，抒情达意，成为生活中一大特色。兴梅汉剧（即外江戏）现改称广东汉剧，流行于东江、韩江流域。客家人很重视烹调技术，客家菜又名东江菜，浓郁可口，别有一格。

4. 琼雷文化

雷州文化和海南文化历史悠久，有很多相近之处，因而有人合并称为琼雷文化^①。

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原始居民都是骆越族。从两晋开始，不断有汉族人士经福建南部、广东潮州沿着海岸线来到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从而逐渐形成雷州话和海南话，所以雷州话和海南话接近，同潮州话一样，与闽南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雷州话流行于雷州半岛及广东西南部分地区，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处。西汉时候，在半岛南部的徐闻、合浦设置“障塞”^②，驻军巡守，成为海防要地。半岛北部的湛江市，原名广州湾，是中国南方的重要海港。与雷州半岛隔琼州海峡相望的海南岛，港湾众多，对外联系密切，岛上汉人流行海南话。海南岛很早就接受中原文化影响，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此岛东北部设置珠崖郡，次年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此岛西部设置儋耳郡。其后，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设置崖州，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

① 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班固：《汉书·地理志》。

年)设置琼州府,故俗称海南岛为琼崖。

雷州和琼崖人士均擅长经商,勇于开拓,不少人在海外创业。雷州歌互相唱和,饶有风趣。用雷州话表演的雷剧,唱腔讲究平仄韵脚,喜剧吸收舞蹈动作,剧团常到海南岛演出。用粤西白话(当地粤语)演出的粤西白戏,唱词通俗易懂,流行于雷州半岛和广西合浦。琼剧又名海南戏,传统剧目比较丰富,剧团也常到雷州半岛演出。海南岛临高县的临剧,继承木偶戏的优秀表演艺术,唱词自由灵活。雷州半岛海域盛产贝类生物,湛江等处贝雕艺人利用贝壳雕刻成各种工艺品,熠熠生辉。海南岛盛产椰子,椰壳坚硬,可雕刻成日用工艺品,海南椰雕驰名远近。

5. 桂东文化

桂东文化没有地区特点,这是省界多次改动所致。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把宋朝广西东部的雷州半岛及附近州县和海南岛划归广东;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把湖南的全州、灌阳划归广西桂林府。其后广西与广东的省界又一再调整,行政区域的变化,影响地区文化风格的形成。

岭南的划分以五岭为界,五岭中最西的是越城岭,位于广西东北部和湖南南部,主峰苗儿山在广西兴安县境,西江的支流桂江发源于此,因而桂江流域以东被视为岭南地区。有人认为柳江流域也属岭南,查柳江发源于贵州独山县南部,已偏离五岭甚远,不宜划入岭南。

桂东文化源远流长。1960年在广东灵山县(1965年划归广西)城郊马鞍山的东胜岩、葡地岩、洪窟等岩洞中,发现分别属于四五个个体的人类化石,距今约数万年之久,被命

为“灵山人”，属于“新人”化石，其特征与广西中部地区于1956年在来宾县麒麟山盖头洞发现的“麒麟山人”化石、1958年在柳江县通天岩洞穴发现的“柳江人”化石接近^①。“灵山人”化石洞穴内有炭屑、烧土和烧骨等遗物，这说明当时已掌握人工取火，出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1973年在桂林市郊独山甌皮岩洞穴内，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人骨经鉴定属蒙古人种，其体质形态上同“柳江人”比较接近，两者有继承关系^②。

桂东地区流行桂林话，也流行广州话、客家话和少数民族语言。用桂林话演唱的桂剧，优美动听，流行于广西和湖南、广东部分地区。桂林三花酒、辣椒酱、腐乳和昭平豆豉等食品也很出名。

6. 少数民族文化

岭南的少数民族，在广东省内有壮、瑶、畲、回、满族，在海南省内有黎、苗、壮、回族，在广西东部有壮、瑶、回族等。他们均有本族的语言、服饰、风俗，在民族文化上各呈异彩。

粤北和桂东、海南的壮族，古称僮人、俚人，自称布壮、布越、布侬，等等，因地而异。壮语的“布”，其义为“人”。壮族善歌，壮歌又俚歌，每年农闲或节日，在固定地点定期举行歌圩，每次一日或数日，参加者有数百至数千人之多，随编随唱，男女对答，气氛热烈。壮剧内容多是民间传说或历

^① 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三十年来广西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史故事。壮族妇女精于编织，“壮锦”在唐、宋时称为“绫布”，用原色棉纱为经、各色丝绒为纬，手工织成，图案雅致，鲜明绚丽，明朝列为贡品，并远销内地。

粤北、桂东的瑶族，隋、唐时称为“莫瑶”，宋以后称“徭”，自称为“勉”、“布努”、“拉珈”，等等，因地而定。多住在山区，村中民房一排排地建在山坡，因此汉族称其大村为“排”，小村为“冲”。瑶族擅长歌舞，每年春节、农历三月三和十月十六举行耍歌堂，祭祀祖先和欢庆丰收，场面十分隆重。瑶族的“瑶斑布”，其制作始于宋朝，蓝底白花，用蜡染而成，图案美观。

粤东、粤北的畲族，史称“畲民”、“峯民”，自称“山哈”，意即“客人”。居住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一般是几户或几十户聚居成村，很少有乡以上的聚居区，有些与汉族杂居一村。畲语接近汉语客家方言。重视祭祖，爱唱山歌，擅长服饰刺绣、腰带织造和斗笠编织。

海南岛的黎族，在隋朝称为“俚僚”，一般认为黎族是俚族的后代，自称为“赛”。多住在山区，极少砖屋，住宅构造分为船形屋和金字形屋两大类。船形屋用竹、木架设地板，离地面约半米，有的达两米，屋顶半圆形如船篷，覆以茅草，地板上铺席，以供坐卧，地板下饲养牲畜。金字形屋上盖为金字架，墙壁为竹木结构，抹以混有稻草的泥浆。妇女善于纺织，“黎锦”在宋朝已驰誉中原。过去少女有绣面的风俗，现已逐渐废除。

海南岛的苗族来自广西，其语言接近瑶族。苗族自称“果雄”、“模”或“蒙”，住在深山，很少聚居，每村一般只有三几户，多则十户八户，住屋用竹木茅草盖成，甚为简陋，便于迁徙。每村之间，往往相隔十多里至数十里，但经常互

通消息。男子擅长狩猎，妇女精于蜡染、刺绣，男女都爱好歌舞。

岭南的满族主要居住于广州市，与汉人杂处，采用汉族语文。回族主要居住于广州、肇庆、桂林等市，同样采用汉族语文，多信仰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在饮食、婚姻、丧葬、节日庆贺等方面，多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规行事。

岭南少数民族人数不多，1994年统计，在广东省只占人口总数的0.6%^①；海南省的少数民族比重较大，过去占全省人口总数13%左右；桂东地区也以汉族为主。因此，少数民族文化对岭南文化影响不大。

有人从经济角度出发，提出岭南的港澳文化、特区文化。由于香港、澳门分别于1997、1999年脱离英国、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届时其面貌必将出现重大、崭新的变化；而经济特区的建设则为时不长，文化尚未定型，现均不作论述。

七、岭南文化的特点

岭南文化能够独树一帜，举世闻名，并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积极作用，因为它具有显著的特点。

1. 兼收并蓄

岭南文化对各种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这是岭

^① 《广东年鉴·基本概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南文化充满活力的原因。

岭南早在远古时候就出现旧石器文化，因与中原等地交往不便，长期停留于新石器时代，直到商末周初才从外地输入青铜文化，这比中原地区要落后数百年至一千年。而且，岭南的青铜文化并不发达。可以说，岭南的土著文化尚未定型，所以对外来先进文化没有力量进行抗拒、排斥。当秦末汉初之际，中原等地的先进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岭南，立即为岭南全盘接受。其实，岭南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对外来文化实行兼收并蓄的过程。

再者，从秦汉开始，两千多年来，岭南一直对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从未闭关锁国，即使在明、清两朝实行“海禁”期间，岭南由于外交（接待外国使团）和财政（靠关税收入补贴地方军政经费开支）的需要，不得不照常维持对外交往。一个开放式的社会，为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提供了有利条件。

2. 勇于开拓

岭南文化富有开拓精神。岭南的居民，除了少数土著的百越族之外，大部分均属中原和各地移民。从秦朝末年年开始，移民活动从未停止。正常年份，商贾的贸迁，军队的移防，官员的调动，士人的讲学，促使外地人士前来岭南。而在天灾、战乱期间，更有大批移民前来。据宋朝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神宗年间，国泰民安，岭南的广州、端州（州治在今肇庆市）、南恩州（州治在今阳江市）、梅州（州治在今梅县市）、惠州、雷州等地，外来移民比本地居民还要多，有的甚至多好几倍。一般来说，在农业社会，普通百姓安土

重迁，保守成性，不轻易远走他乡。而作为移民前往新的地方谋生，必须具备进取精神，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均需刻苦耐劳，不畏困难，才能站稳脚跟，获得发展。岭南的外来移民超过本地居民，这就显示岭南社会具有勇于开拓的风气。

从唐末开始，由于战乱、对外贸易和耕地不足，岭南先民冒险犯难，陆续前往东南亚、澳洲和南北美洲等地，开辟草莱，建立家园，在参与当地建设方面成绩显著，并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明显的贡献。

3. 大胆革新

岭南文化很显著的优点是提倡改革、重视创新。由于岭南远离中央政权所在地，在古代交通和通讯联络不便的情况下，接受正统思想的束缚较少；同时长期与海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容易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潮。

在古代，东晋葛洪在罗浮山创立道教理论。唐朝惠能创立佛教禅宗顿悟学说，提倡独立思考，反对迷信权威；张九龄建议改革官员任用制度。宋朝余靖反对利用“祥瑞”来搞上下欺骗，要求切实为老百姓做好事。明朝陈献章标榜以自然为宗，冲破程朱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海瑞提出整顿吏治。到了近代，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康有为、梁启超鼓吹戊戌变法；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领导辛亥革命。海外华侨、归侨在岭南大力创办各种近代企业，引进最新技术设备，同时兴建新式学校、医院，均显示岭南文化的革新精神。

4. 讲求实用

岭南文化很注意讲求实用。由于岭南一向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商人长途跋涉，辗转贩运，备尝艰辛，目的是追求利润。岭南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民终岁劳苦，胼手胝足，耕耘灌溉，希望能获得丰收。因此，在岭南社会，看重利益，注意实效，成为普遍的观念，这有助于岭南社会的繁荣。

本来，儒家早就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岭南，到了清朝中期，外敌不断入侵，国家多故，民生困苦，整个社会形势促使有识之士振臂高呼，凡事不宜流于空谈阔论，一定要讲求实用。名重一时的南海“九江先生”朱次琦提出：“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①。其门人康有为对之甚表敬佩说：“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馀。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②享有盛誉的番禺“东塾先生”陈澧，反对学者陷入历史上长期纠缠不清的经学与理学的争端，提出：“窃冀后之君子，祛门户之偏见，诵先儒之遗言，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是区区之志也。”^③他还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惟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此之谓经学也。”^④

在前贤先哲的影响下，近代岭南在各方面都涌现出一批

① 简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谱》。

②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③ 陈澧：《汉儒通义·序》。

④ 陈澧：《东塾集·与黎震伯书》。

具有真才实学、埋头苦干的有志之士，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二章 鸿蒙初开 大业草创

——远古的岭南文化遗存

岭南地区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并入中国版图之前的历史，没有文字记载，只有通过考古研究才能获知其情况。

考古学者根据前人使用石制、铜制、铁制的谋生工具，把古代历史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它基本上和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相一致。

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有两三百万年之久。由于石器制作技术的不同，通常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使用打制石器，靠采摘、渔猎为生，具体又分为早、中、晚期。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出现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这是最早阶段的人类，岭南至今尚未发现“猿人”化石。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在广东曲江县发现“马坝人”化石，它比“猿人”进步，属于“古人”阶段。及至旧石器时代后期，在广东封开县发现“峒中岩人”化石，它比“古人”进步，属于“新人”阶段，接近“现代人”。

距今约一万年以前，历史缓慢地进入新石器时代，岭南的“现代人”广泛使用磨制石器，从事制陶、纺织、农业和畜牧业。制陶和农业的关系很密切，因为农业收获的水稻、小麦，必须使用陶器才能熟食。考古学者根据石器的形制和陶器的纹饰、用料、款式、硬度，确定出土文物的年代及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新石器时代又分早、中、晚期，岭南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仍属母系氏族社会，中期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出现“石峡文化”，这是富有岭南特色的地域文化。其后在中原等地影响下，岭南跨进青铜时代。

岭南在青铜时代仍未建立国家，没有官方文献，更没有私人著述，全靠考古工作者长期的辛勤劳动，把埋藏在地层深处的文化遗存陆续发掘出来，使人们得以窥见远古的面貌。

一、令人惊喜的重大发现

在岭南北部蜿蜒起伏的丘陵地区，即盛产优质稻米“马坝油粘”的广东韶关市曲江县马坝乡，有一座由石灰岩构成的小山，高约60—70米，海拔120米，外形很像威武的雄狮，当地称为狮子山。那朝南的狮头峰有一个岩洞，洞底至洞顶约10米，内有石钟乳、石柱。由于洞底比洞口低，雨水可以从洞外把泥土冲入洞内，同洞内的存土、杂物混合，形成堆积土层。

狮子山的东面，有一条矮小的泥岭山；北面有一条砂石底的马坝河，由东向西注入北江；南、西、北三面都是冲积地层，现在成了农田。十里内外，群山环抱。完全可以想见，在远古时代，这里气候潮湿温热，水源充足，草木茂盛，是飞禽野兽和水生动物繁殖的良好场所，也是早期人类活动的

乐园。

1958年5月，聪明勤奋的马坝乡农民看见狮子山附近稻田的水稻长势特别良好，怀疑这些稻田的土质含有天然肥料，为了调查肥源，追踪到狮头峰的岩洞内，发现洞内的堆积土层含磷肥高达33%左右，于是在6月间创办磷肥加工厂，大量挖取岩洞内的堆积土层，其中有不少动物化石，恰好这时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人到韶关市视察，得知这一情况，便指示当地干部要认真保护化石。其后，广东省文化局于8月底派出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前往调查，带回一批化石，和中山大学梁钊韬副教授等共同研究，他们万分惊喜，发现其中有一件是“古人”头骨化石。为了进一步取得确实结论，于是把这件化石送交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鉴定。该所很快就肯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类化石，并郑重其事地特派中国著名的古人类学专家裴文中、吴汝康、周明镇等由北京来到广东，会同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博物馆、中山大学、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工作者，共同前往现场勘察^①。

当初发掘时，有些化石遭到人为破坏，以致“马坝人”头骨某些部位残缺，后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把收集的“马坝人”化石：头顶骨三块、眼眶至前额骨一块、鼻骨一小块、右蝶骨连右颞骨一部分，加以粘结拼合，成了一个中年男性头骨的上部，其脑容量估计为1225毫升^②；前额的高度大于“北京猿人”，小于“山顶洞人”（属于“新人”），并

^① 广东博物馆：《广东马坝人类及其他动物化石地点调查简报》，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10卷第2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逐渐向后倾斜；眉脊粗壮而向前突出，左右互相连续，且稍向后收缩；鼻骨与“猿人”、“古人”相似，但比“现代人”宽大；头骨的厚度约 7.5 毫米，小于“北京猿人”，可是比“现代人”厚；其他一系列特征，都介于“猿人”与“现代人”之间，属于早期“古人”，具有黄色人种的某些面部特征。

“马坝人”生活的时代，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用铀系法测定，距今约 12.9 万年左右。它和“北京猿人”有密切的亲缘关系^①，但是比北京猿人进步。由于“马坝人”生活于“猿人”之后和“新人”之前，这就填补了中国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并且表明中国远古人类的分布从华北直至岭南，范围十分辽阔，因而这个发现具有重大意义^②。

在狮头峰的岩洞内，同“马坝人”化石一道采集得到的化石，最多的是野猪、牛、鹿，其次是虎、熊、獾、犀牛，再次是鬣狗、獾、羊、豪猪、鼠、兔、象、剑齿象、纳玛象、龟、蜗牛等共 19 种，这些动物为“马坝人”所捕食，留下的残骸成了化石，大部分是牙齿，骨骼较少，且多破碎，很难辨认，颜色多是乳白和浅黄两种，化石程度一般较深，绝大部分在同一堆积土层中发现^③，因而它们的生存应在同一时期，其中有些动物已经灭绝，这和人类的捕杀有关。

1984 年 8 月，广东考古工作者从过去狮头峰洞穴挖掘出来的黄色粘土堆积物中，发现两件砾石打制的砍斫器，一为长条形，一为扁圆形，共出的还有一批古脊椎动物化石。这两件石器的器形及打制方法原始粗犷，是岭南旧石器时代中

①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② 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1989 年版。

③ 广东博物馆：《广东马坝人类及其他动物化石地点调查简报》，载《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 年第 10 卷第 2 期。

期文化遗存。^① 由此可知“马坝人”主要靠渔猎谋生，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马坝人”过着流动分散的原始群体生活。

属于“古人”的“马坝人”化石，是目前岭南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这以后，出现了属于“新人”的“峒中岩人”化石。1978年8月，广东省博物馆、肇庆地区文化局和封开、怀集、德庆县文化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以及部分公社干部、社员组成洞穴考察队，在封开县渔涝区河儿口村黄口山峒中岩洞穴中，从黄褐色堆积物内发现一枚人类右上第二前臼齿化石，呈灰白色，石化程度略深，其形态与“现代人”的特征基本一致，属于“新人”化石^②，生活年代距今约3—4万年，或者更早一些。同时还发现一批用砾石打制的石器，制作粗糙，是岭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③。伴存的动物化石有中国黑熊、德氏野狸、无颈鬃豪猪、华南巨貘、中国犀、野猪、鹿、麂、牛等9种，除华南巨貘、中国犀已绝灭外，其余为现生种。“峒中岩人”的发现，扩大了广东境内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的分布范围，也填补了广东“新人”化石材料的空白^④。

“峒中岩人”比“马坝人”进步，在体质形态上接近“现代人”。从遗址出土的炭屑、烧骨、灰烬来看，“峒中岩人”已

① 宋方义、黄志高：《马坝人化石地点发现石器》，载《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4卷第2期。

② 邱立诚、宋方义、王令红：《广东封开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载《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5卷第4期

③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 岭南历史开新篇》，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④ 邱立诚、宋方义、王令红：《广东封开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载《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5卷第4期。

经掌握人工取火，过着比较固定而持久的群体生活，实行族外群婚，开始形成原始氏族公社^①。

岭南的人类社会在缓慢地向前发展，逐渐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也就是说，由使用打制石器进而使用磨制石器，由从事采摘、渔猎活动进而从事农耕、畜牧活动。

二、洪荒窈冥的石峡文化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中原地区，有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澠池县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在华东地区，有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的龙山文化，以及1959年首次发现于山东宁阳县堡头村和泰安县大汶口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在江南地区，有1936年首次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镇的良渚文化；在其他地区，也都先后发现当地有代表性的文化，而在岭南地区，则有1977年正式命名的石峡文化。

石峡位于广东曲江县马坝乡狮子山的狮头与狮尾之间峡地。1958年，狮子山的狮头峰岩洞因发现“马坝人”头骨化石而闻名于世。1972年，石峡发现古代文物遗址，接着于1973、1975、1976年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660平方米，发现柱洞、灰坑、灶坑、陶窑等遗存，清理墓葬108座，共出土随葬品2141件，为研究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分期、与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新文化的关系、探索中国原始社会解体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②

^① 宋方义、丘立诚、王令红：《广东封开、怀集岩溶洞穴调查简报》，载《古脊椎动物与人类》，1981年第19卷第3期。

^②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78年第7期。

石峡遗址的文化层，可分上、中、下三个不同时期。上文化层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文化遗存以“夔纹、云雷纹、方格纹组合的印纹硬陶”同少量磨光石器、青铜器共存为特征，硬陶中有不少釉陶；出土有敞口罐、矮圈足盘、矮喇叭足钵形豆、釉陶豆等残片和青铜钺、镞、篋刀及一件完整的原始青釉瓷钵。中文化层的年代相当于夏、商之际，文化遗存以“曲尺纹、长方格纹组合的印纹软陶”与较多的磨光石器共存为特征，出土有敞口折肩圜凹底罐、敞口短颈折肩圈足尊、高喇叭足细把豆、夹砂罐、陶器座残片和身与柄之间隆起的石铤、三棱圆铤石铤、陶纺轮等。下文化层的年代相当于商朝以前，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四至五千多年，文化遗存以泥质磨光陶、夹砂陶和大量的磨制石器共存为特征，出土有盘鼎、釜鼎、三足盘、圈足盘、豆、夹砂罐、釜等残片，各种鼎足和残石镞、石铤、石铲、砺石及较完整的梯形石铤、大小石凿、石铤、石片、石锤、陶纺轮等。

石峡遗址的下层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是岭南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一。石峡文化主要分布在广东北部，属于该文化的遗址，除石峡外，还有狮子山北面的李岭、曲江县龙归葡勺山的下层，以及北江流域的始兴县城南公社墨江南岸的新村等。此外，东江流域的龙川县坑子里、河源县小莞墟和珠江三角洲的宝安县大石寨等遗址，也发现类似的文化遗存。

石峡遗址的石器，主要有镞、铲、铤、凿、铤、钺、锥、网坠、石片、石棒和砺石等，多数是通体磨光，并运用切割、钻孔等技术，以两面进行钻孔的较多。众所共知，镞、铲、铤都是重要的农具，这些农具的大量出现，说明在石峡文化时

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岭南已进入发达的锄耕农业阶段。与此同时，在石峡遗址的墓葬、窖穴和作为建筑遗存的烧土块中，发现不少炭化的稻谷、米粒、谷壳、稻秆等，部分标本经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等单位鉴定，属于人工栽培稻，与现今岭南种植的籼稻、粳稻基本相同，以籼稻为主。这证明当时岭南已种植禾稻，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采集和渔猎经济还居次要地位。在有稻谷、米粒或农具的墓葬中，有的还伴有大量石镞、石钺等，可见墓主当属男性，这标志农业的主要劳动力已由原来的妇女改为男子。

石凿分平刃直口、卷刃凹口。卷刃凹口的石凿，刃口犹如现代木工圆口凿，可以凿出圆孔、圆槽，反映了石制木工工具的专门化。石器工具类别增加，原因为适应多种劳动的需要和提高劳动效能，这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出土的石器中，以石镞最多，共 574 件，占石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形制多样，磨制精细，它既是狩猎工具，又可用作武器。而石钺则是专用的武器。由于私有制的发展，在原始社会晚期，氏族部落之间使用暴力掠夺对方财富，从而经常出现战争。

石峡遗址的陶器，按陶质可分夹砂陶器、泥质陶器两大类。夹砂陶器是在陶土中掺砂，以防陶器在受火烘烤时破裂，其原理和现在制作“砂锅”相同，泥质陶器是指用筛选、澄洗过的陶土烧成的陶器。石峡出土的陶器，多为灰褐色或灰黄色，其中炊煮器有鼎、釜、甑、鬲，均为夹砂陶；饮食器有三足盘、圈足盘、豆、壶、杯、盂、觥形器等，均为泥质陶器；贮盛器有罐、瓮等，罐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此外还有陶纺轮，用夹砂陶和细泥陶烧成。日用陶器以素面最多；至于纹饰，主要有绳纹、堆纹、条纹、方格纹、曲尺纹、凸

弦纹、镂孔等，部分陶纺轮上刺有米字纹、十字纹、旋涡状纹，或花瓣纹。形式盛行三足器、圈足器或圜底器，平底的完整陶器只发现一件。

石峡遗址的陶器有轮制、模制和手制三种，手制陶器是用手把陶土捏成器皿；或搓成泥条，一圈一圈地盘叠成要做的器皿，然后在泥胎外表用手抹平，因此陶胎较厚，厚薄不匀，器形不规整，常有歪扭的现象。模制陶器是用陶土涂在编织的模型里面或外面，等半干后取出，或连同模型一道放入火中烧制。轮制是把已经成型的陶坯，放在转动的木圆盘（即陶轮）上，在转动中修整器坯的口沿等部分。其中以轮制、模制为主，如盘、豆、壶等，器形比较规整，口沿、圈足、腹壁的厚薄均匀，折壁处棱角明显，可以看到经过轮旋后留下的平行纹、凸弦纹、同心圆纹等，不仅外表美观，而且效率也比手制的快。烧制时的温度在摄氏 680—800 度之间的陶器，质地比较松软，称为软陶；烧制时的温度大约在摄氏 1000 度左右，质地比较坚硬，用手扣击铿然有声，称为硬陶。

石峡遗址的装饰品，有琮、璧、瑗、环、玦、笄、璜、管坠、珠、坠饰、石片饰等，用玉、松绿石、大理石等制成，工艺精美。高级装饰品的制作，轮制陶业的兴起，以及木工工具的专门化，说明手工业至少已部分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部门，这是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重要表现。

石峡的墓葬习俗，为东西向排列的长方形土坑墓，墓坑多经火烧，流行迁葬；二次葬时，尸骨堆放在墓坑的东南隅，墓中有两套随葬品，一套是原一次坟墓中迁来的，另一套是第二次葬时放置的；不少尸骨和随葬品上有红砾土，可能是一种原始迷信；小孩、成人都是单葬，没有合葬或集体迁葬，但有共同的氏族公共墓地。少数大型墓葬中有较多的石器、陶

器和贵重饰物、专用兵器，反映墓主在生前占有较多的财富与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多数墓葬中只有少量石器、陶器，可见这时已出现贫富分化，形成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使原始社会逐渐解体。

地处岭南北部的石峡，溯北江而上，经过始兴、南雄，越过大庾岭，可进入江西赣江流域，因而石峡墓葬出土的盘式鼎、鬻、有段石铤和多种鼎足，与江西清江县“筑卫城遗址”、修水县“山背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石峡的穿孔有肩石钺、刻纹大玉琮、贯耳圈足壶等，与苏南、浙北的良渚文化遗物大同小异。这就说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一方面保持各自的特点；另一方面通过互相交流、互相影响，有许多共同之处。石峡文化也是如此。^①

三、有争议的西樵山文化遗址

西樵山是一座古火山，位于岭南地区南部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在广州市西南 60 公里，面临北江，背倚西江，四周环水，河汊纵横，整座山略呈圆形，周长约 13 公里，草木茂盛，主峰为大科峰，海拔 344 米，北麓为南海市官山墟，商业繁荣，附近都是稻田、鱼塘和经济作物园地。在古代，这里显然是鱼介、飞禽、野兽和人类栖息繁衍的最佳场所。

从 1955 年起，有关部门多次前往西樵山调查研究，在四周山麓发现石器地点共 14 处，主要靠地面采集，只在两个地点进行小规模探掘，获得一批石片、石器和少量陶片，没有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发现远古人类生活遗迹，因而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所作结论也不够准确，引起学术界的争议。为此，1974年以后，有关部门又多次前往调查、发掘，在山上找到数处石器地点，发现以细石器为特点的文化遗存，它与华北以至东北、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属同一传统，这表明中国细石器分布的南界已达南海之滨。^①

值得重视的是，在主峰大科峰以西的云路村附近，发现7个由人工开采石料而形成的洞穴，这些位于山上霏细岩脉岩上的洞穴，岩石坚硬致密，与可溶性的石灰岩不同，并非由于流水溶蚀作用自然形成，仔细观察这些洞穴的洞壁，到处留有火烧和人工剥离石块的痕迹，洞内和附近山坡堆放大量人工打击的霏细岩石片碎屑。经试掘的虎头岩，洞内堆积厚1米多，除大量石片碎屑外，还有炭屑、灰烬、烧石等，为此有人推测，远在石器时代，人们可能用火烧热岩石后，再浇水使之骤冷，造成岩石崩裂，以便撬下石料，因而确定这些洞穴由人工开拓而成，在中国是首次发现，属于重要遗迹。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虎头岩和邻近的锦岩在新石器时代虽曾作为采石场，可是根据现场调查和文献记载，岩洞都是明、清时期凿成，原始先民是否用火烧水泼的方法开采石料，目前缺乏证据，不宜骤下结论。^②

西樵山上发现的石器，往往是在霏细岩或硅质岩露头之处；部分石器地点的位置，山上山下还互相对应。山麓的石器地点，有些并非原生堆积，而是由山上被流水冲刷下来的次生堆积。各处的文化堆积，大量是石片碎屑、石制半成品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载《考古》，1983年12期。

和废品，只有少量成品，夹杂着炭屑、灰烬和粘土等，没有作为一般居住遗址的迹象，结合采石洞穴的发现，可以认为：西樵山遗址是岭南至今惟一的石器时代大型开采石材和制造石器的场所。

西樵山遗址广泛发现典型的双肩石斧、椭圆形和梯形石斧，还有扁平镞、双肩长身镞、有段石镞、石铲、长身石矛、三角形石镞、双翼带铤石镞、刮削器、敲砸器、穿孔石饰等各种打制或磨制的器形，其中许多是为制作磨光石器而先打出的半成品。以双肩石器为特征西樵山文化遗存，在广东、广西、福建、台湾等地区都有发现，发现最多的是广东南部（包括珠江三角洲、雷州半岛）、海南岛和台湾北部，可见其流传很广。^① 双肩石镞、石铲都是农具，它们的大量制造，说明当地已出现锄耕农业。

西樵山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延续时间很长，既有比较原始的石器打制技术和类型，又普遍存在以双肩和梯形斧、镞为代表的石器文化，因而对于西樵山遗址的年代，早先曾有人提出属于中石器时代，或者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从新石器时代早期或稍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等几种意见。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现已掌握的材料表明，遗址跨越的年代很长，不能根据部分遗物来确定整个遗址的年代，部分遗存上限可能到中石器时代，下限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②。但也有人提出，西樵山遗址的年代，上限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下限可能在青铜时代早期，因为再后的遗址就见不到西樵山出

① 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产的石器^①。

西樵山遗址现被确认是采石场和石器制作地。它的发现，开阔了岭南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

四、漫长的新石器时代

岭南地区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提供丰富的食物资源，因而先民使用简单的石器，便可进行渔猎和耕种，得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所以容易安于现状；又因岭南北部有五岭横亘其间，妨碍人们和中原等地密切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社会发展受到影响，因而岭南地区长期停留于新石器时代。

岭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很多，在广东境内发现的就有三四百处，早期多以洞穴为主，洞穴是远古人们的天然住所；中期、晚期则以贝丘、岗丘、沙丘、台地为主，贝丘是古代沿海沿河或湖滨地区，人们采食贝类动物弃置的贝壳堆积，其中往往遗留有人们日用的石器、陶器等文化遗存。

广东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洞穴遗址，主要分布于粤北始兴、英德、连山和粤西罗定、封开、怀集、阳春等县的石灰岩地区。以英德县为例，1959、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该县青塘墟（当时属翁源县）的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狮头岩等洞穴的堆积层中，发现零碎的人骨和巨獭、剑齿象、熊猫、犀牛等动物化石，以及大量的田螺壳、炭屑和烧骨，还有一些打制简单的石器、石片和陶片，陶片分夹砂粗陶、泥质软陶，火候不高，制作技术比较原始，是广东至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从洞穴遗址来考察，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以渔猎为

^①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载《考古》1983年第12期。

主^①，处于母权氏族社会。

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以潮安县陈桥村、增城县金兰寺下层为代表。1956、1957、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陈桥村的贝丘遗址中，发现数十万斤软体动物的硬壳，最多是牡蛎（简称蚝）壳，其次是魁蛤、交蛤、海蛭和蚬、蚌壳、海螺、鸟螂壳也不少，贝丘中还有石器、骨器、陶片和人骨、兽骨，^②石器多用椭圆形河砾石打制，普遍保留自然岩面，其中主要是“蚝蛎喙”，这是尖端经过加工用以采食蚝肉的石器，还有长管状石器、砍斫器、敲砸器、石铤和砺石；骨器是这个贝丘遗址最重要最进步的工具，有骨斧、骨刀、骨锥、骨镞、骨针、骨簪、两端刃器，数量大大超过石器，为广东已经发现的遗址所罕见，全部经过磨制，原料主要是牛、鹿、猪骨，鱼骨仅限作骨针，两端刃器可用于松土、挖掘，也可用于割切；陶器全是手制粗砂陶，陶土未经淘洗，有大量粗砂粒或贝壳末等杂物，火候低，易碎，其上多饰以螺丝划纹和线纹。贝丘中约有代表10个个体的人骨，男女老少都有，骨骼上多染有红色赤铁矿粉末，以头骨和脊椎骨处为最多，部分动物骨骼上也如是，用赤铁矿陪葬，最早见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山顶洞人遗骸，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宗教迷信。从出土文物反映，当时渔猎经济比较发达，可能兼营原始农业和饲养牲畜。

1961年，考古工作者在增城县金兰寺遗址首次于广东发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载《考古》1961年11期。

现代表三个不同时期相重叠的文化堆积。^① 上层文化堆积属于战国至西汉初期，出土轮模制成的方格印纹、米字印纹、水波纹、篛纹、素面的硬陶器、釉陶器及其碎片，器形主要有罐、缶、瓮、碗、盒、孟、盅、鼎、三足盘等，三足盘是典型的器物，器大，壁厚，火候高。中层文化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为贝壳与泥土的混合层，主要出土物是磨制的石器和骨器，种类有斧、镑、凿、铲、刀、锥、镞、矛、饼、环、砺石等，其中有段和有肩有段石镑是新出现的典型器物，磨光的铲、刀、镞、矛、环也是前所未见，打制石器极少，陶器仍以手制的粗砂红陶或黑陶为主，未见彩陶，有一定数量的几何印纹软陶，拍印篮纹、曲尺纹和方格纹的居多，还有少量的云雷纹及其他花纹。典型陶器是短颈鼓腹圈足曲尺纹陶尊。出现一个用粗砂红陶制成的“陶祖”，这是对男性崇拜的象征，是父系氏族制度确定的标志。在4座墓葬中，有1具男性青年骨架是拔牙的，这现象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台湾圆山文化中也曾出现，根据民族学资料，拔牙表示进入青年成熟期，有的则在结婚前后举行。下层文化堆积层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为棕黄色土的贝壳层，出土打制和磨制的石器、骨器，有砍斫器、敲砸器、斧、镑、锥、凿、砺石等，陶器以粗砂陶为主，素面或施篮纹、绳纹、划纹，器形有罐、釜、豆、圈足盘或钵、器座和制陶工具的杵、压槌等，彩陶的火候较低。广东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的文化遗存，上述类型的贝丘遗址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以捕捞、渔猎经济为主，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特点明显^②。

① 莫稚：《广东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收获》，载《考古》1961年12期。

②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以曲江县石峡遗址中层、下层和增城县金兰寺中层、佛山市河宕遗址为代表。石峡遗址、金兰寺遗址前文已叙述。1977、1978年，考古工作者勘探佛山市郊澜石公社河宕村附近的贝丘，发现属于原始社会晚期的氏族公共墓地，已清理的60座墓葬，没有葬具，多数没有明显的墓坑，经鉴定的28座29个人骨架中，13座成年女性的头部均向东，10座成年男性的头部均向西，似已出现原始的宗教迷信。葬式主要为单人仰卧直肢一次葬，死者多是中壮年，老年的很少，小孩的死亡率高。已判明10个成年男女在生前拔牙。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男性多随葬一件小石镞或骨镞，女性多随葬一个陶纺轮。出土的石器以通体磨光为主，其中大型的斧、镞、铲较少，小型的有肩有段石镞为多；还有骨、角、牙、蚌、蚝质料制成的工具和装饰品，其中三棱圆铤骨镞是河宕遗址富有特色的器物。陶器以红色、橙红色陶为主，盛行圜底和圈足器，极少三足器和平底器，纹饰主要有绳纹、条纹、曲折纹、大小方格纹和编织纹、叶脉纹、圆点纹等几何印纹，器具主要有盘、豆、壶、尊和罐类。伴随出土的，有大量淡水、半咸水动物遗骸，如丽蚌、兰蚬、鱼、鳖、蚝、螺等，还有猪、狗、鹿、豪猪、牛(?)和猴类，有些猪、狗的颞骨，经初步观察，确定属于人工饲养^①。

考古工作者认为：通过对广东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研究，广东原始文化大致分为6个区域，粤北地区：多山岗遗址，石器以长身斧镞、有段镞为主，陶器以泥质和夹砂印纹陶共存为主；粤东平行岭和粤中东江地区：岗丘遗址为

^① 杨式挺、陶志杰等：《佛山市郊发现一处重要古遗址和古墓群》，载广东《文博通讯》，1978年第3期。

主，石器以有段和梯形镞为主，陶器以夹砂陶、印纹软陶为主；韩江流域地区：以贝丘、沙丘遗址为主，石器主要是有段镞，陶器是夹砂陶与印纹软陶共存，有的夹砂较粗，抹平磨光，几何印纹不够发达，与福建南部原始文化有密切关系；珠江三角洲地区：以贝丘、岗丘遗址为主，石器以有肩为主，骨、角、蚌、牙质料的工具和饰物很多，几何印纹陶发达，磨光红陶、彩陶、表面加饰红色的陶衣（胎内黑色或灰色）是本地区的特点；西江流域中游地区：以岗丘遗址为多，也有贝丘遗址，出土文物大体上和珠江三角洲相同，与广西东部即西江上游地区有密切关系；粤西南和雷州半岛地区：以岗丘、沙丘遗址为主，出土文物以有肩石器和夹砂红褐陶器为特征，几何印纹陶器不甚发达，新石器时代延续的时间较其他地区为长。

上述地区在文化上既有明显的共性，又有各自的特征^①。

五、不发达的青铜文化

中原地区早在公元前 16 世纪的商朝，就已出现高度的青铜文化，而广东至今尚未发现商朝的青铜器。广东最早的青铜器是在信宜县出土的铜盃，它三足分档，饰饕餮纹，为西周中期常见的器形，其造型巧妙，纹饰精美，显然不是在广东铸造，这证实岭南的青铜文化由中原等地传入，而且比中原等地约迟一千年左右^②。

广东从周朝起进入青铜时代，具体可分早、中、晚三个

^{①②}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时期。早期是西周至春秋时代，青铜器由外地传入；中期是春秋时代至战国初期，除了输入外地青铜器，本地已能铸造青铜器，但质量较差；晚期是战国中期至秦朝统一岭南，广东青铜铸造技术有所提高，开始出现少量铁器。随着青铜文化的发展，岭南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出现奴隶和奴隶主，进入阶级社会。但是，囿于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广东各地的社会发展不平衡，好些边远地区仍处于原始社会。

广东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在西江流域，小部分在北江、东江、韩江及其支流两岸的山岗，这些河流正是古代广东人民与中原及湘、桂、滇、黔、闽、赣等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到1987年止，广东境内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址约300多处，出土青铜器接近900件，其中食器有鼎、簋、锅、三足盘、提梁壶、附耳簋、长方形盘；酒器有罍、缶、盃；乐器有钲、钟、铃、铎、编钟、铎于；兵器有钺、戚、戈、矛、镞、镞、剑、短剑、匕首；杂器有人首柱形器、方形器、圆球形器、半球形器、圆管、圆箍、圆柱、三棱器、铜镜、铜环、铺首、器盖、兽头、洗、环、镗；工具有斧、凿、叉、锯、削刀、篾刀、刻刀、穿刀、靴形刀、铲形器、镰、铧、锄、锤等^①。

考古工作者根据器形和纹饰，认为广东的青铜器大致有四种情况：（一）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如清远县出土的两件铜罍。（二）与长江流域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如鼎，三足细长外撇，耳饰云雷纹、陶纹或绳纹；这类鼎在江苏、江西、湖南等地均有出土；各式剑，与五岭以北流行的式样一致；食器和乐器的纹饰多是云雷纹、蟠虺纹、陶纹、

^① 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文物考古资料选辑》，1989年版。

锯齿纹,这说明广东与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属于同一类型,大部分青铜器与楚国青铜器相近,可见岭南文化与楚文化关系密切。(三)与广西、云南、贵州有一定联系,青铜器中的钺和戚,楚地很少发现,广东出土的钺有扇形、靴形、铲形,戚为椭圆形,类似器物多见于广西、云南、贵州,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广东与西江上游各地已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四)富有本地特色的青铜器,如匕首,附耳箭、圆球形器、方印形器、篋刀、人首柱形器等,多用人物、人面、藤纹、席纹为装饰。人首柱形器从不见于中原地区,为广东所独有。

广东的青铜器往往与磨光石器、印纹硬陶共存,这表明当时仍未排斥对石器的使用。据不完全统计,在出土的青铜器中,接近半数即400多件是兵器,其中铜镞约200多件、矛74件、钺64件、剑和短剑39件,还有铜制戈、钺、镞、戚、匕首等;而铜制农具仅6件,其中锄、铤各2件,锛、镰各1件^①,这显示当时广东农业仍处于原始阶段,也说明青铜文化尚未发达。

^① 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文物考古资料选辑》,1989年版。

第三章 兼收并蓄 源远流长

——吸收中原及各地文化

岭南文化在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得以繁荣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接受中原和各地优秀文化。

早在新石器时代，岭南和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地区就有文化交流。进入青铜时代，岭南从闽、赣、湘、桂、滇、黔等邻近地区先后输入青铜器，其后才自行铸造有本地区特色的青铜器，然而这时岭南的经济、文化仍处于落后状态。

秦朝统一全国，大批军民前来传播中原及各地文化，从此岭南经济、文化有了显著的发展，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其后，赵佗创建南越国，和辑百越，使各族人民友好相处。五代时出现的南汉国，十分重用中原人士。再者，每当中原发生重大战乱时，均有大批移民逃避灾难，涌入岭南。而在太平盛世，不少志存匡济的外来官员，以振兴文教为己任。还有流寓岭南的硕学鸿儒，以传道授业为职责。众多的商人，把各地优质产品运来岭南，并传入其制造工艺。在各方面长期努力下，岭南吸收中原及各地文化取得显著的成绩。

一、伟大的和平进军

岭南在先秦时期没有国家、没有城市、没有文字，甚至没有大型村落，因此秦军进驻岭南，没有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抵抗，可以说是一次伟大的和平进军，它给岭南带来无限美好的发展远景。对于这个岭南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古籍竟有截然相反的记载，为此不能不予以澄清。

据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值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司马迁职居史官，利用先秦史籍、汉朝宫廷档案和实地调查所得，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公元前 104～前 91 年）撰写《史记》，其记载应属可信，上述记载说明五个问题：一、秦军进驻岭南没有发生战斗；二、进军时间不超过一年，当年就建立郡级行政机构；三、由“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即曾经逃亡的罪犯、入赘于妻家的贫民和商人组成的军队，明显不是久经战阵之师，没有强大的战斗力，派这种军队去“略取陆梁地”，当然是认为岭南没有强大的敌人；四、所谓“陆梁地”，据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可见当时岭南没有城市，当然也就没有国家和君主，岭南的土著文化尚未定型、成熟，因而很易接受中原及各地优秀文化；五、中国军队的组成一向以农民为主，而秦朝进驻岭南的军队成员并非如此，按理推测，这样的军队人数不会很多，因而次年再派办理讼狱不当的官吏前来岭南屯守，其人数显然也不会很多，但是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西汉淮南王刘安撰《淮南子》，其具体执笔者是伍被、苏飞等人，对秦军进驻岭南作了与《史记》截然不同的叙述，两千多年来，经常被后人引用，现摘录《淮南子·人间训》如下：

“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馀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卒以避之。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祸在备胡而利越也。”

上述记载，成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大怪事！秦军50万人作为五路，分别驻在镡城岭（即越城岭，主峰苗儿山在今广西资源县）、九疑（在今湖南宁远县）、番禺（今广州市）、南野（今江西南康县）、馀干水（即流入鄱阳湖的信江，在江西东北部），这种军事部署，即使是世上最拙劣的统帅，也不会干如此蠢事，因为它违背军事常识：

一、这五路大军分别部署在现今四个省（区），地域如此辽阔，在古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极其落后的情况下，任何高明的统帅都无法指挥。

二、这五路大军，从南方的番禺，到北面的馀干，相距将近两千里，从东边的南野到西端的镡城，相距也有数百里之遥，而且其间均有高山大河阻隔，根本无法互相呼应，配

合行动。

三、这五路大军的驻地，当时农业尚未发达，尤其是谭城之岭和九疑之塞均属荒山野岭，10 万大军的口粮，每天就要 10 万斤大米，每月就要 300 万斤大米，折合稻谷为 500 万斤，一年就要稻谷 6000 万斤，当时上述任何驻地均无法供应如此巨额粮食，即使从外地运来也极端困难。

四、据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载：西汉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后，整个南海郡（辖区相当于今广东省大部分地区）只有人口 94 253 名，看来番禺居民不足 1 万人。而在此之前两百多年的秦朝南海郡治番禺城，就有驻军 10 万人，超过全郡人数，令人难以想象。

五、既然已有一军 10 万人进驻番禺，则岭南问题已解决，其他 4 路驻军毫无必要。

六、秦国兵力有限，不可能抽调 50 万大军来进驻岭南。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 224 年），攻打拥有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广大地区的楚国，王翦动用了整个秦国军队，总数才是 60 万。除此之外，其他战役从未超过 30 万人。秦军进驻岭南，同时派蒙恬北逐匈奴，建筑万里长城，在黄河河套等地设置 44 个县，任务极为艰巨，也只动用 30 万军队，当时秦军要分驻全国各地维持治安，不可能再调动 50 万军队来岭南。

七、令人惊异的是，久经战阵、武器精良的秦军 50 万人，兵分五路，东在江西，西在桂北，南达广州，北到鄱阳，竟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杀，主帅殒命，“伏尸流血数十万”，战胜者是潜伏在岭南山野的越人，使用的主要是简陋的石器和少量青铜兵器，一夜之间可步行千里之外作战，而其战果却大大超出于 20 世纪威力最强的原子武器之上，取得人类战争史

上至今仍属独一无二的胜利，弄到全中国男不能耕、女不能织、伤不能医、死不能葬，导致各处农民起义，秦王朝随即覆灭。这种描述只能说是浮夸失实。

对于《淮南子·人间训》叙述秦军进驻岭南的情况，清朝阮元《广东通志》认为：“秦使屠睢击越事，淮南王（刘）安得之传闻”，指出其并无事实根据。同时认为：“置南海郡时屠睢已死，焉得有为南海尉之事乎？”早在东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年），高诱注《淮南子》时就已指出，此书记载“世间诡异瑰奇之事”。明朝宋濂《诸子辨》说：“《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诸家，非成于一人之手，故前后有自相矛盾者，有乱言而乖事实者。”可见此书并非信史，它伪造岭南历史，其原因和当时汉武帝用兵岭南有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攻打南越，南越向朝廷告急，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决定乘机出兵，这必须就近征调军队、粮食及各种用品，淮南国首当其冲，淮南王刘安对此当然不愿意，于是上书规劝，力陈出兵之害^①。刘安本来就是野心家，正在积聚实力，妄想问鼎长安。以为伪造秦军在岭南惨败的史实，就可以劝止汉武帝出兵岭南，不至削弱自己的实力。对此，司马迁在《史记·淮南王列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虽然记录了伍被、徐乐等人关于秦军在岭南惨败的谈话，但这些谈话只是反映刘安、伍被、徐乐等人的态度和观点，这些人在谈话中列举的事实有悖情理，不等于秦军进入岭南的真正历史。真正的历史仍然以《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南越列传》为准。至于秦军对于发展岭南文化，可谓贡献巨大：

^① 班固：《汉书·严助传》。

首先，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即桂林郡、象郡、南海郡，任命官员处理各种事务，执行中央政府颁布的规章、法令，使社会生活走上正轨，消除无政府的混乱现象。

其次，修筑城池。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在南海郡修建番禺城，作为郡治所在地。从此两千多年来，番禺（后名广州）成了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建城的历史虽然比不上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等古都，但它同世界上很多国家首都建城历史对比：英国伦敦建于公元 43 年，法国巴黎建于公元前 1 世纪，德国柏林在公元 1244 年开始见于史册（此前是施普雷河边的集镇），波兰华沙建于 13 世纪，俄国莫斯科建于公元 1156 年，奥地利维也纳建于公元 1 世纪，埃及开罗建于公元 642 年，美国华盛顿于公元 1792 年动工兴建，日本东京建于公元 1457 年。^① 仅此一端，岭南文化在世界史上就足以自豪了。

再次，推广使用文字和度量衡器材。文字是传递信息和交流智慧的重要工具，度量衡器材是进行贸易的必要手段。只有使用文字和度量衡器材，才能促使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复次，发展交通。先秦时期，岭南文化落后于中原等地，原因之一就是有五岭阻隔，交通不便，难以顺利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秦军进驻岭南时，必须修筑道路，以便行军和运输军需品，因而在大庾岭筑路，于广东南雄县西北修建横浦关；在骑田岭筑路，于广东阳山县西北修建阳山关；在连江（北江支流）上游，于广东连县西北修建湟溪关。这三条道路，使北江与赣江、湘江的交通得以衔接。再者，开凿灵渠，使湘

^① 中英联合编审委员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版。

江与漓江得以沟通。从此，岭南与中原等地的来往，比前大为顺畅。

最后，进驻岭南的秦军，因全部使用铁制武器和劳动工具，这就促进岭南进入铁器时代，并传入内地的动植物品种和先进的生产工艺。

秦朝统治岭南的时间极短，由秦始皇三十三年至秦二世三年（公元前 214—前 207 年），只有短短的七年，这期间秦始皇于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病故后，中原等地随即发生战乱，僻处岭南的秦朝官员，因南海郡尉任嚣患上重病，难以有很大作为。再者，进驻岭南的秦军也不多，《史记》没有记载这次进军发生战斗，而岭南尚未建立国家，因此秦朝无需调动重兵前来。清朝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载：“秦以任嚣为南海尉，初居泮口西岸，俗名万人城，在今城（即广州）西二十七里，既乃入治番山隅。”可见进驻南海郡的秦军，就是任嚣统率的万人而已。由此推知，进驻桂林郡、象郡的秦军也不会很多。行政人员更是配备不足，南海郡丞也未到任。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做出上述成绩，也就很难得了。

二、南越国、南汉国的功绩

在岭南历史上，曾经两次出现独立王国，一是秦末汉初的南越国（公元前 207—前 111 年），一是五代的南汉国（917 年—971 年）。这些割据者立国伊始，想确保本身地位并企求发展，于是大力吸取中原和各地文化，为促进岭南文化繁荣作出很大贡献。

1. 南越国和集百越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据《史记·南越列传》载：“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以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即中原）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秦兵新筑道路），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即中原人士）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任嚣死后，赵佗即严守边境。秦朝覆灭，赵佗出兵吞并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

汉高帝统一全国，鉴于多年战乱，百姓疲困，不想出兵岭南。因此在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派陆贾前来岭南册封赵佗为南越王。诏书说：“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中原人民）南方三郡（即南海、桂林、象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即赵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它（赵佗）为南粤（即南越）王^①”。希望赵佗能够“和集百越”^②。这说明在岭南的中原及各地移民，安居乐业，同土著越族相处融洽。

赵佗是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立国之初，“颇有中国

① 班固：《汉书·高帝纪》。

②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

(即中原)人相辅”^①，当然是按照秦朝的成规办事。其后又接受汉朝册封，因此理应奉行汉朝的政策法令，在政治制度上和内地没有很大差别。只因僻处边隅，远离朝廷，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赵佗以“‘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②，其曾孙“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③，并非完全和中央保持一致。

在生产技术上，赵佗在《报文帝书》中，确切无误地提出要购买内地的“金铁田器”和“马牛羊”。从出土文物得知，农业方面，当时岭南农具全部用铁制造，主要是耜和锄，耜用于挖沟起土，锄用于松土、点种、间苗、中耕除草，也用于挖沟起土，是古代南方的“万能农具”，至今岭南农村仍广泛使用。收割农作物已用铁镰。农作物有稻、黍、粟、大麻、芋和多种瓜果蔬菜，家禽、家畜的饲养较发达。手工业方面，冶铸、制陶、纺织比前显著进步，并能制造漆器、玻璃和金银、玉石、象牙等工艺品。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南越国设置专门机构来进行生产。引人注意的是，这时已能制造海船，并积极开展海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1983年在广州市区象岗出土的南越文王墓葬品中，就有来自非洲的象牙、西亚的银盒，南亚和东南亚的犀角、琥珀饰品、熏炉香料，以及创始于两河流域的金花袍饰等物品。

在文化艺术上，来自华北的赵佗，有很好的文学素养，他署名的《报文帝书》，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料想他当重视文化艺术。事实说明，南越国的音乐比前有所发展。南越文王墓葬中的乐器，以中原常见的乐器为多^④。南越国出土的乐器比前增加的有石磬、埙、琴、瑟、鼓、笛、铜勾罐、铜

①②③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

④ 吕烈丹：《南越王墓与南越王国》，广州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

铙、铜锣和铜鼓等，值得提出的是铜鼓，早在战国时代，铜鼓由其发祥地滇池地区的晋宁、呈贡、江川等处，传至广西和广东西部的云浮、阳江以及海南岛。它作为乐器，用于祭祀、喜庆，也可作为权力的象征，在战斗时用以召集群众，还可作为财富而予以贮藏。铜鼓进入岭南，说明岭南接受滇黔文化的影响。与音乐密切相联的是舞蹈，从出土文物得知，南越国的舞蹈，可分中原式与南越式两大类。中原式的舞蹈，主要是以娱乐为主的“杂舞”，在南越文王墓葬中，有6个玉雕小舞俑，代表三种“杂舞”，即单人长袖舞：舞俑梳横向螺髻，裙边、袖边都有花纹，体形弯曲，一长袖后甩，另一长袖举过头顶；双人舞：舞俑是两个并排的人体，身前两人的衣袖交叉；“沐猴舞”：舞俑缩颈探头，耸肩提膝，双袖后甩，动作滑稽，很像猴子的姿态。南越式的舞蹈，在岭南出土的铜鼓上通常铸有越人的舞姿，其服装、姿态与中原地区不同，跳舞者排成一列，头戴高耸的羽毛冠，上身似是赤裸，下身穿后幅长及地面、前幅过膝的羽毛裙，舞蹈动作以摆动身体为主^①。至于南越国的美术，也从中原地区吸收丰富的养料。南越文王墓中的壁画，有些是中原的风格，另一些则是岭南的风格，可能有些是中原来画师，有些则是岭南越人画师。所绘的图案，艺术水平不逊于中原地区^②。

南越国的统治者重视和集百越，并积极吸收中原和各地文化，因此有大批越人汉化。当汉武帝出兵废除南越国时，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州）、郡治、县治所在地，以及西江两岸与河网交错的平原地区，均已大力开发，其发展水平已接近中原地区。南越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南下汉人和汉化越人，其

①② 吕烈丹：《南越王墓与南越王国》，广州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

经济、文化生活与中原地区同阶层比较，几乎不存在差异。后来番禺成为西汉 19 个著名都会之一，明显是南越国打下的基础^③。南越国覆灭后，汉武帝在岭南设置郡县，全面实行汉化。

2. 南汉国重用客卿

五代时，南汉国对岭南经济、文化建设作出贡献。但是，封建史家以中原政权为“正统”，对南汉国等地方政权，一贯采取贬抑的态度。北宋初年，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把南汉国称为“僭伪”，其后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把南汉国列入“世家”，不属“本纪”之内。清朝广东梁廷楠撰《南汉书》，也难免存在偏见。近人范文澜认为：“在五代大乱的情况下，南方立国分治，并不是坏事。南方民众受统治者的祸害轻一些，这就是诸国应该暂时存在的理由，一切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标准，不能单凭统一与分治的形式来判断好坏。”“原来较为落后的楚、闽、南汉等地区，经过五代时期，经济文化都有了显著的进展”^④。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任何人否认不了。南汉国在文化上有显著的进展，就是因为它吸收中原等地的优秀文化。

唐朝末年，各地藩镇拥兵自立，但岭南仍然归顺中央，所以欧阳修《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载：“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以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这就为日后南汉立国从外地调来了一批人才。

唐哀帝天祐四年（907 年），朱温篡夺政权，建立后梁，与

^③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辑：《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版。

^④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三章。

此同时，李克用建立后唐，王建建立前蜀；接着，吴、闽、吴越、楚相继立国。到了后梁贞明三年（917年），清海、建武节度使刘岩鉴于吴越钱鏐进封为国王，于是提出同样要求，没有得到允许，这才在岭南建立南汉国。他虽然当上南汉皇帝，“每对北人自言家本咸秦，耻为蛮夷之主”^①。其实他的祖父刘安仁是河南上蔡人，因经商定居广州，他侈言来自咸秦，无非仰慕关中文化而已。刘岩之父刘谦，任封州刺史、贺江镇遏使，死后由长子刘隐代理其职务：“隐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遂有南海。隐复好贤士。是时，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王定保、倪曙、刘濬、李衡、周杰、杨洞潜、赵光裔之徒，隐皆招礼之”。^②刘隐去世，由弟刘岩代理其职务，后来刘岩建立南汉国，主要靠上述人士相助。因为这些名门望族和世家子弟有较深厚的文化素养，熟悉典章制度，富有从政经验，南汉立国之初，设置机构，制订法律，与中原及邻近地区交往，他们出谋献策，进行具体工作，可以避免混乱，容易做出成绩。在这些人士中：南汉国的开国宰相赵光裔，洛阳人，父赵隐，唐朝尚书左仆射，他和兄光逢、弟光胤都是唐朝进士。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年），派膳部郎中赵光裔、右补阙李殷衡为“官告使”，前来岭南，宣布刘隐为清海、静海等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刘隐极力挽留赵光裔、李殷衡。赵光裔认为自己是“中朝甲族，耻事霸国”，经常心情抑郁，很想北归。后来刘岩模仿赵光裔的笔迹，派人带信去洛阳，把赵光裔的

①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僭伪列传·刘陟》。

②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家属都接来，赵光裔喜出望外，从此尽心为南汉效力。他“为相二十余年，府库完实，政事清明，辑睦四邻，边境无恐，当时号称贤相”^①。其兄光逢是后梁宰相、弟光胤是后唐宰相，后来其子赵损也继任为宰相，在扰攘纷乱的五代，“一家四相”，当时是非常突出的事。至于李殷衡则是唐朝名相李德裕之孙，南汉立国时任礼部侍郎、同平章事，不久病故。

杨洞潜，先世由四川迁居岭南，他在唐末曾任邕管巡官，其后留居广州，刘隐以师事之。他为刘隐、刘岩策划，攻取韶州、容州、高州，由是知名。他提出刺史不宜由武官担任，应当大量聘请中原人士作为幕僚，从中选用刺史，因而招聘了一批干才，使地方官用人得当，民受其福。南汉立国，他任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建议设立学校，开科取士，选拔人才，使各项制度都粗有条理。

刘濬，滑州胙人（今河南延津县附近），父崇望，唐昭宗时宰相；伯父崇龟，清海军节度使，岭南东道观察处置使，当时中原战乱，刘濬前来岭南寓居，刘隐聘为幕僚，凡事多与之商定。南汉大有九年（936年），杨洞潜病故，他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代之，常劝刘岩爱民息兵，为政清简。

南汉国王并非英明之辈，但是注意吸收中原和各地文化，重用内地人才，因而立国 55 年，在五代十国中享祚最长。

三、乱世每多南迁客

中国历代王朝的京城，多在中原、关中等地，因而每当政权更迭时，中原等地成为主要战场，这时使大批士民纷纷

^① 吴任臣撰：《十国春秋·南汉王·赵光裔传、赵损传》。

向边境地区迁徙，其中不少人南下逃生，他们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学问知识，从而促进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早在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政权的时候，天凤四年（17年），爆发了新市（今湖北京山县附近）人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起义，次年琅琊（在今山东境）人樊崇等领导的赤眉起义，接着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在推翻王莽政权之后，又出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镇压农民起义军和削平各地割据势力的战争。这次战乱至东汉建武十二年（36年）统一全国时止，前后达20年之久，造成中原等地人口大量迁徙。其中有些移居岭南。例如，西汉平帝时，南郡华容（今湖北潜江县附近）人胡刚，被大司农马宫推荐到朝廷任职，因不满王莽所为，便逃来岭南^①。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184年）之后，中原等地军阀割据，群雄相争，战祸连年，民不聊生，一批硕学鸿儒相率南迁，例如，北海（在今山东境内）人刘熙，博览群书，名重当地，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19年），拒绝荐举，前来苍梧、南海，授徒讲学，门生数百人，著《释名》27篇，这是古代重要的训诂学著作；还著有《谥法》3卷^②。陈郡扶乐（今河南太康县附近）人袁徽，是司徒袁滂之侄，以儒学知名于时，目睹天下将乱，拒绝朝廷征召，来到汝南^③。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附近）人程秉，是大儒郑玄的弟子，后避乱岭南，与刘熙讨论学术，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④。南阳（在今河南）人许慈在岭南奉刘熙为师，研究《易》、《尚书》、

① 范曄：《后汉书·胡广传》。

② 郭棐：《粤大记》。

③ 陈寿：《三国志·魏书·袁涣传》。

④⑤ 陈寿：《三国志·吴书·程秉传》。

“三礼”、《毛诗》、《论语》，后在蜀汉任博士^⑤。他们对岭南的教育事业与学术研究作出可喜的成绩。有些中原人士前来避难，立身行事，风格高尚，给岭南社会带来良好的影响。例如汝南平輿（今河南汝南县附近）名士许靖，字文休，从会稽（在今浙江）乘船逃来岭南，他让全族人士都上了船，然后自己才上船，当时见者莫不称赞，因而在岭南受到交阯太守士燮的特别敬重，为此袁徽写信给汉献帝时尚书令荀彧说：“许文休英才伟士，智略足以计事。自流宕以来，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其纪纲同类，仁恕惻隐，皆有效事。”后来许靖入蜀，刘备任命为太傅，受到诸葛亮等人的礼遇^①。

西晋南北朝时，从西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八王之乱”开始，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统一全国为止，其间299年，战乱相继，南北分裂，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四散逃亡，岭南相对安宁，故络绎前来。出土文物足以说明这个问题：1952年在广州南郊敦和乡客村发现西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大型砖墓，砖文为“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看来墓主似从中原迁往江南，以后再来到岭南，故有此语。1954年10月，广州北站西侧孖岗发现西晋怀帝永嘉七年（313年）砖墓，砖文为“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所以黄佐《广东通志》说：“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应为西晋）永嘉之际，中国（即中原）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即岭南），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可见这些

^① 陈寿：《三国志·蜀书·许靖传》。

移民对传播中原文化起了很大作用。东晋初年，江浙地区赋役繁重，人民难以忍受，纷纷从海道逃来广州，广州刺史邓岳利用这些逃民的技术来铸造兵器，提高了岭南的冶炼水平^①。到了东晋后期，安帝元兴二年（403年），卢循率众由晋安（今福建福州市）泛海前来，攻占广州，遣使向朝廷献贡，被任为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其后卢循与其姐夫、绍兴太守徐道覆起兵，取道豫章（今江西），进攻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兵败退归岭南，其来自江、浙、闽、赣的余部在岭南溃散，成为变相的移民，为岭南的开垦尽了自己的力量。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士民相继迁居岭南。例如，晋宋之际，临沂（在今山东）人王伯之、王叔之兄弟，为名相王导后裔，目睹王室多艰，均举家前来依附广州刺史王镇之。王叔之在罗浮山定居，与子弟读书山中。著有文集9卷、《庄子义疏》2卷^②。不仅如此，北朝也有人渡海前来岭南。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6年），北魏入侵北燕（在今辽宁西南与河北东北部），北燕国主冯弘逃往高丽（今朝鲜北部）时，要儿子冯业率领300人乘船来到番禺^③（一说新会^④），此后冯氏数代在岭南担任地方官。冯业之孙、罗州（州治在今广东化县附近）刺史冯融，为儿子高凉太守冯宝聘娶高凉南越首领冼氏之女为妻。此后冼氏率领族人长期归顺中央政府，反对地方分裂势力，为加强民族团结而卓著勋劳，她还教育儿子冯仆和孙子冯贵、冯暄、冯魂，

① 房玄龄等撰：《晋书·庾亮传》。

② 黄雨：《历代名人入粤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冯贵传》。

④ 魏征等：《隋书·谯国夫人传》。

在这方面继续作出成绩，成为千古美谈^①。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避乱暂寓岭南，事宁北归故居。尽管如此，他们对岭南的文化事业仍然有所贡献。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黄巢率众从河南、安徽经江苏、江西进入浙江、福建，于僖宗乾符六年（879年）五月攻占广州，原拟长期据守，由于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以图大利”^②，黄巢只好于次年北上，其中病弱者流落岭南，也成了变相移民。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中原居民大批逃难，不少人进入岭南。清朝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载：“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即北宋京城，在今开封市）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粉榆（汉高祖故乡在丰县粉榆北）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又载：“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谥，因改所居为珠玑巷。”这就说明：珠江三角洲很多居民自称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主要原因是“地望”。而“地望”在封建社会颇为人们所重视。但《广东新语》这两段记载均不够准确，张昌事迹不见于史籍，而宋朝三百年间，从未有一位皇帝来到南雄。

另一传说是好些族谱记载：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也有说是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或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苏妃（一说胡妃）触犯帝怒，逃出皇宫，当时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富民黄贮万运粮至京，予以收容，载回本

① 魏征等：《隋书·谯国夫人传》。

② 刘昫等：《旧唐书·黄巢传》。

乡。皇帝要兵部尚书张钦（一说张英宾）下令缉拿，因不明去向，无法追查，日久逐渐寝息。其后黄贮万同家仆刘壮不和，刘壮上京揭发，兵部官员怕皇上究问，于是与五府六部所有文武官僚共同遮掩，伪称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有贼作乱，要在此建筑寨所，驻兵镇守，因而牛田坊五十八村亿万居民惶恐嗟怨，其中珠玑里居民九十七家由贡生罗贵率领，来到香山县黄角大良，分别投靠土人，各成聚落。这些族谱的记载自相矛盾，主要事实完全违背情理，不止一处谬误，令人难以置信。盖因修族谱者对本族早期的活动，未必完全了解，由于“地望”观念作祟，难免抄袭、虚构，以示系出名门，家本贵胄，辞多溢美，事属乌有，为此有些族谱的记载并不可靠。南雄珠玑巷为粤北一个小村，它位于南北交通要道，移民只是途经此地而已。《广东新语》和广东某些族谱的记载，实质上是反映某些人士自认祖先是中原望族的心愿而已。

历史真相是：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金军分兵两路南下，所到之处，疯狂烧杀掳掠，居民纷纷逃避。东路金军从和州（今安徽和县）渡江后，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占领临安（今浙江杭州），宋高宗赵构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转乘大船在海上避难，金军驾舟追击失利，担心后路被截，只好退兵，宋高宗随即返回临安。西路金军由黄州（今湖北黄冈）渡江后，攻占江州（今江西九江），隆祐太后从洪州（今南昌）逃到虔州（今赣州），后也返回临安，金军尾追至吉州（今江西吉安）附近转而进攻潭州（今湖南长沙），其后得知东路金军撤退，也回师荆门（在今湖北）。随同隆祐太后的难民，大批被金军屠杀，余下的分别逃往湖南、广东。到了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率领从江淮等地招募的军队，在江西抵抗元军入侵，战败后收集余部，退驻循州南岭

(在今广东紫金县南)，次年在海丰县五坡岭兵败被俘，余部溃散，留落在粤东。祥兴元年（1278年），张世杰、陆秀夫等在广东新会县厓山拥戴宋帝赵昺，当时从浙、闽跟随前来的官员、民兵有20多万人，次年二月宋朝覆灭，余众居留于珠江三角洲至海陵岛一带，至今台山、宝安、香港好些人士自认是宋朝皇室、大臣后裔。

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年）出兵福建，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在汀州（今福建长汀）被俘，其弟朱聿锜逃来广州，同年11月2日，由大学士苏观生等拥立为帝，年号绍武。另一方面，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朱由榔，从湖南衡州逃至广西梧州，受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同年11月18日，在广东肇庆即帝位，年号永历。这两个南明政权为争夺帝位而互相残杀，正在难解难分之际，由福建前来的清兵，于12月15日突然袭击广州，绍武帝被俘自杀，永历帝仓惶逃回广西。在这期间，有一批由外地前来的难民留在广东。

南宋、南明的移民，深受异族入侵之害，因此他们对岭南的民族意识有很大影响。同时，他们也和以前的移民一样，把中原和各地的文化传入岭南。

四、外来官员的勋劳

中国封建皇朝任命地方大员，为防止徇私舞弊，实行回避制度，因此古代岭南的主要行政官员，由外地人士担任。再者，岭南远离朝廷，僻处边陲，又是对外交往的主要港口，为了确保中央政令的执行，一般来说，对岭南大员的任命比较审慎，所以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輿地考》说：“五岭之南……，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轻

悍，易兴迷节，爰自前代，至于唐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也。”但这不排除贪官污吏在岭南履其私欲，祸国殃民。所以唐朝房玄龄等撰《晋书·吴隐之传》说：“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篋之宝，可资数世……，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朝廷欲革岭南之弊，隆安中，以（吴）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吴隐之到任后，清操自励，想以自己的表现来改变官场积弊^①，因而千古传为美谈。

岭南人民怀念忠心报国、施行德政的外来官员。广东潮州市义安路英聚巷原来有座“十相留声坊”，纪念在担任宰相前后曾来到潮州的唐朝常袞、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和宋朝陈尧佐、赵鼎、吴潜、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广东好些地方均有类似祠祀。唐朝 290 年间的宰相，曾在广东任职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 30 多位^②。他们在广东各自作出令人赞颂的功绩和留下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清朝张嗣衍主修（乾隆）《广州府志》载，明朝广州城内主干道惠爱大街有一座木制牌坊名“惠爱坊”，牌坊上列举秦朝末年至明朝中期在岭南有建树的地方官员名单：“秦任嚣、赵佗，汉吴恢，吴陆胤、钟离牧，晋陶侃、吴隐之，南朝王琨、萧劭、王僧孺，隋刘公权、慕容三藏，唐冯立、王琳、宋璟、李尚隐、卢奂、李勉、杜佑、杨于陵、孔戣、郑綰、韦正贯、卢钧、韩愈，宋向敏中、李符、邵晔、陈世卿、陈从易、周敦颐、魏瓘、张田、王大宝、龚茂良、廖德明、黄震、萧注、曾逢龙，明杨信民、王翱、刘大夏、王守仁、彭远、陈员韬、陈选、刘永清、彭韶、张琰、王溥、郑金、陶鲁、李祥、毛吉、彭琬、宋

① 房玄龄等：《晋书·吴隐之传》。

② 阮元：《广东通志·职官表》及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宰相表》。

端仪、花茂、聂好谦、曹琚、道同、高瑶、熊瓚、蒋升、王重、丁瓚、吴廷举、郭郁邻”，这个名单虽然很不全面，但是六十七人的阵容可谓代有名臣，各建殊勋，尤其是明朝中期以后，岭南文化有较大发展，外来地方官员为此作出努力。

外来官员分两类，一是正常的职务调动，由朝廷任命来岭南工作；另一是清朝以前出现的“谪宦”。“谪宦”分为“贬谪”（官职降级）、“安置”（徒有虚衔没有实权）、“流徙”（即流教）、“编管”（撤销职务，受流放地官员管束）。“谪宦”有两种人，一种是忠而获咎或遭人诬害，他们来到岭南，虽处逆境，仍然爱国爱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社会做好事，因而为广大群众所称颂。另一种是为非作歹、罪有应得，这种人在岭南，无所作为，永远为人所不齿。一般来说，谪宦因处境欠佳，大都韬光养晦，避免再惹麻烦，而且受到掣肘，要想有所作为，实在不容易。众所周知，秦汉时候，任嚣、赵佗在岭南输入中原文化，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鉴于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经济的繁荣，所以历来有抱负的地方大员，都重视端正吏治和发展文化教育。广州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的港口，商贾云集，贪污行贿，时有所闻。传说广州西郊石门有“贪泉”，饮了就贪得无厌，东晋吴隐之不相信这骗人的鬼话，特地去饮贪泉，并赋诗明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事实证明，吴隐之虽然饮了贪泉，丝毫没有改变高尚的廉洁操守。^①南齐时，王琨任广州刺史，当时俗语说：“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但是他一无所取，后被擢为廷尉。^②南朝萧梁

① 房玄龄等：《晋书·吴隐之传》。

② 萧子显：《南齐书·王琨传》。

皇族成员萧励任广州刺史，前此外国商船来到广州，货物多被刺史侵吞，以致每年只有三几艘前来，由于萧励廉洁，不侵犯外商，每年有十多艘前来，这就有利于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所以萧励调动职务时，广州的官民流泪惜别，数百里途中，都有人带了酒菜前来送行，可见他深受岭南群众的爱戴^①。到了唐朝，曾任广州都督的冯立、王方庆、宋璟、李朝隐、裴仙先、李尚隐、卢奂、李勉、杜佑、李复、杨于陵、马总等，孔戣、卢钧、韦正贯、萧仿、李知柔等人均政绩昭著，其中宋璟等人还成为唐朝名相。他们廉洁自律，因而大批外商前来贸易，为广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新的局面。

唐朝著名文学家韩愈，两次被贬来岭南，第一次在唐德宗时，他上疏反对宫市（由宦官主持采办宫廷用品，仗势以低价强买或掠夺民间货物），被贬为连州阳山（今阳山县）令，阳山僻处粤北山区，非常穷困，韩愈上任后，惊呼：“阳山，天下之穷处也。”他尽量为群众解决困难，因此深受人民爱戴，生了孩子多以“韩”字为名。^②当时韩愈已有文名，所以南海县的区册、区宏等也都远道前来拜师求教，区册归乡省亲，韩愈还撰写《送区册序》，可见师徒之间关系很密切^③。阳山人民为了纪念韩愈，把城北的大山名为“贤令山”，并在城内兴建“韩文公庙”达三座之多，直至清朝中期仍然存在^④。第二次在唐宪宗时，韩愈上表反对派太监把凤翔县法门寺的释迦之佛指骨迎接至宫廷内观赏，触犯了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次在潮州只有八个月，虽然为时较短，但是深入了解民间

① 李延寿：《南史·萧励传》。

②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韩愈传》。

③ 阮元：《广东通志·列传一》转引《广东人物传》，卷二百六十八。

④ 阮元：《广东通志·山川略》卷一百十三。

疾苦，设立学校，聘当地进士赵德主持其事，为潮州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潮州人民为了纪念韩愈，把潮州州治海阳县（今名潮安）城东的东山改称韩山，在山下兴建韩文公祠；并把韩山之下的员水改称韩江。

宋朝时候，珠江三角洲开始围堤造田，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岭南的经济比前繁荣，文教事业也随之兴旺。北宋时，程师孟任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在广州城外商业区加筑“西城”以保护对外贸易。还大办教育，经常亲自给生员讲解经书，因而前来听讲的接踵而至，甚至外商子弟也要求入学受教^①。周敦颐任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不怕劳苦，即使是偏僻之处和瘴疫地区，也前往查访，以平反冤假错案为职责^②，他是宋朝理学开创者，因住于濂溪侧，后人尊称为濂溪先生，其学说在广东颇有影响，后来广州、韶州（今韶关市）等地建立濂溪书院，以示纪念；至今仍有好些人取名“景濂”，对他表示敬仰。包拯曾任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知府，当地出产名贵的端砚，前任知府借口进贡，但是索取的端砚比进贡定额多数十倍，私下送给朝中权贵，进行巴结，包拯到任后，他不仅作风廉洁正直，下令只按规定数额进贡，任满北归，不取一个端砚^③，而且重视教育事业，创立星岩书院，培养人才；还设立丰济仓，用以储粮备荒，因此深受岭南人民称赞^④。南宋时，陈岷、方大琮等任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都注意修缮城濠，兴办教育^⑤。

① 裘明之：《中吴纪闻》卷三。

② 脱脱等：《宋史·周敦颐传》。

③ 脱脱等：《宋史·包拯传》。

④ 李小松、陈泽弘：《历代入粤名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 阮元：《广东通志·宦绩录》卷二百三十六。

明、清两朝，岭南教育比前有显著发展，外来地方官的业绩功不可没。明朝中期，王守仁任两广总督兼巡抚，在广州传播其“知行合一”学说，提出：“知是行的意主，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终。”还提出：“学莫先于致良知，知致而行即至，故格物是诚意工夫，明善是诚身工夫，穷理是尽性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约礼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①。他的学说在岭南有一定影响。到了清朝，在文教方面成绩卓著的两广总督，要推阮元和张之洞。阮元按照他任浙江巡抚时在杭州创办“诂经精舍”的做法，在广州创办“学海堂”，出版《十三经注疏》，主编《皇清经解》，（又名《学海堂经解》），重修《广东通志》等^②；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院”和广东水陆师学堂，设立广雅书局，出版了大量书籍，同时开办近代企业^③。从清朝中期开始，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中逐渐显示其重要地位。

五、四方贤俊聚南疆

岭南有独特的景色和丰富的物产，广州一向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港口，因此在太平盛世也有大批移民前来岭南：商贾前来贸易，硕儒前来讲学，文人雅士前来游览，还有各行各业前来谋生，他们把各地文化传入岭南，从而丰富、发展了岭南文化。广东境内的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和沿海各港口，都是外来移民以及与外地进行文化交流的路线和地区。

从外地移居岭南的路线，徐俊鸣在《隋唐宋之间广东人

① 范端昂：《粤中见闻》。

② 赵尔巽等：《清史稿·阮元传》。

③ 赵尔巽等：《清史稿·张之洞传》。

户分布变迁》中提出：“秦凿灵渠沟通湘、漓之后，越城岭道为北方人民南移最主要的道路，故隋代人户分布中心在西江下游一带，实与此有关。自唐代开凿大庾岭以后，由于北江路程比西江为短，因此北江代替了西江的地位，故人户中心转移于北江下游。宋代沿海地区人户已逐渐增加，人户中心始转移于沿海，而和现代相似，这又表示沿海低地大量利用和海外交通的日益发展”^①。上述前来岭南的移民路线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中国经济文化的东移南迁所决定。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均在关中地区，封建皇朝需要高级奢侈品，所以这时商人从番禺（今广州）溯西江而上，经灵渠入湘江，至长江转往汉水，可到达关中地区。至于大庾岭山路，早在秦军进入岭南时就已开凿，秦朝在大庾岭附近设置横浦关，便充分说明这里是交通要道，但当时对外贸易尚未发达，取道于此的人士较少。

到了唐朝，大运河通航，扬州成为全国最繁荣的商业城市，有“扬（扬州）一、益（成都）二”之称，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奉令拓建大庾岭山路，他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中说得很清楚：“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寅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巖嶽，千丈层崖之半，颠济用惕，渐绝其元。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其路线是：从广州溯北江而上，越过大庾岭道，进入赣江，由长江转往大运河，前往扬州，通过淮河、黄河，可至洛阳，再经渭河，则到达长安。这时岭南与关中、中原等地的交通，比前大为改善。

^① 田方、陈一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升平时候，商人们纷纷从外地前来岭南。班固《汉书·地理志》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中国”一词，古代指京城而言，也可指中原地区。这说明，汉朝从京城或中原来广州的商人数可观，而且大部分成了富户；引起史官的注意，并且载入史册。除了关中、中原地区之外，这时滇黔地区的铜鼓也开始传入岭南，虽然滇黔地区并不比岭南先进，但铜鼓由于独具特色而在世界上颇有名气，它是古代西南、中南地区少数民族首领用作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是指挥战争和召集群众的工具，也是年节庆贺、祭祀典礼的乐器。全国现有铜鼓1400多具，其中广东就有100多具^①，多出现在广东西部和西南部。再者，巴蜀地区的食品如枸酱等，通过夜郎（在今贵州）沿西江顺流而下，在番禺（今广州）出售^②。在海上交通方面，据范曄《后汉书·郑弘传》：郑弘于“建初八年（83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今福建福州市）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郡治在今湖南郴县）峽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这说明汉朝岭南和各地来往甚为密切。到了唐宋时候，广州与内地之间商业活动比前更为频繁，外地手工业产品，在岭南市场销售，使岭南手工业工艺有所借鉴，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到了明清两朝，山西票号，徽州钱庄，在岭南甚为活跃。各地的丝绸、茶叶、瓷器，大量运来广州，再售往海外。广州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十三行”，其中势力最大的怡和行、同文行、同孚行，其次

① 杨耀林：《广东发现的带铭文铜鼓》，载《考古》，1982年第一期。

②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为资元行、义丰行，义成行、丽泉行均由福建商人主持；东生行由安徽人主持；万成行由浙江人主持。十三行中，潘、卢、伍、叶四大姓，潘、伍、叶均为福建人氏。他们经商之余，致力文化事业。由此可见外地商人对岭南的经济、文化做出卓越成绩。

外来的学者、诗人，对岭南文化也有很大贡献。三国时，虞翻因直言强谏，忠而获咎，被吴主孙权流放番禺（今广州），他虽属罪人，但在番禺仍讲学不倦，经常有门徒数百人，还著有《老子训注》、《论语训注》、《国语训注》等书^①。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袭封安乐公的南朝谢灵运，博学多才，擅长诗赋，尤以山水诗著称。他被流放来广州，撰《罗浮山赋》、《岭表赋》等，是第一个为罗浮山作赋的人^②，其诗作颇受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推崇^③。唐朝很多著名诗人，如王勃、杜审言、沈佺期、张说、刘长卿、刘禹锡、杨炎、李翱、李绅、张祐、李德裕、许浑、李商隐、李群玉、陈陶、高骈、曹松、吕洞宾等，均曾前来岭南，留下脍炙人口的篇章^④，有些岭南故事还被编写成传奇小说，例如在岭南曾任静海军节度使高骈从事的裴铏，其名作《崔玮》、《孙恪》，千载传诵，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爱好。

到了宋朝，大批名士鸿儒也来到岭南。哲宗时，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使（治所在今广西容县），可是在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其后再被贬为琼州（今海南岛琼山县）别驾，昌化（今海南岛儋县）安置。这就充分说明，他在居留地有职无权，而且更甚的是，他在惠州难以及时领取薪俸，生活

① 陈寿：《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②④ 黄雨选注：《历代名人入粤诗选》。

③ 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吾人咏歌，独惭康乐”。

很艰难；在昌化竟至租借官屋也不获准，要自己掏钱购地建房^①。他虽处逆境，所到之处关心群众生活，经常与当地人士唱和往还，对山川名胜的题咏甚多，为当地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贡献。其弟苏辙，也在哲宗时被贬为化州（今广东化州县）别驾，雷州（今广东海康）安置，后移至循州（今广东龙川），撰《龙川略志》、《龙川别志》，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他和苏轼一样，所到之处，尽力为当地群众做好事。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长期在福建建阳讲学，广东潮州人郑南升、郭叔云等前往从师^②，朱熹也前来广东揭阳、潮州、韶关等地游览^③，对广东理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因而后人在广州建立晦翁书院表示纪念。此外，秦观、米芾、苏过、朱敦儒、陈与义、杨万里、方信孺、刘克庄等人，在岭南都有传世之作，为后学所传诵^④。

明清两朝，好些享誉全国的学者前来岭南任职、讲学或旅游。明朝茶陵诗派创始者李东阳，诗、书兼著的祝允明，戏曲大师汤显祖，主讲东林书院的高攀龙，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以及清朝监修大量官书的徐乾学，浙西词派始祖朱彝尊，论诗创“神韵说”的王士禛，史学名家杭世骏和全祖望，论诗创“性灵说”的袁枚，诗学史学兼长的赵翼，擅长训诂考证的钱大昕，精研金石的金石学家翁方纲，强调通经致用的魏源，将篆、隶笔意融合于行、楷的书法家何绍基，还有力主维新的杨锐、刘光第和从事革命活动的陈去病、宋教仁等，他们都为促进岭南文化发展而作出贡献。

① 元脱脱等：《宋史·苏轼传》。

② 阮元：《广东通志·列传二十五》。

③ 李小松、陈泽泓：《历代入粤名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 黄雨选注：《历代名人入粤诗选》。

第四章 互相促进 共同提高

——长期对外文化交流

两千多年来，岭南一直保持对外联系，从未闭关锁国，即使在明、清两朝实行“海禁”期间，仍然对外开放，因而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特殊贡献。

从岭南扬帆远航，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和其他商品，不断辗转运往海外各地，丰富了异域人民的物质生活；中国发明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往西方，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商人、政府使者、传教士和华侨而弘扬海外，并对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产生良好影响。

与此同时，岭南热情接待海外来客，输入各国特产，引进作物品种：粮食方面有水稻、玉米、番薯、马铃薯等，蔬菜方面有生菜、菠菜、蕹菜、椰菜、椰菜花、西洋菜、君达菜、辣椒、番茄、洋葱、荷兰豆、芥兰头（球茎甘蓝）、南瓜、苦瓜等，水果方面有木瓜、番木瓜、番石榴、樱桃、菠萝、菠萝蜜、无花果、椰枣、油橄榄等，药材方面有诃子、郁金、芦荟、阿魏、白豆蔻、龙脑树等数百种之多，花卉方面有茉莉、素馨、水仙、指甲花、昙花等，经济作物方面有棉花、花生、

甘蔗、胡椒、番麻、刺桐、烟草等^①，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再者，岭南还先后汲取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的哲学、文学、医药学、数学、天文学、历法、美术、音乐、雕塑、建筑艺术、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岭南在中国对外联系中能够发挥重大作用，有其独特条件：

一、岭南面对太平洋，港口不冻少淤，能直接前往世界各地；同沿海地区其他港口相比，前往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欧洲的航程较短。

二、中国主要外销货物，如丝绸、陶瓷、茶叶等，多产自东南亚地区，由西北陆路输出国外，要越过高山大漠，行旅艰辛，费用高昂，南方海路不仅运费较低，而且方便快捷。

三、中国西北陆上对外通道，要通过许多国家和民族居留地，其中一个地区发生变乱或阻挠，就影响全线畅通，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南方海路则不如是。

四、太平洋、印度洋上众多岛国以及澳洲、美洲大陆，在古代只有通过南方海路才能与之联系。

五、岭南腹地深广，气候温热，土地肥沃，农林渔产品丰富，手工业品制作精巧，被誉为“广货”，畅销海内外，市场繁荣，在对外贸易上能吐纳大宗货物。

六、岭南交通方便，溯西江而上，可前往桂、黔、滇，如经灵渠，可前往长江流域；溯北江而上，陆行越过萌渚岭山口进入湘江，或越过大庾岭山口进入赣江，均可前往长江流域；如经长江转入大运河，可前往钱塘江、淮河、黄河、海

^① 综合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等等。

河流域；溯东江而上，可前往赣南、闽西；也可从海路前往沿海地区，因此全国各地货物均可经广州输出国外。从广州进口货物，同样亦可运往全国各地。

七、岭南远离中央政权所在地，大型战乱较少，即使发生战乱，也为时短暂，局面长期稳定，居民热情好客，国外人士乐于前来贸易访问，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

一、扬帆南溟溯自秦汉

中国在秦汉时期处于空前统一的局面，此时地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正在崛起，这东、西两大帝国都积极开展对外联系，以便扩大自己的影响，因而促进彼此之间的海上交往。著名德国学者夏德（F. Hirth）说：“中国与罗马等国贸易，自公元3世纪以前，即以广州及其附近为终止点，是时广州已为海上贸易要冲。”^①

当时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造船业颇具规模，1976年在广州市区中山四路附近发现秦汉期间造船工场遗址，它能建造载重数十吨的大型木船^②，可以沿着海岸作远洋航行。至于这条航线，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馀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馀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

^① 转引自武育干：《中国国际贸易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石异物资黄金杂糅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一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由于古代地名无法确知现在何处，因此对上述航线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从岭南港口（即今越南广治附近或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到都之国（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经邑卢没国（缅甸南部勃固附近），来到谶离国（在伊洛瓦底江口），步行至夫甘都卢国（在伊洛瓦底江中游蒲甘一带），由此乘船至黄支国（印度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①。另一说是从岭南港口（即今越南岷港或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到都之国（今越南南圻一带），经邑卢没国（泰国富华里），到谶离国（泰国古都佛统），步行横越中南半岛，到夫甘都卢国（缅甸蒲甘地区），再乘船到黄支国（印度建志补罗的马德拉斯）^②。至于“已程不国”，则两说均认为在今斯里兰卡。在这条航线上，中国宫廷派出的使者和译员携带黄金和各色丝绸，冒着狂风恶浪和海盗剽杀的危險，前往东南亚、南亚购买珍宝异物，沿途受到热情接待。由于受当时造船和航海技术的限制，中国使者到达印度半岛南部后就得返航。

根据出土文物来考察，沿着《汉书·地理志》所述航线，考古学家在东南亚发现一批汉朝文物，如陶器、五铢钱等。^③

① 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南海交通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编：《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在加里曼丹岛出土的圆圈纹陶甗，与广州出土的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同类器皿极为相似^①，可见两地之间联系密切。

这时岭南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绸，以印度半岛南部为中转站，再由安息（今伊朗）、大秦（罗马帝国）商人运往南阿拉伯、埃及和欧洲各地市场。西汉时，善于经商航海的希腊人、罗马人越过地中海，来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港，通过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运河，由红海进入印度洋，到达印度半岛南部，在此购买由岭南等地运去的丝绸。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年），埃及人希帕努斯（Hippalus）发现印度洋上的信风规律后，大批罗马船队由埃及的红海港口伯伦尼卡或迈奥霍穆扬帆远航，越过阿拉伯海，直驶印度半岛南部，这大大有助于岭南与西方的间接交往。越来越多的中国丝绸由岭南运至埃及，古代埃及托勒密王朝克列奥帕拉特女王所穿的丝袍，就是用中国丝织成的。罗马帝国对中国丝绸的需要量极大，以致罗马学者普林尼（G. Pling）在《自然史》一书说：购买中国丝绸，“据最低之计算，吾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即中国）及阿拉伯半岛之地方，不下一亿赛斯透斯（古罗马币，一说约合10万盎司黄金^②，一说约合85万金镑^③），此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也。”大宗贸易必然带来巨额利润，据范曄《后汉书·大秦国传》载：大秦“与安息、天竺（即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而房玄龄等撰《晋书·大秦国传》则说：“安息、天竺人与之（指大秦）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这就使大批罗马商人趋之若鹜，因而英国历史学家吉本（E. Gibbon）在《罗马帝国兴亡史》

① 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版。

②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三联书店，1973年版。

中说：罗马帝国每年有 120 艘商船从埃及前往印度和斯里兰卡，同亚洲远邦商人贸易。其中当然包括岭南商人在内。

那时，熙熙攘攘的岭南市场，带有异国色彩，人们可以买到海外珍品。1983 年在广州市区象岗发现南越国文帝墓，其中出土有产自非洲的大象牙、红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风格的圆形银盒、创始于西南亚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金花泡饰，以及燃烧龙脑香的熏炉。龙脑香来自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马来语称为“果布婆律”（Kapur Baur），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均记载番禺有“果布”出售，姚思廉《梁书》则称为“婆律香”，均为“果布婆律”的简称。^①茉莉、素馨、诃子、郁金香等花木品种也在这时从海外传入岭南。

在广州汉墓中，出土较多的是串珠，有玛瑙、鸡血石、石榴石、煤精、水晶、硬玉、琥珀或玻璃等不同质料制成，还有迭嵌眼圈式玻璃珠、蓝色玻璃碗、绿色玻璃带钩和璧（包括黄、白色）。带钩、璧是中国传统的礼用器，其他的则与中国传统工艺品迥异，这应与海外贸易有关。出土的玻璃珠经过化验，含铅、钡甚微或没有，与中国古代的铅钡玻璃系统不同，而与西方的古代玻璃相类，可能是舶来品。随着饰品的进口，其雕刻艺术也传入广州，例如中国不产狮子，它产于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由于这时进口用琥珀雕成狮子的工艺品，此后雕刻的狮子成为中国大型建筑的装饰品，扎制的狮子成为中国举办年节及各种庆贺活动的道具，描绘的狮子则是中国画常见的内容。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出土托灯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博物馆编：《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 年版。

陶俑和侍俑，有男有女，形状和汉人不同，头部较短，两颧较高，深目高鼻，宽鼻厚唇，下颌较突出，身体不太高，从刻画的胡子与胸毛来看，再生毛发达，和马来群岛土著居民“原始马来人”接近。这些陶俑的服饰特点是缠头、绾髻、上身裸露或披纱，侍俑下身穿长裙如纱笼，也和马来群岛土著民族的风习相似。如从深目高鼻这种体形来看，他们可能来自西亚或东非，大概就是东汉杨孚《异物志》中所说的“瓮人”。^① 无论从出土文物或古籍记载来看，足证这时岭南已有外侨居留，传入外国文化。

伴随商业活动，外国使者也从此取道岭南前来中国，据范曄《后汉书·大秦国传》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大秦王安敦为罗马皇帝马可·奥理略·安敦尼努斯（M. A. Antoninus, 161—180年），但是罗马帝国不产象牙、犀角、玳瑁，而且罗马史籍也没有遣使中国的记载，因而人们怀疑这是罗马商人假托国王名义进行的活动。即便如此，它充分说明罗马商人在1800多年前已经来到岭南活动。

二、通航西亚在于魏晋南朝

魏晋南朝时期，中国南北分裂，南方政权从本身需要出发，大力加强对外联系；在西方，罗马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 I）于公元395年（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去世，罗马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博物馆编《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这时，中国与罗马帝国的陆路贸易暂时中断，从而促进海道贸易比前频繁，因而岭南对外交往比前有了进一步发展。

孙吴黄武五年（226年），广州刺史吕岱平定了士徽的反抗，巩固了在岭南的统治后，政府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等人前往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堂明（今老挝中部、泰国东北部）等地访问，并在扶南和天竺的使者有所接触，其经历和了解的国家有一百数十个之多^①。回国后，朱应撰《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外国传》，这使中国对东南亚、南亚有了进一步了解，彼此之间建立了良好关系。孙吴赤乌六年（243年），扶南遣使来赠乐人及土特产，此后来往密切。据史籍记载，自孙吴至南朝，林邑来使二十多次，扶南来使三十多次，中国文化传播入林邑、扶南、堂明；林邑、扶南所产的吉贝（棉布）、金属品、玳瑁、沉香、贝齿、象牙、翡翠等经常传入中国。

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大秦国派遣使者前来广州，转往京都洛阳，赠送火浣布等礼物。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中国僧人法显从长安陆路前往印度取经，由海道返国，于安帝义熙五年（409年），在师子国（在今锡兰岛）无畏山寺院內，看见青玉佛像旁供着一把中国的白绢扇，可知这时中国日用品已从岭南海道销往南亚。法显途中在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转船，船上商人说：“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② 这个明确的航期，说明广州和东南亚之间的来往相当密切。

^① 姚思廉：《梁书·海南诸国》。

^② 法显：《佛国记》。

南朝时候，据李延寿《南史》记载，林邑、扶南以及在今泰国境内的金邻国、顿逊国、狼牙修国，在今马来半岛的盘皇国、丹丹国，在今加里曼丹岛的盘盘国，在今苏门答腊岛的干陀利国，在今爪哇岛的诃罗单国、阇婆婆达国，在今巴厘岛的婆利国，在今锡兰岛的师子国，以及天竺国、波斯国、大秦国等，都先后遣使备礼前来中国访问，很多从海道来到岭南。与此同时，商人也络绎不绝前来贸易，广州市场相当繁荣，所以萧子显《南齐书·东南夷列传》说：“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瓌宝溢目。商舶远屈，委输南州。故交（州）、广（州）富实，物积王府。”考古学者于1960年在广东英德县浚洸石墩岭、1973年在曲江县南华寺附近的南朝墓葬中，均发现波斯萨珊王朝（226—651年）的银币，可见当时广州已有波斯或阿拉伯的商人前来贸易或居留。波斯艺术由海道传入岭南，再传入内地，现在仍能看到的著名文物是江苏南京、丹阳等地、南朝陵墓前的希腊式石柱和有翼兽的立体雕像，它具有中国风格，是中外文化融合的产物。岭南商船在这时已前往阿拉伯地区，埃及制造玻璃的技术通过印度传入广州，可惜不久失传。据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马斯欧迪（al-Masndi）《黄金草原与珍奇宝藏》载：六世纪时（即南朝中后期），中国商船经常进入波斯湾，来到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王国京城希拉附近贸易（离巴比伦废墟约3公里）^①，还来到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阿丁。中国南方镀制金银的工艺则在这时传入埃及。这期间，除了使者和商人之外，不少僧侣来到广州。第一个由海道前来中国的是天竺国名僧耆域，他

^① 引自纳忠：《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载《历史教学》，1979年第一期。

在晋惠帝时来广州传教，并为人治病，很有效验，其后前往京城洛阳，复因中原战乱而返回天竺。从此印度等地名僧络绎来到广州，再转往各地传教。例如，晋安帝隆安三年至五年（399—401年），罽宾国（在今克什米尔）名僧昙摩耶舍在广州王园寺（今克孝寺）译经传教，译出《差摩经》一卷，后在安帝义熙年间（405—418年）前往长安（在今陕西）、江陵（在今湖北）等地，以后前往西域。宋文帝时，罽宾国名僧求那跋摩取道师子国、阇婆国来到广州，至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前往京城建业（今江苏南京）译经传教，元嘉十二年（435年），中天竺名僧求那跋陀罗来到广州，后为朝廷礼请至京城译经传教。齐高帝建元初年（479年），中天竺名僧求那毗地来到广州，后往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建元三年（481年），中天竺名僧昙摩伽陀耶舍在广州朝定寺译出《无量义经》，此经传至京城，广泛缮抄流传，传说在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或大通元年（527年），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菩提达摩（简称达摩）来到广州，在西来庵（今华林寺）传教，其后前往建康、洛阳、嵩山少林寺，他被认为是中国禅宗的始祖。梁武帝大同十二年（546年），西天竺名僧波罗末陀（又名真谛）来到广州，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到达建康，后又回到广州，前后翻译了佛教的经、论、纪传64部，共278卷，其中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识学的重要论著，他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其余为鸠摩罗什、玄奘、义净）。上述僧人在传教的同时，还传入印度的哲学、文学、医药、天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对中华文化有深刻和广泛的影响。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说：“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智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佛教还为中国的文学带

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在音韵学方面，为过去中国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至于中国佛庙建塔塑像、绘制壁画，举行宗教仪式时行礼奏乐，这都和印度文化传入有关。现在，岭南古代建筑物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它为神州大地增添了无数奇姿异彩。另一方面，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指出：“佛的意思就是觉悟，觉悟了人生的究竟，解决了生死的问题，不管这种觉悟的内容是什么，归根只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种。因为是唯心主义，所以不要任何事实作依据，只要能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后来僧徒们诳话愈说愈大，愈说愈多，愈说愈奇，佛的神通也愈说愈广大无边，愈不可思议。”“各宗教中说诳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因此，佛教给中国带来严重消极的影响，妨碍社会的发展。

三、直达东非畅说隋唐

隋朝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 270 多年南北纷争的局面。唐朝兴起，其势力范围空前扩张，东北至黑龙江下游及鄂霍次克海沿岸一带，南至印度支那半岛中部，西至咸海（一说里海），北至西伯利亚南部，从而成为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与此同时，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兴起，阿拉伯帝国雄跨欧、亚、非三洲，商业十分兴旺。这东、西两大帝国都加强对外联系，因此广州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

隋朝为了加强和东南亚的联系，炀帝大业三年（607 年）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携带绸缎五千匹，从广州启程去访问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国王派王子那耶迦随中国使者回访，礼物有金芙蓉冠、龙脑香，并用金铸成多罗叶，

隐起成文以为表章。这显示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岭南处于重要地位。

到了唐朝，南方海道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宰相贾耽记述“广州通海夷道”，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地理志》予以转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九龙半岛西部），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海南岛东北角附近）。又南二日至象石（今独珠山，海南岛东南岸属岛），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今越南中南部）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今越南归仁附近）。又一日行，至门毒国（今越南归仁、芽庄之间）。又一日行，至古笮国（今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今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今越南南部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碇，蕃人谓之质（即新加坡海峡），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在马来半岛南端柔佛），南岸则佛逝国（即室利佛逝国，在苏门答腊岛）。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在爪哇岛），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碇，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在今伯劳威斯群岛），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在马来半岛西岸吉打）。箇罗西则哥谷罗国（在马来半岛克拉地峡西部）。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在苏门答腊岛棉兰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在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今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在锡兰岛），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即印度南部）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在印度西南部奎隆），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馀小国，至婆罗门（即印度）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颯国（今印度布罗奇附近）。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颯国（今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

(即印度河)，自北渤昆国(约在今印度伯尔蒂斯坦)，西流至提颯国北，入于海。又自提颯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今伊朗西部阿巴丹附近)，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刺国(今伊拉克巴士拉)，乃大食国(阿拉伯帝国)之弗利刺河(即幼发拉底河)，南入于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在今伊拉克巴士拉之西)，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刺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今东非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馀，至设国(今也门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在阿拉伯半岛东南)，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今阿曼苏哈尔)。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馀，至拔离谿磨难国(今巴林)。又一日行，至乌刺国，与东岸路合。”

上述航线是：船队从广州出发，沿印度支那半岛东岸，来到湄公河口昆仑岛，渡新加坡海峡，经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尼科巴群岛、锡兰岛到印度半岛西岸，由此分为两路，一路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沿东岸到达幼发拉底河口的乌刺国，从岭南输出的中国丝绸、瓷器、纸张、葛布、药材、金属制品和工艺品，由此转运至世界商业中心之一缚达城；另一路由印度半岛西岸横渡印度洋，到达非洲三兰国。这条航线全长一万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它沟通亚、非两大洲。由于沿线各地现在均有大量瓷器出土，因而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改称为“陶瓷之路”，也有人合称为“丝瓷之路”。这条航线有许多支线，前往真腊(今柬埔寨)、堕罗钵底(在今泰国)、骠国、迦摩浪

迦（均在今缅甸）、耽摩立底（在今印度东部）和马来群岛等地。不论是主线或支线所到达的国家，都和广州有来往。所以日本真人元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广州“江中有婆罗门（今印度）、波斯、昆仑（今马来半岛、马来群岛）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阿拉伯国家）、骨唐国（在吕宋岛或苏门答腊岛）、白蛮（指欧洲人）、赤蛮（指非洲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由此可见当日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因此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ordadbeh）在其名著《道里邦国志》中认为：“汉府（Khanfn 即广州）是中国最大的港口。”

鉴于大批外侨长期留在广州，政府在今光塔街一带特设“蕃坊”，供其居住，由外侨推选“蕃长”一人，经中国认可，负责管理“蕃坊”事务。中国尊重外侨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外侨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在蕃坊建立怀圣寺和光塔；也有信奉犹太教、基督教、拜火教的^①，因而上述宗教在这时传入岭南。由于阿拉伯人、波斯人在岭南从事香药贸易，传入阿拉伯药方，很多药用植物还在岭南移植，这就促进了中国医学、药物学的发展。对此，唐朝名医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都有记载。与此同时，还传入阿拉伯的数学、天文学、历法、美术、音乐、舞蹈、球戏等，甚至服饰（胡服、胡帽、妇女耳环等装饰）、饮食（烧饼、油煎饼等）、住室（西亚建筑风格），也对中国有一定影响。

阿拉伯人爱好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西传的桥梁。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Muhammad，约 570—632 年）就曾

^① 阿拉伯人著，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 年版。

说过：“求学问尤当去中国”。^①住在广州的阿拉伯人李彦升深受中国文化熏陶，为岭南节度使卢钧所赏识，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考中进士而知名于世。

在此期间，岭南同印度继续进行文化交流。与法显、玄奘齐名的中国高僧义净（635—713年），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十一月从广州乘船启程，途径室利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巨港）、末罗瑜国（今苏门答腊岛占碑）、羯荼国（今马来半岛吉打），到达印度东部耽摩立底国（今恒河入海口塔姆卢附近），前往那烂陀寺（在今印度巴腊贡，为古印度最高佛教学府）研究讲学10年，并学习印度医学、声明（即语言、文字学），于唐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七月二十日回到广州。同年十一月一日，再由广州前往室利佛逝国抄写佛经，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仲夏回到洛阳。他带回佛教的经、律、论约400部，译成经、律56部，共230卷，他在归途中写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前者叙述在海外各地考察佛教的情况，后者介绍中国西行取经的僧人共60位，其中大半是从岭南去的。

五代时，清海、建武节度使刘岩割据岭南，国号汉（史称“南汉”），建都广州。这时东南亚、南亚、西亚诸国的使者商人继续前来岭南，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四、舳舻相接喜叙宋元

北宋王朝结束了唐末五代的分裂割据局面，统一全国，然

^① 转引自《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而西夏占有黄河河套与河西走廊，控制了北宋前往中亚地区的通道。同时，东阿拉伯帝国发生内乱，也妨碍了东、西方的陆上贸易。因此，这时中国对外联系以海路为主，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南宋和元朝时，虽然福建泉州港兴起，但广州比前更为繁荣。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统一岭南地区，首先在广州设立提举节舶司，负责接待外国使者和商人。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特派太监8人携带金帛，分4路前往东南亚、南亚等地邀请外商前来贸易^①。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广州奉真观改为来远驿，热情接待外国使者和商人^②。宋朝与岭南有直接或间接来往的国家或地区，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载：主要是东南亚的安南国（今越南北部）、占城国（今越南中部）、宾瞳胧国（今越南藩朗）、宾陀陵国（今越南藩朗附近）、真腊国（今柬埔寨及泰国南部）、蒲甘国（今缅甸蒲甘）、登流眉国（今马来半岛中部）、佛罗安国（今马来半岛巴生港附近）、麻啰奴国（今加里曼丹岛西北部）、上下竺（今马来半岛南部奥尔岛）、兰里国（今苏门答腊岛亚齐）、三佛齐国（今苏门答腊岛巨港一带）、波斯国（今苏门答腊岛西部）、闍婆国（今爪哇岛中部）、沙华公国（约在今马古鲁群岛一带）、十二拓（今卡里马塔群岛的塞鲁土岛），南亚的天竺国、注犍国（今印度科罗曼德海岸一带）、细兰国（今锡兰岛）、故临国（今印度奎隆）、南尼华罗国（今巴基斯坦信德地区），西亚的大食国、白达国（今伊拉克巴格达）、大秦国（今印度南部或伊拉克）、默加国（今沙特阿拉伯麦加）、麻离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6。

拔国（今阿拉伯半岛南部），非洲的勿斯里国（今埃及）、陀盘地国（今埃及达米塔港）、昆仑层期国（今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岛一带），甚至远达欧洲西端的木兰皮国（今西班牙南部）。

宋朝在国际海运方面享有盛誉，外商多乘坐中国海船前来岭南。在广州“蕃坊”居留的外侨比前增加，主要为阿拉伯人，他们为岭南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对此，中国政府给以荣誉和奖励，曾任广州“蕃坊”蕃长的勿巡国（今阿曼苏哈尔）人辛押陀罗，宋神宗赐以白马一匹、鞍辔一副，^①宋哲宗授予“归德将军”称号。^②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佛齐国地华迦罗等出资重修天庆观（在今海珠北路祝寿巷），这是两地人民密切联系、重视文化交流的表现。元丰五年（1082年），广州转运副使兼提举市舶司孙迥奏报：“南番纲首持三佛齐詹毕国主及主管国事国主之女唐字书，寄臣熟龙脑香二百二十七两、布十三匹。……臣不敢受，乞估值入官，委本库买采帛等，候各舶回报谢之。所贵通异域之情，来海外之货。”^③宋神宗表示同意，这说明岭南和三佛齐关系之密切；至于三佛齐国主之女能写“唐字书”，可见她深受中国文化之熏陶。这时在广州居留的阿拉伯人，也经常前往州学听讲，热情学习中国文化。勿巡国使者还请求另建校舍，招收外侨子弟，因此到了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广州设立“蕃学”，这有利于广州和阿拉伯的文化交流。中国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就在这时由南方海路先后传入印度、阿拉伯、埃及和欧洲。印度和阿拉伯的香药，也在这时继续大

① 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二。

② 苏轼：《东坡外制集》卷中《辛押陀罗·归德将军敕》。

③ 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六。

量输入岭南。唐朝医学著作中采用进口香药的医方只有数十种，宋朝医学著作中以进口香药为原料的汤剂、成药则不下二三百种，这促进了中国医学、药物学的发展。在岭南经商的外侨，有的成了巨富。据岳飞之孙岳珂《程史》记载：广州“蕃坊”中最富有的外商姓蒲，德国学者夏德（F. Hirth）认为“蒲”乃阿拉伯常见人名 Abu' 的音译^①，至今广州仍有蒲姓人士。大量阿拉伯人在广州居留，以致广州方言中掺入了阿拉伯单词，如“污糟”、“那渣”（均为“不洁”）、“霖”（好、对）、“罅”（空隙、没有）、“冚”（盖着、打）、“比”（给予）等等。^②。产自阿拉伯地区的君达莱、椰枣树、油橄榄以及大批药用植物种子，也在这时传入岭南。

宋末元初，岭南饱受战火摧残。元朝统一全国后，世祖至元十六年（1280年）十二月开始，多次派广东招讨使达鲁花赤、杨庭璧前往东南亚、南亚等地访问，据陈大震《南海志》记载，与广州有来往的国家和地区达140个之多，分布在今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吕宋岛、棉兰老岛、苏门答腊岛、林加岛、新加坡岛、兰散岛、邦加岛、勿理洞岛、天定群岛、加里曼丹岛、苏禄群岛、班乃岛、苏拉成西岛、塞布库岛、马鲁古群岛、曼涯岛、班达群岛、爪哇岛、帝汶岛、巴厘岛、小巽他群岛、锡兰岛、印度半岛、马尔代夫群岛、阿拉伯半岛，以及中亚、西亚、北非和东非等地。为此，陈大震《南海志》说：“广（州）为番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岛夷诸国，不可名殫，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尽日月出入之地，无不奉珍效贡，稽顙称臣，故海

①（日）桑原隲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② 马道达：《广州话中的外来语——阿拉伯语》（内部稿）。

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畜玩于上林，其来者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之所书者。”前志指宋宁宗嘉定年间陈岷《南海志》和宋理宗淳佑年间方大琮《南海志》。这说明广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比南宋有了显著的发展。

我们再看国外的记载，著名旅行家非洲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Ibn Batwutah）在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经印度前来中国，回国后著有《异域奇游胜览》，又名《伊本·白图泰游记》，其中对广州的描述是：“隋尼克兰（即广州）是一大城市，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城的一个地区是穆斯林居住区（指‘蕃坊’），内有清真寺和道堂，并设法官（指‘蕃长’）和谢赫（指‘教长’）。”他盛赞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船可载千人，乘坐甚为安全舒适。书中还介绍了他在广州受到的热情接待，从而显示广州是一座好客的城市。

五、远驶欧美共话明清

明清时期，中国先后两次在沿海部分地区实行海禁，一为明朝中期的倭寇侵扰，一为清朝初期的郑成功反抗。在这期间，广州仍然保持对外联系，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

明朝初年，倭寇在中国海域猖狂抢劫；同时，元末盘踞江浙沿海岛屿的张士诚、方国珍残部，企图卷土重来。为此，明太祖严禁私人出海，以防暗中接济敌寇，初时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设立市舶提举司，处理对外联系事宜。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

(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南亚、西亚及东非等沿海地区)诸国。”^①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上述三处市舶提举司,但这不等于完全禁止广州等地的对外贸易,因为据《明实录》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惟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广州是接待真腊、暹罗入贡的港口。可是撤销市舶提举司,对外联系诸多不便,因而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重新恢复。两年后,广东市舶提举司在广州城西蚬子步(今广州市十八甫)设立怀远驿,构屋120间,建筑十分华丽,用以接待外国贡使。明世宗嘉靖元年至穆宗隆庆元年(1522—1576年),由于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掳掠,实行海禁。据《明史·职官志》载:“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这时广州成了中国南方对外联系的惟一港口。

从明朝中期开始,西方殖民者向东方侵略,岭南与马六甲海峡以西地区的联系遭到破坏。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首次驾驶欧洲式船只来到广州。正德十六年(1521年),广东海道副使汪铤派人与葡萄牙船上的华人杨三、戴明联系,得知他们熟悉制造西方火铳炮和火药,便劝其留在广东东莞制造西方火铳火药。^②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殖民者别都卢(Pedro Homen)等率领船队入侵广东新会县西草湾,汪铤用西方火铳击败葡萄牙殖民者,活捉别都卢等42人,杀死35人,缴获西方大小火铳20多门和船只两艘,残敌狼狈溃逃。^③这场辉煌的胜利,使西方殖民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妄生觊觎,侵犯中国。这件事应该大书

① 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

②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

③ 张廷玉等:《明史·外国传·佛郎机》。

特书，因为它比清朝林则徐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足足早了300多年。从此明朝大规模仿造西方火炮火药，用于长城一带的防御工事。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西班牙人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来到广州府上川岛，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来华传教士，但不久病故。其后基督教传教士接踵而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诡称商船遇风，通过行贿，获准借广州府香山县蠔境澳（即澳门）居留，葡人传入西欧的建筑、服饰、饮食、音乐、美术等等，从而使澳门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据点，西方传教士在此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再转往内地传教，同时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欧洲。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基督教牧师加内罗（D. M. Carneiro）在澳门创办圣加札医院，这是在中国境内第一间用近代欧洲医学治病的医院。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广东肇庆等地展出自鸣钟、天象仪器、三棱镜、八音琴和世界地图，并介绍西方的天文数学、理化知识，使中国人民耳目一新。为此，明末清初，广州人民很快就掌握了修钟、造钟技术（发条靠进口），由于中国修钟、造钟以广州为最早，所以有“广钟”之称。原来流行于波斯、伊拉克的“扬琴”（又名洋琴），大约在明朝末年传至广东沿海一带，其后流行于全国。

明末清初，郑成功在台湾抗清。清世祖顺治十八年至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61—1683年）实行海禁，沿海居民一律内迁50里，但是澳门有大量葡萄牙人居留，不便内迁，所以广州通过澳门仍然维持对外联系。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后，解除海禁，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江（江苏云台山）、浙（浙江宁波、后改定海）、闽（福建漳州）、粤（广东广州），四

个港口设立海关，开放对外贸易，后因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骚扰，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决定除广州外，其他港口停止开放，从此直至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止，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惟一港口。

这时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比前显著增加，据法国德恩（Dehergne）编印《1552—1800年的中国耶稣会士名录》所载即达900多人，以葡、西、法、意、比国籍者较多，德、奥、波、捷等国籍者次之，英国籍者最少。此外还有天主教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传教士前来。他们之中，很多是从海路来到岭南，掌握中国语言、文字后，再分别前往内地各处传教，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他们不断把中国情况介绍给欧洲，其后西方启蒙思想家从本身需要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利用改造，作为抨击欧洲传统偏见和神学束缚的思想武器；并把中国古代的“仁政”观点，作为提倡资产阶级社会改革的依据。他们崇尚“理性主义”、“自然法则”，于是把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引为同调；他们追求理性和智慧，反对愚昧和盲从，所以对儒家的伦理道德、注意教育的学说，给予很高评价。他们还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如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年）的“单子论”、“二进制数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易经》和宋儒理气宇宙观的启发；法国著名作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年），崇尚的“自然法则”，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其相似之处，他被认为是“新思潮的代言人”、“社会舆论的领袖”；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F. Quesnay 1694—1774年），其以农为本的理论、土地单一税的主张，都曾直接承受中国重农思想的某些内容，因而有“欧洲的孔子”之称。在18世纪前

后，欧洲社会掀起了崇尚中国古老文明的热潮，但是到了18世纪后半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某些欧洲学者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出异议。探本溯源，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是从岭南开始的。

与此同时，岭南传入了近代欧洲文化。在医药方面，由于推销商品、传教等需要，清仁宗嘉庆十年（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比尔信（A. Pearson）来广州传播种牛痘的医术。道光十四年（1834年），美国海外传道部派医生伯驾（P. Parker）来广州创办博济医院，内设南华医学堂（即今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道光三十年（1850年），英国商人在广州沙面开设屈臣氏药房，出售西药。德宗光绪八年（1882年），旅美归侨罗开泰在广州仁济西路怡和街开设泰安大药房，出售并自制部分西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美国教会在广州设立柔济医院（即今广州第二人民医院），创办广东女医学堂。两年后，法国人在广州长堤开设韬美医院（即今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在报刊出版方面，由于贸易和政治需要，道光二年（1822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创办《蜜蜂华报》，这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道光六年（1826年），士罗在澳门创办《依泾杂说》，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华文报纸。内容不详。总的来说，外文报纸刺探中国情报，反对中国禁止鸦片。道光十三年（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C. Cutzlaff）在广州出版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中国统纪传》。极力鼓吹要使中国耶稣教化。在教育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J. Morrison）在香港创办英华书院，道光三十年（1850年），外国传教士来广州创办学校，当时广州市民痛恨帝国主义入侵，予以坚决抵制，这就迟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凭借不平等条约，才得以在岭南创办学校。在建筑方面，由于天主教活动增多，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法国普行善会开始在广州德路修建“圣心大教堂”，用花岗石建造，故俗称“石室”，历时25年，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落成，它是中国最大的以高直尖顶为特色的哥特式建筑物。在交通工业方面，由于西方商人前来中国贸易，需要在广州黄埔维修商船，因而中国近代工业最早出现于广州黄埔，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也最早诞生于黄埔。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香港“大英轮船公司”派代表柯拜（J. Couper）来黄埔监督修理英国船舶，他发现可获厚利，便在此建造近代化的“柯拜船坞”，这是外商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家船厂，也是未经中国许可而非法建造的船厂。此例一开，外商接连在黄埔侵犯中国主权而擅自建厂，这些船厂虽曾一度兴旺，终被英商“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所吞并，后因无利可图，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停业，这年广东当局兴办洋务，创立广州机器局制造军火，三年后收购“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在黄埔的废置船厂，用以制造小型浅水军舰，在沿海及内河行驶。此外，通过西方商人，原产自美洲的大批作物品种，也在岭南移植。

对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n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评论说：“总之，耶稣会传教士们的贡献虽说内容复杂，但却具有一种较高级的投机性质。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中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那些耶稣会传教士连同他们的荣誉在内，实在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因为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同他们带去的科

学一般多。虽然有些迷信由于他们的到来而破除了，但哲学家们可以认为，他们随身带去的迷信也不少。”至于西方传教士当时在岭南进行的政治活动，则是为其本国利益服务，对中国人民有损。

第五章 忧国爱民 与时俱进

——提倡改革、革命的政治思想

中华文化认为社会能够不断发展、繁荣，就在于进行改革、革命。《周易·系辞》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周易·革》也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朝政黑暗腐败，社会停滞衰退的时候，就有一批志士仁人挺身而出，不顾本身安危，要求进行改革或革命。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之一的岭南文化，很好地发扬了这个光荣传统。

岭南地处边陲，远离中央政权所在地的京城，政治上所受桎梏较轻；加以位居海疆，容易接受外来影响，思想比较活跃。因此，在古代，一再要求澄清吏治，消除各种腐败现象；在近代，鼓吹维新变法，进行武装革命；在现代，首先宣传社会主义，大力开展工农运动。

一、要求整顿吏治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官员庸劣，人民受害；一是皇帝胡闹，国家遭难。对此，历代岭南的名臣贤士奋不顾身，大胆忠谏，要求整顿吏治和革除积弊。

在唐朝号称“开元之治”的太平盛世，玄宗顾盼自得，逐渐追求佚乐。这时，来自岭南曲江的张九龄（678—740年），就已洞察出潜伏的重大危机。他大声疾呼，要求整顿吏治。认为政治要上轨道，首先要慎选地方官员，但是好些地方官员很不称职。他在《上封事书》中指出：“况今六合之间，元元之众，莫不悬命于县令，宅生于刺史。陛下所与共理，此尤亲于人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为什么出现大批官员并不称职的情况呢？张九龄淋漓尽致地揭发：“但于京官之中出为州县者，或是缘身有累，在职无声，用于牧宰之间，以为斥逐之地；或因势附会，遂忝高班，比其势衰，且无他责，又谓之不称京职，亦乃出为刺史；至于武夫流外，积资而得官，成于经久，不计于有才，诸若此流，尽为刺史，其余县令以下，固不可胜言。”这是说：朝中那些犯有过失，庸碌无能，或者靠巴结逢迎，爬上高位，后台一倒，难以在职，或者是不谙政事的武官和九品以外的低级官员，混的时间长了，并无才能，也成了刺史、县令，肯定无法把工作做好。他认为：“据资配职，自以为能，为官择人，初无此意。故使时人有平配之议，官曹无得贤之实，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是于圣朝有何裨益？故臣以为选部之法，弊于不变。变法之易，在陛下焕然行之”。他建议革除上述弊病，要改革选拔官员的办法，慎重任命刺史、县令，“凡不历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

为侍郎、列卿；不历县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为台、郎、给、舍。”而且，中央与地方官员应定期对调，以便上下沟通，避免壅蔽隔阂，庶可走上治道。同时他还提出：“在之选用贤良，取其称职，或遥闻而辟召，或一见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图侥幸，辟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奸伪自止，流品不杂。”这种只问德才，不拘年资来选用官员，应该说是切中时弊、十分正确的意见。因此明朝丘濬写诗称赞张九龄：“岭海千年第一人，一时功德迥无伦。江南入相从公始，袞袞诸贤继后尘。”“伊尹兴商吕佐周，匡时有道孰能侔？谁知岭表千年后，公问中州出一头。”

北宋时候，疆土比前代狭小，国势衰弱，外有强敌，内有隐忧，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借助所谓祥瑞，宣扬君权神授，用以欺骗人民。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早在汉武帝时就有了。一千多年来，皇帝以此愚弄百姓，官员以此奉承皇帝，上下互相欺骗，成为政坛积弊。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皇帝采用参知政事王钦若的意见，伪造最大的祥瑞“天书”，分别悬挂于京城开封左承天门和泰山醴泉亭，^①大臣王钦若、丁谓等还多次呈献“祥瑞”之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地也纷纷送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所谓“祥瑞”，数量之多，更是无法统计。这完全是转移群众视线，掩盖当时水、旱频仍的灾情。宋仁宗时，广东曲江余靖（1000—1064年）对此强烈反对，撰写《正瑞论》，态度鲜明地提出：“窃谓国之兴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国之亡也在乎乱，不在乎妖。”接着，他以大量史实来说明：“尧以敦九族、和万邦而兴；舜以举十六相、去四凶则又兴；禹以

^① 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二十七》。

平水土兴；汤以行仁政兴；周人以积行累德兴。夫是者虽无祥瑞，可不谓圣且治乎！癸（即夏桀）以奢侈亡，辛（即商纣）以暴虐亡，厉王以聚敛亡，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虽无妖怪，可不谓昏且乱乎！”因此，他严正要求：“今之郡县，时报祥瑞以为纪事之端，愚谓非良直之法也。必若德施于民，效易其俗，赏不僭，刑不滥，则四灵（指麟、凤、龟、龙）为畜，日游于君之宫沼郊藪矣。又何用索异传怪，惑天下之耳目哉！”他认为地方大员经常搞些“祥瑞”上报朝廷，并非善策，不如替人民做好事，移风易俗，赏罚分明，这比用奇异怪诞来愚惑世人要好得多。本着这种态度，他在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上疏谏迎舍利，这同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呈奏《谏迎佛骨表》，可谓先后媲美。

明世宗迷信道教，长期不理政事，严嵩当权，杀害异己，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吞侵军饷，北方有鞑靼攻袭，东南有倭寇侵扰，政治腐败，经济困难。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户部主事、广东琼山海瑞冒死犯颜直谏，在奏疏中严厉批评世宗：“主谓遐举（即升仙得道）可得，一意修真（即修真炼丹），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指随意封赏道士高官厚禄），名器滥矣。……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为此，他恳切要求改革：“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朔，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海瑞认为，国家要走上正轨，只要最高领导者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共同研究致治之道，革除数十年的积弊错误，各级官员也要秉公办事，

直道而行，不搞阿谀奉承，向先贤前哲学习。这样，太平盛世并非难事。然而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在于：“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那些做大官的，只顾保持自己的禄位，不愿正视现实，专门吹拍奉承，没有真话；做小官的，只因上面实行高压政策，严刑峻罚，自己如不小心就会获罪，所以闭口不言国事。因此天下就像一潭死水，没有半点生气。这篇奏章上呈，俗称海瑞骂皇帝，世宗看了大怒，下诏处死海瑞，只因未及行刑，世宗先自一病呜呼，海瑞才得获释。

二、倡议维新变法

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入侵。岭南有识之士，爱国心切，最早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倡议维新变法。

中国人提出向西方学习，论者多以为由林则徐、魏源倡议；又以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始知枪炮军舰不足恃，才懂得要变法维新。其实不然，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希望革新，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早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顺德梁廷楠任广东海防书局总纂，编纂《广东海防汇览》、《粤海关志》等书，有机会研究国外情况。当时来广州经商、传教的西方人士，曾用不甚通顺的中文，介绍欧美情况；国人也曾著述在海外的见闻，梁廷楠据此编写《海国四说》，这四说是《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介绍耶稣教历史及在华传播简况），《合省国说》（介绍美国简况）、《粤道贡国说》（介绍由海道来粤贸易各国简况）、《兰峇偶说》（介绍英国简况）。书中高度推崇欧美的民主政治和生产技术。其《合省国志·自序》云：“予观于美利坚之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然后知古者可畏

非民之未为虚语也。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而守之。未有统领（即总统），先有国法（即宪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又说：“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而无使覆当前之餽斯已耳，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哉！”对此，人们不能不感到十分惊异，梁廷楠的卓见远识，超越于其同时代人之上。他称赞凡事通过立法，反对终身担任最高职务，当然更谈不上世袭，这明显是否定封建制度。他产生这种思想决非偶然，由于他出身平民家庭，少年丧父，刻苦治学，但在科场中仅是副贡生，授澄海县训导，连养家活口都有困难，不久就辞职而归，任越华书院监院，谈不上什么“皇恩浩荡”。青灯寒窗，博览群籍，目睹时艰，志存匡济，没有官爵束缚，自然思想解放，纵观环宇大势。探求治平之道，说论宏议，振聋发聩。受到时人的称赞。现在人们只重视他的《夷氛闻记》、《粤海关志》，忽视他的政治见解，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上一个疏漏。

这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多次入侵，清政府接连战败，人们痛定思痛，奋起总结教训，与西方接触较多的岭南人士，对如何向西方学习，提出不少建议。广东香山县南屏镇（今属珠海市）容闳（1828—1912年），少年丧父，家境困难，由于偶然的机会有，得以接受西方教育，文宗咸丰四年（1854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取得文学士学位，是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在毕业时认为：“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

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为此，他在毕业后立即回到中国，怀着“教育救国”的宏愿，多年来一直大力呼吁派遣公费留学生去国外学习，他表示：“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②经过诸多曲折，清政府于穆宗同治九年（1870年）采纳其建议，成立留学事务所，先后派遣120名少年去美国学习。^③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是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严重挑战。当初内地很多家长不愿子弟远赴异国，广东因华侨、港澳同胞较多，所以赴美留学的少年，三分之二以上是广东籍人；而在广东籍中，半数为宜山县人（今改名为中山市及珠海市），其中有詹天佑（后为京张铁路总办）、梁敦彦（后为外务部尚书、交通总长）、蔡绍基（后为北洋大学校长）、唐国安（后为清华学校校长）、蔡廷干（后为外交总长、代理内阁总理）、唐绍仪（后为国务总理）、梁如浩（后为外交总长）、徐振鹏（后为练习舰队司令）、曹嘉祥（后为海军次长）、容耀垣（后为孙中山顾问）等等。虽然留学事务所因封建官僚作梗，于光绪七年（1881年）半途解散，但毕竟为国家造就了船舶、铁路、矿冶、机械、电报、教育、海军、外交方面的第一批专家，创立了向西方学习的良好开端，此后出国留学蔚然成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香山雍陌乡（今属珠海市）郑观应（1842—1921年），曾在上海英华书馆学习外文，后任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其后独立经营和生茶栈。光绪六年（1880年），受李鸿章委派为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轮船招商

①②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局帮办和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职。他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大力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其文稿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江苏由余莲村经手刻印名为《救时揭要》，有日本翻译本；同治十年（1871年）增补，在香港出版，改名《易言》，曾两度刊行。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广州再经删定，改名《盛世危言》，共八卷，内容甚广，包括议院、选举、立法、外交、教育、建都、考试、传教、吏治、禁烟、革弊、税收、银行、盐务、捐纳、运输、国债、国防、邮电、工矿、农商等方面。此书尚未出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即由江苏布政使邓华熙抄呈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下令译署出版给官员阅读。可见此书乃是清末实行变法自强的先河。作者在书中最早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名副其实。并在序言中引用张靖达立：“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船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①他大力宣传变法维新，其论著多次再版，在全国影响很大。

其后，广东三水人胡礼垣（1847—1916年）、南海人何启（1859—1914年），因均在香港出生，很早就接触西方文化。胡礼垣在香港大书院（后改名皇仁书院）毕业，曾游历苏禄、日本等地，以后长期在香港从事著作。何启曾在英国阿伯丁大学学医，后入林肯法律学院，毕业后回香港任大律师，兼任议政局议员，加入英国籍，创办雅丽士医院（香港大学医学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

院前身)，兼任医学教授。他们认为中国如要富强，最好是仿效英国，实行君主立宪，设立议院，大办教育，要求发展实业，但是反对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和“筹借洋款”；不同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同时对维新派康有为的个别观点也表示不满。他们把光绪十三年至二十七年（1887—1901年）发表的政论，于戊戌政变后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汇刻为《新政真诠》（又名《新政全书》）出版。该书“例言”说：“《新政安行》作于政变而后、人言最禁之时。乃禁愈严而言愈放者，以新党（指维新派）、旧党（指保守派）之所为乖张舛错，皆由于未能平理近情、顺道公量之故。”从中可见作者的政治立场。然而，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筹划第一次广州起义时，何启负责起草对外宣言；辛亥革命后成立共和国，胡礼垣由香港致书孙中山表示拥护。^①他们囿于本身的地位，没有参加革命，但他们推动社会改革，激发人们救亡图存，在历史上有其积极作用。

倡议变法维新，影响最大的要推南海人康有为（1858—1927年）、新会人梁启超（1873—1929年）等人发起的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从小接受儒家教育，光绪五年（1879年）暂住香港，自称“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②“为讲西学”是指他在光绪十年（1891年）于广州创办“万木草堂”，除教学生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许多西方译著。前此他在上海购买西方译著达3000多册，努力研究西方情况。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后，民族危

^① 胡礼垣：《胡翼南先生全集·与孙中山书》。

^②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机日益严重，他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多次上书清帝，倡议变法维新，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康有为及其门人梁启超等在北京发动各省应试举人1300多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号召变法图强，从此揭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影响及于全国。其后梁启超在上海《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法积既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这年6至9月，清帝采纳康、梁等人的意见，颁发维新法令，推行新政，后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导致变法失败。但是“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仍有其重要意义。

三、发动武装革命

从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开始，英帝国主义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此后西方殖民者纷纷前来攘夺中国主权，攫取利益，清政府腐败黑暗，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忍无可忍，纷纷挺身而出，组织武装反抗，其中在全国范围有重大影响的，一是广东花县人洪秀全（1814—1864年）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给清政府以严重打击；一是广东香山人孙

中山（1866—1925年）领导的辛亥革命，前仆后继，终于推翻清政府，废除了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

1. 太平天国起义

清朝道光三十年底（1850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行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两年后定都南京（改称天京），前后与清政府进行了18年的武装斗争。

洪秀全出身于中农家庭，少时在村中读私塾。道光八年（1828年）来广州考秀才，落第后回家耕种，后任塾师。道光十六年（1836年）再来广州应试，仍然失败。次年复来广州应试，也未登榜，这时他在广东布政司附近的大街上，获得基督教传教士、广东高明县人梁发散发的宗教宣传品《劝世良言》，共9册、约10万字，内容是英国传教士马孔逊（R. Morrison）翻译的几章旧约圣经和一部分对经文的解释，以及梁发自述的学道经历，它用通俗的语言对教义进行讲解，无非是要人们崇敬神天上帝，依赖救世主耶稣，让灵魂得救，富人要行善积德，穷人要安分守己，一切都要听命于神天上帝，死后就会到天堂享受世上所没有的幸福。当时洪秀全热心功名，对这类说教并不重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来广州应试，还是落第。前后参加考试4次，历时15年，一无所获，这确是极为沉重的打击，他对科场表示绝望，激起反抗思想，促使他想起《劝世良言》中的“神天上帝”，并想起6年前的一场大病。这时他向人宣称，在病中似梦非梦，仿佛到了天堂，有无数天使相迎，还有一位“金须

黑袍高大老人”赐给一剑，对他进行劝导。^①因此，他自认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之弟，接受上帝的天命，下凡救世。这种神话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并不罕见，汉高祖、明太祖就是先例。洪秀全据此组织“拜上帝会”，规定只拜上帝，不拜神仙菩萨等偶像。他砸烂村塾中的孔子牌位，引起村中父老反感，因此失去塾师的职业。而他在本乡传教，信徒甚少。因此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他和拜上帝会成员冯云山、冯瑞珍、冯瑞嵩4人，从花县出发，前往番禺、增城、从化、英德、南海、顺德、连山、阳山等十多个县传教，靠沿途贩卖笔砚获得的微利来作旅费，生活相当艰苦，招收的信徒无多，冯瑞珍、冯瑞嵩半途离去，只剩下同乡同学、也是考试失意的塾师冯云山，两人继续前行，来到广西贵县，传教的成绩甚差，本拟返回广东。途中，冯云山临时决定留在广西桂平，洪秀全独自回到花县，仍当塾师，同时总结教训。他发现单纯用信仰上帝来赎罪邀福，难以获得信徒。而他长期在农村生活，深知农民的苦难，要吸引大批群众，宗教内容必须符合群众心意。从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825—1827年），他利用某些儒家思想和社会传统观念以及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加以糅合，先后编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篇传教文书，他在《救世歌》中劝人信奉天父上帝，勿拜邪神，须做正人，要戒“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覡”、“赌博”（包括吸鸦片、酗酒）。在《醒世训》中，他认为人人都是“皇上帝”的子女，因此人与人的关系应该平等、无私，所以“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接着引用

^① 《洪仁玕自述》。

《礼记·礼运》中关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这一段文字，号召群众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认为“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可见他对孔丘的认识自相矛盾。在《觉世训》中，他指出：“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因此凡人不应跪拜各种偶像。他把各种神仙菩萨甚至清朝皇帝都称为“阎罗妖”，从而发出号召：“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这以后，道光二十七年，洪秀全从花县来广州拜访美国牧师罗孝全（I. J. Roberts），得以阅读“新旧约圣经”。但是罗孝全认为洪秀全有异端思想，拒绝为其洗礼。洪秀全学到一些对上帝的仪式，同年8月去广西寻找冯云山。由于这时冯云山在紫荆山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洪秀全的神学理论符合广大农民的愿望，信徒大增。经过三年的酝酿，一场势不可挡的革命风暴横扫神州大地，太平天国在华东地区建立政权。咸丰九年（1859年），洪秀全族弟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被封为干王，颇受器重。洪仁玕根据自己所接受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撰写《资政新篇》建议兴办铁路、轮船、银行、工厂、矿山、邮政、报馆、钱谷库、市镇公司、公会、医院等，这在当时尚属卓见，有其进步意义，洪秀全表示同意，只因天京被清军包围，无法实行。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攻陷天京，太平军余部在康王汪海洋的率领下，进入广东东部嘉应州（今梅州市），一直坚持战斗到同治五年（1866年）才溃败。

2. 辛亥革命

光绪二十年（1894年）6月，孙中山与陆皓东到天津上

书李鸿章，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但是李鸿章不予接见。同年11月，孙中山前往太平洋夏威夷群岛（当时由土人建立王国）首府火奴鲁鲁（华侨称为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进行革命活动。次年1月，孙中山与邓荫南返回香港，成立香港兴中会总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扩大为同盟会香港分会。兴中会和同盟会在岭南进行了十次武装起义。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广州之役：香港兴中会总部成立后，当即在广州等地建立分会，并准备于同年10月26日，即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举行广州起义。由孙中山主持军事，杨衢云留在香港筹款、购械和募兵，谢纘泰联络外籍人士，郑士良发动三合会群众参加，朱淇负责起草讨满檄文和安民布告，朱淇之兄朱湘时任广州西关清平局委员，得悉情况后向清吏告密，因而陆皓东、程奎光、朱贵全、丘四等人被捕，受尽酷刑，壮烈牺牲，起义流产。孙中山临时潜入博济医院躲避，事后前往香港。

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惠州之役：这年正值北京爆发义和团反帝运动，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因此孙中山派郑士良经惠州归善县（今广东惠阳）发动三合会群众起义。杨衢云、李纪堂、陈少白在香港接济军饷、武器。10月初，郑士良在归善三洲田率领会党百余人，进攻沙湾、佛子坳、崩冈墟、三多祝等地，连战皆捷，队伍发展至两万多人，后因弹药不继，被迫解散，郑士良退往香港，次年在香港被清吏毒死，杨衢云也被清吏派人暗杀。史坚如为配合三洲田起义，用炸药谋杀两广总督德寿，后被捕牺牲。

壬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广州之役：由于杨衢云、史坚如牺牲，谢纘泰、李纪堂要报仇雪恨，不同孙中山及兴

中会商量，私下与洪秀全从侄洪全福合作，计划于1月28日在广州起义。由李纪堂独力负责筹集军费，洪全福联络东江、北江等地会党，因被人告密，在广州设立的起义机关被清吏破获，会党20多人被捕，有10多人被杀，其余被判重刑，东江会党起义后被清军击溃。

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潮州黄冈之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江西、湖南的同盟会发动萍浏醴起义，因而同盟会香港分会准备在潮州起义响应。孙中山指出：“起义须潮、惠、钦、廉同时发动，以便牵制清军。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①后因计划泄露，清军打算逮捕同盟会员，同盟会提前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1907年5月22日）发难，攻占潮州黄冈（今饶平县），成立军政府，清朝两广总督周馥急调大军前来镇压，起义军弹尽援绝，伤亡甚多，被迫解散。

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黄冈起义后，同盟会于6月2日在离惠州城10公里的七女湖起义，缴获清军防营的枪械，击毙水师巡船哨弁多人，攻克泰尾、杨村、三达、柏塘等墟，各乡三合会群众纷纷来集，声威大震，在八子爷打败清军管带洪兆麟，清军水师提督李准前来镇压，起义军声东击西，来去飘忽，清军疲于奔命。其后起义军获知潮州黄冈起义失败，又因弹药缺乏，于是在梁化墟附近埋藏枪械，自行解散。

丁未防城之役：这年初，广东钦州“三那”（那黎、那彭、那思）地区爆发刘恩裕等领导的抗捐斗争，孙中山派人与之联系，其后刘恩裕牺牲，“三那”乡民派代表到河内向孙中山求援，孙派王和顺前往。王和顺于9月3日在钦州王光山发

^①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

动清军起义，5日攻占防城（今属广西），并向钦州府城进发，因清军已有防备，改攻灵山，后以弹药告乏，退回“三那”，宣布解散，部分起义军退入十万大山，等待时机。

丁未镇南关（今友谊关）之役：孙中山考虑防城之役失败，但精锐仍留在十万大山，于是命令王和顺率领攻打镇南关，取得镇南关的军械弹药后会攻龙州（今龙津县）。但是广西凭祥土司李祐卿不肯听王和顺调度，乃改派黄明堂专任其事，李祐卿为副，于12月1日攻占镇南关右辅山的镇南、镇中、镇北三个炮台。因有炮台守军做内应，进展顺利。次日，孙中山率领黄兴、胡汉民、胡毅生、卢仲琳、张翼枢以及日人池亨吉、法国炮兵狄氏来到镇北炮台，发现大炮无法移动，炮台并无枪枝子弹，难以坚守，清军反攻，众寡悬殊，于是撤出。

戊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钦州马笃山之役：这年3月，孙中山派黄兴率领安南（今越南）华侨青年两百多人，从安南进入钦州东兴（今属广西），29日在小峰击败清军，4月2日攻占马笃山，起义军发展至600多人，获步枪400多支。后因弹尽援绝，宣布解散。

庚戌（宣统二年，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开始训练新式陆军。新军文化程度较高，爱国思想较浓，容易接受革命理论。广州新军炮兵排长、同盟会员倪映典，于一个月内，就在广州新军士兵、下级军官中发展会员3000多人，占广州新军半数以上。这年2月9日（农历除夕），广州新军士兵和警察发生冲突，2月12日，倪映典乘机发动新军起义，率领1000多人，从军队驻地郊区燕塘向广州城进发，途中与清军相遇，倪映典壮烈牺牲，起义军失败，损失惨重。

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宣统二年（1910年）冬，孙中山在马来亚槟榔屿召开会议，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邓泽如等人参加，决定在广州起义，成事后，由黄兴率军入湖南、湖北，由赵声率军入江西、江苏，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会师北伐。会后，孙中山到美洲向华侨募款，黄兴等则回香港成立统筹部，进行各种准备工作，拟于宣统三年三月十五起义，后因同盟会员温生才枪杀清朝广州将军孚琦，广州戒严，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加以饷械尚未全部运到，改期为三月二十九（即公历4月27日），原订10路进攻计划，临时改为4路进攻，但临时有些人并未参加。当晚由黄兴率领革命党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后与大队清军相遇，展开通宵激烈巷战，次日凌晨，参加起义的130人中，仅有少数幸存，战死和被捕牺牲的有100多人。事后，同盟会员潘达微通过善堂收殓烈士遗骸72具，葬于城郊黄花岗。

四、最早宣传社会主义

岭南人士得风气之先，很早就提出近代中国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其后介绍欧洲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近代中国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首先是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3月，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改名天京，随即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务使天下共享天父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要实行这个制度，做法是：“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

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钱从何来？“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尚（上）受田，多踰十五岁以下一半……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桑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二十五家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这种把个体农户的产品收归公有，再予以平均分配的办法，乃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这以后，康有为提出大同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清朝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撰写《大同书》初稿，认为：“机器日出精奇，人民更加才智，政法更有精密，而不行大同之法，终无致生民之食安乐、农民之得均养也”。因此，“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但是，“诸国并立，则强弱相并，大小相争，日役兵戈，涂炭生民，最不宁哉！”只有做到“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如何才能实现“无邦国、无帝王”，康有为提不出具体办法。而且，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成了保皇派的首领，更不会侈谈“无帝王”了。

与此同时，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三十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行的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为什么要提出“民生主义”？因为：“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20世纪不得

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解释：“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一曰节制资本”。同年8月3日，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时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①但是，如何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孙中山并未提出具体做法，而科学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生产资料公有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搞计划经济。

关于科学的社会主义，岭南很早就有人撰文介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②这是中国报刊首次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联系起来，其中马克思译作“麦喀士”，梁氏称其为“社会主义之泰斗”。梁氏并非社会主义信徒，发表此文目的是使国人增广见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马君武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简介马克思及其学说。^③同年12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复某友人函》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④光绪二十一、二年（1905—1906年）的《民报》，朱执信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比较详细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译作马索克、媯皮尔）的生平活动以及《共产党宣言》（译作《共产主义宣言》）的主要观点，^⑤并用文言文节译《共产党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二版。

②⑤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王兰恒等：《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2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宣言》。廖仲恺发表译文《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欧美社会主义运动。^①当时日本流行社会主义思想，中国人士在日本耳闻目见，因此予以介绍传播。

辛亥革命后，1912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在广州成立晦鸣学社，出版机关刊物《晦鸣录》（后改为《民声》），也曾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②1919年，杨匏安在广州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撰文宣传马克思主义，次年参加建立广东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1922年1月22日，香港海员要求增加工资，英国资本家予以拒绝，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林伟民、苏兆征等领导下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到1月底止，包括码头搬运工人在内的罢工人数达到3万多人，香港英国当局竟以武力封闭海员、运输两个工会，逮捕罢工领袖，工人奋起反抗。3月1日，香港10多万工人实行总罢工，广州方面鼎力支持。4日，大批工人离开香港，港英当局停开广九铁路火车来阻挡，工人只好步行至广州，途径九龙沙田，英国军警竟然开枪，打死6人，打伤数百人，造成“沙田惨案”。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军政府向港英当局提出抗议，通电全国予以援助。3月5日，港英当局被迫答应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五至三十，恢复海员、运输工会，释放被捕工人领袖，抚恤死难者，罢工取得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起点。同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8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

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王兰恒等：《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工农联合等决议，确定工人阶级应当参加和领导民主革命，以反对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决定正式加入赤色工会国际。同年6月19日，香港工人在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领导下，支援上海“五卅运动”，有25万人参加，10多万工人罢工后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广州英、美、日商洋行和沙面租界的工人也参加大罢工，6月23日，广州工人、农民、学生等10万人游行示威，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遭到英、法军队枪击，当场牺牲50多人，伤170多人，轻伤的不计其数，造成“沙基惨案”，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反帝怒火，积极支持“省港大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加强对罢工的领导，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历时16个月，参加人数之多，斗争时间之长，在世界罢工史上也属罕见。它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重大贡献。

1926年4月20日，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同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职工运动总策略、劳动法大纲等决议，号召全国工人积极参加和支援北伐战争。

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六届，由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为全国各地共培养近800名农民运动干部。

第六章 赤胆忠心 气贯长虹

——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

中华文化崇尚爱国主义精神。在反对外来侵略时，歌颂成仁取义、为国牺牲是最高尚的品德；在太平盛世，赞美济世爱民、惠及后代是应有的抱负。经过两千多年的长期宣扬，爱国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岭南文化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岭南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主要表现在：维护国家统一；抵抗外来侵略；高举反帝大旗；热心乡邦建设。

一、维护国家统一

中华文化高度强调国家统一。早在春秋后期，周天子的号令不能通行全国，诸侯互相攻战，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此，人民希望天下一统。《诗经·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春秋左传·昭公七年》也说：“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古

代的“天下”，是指中国各族聚居之地而言，君王则是统治国家的代表。人民希望国家统一，否则社会就不能安定。这种理论的确立，大大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尽管中国也有短暂时期出现分裂，这时岭南人士为国家统一作出可喜的贡献。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赵佗乘机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其后汉高祖消灭项羽，在十一年（前196年）派遣陆贾前来番禺（今广州），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初时赵佗对陆贾态度傲慢，箕踞相见，当陆贾对赵佗晓以大义后，赵佗立即起身表示归顺中央。吕后掌权时（前187—前180年），南越国和中央政府发生严重矛盾，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到了汉文帝元年（前179年），陆贾再次担任使者，携带诏书、礼物前来会见赵佗，赵佗甚为感动，在上书汉文帝时说：“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赵佗愿意归顺中央有各种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他显然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即“不敢背先人之故”。

如果说赵佗是汉族人士，所以拥护中央政权，那么，岭南土著同样拥护中央政权，这就足以说明：在岭南文化中，爱国主义根基深厚。南北朝时，全国分裂，岭南俚族首领洗夫人拥护中央政权，便是突出的例证。《隋书·谯国夫人传》载：“谯国夫人者，高凉洗氏之女也。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

后来她和北燕苗裔的高凉太守冯宝结婚。萧梁大宝元年（550年），侯景叛逆，高州刺史李迁仕心怀不轨，企图诱使冯宝一道作乱，洗夫人洞察其奸，劝止冯宝，并亲自率兵以奇计击败李迁仕，拥护梁朝。陈朝取代梁朝，洗夫人继续归顺中央，陈武帝永安三年（558年），冯宝去世，岭南边海地区大乱，洗夫人抚馭部落，安定附近各州，陈武帝任命冯宝之子冯仆为阳春太守。陈宣帝太建二年（570年），广州刺史欧阳纥召见冯仆，诱其一同谋反，冯仆派人归告其母，洗夫人回答：“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她率领百越酋长迎接陈朝统帅章昭达，共同击败欧阳纥的叛军。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出兵江南，消灭陈朝，岭南一时未有依附，数郡共奉洗夫人为主。不久，隋文帝派韦洸安抚岭南，陈后主也致函洗夫人，告以应该归顺隋朝，洗夫人即派其孙冯魂迎接韦洸。其后，王仲宣在广州叛乱，围困韦洸，洗夫人派遣其孙冯暄前往解围，但冯暄与王仲宣部将陈佛智私谊较好，逗留不进，洗夫人当即把冯暄逮捕下狱，另派冯盎出兵，冯盎阵斩陈佛智，与隋军会师，共同平定王仲宣之乱。洗夫人还披甲乘马，陪同隋朝大臣裴矩巡视安抚岭南各地，获得隋文帝的嘉奖。洗夫人经历三朝，始终服从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千古传为美谈。

唐朝末年，各地藩镇纷纷拥兵自重，但岭南依然归顺中央。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篡夺政权，建立后梁；与此同时，李克用建立后唐，王建建立前蜀；接着，吴、闽、吴越、楚相继立国。到了后梁贞明三年（917年），清海、建武节度使刘岩鉴于吴越钱鏐进封为国王，于是提出同样要求，没有得到允许，这才在岭南建立南汉国，他虽然当上南汉皇帝，

仍“自言家本咸秦，耻王蛮夷。”^①其实他的祖父刘安仁是河南上蔡人，因经商定居广州，已历三代，他侈言来自咸秦，无非是仰慕中原文化而已。当宋太祖于开宝三年（970年）九月出兵南下时，南汉国马步军都统潘崇彻知道大势所趋，于次年元月率众归顺；二月，南汉国刘铎投降。宋军没有遭到强烈抵抗，是因为岭南人民对刘铎的割据极为不满。有鉴于此，元朝末年，群雄并起，东莞何真领重兵镇守广州，有人劝他割据自立，他不同意。当明太祖于洪武元年（1368年）进军广东时，他立即归顺明朝，因而明太祖下诏褒奖，“尔真连数郡之众，乃不领一兵，保境奉归，虽窦（融）、李（勣）奚让焉。”后来又称赞何真“可谓识时务者”。

二、抵抗外族入侵

中华文化鼓励人们执干戈以御外侮，视为国民应尽的职责。这种思想激发广大群众的斗志，不怕牺牲来保家卫国。所以每当外族入侵时，炎黄子孙奋起抵抗，岭南人士为此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南宋恭宗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元军迫近临安（今浙江杭州市），谢太后带着四岁多的恭宗投降。五月，益王赵昰在福建福州即位，改元景炎，元军尾追不舍，十一月，南宋行朝仍拥有军队17万人、民兵30万人、淮兵万人，^②从海路经泉州前来广东潮州浅湾、惠州甲子港，这支庞大的船队，由广东沿海各地供应粮食，可见负担十分繁重。仅是香山

^① 吴任臣：《十国春秋·南汉一》。

^②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二王之立》。

(今中山市)平民马南宝就献粮1000担^①。次年正月,南宋行朝拟往广州,因元军扼守港口受阻。四月,泊舟官富场(今深圳市东南)。十一月,在井澳(今中山市横琴岛)遇上飓风,赵昞几乎溺死,受惊成病,其后在香山沙涌马南宝家中居住,得到很好的照顾。景炎三年(1278年)四月,赵昞在碙洲(今广东吴川县碙洲岛)病故,其弟卫王赵昺继位,改元祥兴,六月,移居新会县崖山,建造行宫、军营。次年(1279年)二月,在元军强大攻势下,南宋行朝最后覆灭,溺死的有10多万人。^②

南宋末年,元军分兵三路进入广东,攻势凌厉,难以阻挡。广东各地积极支持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抗元斗争,前后达三年之久,这是极不容易的。其中尤以广州城的四次争夺战,充分表现岭南人士的爱国精神,这是中国军事史所仅见,即在世界战争史上亦罕有。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六月,元军逼近广州,宋摧锋军将领黄俊在城郊石门奋战,兵败后,不愿仕元而被杀,元军首次进入广州城。这时,东莞平民熊飞起兵,在东莞榴花村阵斩元将姚文虎,尽歼其军,接着进攻广州,守城元将梁雄飞仓忙逃走,恰好新会县令曾逢龙领兵来广州会师。宋朝广东制置使赵溍派曾逢龙、熊飞收复韶州(今广东韶关市);十月,曾逢龙、熊飞在粤北鏖战,先后牺牲。次年二月,元军再次攻入广州。四月,宋朝龙图阁待制张镇孙、都统凌震聚集乡兵,分东、西两路袭取广州,元军吕师夔、梁雄飞因军饷不继而撤退。十一月,元军第三次围攻广州,张镇孙在海珠寺兵败被俘,元军入城后

① 贯淳等:《崖山志·马南宝》。

② 脱脱等:《宋史·瀛国公传》。

大肆屠杀，实行夷城。至元十五年（1278年）三月，都统凌震、转运判官王道夫又再光复广州。闰十一月，元军第四次攻入广州城。十二月，宋军王道夫反攻广州，兵败被俘，凌震继续反攻广州，兵败后退走崖山（在广东新会县南，面临南海），两个月后，宋皇朝在崖山覆灭，但是广州地区的抗元斗争并未停止；至元十八年（1281年），南海平民李梓采用宋朝年号起兵；至元二十年（1283年），南海平民欧南喜自称宋朝将军，与新会平民黎德聚众10万人攻打元军，增城平民蔡大老、钟大老、唐大老起兵响应，多次击败元军；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东莞平民张疆聚众两万多人，以恢复宋朝为名，继续进行抗元斗争。至于岭南其他州县群众起兵抗元，更是难以枚举。

明朝末年，清兵进入岭南，岭南人民纷纷毁家纾难，组织义军，进行抵抗，以少敌众，以弱御强，其中最突出的是顺德陈邦彦、东莞张家玉、南海陈子壮，被誉为“广东三忠”，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把这三人的比之为宋朝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南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年号永历。永历元年（1647年）二月，清军攻陷肇庆，永历帝逃至桂林，清兵尾追不舍，即将攻陷桂林，这时，明朝兵科给事中陈邦彦为解救桂林之围，说服顺德甘竹滩农民军余龙等两万人袭击广州，清兵闻讯立即回师广州，与余龙作战，永历王朝得以脱险。为了收复广州，陈邦彦联络陈子壮、张家玉共同起兵，但是陈子壮操之过急，比原定日期提前两天进攻广州，因孤军力弱受挫，后被清兵逐个击破，广州城内准备响应的明朝义士3000人全遭屠杀。陈子壮在高明、陈邦彦在清远等地继续战斗，兵败被俘，不肯投降，均被凌迟处死，其亲属、门生、部下也大批被害。张家玉在增城巷战，重伤后

投水自尽，其族人几乎全部被杀。他们破家为国，屡败屡战，百折不挠，所留下的诗文，充满高度的爱国主义激情，永远教育着后人。例如张家玉《军中夜感》：“惨淡天昏与地荒，西风残月冷沙场。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竹香。”这首诗最后两句，与文天祥《过零丁洋》一诗的最后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谓互相辉映。尽管清朝一再查禁明末志士的作品，但是爱国主义的作品是无法全部禁毁的。明人罗应垣称赞张家玉的《军中遗稿》：“读之，令人悲其志，惜其遇，悯其忠，而复壮其气魄，如对岷山之碑，不觉堕泪，岂非忠义之言，楔在人心，自难磨灭者欤？”岭南文化中就是这样世代相传而发扬光大。

三、高举反帝大旗

清朝中后期，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岭南地区首当其冲，岭南人民首举义旗，抵御外侮，100多年来，前仆后继，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无数志士英勇牺牲，诚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国殖民者无耻地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进犯广东，只因两广总督林则徐严加防守，广东水上居民、渔民五六千人参加水勇，配合作战，英军无法得逞，于是改道北上，侵占定海，进犯大沽。道光皇帝改派昏庸无能的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与英军议和，十一月底，琦善来到广州，他自动裁撤战备，解散全部水军，诬陷林则徐，擅与英军议订《穿鼻条约》，允许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银元和开放广州等。这个消息传出，广州群情大哗，爱国士绅、书院学生聚集学宫，一致要求当局驱逐英军，

收复香港，广东巡抚怡良据实上报朝廷，琦善遭到革职。次年一月，清政府派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出任靖逆将军，领兵前来广州，奕山是皇室近亲，四月间到达广州，日夜饮酒作乐。主张“防民甚于防寇”。5月26日，英军攻占广州城外泥城、四方两炮台，奕山乞和。英军在广州大肆抢劫，无恶不作，5月29日，盘踞广州城北四方炮台的小股英军窜至北郊三元里、萧岗一带淫掠，三元里农民在韦绍光领导下，当即击毙英军数名。为制止侵略者继续施暴，韦绍光等联络附近各村，准备收复四方炮台。次日，三元里附近103乡（村）群众约5000人，手持刀矛锄耙木棍，高举“平英团”旗帜，在四方炮台附近的牛栏岗与英军1000多名激战，恰逢雷雨，英军火药枪淋湿后无法使用，附近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越聚越多，打死打伤英军近50名，缴获许多战利品，英军司令卧乌古（Hugh Gough）率大队来解救，又被数万义勇在连山击败，军官多人伤亡，只得狼狈逃回四方炮台。31日，南海、番禺、花县、增城等县400余乡（村）义勇数万人包围四方炮台，英军头目向奕山求救，奕山竟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强迫各乡义勇撤围，英军才得以逃上兵舰。三元里抗英斗争，为岭南文化的爱国传统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这以后，广州城西北郊成立升平社学、东北郊成立东平社学，南郊成立隆平、南平等社学，参加社学的群众达10多万人，其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店员和爱国士绅。他们英勇反抗侵略者，声势相当浩大。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英国水手在广州十三行附近强取食物，不给货款，反把中国商人刺伤，路人群起责问，水手行凶后逃回英国洋馆，从楼上向路人抛掷砖瓦，群众包围洋馆，英国侵略者竟向群众开枪，群众怒烧洋馆，官府无法阻挡。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

国公使璞鼎查 (H. Pottinger) 要求在广州黄埔租地, 设立墟市, 建造衙署, 两广总督祁项表示同意, 由于当地人民坚决反对, 此事才被迫停止。次年 (一说道光二十七年, 即 1847 年), 英国企图在广州河南洲头嘴建立租界, 当地 48 乡 (村) 3000 多人到洋馆抗议示威, 予以制止。道光二十六年 (1846 年) 一月, 英国公使德庇士 (J. Davis) 歪曲《南京条约》, 硬要进入广州城, 两广总督耆英表示同意, 这时社学集结数千人, 冲进广州知府衙门, 驱逐知府刘浚, 烧毁刘浚朝珠公服, 刘浚爬越衙门后墙逃跑, 群众张贴杜绝英人入城的告示, 德庇士只好退回香港。道光二十九年 (1849 年) 二月, 英国公使文翰 (S. G. Bonham) 率领军舰闯入珠江, 要求进广州城, 广州群众 10 万人武装起来, 日夜操练, 准备迎敌; 商人也宣布与外国断绝贸易, 文翰看见情况不妙, 只得放弃立即入城的无理要求。

清文宗咸丰六年九月 (1856 年 10 月), 广东水师在广州黄埔河面停泊的中国“亚罗号”船上逮捕海盗, 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 (H. S. Parkes) 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 (J. Bowring) 指使下, 硬说这是英国船, 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接着英军侵占广州城郊猎德、凤凰岗、海珠等沿江炮台, 曾一度攻入城内, 广州人民奋起反抗, 英军兵力有限, 被迫撤走, 次年十二月,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 烧毁十三行及大片民房。在强敌面前, 咸丰八年 (1858 年) 一月, 广州城郊三元里、石井和南海、番禺两县人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 组织义勇数万人, 不断袭击侵略者的据点, 击杀单独外出的英、法士兵, 并曾一度攻打英法联军盘据下的广州城, 给侵略者以很大威胁; 四月, 佛山团练局号召在香港、澳门等处为英、法服役者一律罢工回籍, 一月之内, 回籍者就有两万

多人，使港澳商务陷于停顿；六月，团练局义勇在黄麋塘与侵略军大战，毙敌百多名；同月，侵略军进犯东莞县榕树头，被当地群众击退，侵略军头目巴夏礼因坠马几乎被俘。八月，侵略军两千多人进犯新安（今深圳市）县城，被当地群众击毙百余人。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侵略军1000多人到三元里、牛栏岗烧杀，被当地群众打死十多人。正是岭南人民的英勇抵抗，使英法侵略军盘踞广州时胆战心惊。

清德宗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期间，岭南群众出于爱国热情，从各个方面打击法国侵略者。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光绪八年（1882年）已退役的老将冯子材，这时以广东高雷钦廉四府团练督办的身份参加抗法斗争，后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在中越边境痛歼敌军，取得辉煌战果，收复半年前失去的全部阵地。广西上思人、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与越南军民并肩作战，在河内城外人民桥杀死法军主将李维业（H. Riviere）。岭南籍的海外华侨和香港同胞也纷纷关怀祖国的抗法斗争，美国三藩市华侨捐助军饷50万银两；日本神户、横滨华侨富商公议，愿集捐饷银100万两；古巴华侨捐银1.4万多元；新加坡华侨也竭力捐输。香港黄埔公司船坞广东工人罢工，拒绝修理闯入闽江时被中国炮台打伤的法舰“加利桑尼亚尔”号；搬运工人、驳船工人、人力车夫、轿夫、舂米工人等相继罢工，香港旅馆的广东工役拒绝给寓居的法国人服务。航行于香港、日本之间的法国轮船中的司火华工也弃职不干。至于在岭南各地的法国传教士，更是受到群众的纷纷声讨。^①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清德宗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曾抽调南洋海军参加。南洋海军中的岭南志士奋不顾身，英勇作战，致远舰就是突出的例子。在海战中，致远舰已负重伤，弹药用尽，管带、广州人邓世昌下令高速撞向日舰吉野号，企图同归于尽，不料半途中鱼雷沉没，全舰官兵250人都壮烈牺牲，他们忠心报国，永远为后人所纪念。

四、热心乡邦建设

岭南社会能够以较快的速度繁荣发展，原因之一就是大批人士关心公益事业，投资文化教育，兴办工业交通，在这方面，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作出了很大贡献，充分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所宣扬的崇高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岭南的社会福利事业，由来久矣。可惜明朝以前的岭南方志残缺不全，难以查考，但是从外国著作中还可略窥一二。元朝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北非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h）来到广州，他在《异域奇游胜览》（又名《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记载：广州“城中央有一座九门大庙，每一门内设有圆柱和台凳，供居住者坐息。第二与第三门之间有一地方，内有房屋多间，供盲人、残废者居住，并享受庙内供应的生活费和衣服。其他各门之间亦有类似的设备。庙内设有看病的医院和做饭的厨房，其中医生、仆役很多。据说，凡无力谋生的老人皆可向庙里申请生活费和衣物。一无所有的孤儿寡妇亦可申请。”这记载是否完全确实，尚待查考。但是，清高宗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仇巨川撰《羊

城古钞》，明确记载广州城内设有：育婴堂，始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地址在第十甫，内有接婴、药室、乳房；养济院，始于明朝，地址在东门外，收养盲疾孤贫寡妇；麻风院，地址也在东门外，收养疯疾孤贫寡妇；惠民药局，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已设，地址在大石街，聘有医生，对贫民赠医赠药。还有从事收葬贫苦死者的长生局，宋朝已设；敦仁馆，始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以及作为公共墓地的漏泽园和义冢。上述机构的经费，部分由政府拨给，部分由富商和绅士捐助。据清道光二年（1822年）成书的阮元《广东通志·恤政》记载：广东各县都有社会福利机构，名称各异，其经费来源与广州相同，为广大农村做了不少好事。

古代岭南的文化教育落后于中原地区。明朝时候，由于湛苦水、霍韬、高献夫、黄佐、薛侃等人大力创办书院，仅广州城内外就有二十多间，岭南各地也纷纷仿效。清朝岭南的书院比前进一步发展。书院由政府拨款和各方资助，置有田地房产，或把现款交商人牟利取息，作为基金，对入学者提供生活、书籍费用，只限学额，不限年龄，这就使一批寒士得以走上成才之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朝廷下令废除书院，改设现代学校，并鼓励私人办学，因而岭南各地纷纷创办私立学校。这以后，岭南籍的海外华侨、港澳同胞踊跃捐款回内地办学，赞助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文化大学以及执信中学、仲恺农校和各地一批私立中小学、教会学校。与此同时，各地学宫明伦堂、民间祖尝的产业收入，也有一些用于资助青少年入学，这为岭南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

岭南的近代经济建设，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由于爱国爱乡，也作出显著成绩。早在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南海

西樵简村归侨陈启源积极引进外国机器缫丝技术。他原是本村塾师，对当地手工缫丝十分留意，后因生活困难，前往安南（今越南）经商，在安南、暹罗（今泰国）等地考察外国机器缫丝厂，其后回到本村，用自己设计的机器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并改进缫丝技术，产品成本低、质量好，生产效率高，因而打击了本地手工缫丝业，弄得矛盾很尖锐。为此，他后来设计一种小型缫丝机，交由小生产者在家缫丝，他设立货栈收购蚕丝。从此附近各县相继仿效，使当时广州地区成为中国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重心（华东地区机器缫丝业控制在外商手中），蚕丝成为岭南出口的大宗商品之一。

繁荣经济必须发展交通。清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广东梅县旅爪哇岛华侨张榕轩回国觐见，有关部门示意他兴筑铁路。张榕轩、张耀轩兄弟等关心家乡建设，于次年集资修建由汕头至潮安的潮汕铁路，另有意溪支线，共长42公里，这是中国民间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全线通车，这对韩江上游如梅县、兴宁及闽、赣边境华侨和物资进出，特别在韩江水涨不便通航的时候，提供了很大便利。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新宁（今台山）旅美归侨陈宜禧回国准备创办德和织造公司，经营纺织业。恰遇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猖狂掠夺中国铁路筑路权，全国各地爱国群众掀起一场收回路权的运动。高龄60岁的陈宜禧于是改变计划，毅然决定自筑新宁铁路，他在《敬告新宁铁路股东暨各界书》中说：“愤尔时吾国路权，多握外人之手，乃不忖棉薄，倡筑宁路。”他提出：“不招洋股，不借洋钱，不用洋工程师。”自任总理兼总工程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始施工。其时一批封建官僚、劣绅前来争权夺利，诸多阻挠破坏，陈宜禧等百折不挠，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20年竣工，以台山

县城为中心，北至江门北街，南至斗山，西到白沙，共长 137 公里，并附设公益码头、北街码头、公益机器厂和电灯厂、牛湾船坞、宁城印刷厂等，这就促进了铁路沿线的市场兴旺。

在这前后，岭南人士还大力投资于航运、机械、电业、制革、纺织、造纸、卷烟、火柴、船舶修造、粮食加工、建筑材料等近代企业。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疯狂进行经济侵略，深入岭南内地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这使岭南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在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对此，岭南人士大力提倡使用国货，可见没有爱国主义就没有岭南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岭南社会能够不断前进，岭南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重大影响，它是岭南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大力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对岭南社会的繁荣、进步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七章 为国育才 济世利民

——迎头赶上的教育

岭南的教育事业，其起点大大迟于中原。春秋末期，孔子在鲁国（今山东境内）讲学，有弟子3 000人，但这时岭南还不曾使用文字！更谈不上建校授徒。从汉朝开始，岭南由于政府官员的重视，外来学者的热心，地方人士的支持，教育事业欣欣向荣。原因在于古代奉行“政教合一”，造就人才，为国效劳，士子可以“学而优则仕”，获得较好的出路。学校采取“训教合一”，重视道德熏陶，这对社会各方面产生良好影响，有利于安定、发展。

逮及近代，为了“国强”、“民富”，岭南首先接受西方教育制度，创办适应时代需要的各种学校，进行职业培训。辛亥革命以来，岭南的教育事业更是不断取得显著成绩。

一、政府主持的官学

岭南在汉朝开始办学。汉武帝时，中央设立太学（又名大学），作为最高学府。其后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

令全国各地设立学官，负责教育工作，详情未悉。汉平帝元始三年（3年），全国各级行政地区普遍创建学校，从此成为定例，历代相沿不改；教学内容为儒家经典；名称分别是：郡、国称为“学”，县、道、邑、侯国称为“校”，乡称为“庠”，聚（村落）称为“序”。“学”、“校”作为中级学府，设置经师一人；“庠”、“序”作为初级学府，设置《孝经》师一人^①。汉朝的南海郡，相当于今广东省绝大部分地区，只设6个县^②，按上述规定，也只有6间“校”，可见那时岭南的学校很少。从三国到南朝，战乱频仍，政府无暇顾及地方教育。隋朝虽曾一度重视教育，还创立科举制度，此举为历代所奉行，但地方官学没有什么成就，岭南也不例外。

唐朝的教育事业比前健全，朝廷设国子监来管理全国的教育工作。地方官学设府学、州学和县学，府、州还设有医学，县以下设乡学或市（镇）学、里学。府学、州学、县学的教师称为博士、助教。地方官学没有专职的学官，由长史领导，再隶属于国子监，府、州医学则由太医署领导。至于学生名额，按府、州、县的大小，分别规定人数，府学为50—60人，州学为40—50人，县学为35—40人，医学招生较少。入学年龄一般以14岁至19岁为限，饮食服用由学校供给，但学生初次拜见老师，要行“束脩之礼”，送绢二匹和酒肉（数量不限），以示尊师。这时岭南的地方官学有所发展。

五代时期，刘岩割据岭南，建立南汉国，他接受兵部侍郎杨洞潜的建议，设立官学，开科取士，每年录取进士、明经（与进士科并列，主要考经义）十多人。知名的有状元简

① 班固：《汉书·平帝纪》。

② 班固：《汉书·地理志》。

文会，进士梁嵩、钟允章、王宏、王诩等人^①。当时天下大乱，南汉国仍能注意教育，培养人才，可谓难得。

宋朝重视地方教育，设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长官。广南东路（简称广东）设提举学事司，专职管理学政，考察属下各州、县办学情况。^②前此地方官学没有固定经费，从宋朝开始，政府给地方官学颁赐学田，这便于办好学校。广州的州学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创立，最初设在西城旧孔子庙，仁宗皇佑二年（1052年）迁至东城，并加以扩充，后因东城扩建，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迁至国庆寺附近，三年后，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程思孟为州学设置学田，并常去讲学，很多人都来听讲。徽宗时，广州还为长期居留的外侨子弟设立“蕃学”。到了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州学迁到番山附近，此后不再搬迁，俗称“广府学宫”，虽屡经兵火毁损，但历代均大力维修增建，气象宏伟，规模不亚于南京夫子庙。清末民初，“广府学宫”先后被好些单位分割占用，面积一再大幅度缩减，其后大成殿等建筑物全部拆建为广州第一工人文化宫。关于各县的县学，视当地财力而定，有些县学的建筑物也很富丽堂皇，南海、番禺的县学就各有学田400多亩。

元朝地方官学设路学、府学、州学、县学。广州路设儒学提举司，但未建立路学。广府学宫经费充足，其学田年收租米3000担。府学、州学各设教授，县学设教谕。有些地方还设立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医学隶属太医院，除学习《难经》、《素问》等医书外，也要读儒家经典，否则不准行医。

^① 梁廷楠：《南汉书》。

^② 脱脱等：《宋史·职官志》。

阴阳学隶属于司天台，学习天文、术数等科，学有成就的在司天台任职。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下令，全国各地村庄，每50家为一社，每社设社学，选择通晓经书的人担任学师，农闲时让农家子弟入学，这是全国建立“社学”之始，岭南也是如此，城乡各地纷纷建立社学。

明朝重视地方教育。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下令：“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因此，岭南各府、州、县均设立学校，又在军事防区卫所设立卫学，乡村建立社学；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各学均设训导。学生名额为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均供给生活费用。后来人数增加，供给生活费用的称为廩膳生员，以后增加的称为增广生员，又再额外增加的称为附学生员，学官对学生的思想管制甚严，规定学生要专门研读儒家经典中的一部，同时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科^①。其后重行规定，改为礼、射、书、数四科。各科内容为：“礼”由朝廷颁发的经、史、律令、诏诰、礼仪等书，学生须熟读精通；“射”是在每月初一、十五练习射箭；“书”为临摹名人法帖；“数”要求精通《九章算术》，上述课程均有人讲解。学生要遵守学校禁例，不许评论政事。由教官主持月考，提学官主持岁考、科考。岁考以六等定成绩，一二等有奖，三等不奖不罚，四等挞责，五等则廩膳生、增广生降一级，附学生降为青衣，六等除名^②。学规异常严格，其考核分德行、经艺、治事三种，三种兼长，列为上等；长于德行，短于经艺或治事，列为二等；德行有缺，经艺、治事兼长，亦列为三等。犯

①② 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

重大错误者，追缴学习费用，另有处罚。至于社学的课程，除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课本外，也要读“御制大诰”、“本朝律令”，但社学不久就停办。

清朝岭南的地方官学有府学、州学、县学，统称“儒学”，学官设置和明朝一样，但其任务并不真正教书，只主持月课季考，学校成了考试、给廩的机关。地方官学的学生称为“生员”，要通过考试，取得“秀才”资格才能入学。入学前称为“童生”。生员须填写履历，出身水上居民或倡、优、隶、卒的不准应试入学。生员分三等，一等为廩膳生员，简称“廩生”，每年可领取白银二两四钱；二等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不领取廩饩银；但可补廩生缺额；三等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廩生、增生有规定名额，广州府学各为40名，州、县学视各地情况而定。生员可免除本身徭役，家贫不能自给的予以补助。学校课程主要有：《御制诗、书、春秋三经传说类纂》、《钦定孝经衍义》、《性理大全》、《御制律学渊源》、《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古文渊鉴》以及“十三经”、“二十二史”等。生员要遵守《圣谕广训》，思想言行不许越轨，平时享有身份特权，其法定服色是蓝袍，如犯过错受罚，则改穿青衫。罚轻的由地方官会同学官在学宫明伦堂予以戒饬，罪重的先经学改革去生员学籍才能惩办。

清圣祖康熙九年（1670年）下令，“凡府、州、县每县置社学，选择文艺通晓、行谊谨严者充社师。”为此，岭南城乡各地纷纷设立社学，年12岁以上、20岁以下者入学肄业。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州北郊的升平社学、东平社学和南郊的隆平社学、南平社学等，领导10多万群众，打击英国侵略者，在历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

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下令：“各省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义学也称义塾，不收学费。早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广东督粮道蒋伊在广州城南龙藏街设立岭南义学；次年，广州知府刘茂溶在城南木牌头设立珠江义学；雍正元年，广州知府宋玮在城南西湖街捐建南海义学；雍正八年（1730年），广州知府庞屿在城东建番禺义学，到了仁宗嘉庆八年（1803年），广东布政使康基田把岭南义学改为羊石书院，珠江义学改为珠江书院，南海义学改为西湖书院，番禺义学改为番禺书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令废除科举制度，岭南的各级地方官学随之结束。

二、民间兴办的私学

岭南地方官学的学额有限，入学条件较苛，而且时兴时废，因此学童大多数就读于私学。古代兴办私学不用官方批准，它在数量上超过官学，弥补了官学的不足。

私学有两种：一是初级的，属启蒙性质。汉朝时称为“学馆”、“书馆”或“书舍”，后世称为“私塾”。岭南的私塾大约可分五种类型，1. 私塾：由私人开办，场地不大，随时招收学生，多为男童，教以识字读物或儒家经典，塾师可能略加讲解，有的可能指导写对联、信件、珠算，收费不多，可随时入学、退学。2. 家塾：由富户出钱延聘教师，在家内专教自己及亲朋的子女侄甥，年龄不拘，因而程度参差较大，塾师着重讲解经书，有的指导写作诗文。3. 乡塾：塾师由乡董聘任，如不收学费的则名为义学，学生多为农家子弟，学习期限很少超过三年，学习内容与私塾相似。4. 坊塾：由城镇

街坊举办，与乡塾大致相同，少收或不收学费，学生多是城市贫苦劳动人民子弟。五、堂塾：由善堂办理，有的每日供膳一次；有的每年供衣服一、两次，新旧不定。解放前，岭南城乡普遍存在私塾，因而同内地对比，文盲较少。

私塾的教学方法是：塾师因材施教，个别传授；学生整天诵读，死记硬背，每日习字一两纸。初期是识字，识字课本有汉朝的《仓颉篇》，约3300字，此书早已失传，现仍保存的仅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史游《急就篇》，今本34章，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物等常用字，分类编成韵语，多为七字句，其后此书逐渐为《三字经》（宋朝浙江王应麟、一说广东区适子撰）、《百家姓》（北宋人编，作者佚名）、《千字文》（南朝萧梁周兴嗣、一说萧子范撰）、《千家诗》（宋朝刘克庄编）所取代。到了明、清时期，又增加了《小儿语》、《续小儿语》（明朝吕得胜、吕坤父子编）、《幼学》（明朝程登吉编《幼学须知》、清朝邹圣脉加以增补注释，改名《幼学琼林》）。后期是诵读《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并学习写作和简易数学。

另一是高级的，属深造性质。汉朝时，经师大儒设立“精舍”、“精庐”，后世称为“书馆”。书馆又分“小馆”、“大馆”。小馆由一至三四位士子开办，与程度较高的家塾相似，学生大多来自私塾、家塾，收费比私塾昂贵，分为束脩、礼敬、节仪等，有些教师较有名望。“大馆”比“小馆”程度更高，有的学生年岁较大，它可为远地来的学生提供住宿，学费也更多。古代从事讲学的经师，有些是专职的，也有一面做官、一面授徒的。东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7年），番禺人董正精通《诗》、《春秋》、《礼记》、《仪礼》、《周礼》，他见政局混乱，不愿做官，授徒讲学，远在千里之外的南郡车遂，

也慕名前来听讲^①。宋朝番禺人李昉英，曾任直秘阁、福建提举，后因父丧丁忧回籍，筑室墓旁，聚集宗族子弟讲学其中。

在岭南讲学的经师，不乏全国知名的学者。如明朝陈献章（1428—1500年）广东新会县白沙乡人，他在家乡讲学数十年，世称白沙先生。为国家培养一批人才，其弟子知名的有湛若水、梁储、林光、张诩等人。他在教学活动中，提倡独立思考，不盲从附和。他主张：“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②所谓“学贵知疑”，就是对于前人的观点、论述是否正确，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发现前人不足之处，这才能超越前人，取得进步。如果人云亦云，那就不会有任何贡献。所以他写诗《赠陈生秉常》：“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③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值得大力宣扬。湛若水（1466—1560年），广东增城人，曾任南京礼、吏、兵部尚书，所到之处，聚徒讲学，所以弟子很多。^④

到了清朝，岭南私人讲学比前有所发展。突出的有：朱次琦（1807—1882年），广东南海县九江乡人，曾任山西襄陵知县，不久辞官回乡，在“礼山草堂”讲学20多年，世称九江先生。其弟子知名的有简朝亮、康有为等。^⑤他很注意德育，提出：“修行之实四，曰敦行孝弟，曰崇尚气节，曰变化气质，曰检摄威仪。”^⑥他勉励弟子治学要福国利民、经世致用。对此，其弟子康有为推崇说：“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

① 仇巨川：《羊城古钞·人物》。

② 《陈献章集》卷二书一《与张廷实主事》。

③ 《陈献章集》卷四。

④ 张廷玉等：《明史·湛若水传》。

⑤ 赵尔巽等：《清史稿·康有为传》。

⑥ 赵尔巽等：《清史稿·朱次琦传》。

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① 由于他重视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故能获得弟子及社会人士的尊敬。

简朝亮（1851—1933年），广东顺德县简岸乡人。家境清贫，自幼好学，后因亲友资助，得以受业于朱次琦门下，成为嫡传弟子。由于五应乡试不第，只好绝意仕进，在家乡建立“读书草堂”，毕生从事讲学，世称简岸先生，从学者甚众。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广州创立“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深入研究并传播维新理论，世称南海先生。最初设在大塘街云衢书屋，后迁至长兴里邱氏书院（今中山四路内），次年迁往卫边街邝氏祠（今吉祥路南段），光绪十九年（1893年）迁往广府学宫仰高祠，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查封。从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891—1898年），先后有学生1 000多人，其中知名的“十大弟子”为梁启超、陈千秋、徐勤、麦孟华、韩文举、梁朝杰、曹泰、王觉任、陈和泽、林奎，不少弟子后来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其讲学一反旧式书院的传统，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有重大的改革，注意德、智、体育全面发展，课程“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② 在教法上，“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③ 诱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指评时政，学以致用，提倡集体学习，学生除听老师讲课外，主要靠自学和写读书笔记，无考试制度。其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②③ 梁启超：《康有为传》。

三、教育与学术研究结合的书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它能弥补官学之不足，并具有自己的特色：即把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有的还出版书籍，这不仅满足读书人的需要，而且有助于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明朝中后期，有的书院一度成为文人学者议论朝政的讲坛；清朝中后期，广州有的书院成为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场所。因此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书院始自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的丽正书院^①，当时是藏书、校书之处。其后，私人的书房兼讲学之地也名为书院。到了五代十国，好些地方都设立书院。它分官立、私立两种，前者多是地方官为了表现政绩而创办，后者多是理学名儒用以宣扬师说或纪念先贤而设立。其经费来源，一般均置有学田、房屋，靠田租、房租收入，也有由政府拨款和各方捐钱作为基金，靠利息收入。书院负责人称为山长、学长或院长，由名儒或学官担任，有的还设置监院，下有斋长、书办、号房、院役。聘请学者讲学，内容大致为理学、经史、词章、科场时文等。容许发表不同的学术见解，存在自由讲学风气。书院建筑规模和招生名额视本身收入而定，建筑由两进至五进，以三进为最多。生徒不限年龄和家庭出身，提供生活、书籍费用，成绩优异的给予奖励。订有严格的“教规”、“堂训”，强调德育，每月朔（初一）、望（十五）定期开讲，平时以自学为主，重视培养生徒自学能力，有疑难时

^①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百官志》。

可向山长请教。教学多采用问难论辩方式，官师每月考核生徒治学情况。在封建社会，书院为寒士提供了学习机会，并为国家培养了人才。书院的自由讲学，还对社会风气产生良好影响。

岭南最早的书院，相传是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时在今潮州市设立的，由进士赵德主持，但有人认为它很可能是“书舍”而已。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英州（州治在今英德县）知州王仲达在英德南山涵晖谷前建立涵晖书院，由名儒石汝砺主持。岭南书院可能以此为最早，具体情况未见确切记载。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谪宦刘元城在嘉应州（州治在今梅州市）建立梅城书院，详情亦不可考。

到了南宋，岭南好些地方都建立了书院，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6间。^①其中较具规模的有：广州禺山书院，建于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院址在广州府学之后（今中山四路广州市文化局内），直言敢谏的奉议大夫梁百揆，世称“裕懿先生”，称病引退后在此讲学；其后明朝海瑞曾在此学习。番山书院，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方大琮建于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院址在广州府学，内有文、行、忠、信四斋。这两间书院，宋末元初均毁于兵火，以后重建。曲江濂溪书院（后改名相江书院），提点杨大异建于淳祐六年（1246年），院址在今韶关市帽子峰山麓，据杨大异《濂溪书院记》载：“得地于帽峰之麓，相江之滨，越月而成，右为祠五间，继以讲堂，间亦如之。左右为两斋，皆五间，外为三门，总而翼之

^①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78年版。

以室。浚井闾地，闭垣四周，几二百寻。”可见相当宏伟。濂溪书院为纪念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而设，因而这间书院的讲学，主要是宣扬周敦颐的理学思想。惠州丰湖书院，惠州知州刘克刚建于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院址在惠州城西南，由州学教授兼任书院山长，这间书院为纪念罗从彦（世称豫章先生）而设，罗从彦是理学家杨时的门徒，尊崇程颢、程颐的学术观点。

元朝时候，岭南书院比前增加，规章制度也比前健全。例如，潮州韩山书院，总管王元恭于元惠宗至元五年（1339年）拓建，书院内有师生宿舍、饭堂，储存春秋祭礼用的祭器；还置有学田，保证每年有固定收入。遂溪文明书院，彭从龙于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重修，情况也是如此。

明朝初期对于宣扬理学的书院不甚重视，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社会上再度出现讲学的风气，书院的设立随之增多。湛若水所到之处，必定建立书院纪念其师陈献章（世称白沙先生）。^①由于陈献章鼓吹理学，在湛若水、霍韬、方献夫、黄佐、薛侃等理学名儒积极倡导下，各地纷纷创办书院，据不完全统计，明朝全国的书院约1200多间，岭南的书院就有168间，其中以广州为最多，约20间。^②好些书院设立在西樵山、白云山、罗浮山、越秀山，环境清幽，以致有人认为宋、明理学受禅林精舍的影响。理学与禅学互相渗透，确是事实，但是中国士子欢喜选择林泉佳处，远离尘嚣，澄心寡欲，刻苦攻读，则是古已有之，与禅林无关。

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年）二月，御史游居敬上疏，指

① 张廷玉等：《明史·湛若水传》。

②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78年版。

斥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因而皇帝下令拆毁全国书院。次年，吏部尚书许赞提出：“近来抚、按两司及知府等官，多将朝廷学校废坏不修，别起书院，动费万金”，于是皇帝再度下令拆毁书院，这两次拆毁书院由于岭南僻处边陲，执行者阳奉阴违，因而不少书院得以保存。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年），首辅张居正痛恨私人讲学，认为不仅“空谈废业”，还会“摇撼朝廷”，于是大规模禁毁书院，这次岭南被毁的书院较多。郭秉《岭南名胜记》载：“万历中，宰忌讲学，毁及院舍，有司奉行，急若风火，西樵独流祸烈，一时儒绅飒然丧焉。若大科、若铁泉、玉泉、天阶诸舍，皆被毁拆。独云谷以白沙祠存，四峰以西庄祠存，石泉恭贮赐书，有司不敢毁，而名贤寤寐之地，遂为烟蔓之场。”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太监魏忠贤下令禁毁全国书院。当时政治极度腐败，士大夫在书院讲学时讽议朝政，尤以顾宪成、高攀龙主持的无锡东林书院声名最著，因而遭忌，魏忠贤借此消灭异己，把反对他的大批正直忠鲠之士，均指为东林党徒，加以摧残，其中不少人实在与东林书院无关，也都受到迫害。岭南的书院经这四度被毁，从此一蹶不振。

清朝严厉实行思想禁锢政策，对自由讲学的书院，当然予以压抑。世祖顺治九年（1652年）上谕：“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圣祖康熙年间虽然取消禁令，这时岭南各地陆续创建书院，但其内容已和过去不同，类似义学性质，讲学宗旨是适应士人登科中举的需要。有清一代，岭南共建书院415间，其中广州府有152间，依次是肇庆府（曾为两广总督所在地）有43间，潮州府42间。可见分布极不均匀。所以广东学政徐琪在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年）给朝廷的奏报

说：“文风自以广州、肇庆两府为最优，而广州又以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新会数县为尤胜；肇庆则高要、四会、开平、鹤山数县为佳，新兴、阳春则稍次之。”

清朝岭南的书院，很多侧重于应付科举考试，时日既久，流弊滋生，士子只注意写八股文，没有真才实学，即使每月作读书札记，不过摭剿陈言，东抄西撮，罕有心得，日后纵能获取高官，对国家人民并无助益。为了扭转这个偏向，清宣宗道光四年（1824年），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越秀山麓创办“学海堂”，因东汉何休学问渊博，被誉为“学海”，堂名取义于此。学校实行“学长”制，初时阮元指定著名学者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等为首任学长，轮流负责校务，课程以经史为主，提倡实学，招生比较严格，培养出一批人才，其中知名的有陈澧、桂文灿等人。清穆宗同治六年（1867年），广东巡抚蒋益澧在越秀山麓创办“菊坡精舍”，纪念南宋名臣崔与之（其居处名“菊坡”），教学内容和教法多仿效“学海堂”，招生对象从粤秀、越华、羊城三间书院的肄业生中选拔，加以深造培养。同治八年（1869年），广东布政使王凯泰在越秀山麓创办“应元书院”，他撰《新建应元书院记》中说，这书院“为举人肄业地，举人会试第一为会元、殿试第一为状元，其名亦宜之。”它的招生对象是举人，办学目的是培养进士、状元。同治十年（1871年），广东最后一位状元为顺德梁耀枢，就是在此培养的。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城西源头乡（今西村）创办广雅书院。“广者大也，雅者正也。”校名取义于此。招收广东、广西学生各100名，由当地从严选送。著名学者梁鼎芬、廖廷相、谭莹、丁仁长等先后担任院长。下设“分校”四人，分别讲授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另设

监院两员，管理住在东、西两斋的两省学生。监院之下设斋长，由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学生可自由选择课程，兼习词章之学，以自学为主，每天学习要写日记，以便院长考核。三年为小成，九年为大成，学业不进步的除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上谕：“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至此，岭南的书院已完成其历史任务，先后分别停办或改为学堂。

四、仿照欧美教育制度的学校

19世纪中期以后，帝国主义不断入侵，清廷为了“自强”、“求富”，吸取外国经验，首先创办外语、技术、军事、师范等专科学校，其后陆续筹设普通大、中、小学校，以便培养各级人才，改变落后面貌。岭南最早与欧美接触，因而也最早创办欧美式的学校。

关于外语学校方面：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必须掌握外国语言文字，为此，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首先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外语学校）。次年，两广总督瑞麟在广州创办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招收14—20岁的青少年，分别讲授英、俄、法、日文，同时学习汉文和自然科学知识，3年毕业。该馆还翻译出版一批外国书籍，介绍外国政治、文化、史地、文学等方面的情况。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把两广游学预备科馆、广州译学馆合并为两广方言学堂，内

设英、德、法、日文各一班，是清末比较完备的外语学校。^①

关于军事学校：要有强大的军队，必须创办培养军队骨干的学校，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训练新式海、陆军，设立实学馆，因校名不明确，后改为广东水陆师学堂，校址在广州黄埔附近的新洲平岗乡。招收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清朝海军大臣的谭学衡、广东督学及西南护法政府七总裁之一的汤廷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海、陆军培训分别办理，在原址设陆军武备学堂，学生中后来知名的有姚雨平、李济深、张醜村、黄慕松等。在黄埔海关附近设广东水师学堂，后改为广东海军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在黄埔平岗乡陆军武备学堂旧址创办陆军小学堂，学生中后来知名的有蒋光鼐、李朗如、李章达、陈铭枢、张竟生、邓演达、陈济棠、李扬敬、余汉谋、徐景唐、叶挺、张发奎、薛岳、李汉魂、邓龙光等。1912年改为陆军小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武备学堂改名陆军中学堂，1912年与设在广州北横街的将弁学堂合并，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次年停办。1924年，孙中山利用陆军小学旧址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因位于黄埔，俗称黄埔军校。此外，光绪三十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创办广东军医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创办两广陆军测量学堂。^②

关于师范学校：要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培养大批优秀的教师。为此，清光绪二十八年创办广府学堂师范班，光绪三

^① 曹思彬、林维熊、张至编：《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龚志鏊：《旧时代的广东历届军事学校概况》载《广州文史资料》第三辑，1961年版。

十年创办两广速成师范馆和私立坤维女学师范班，光绪三十一年创办两广初级师范简易科馆和南海简易师范科馆。由于废除书院、兴办各种学校，需要大量教师，此后设立的师范学校甚多，如广东官立女子师范学堂、私立协和幼稚师范科，等等。学习年限最长的为两年，最短的只有四个月。

关于政法学校：清朝末年，社会黑暗腐败，为了澄清吏治，培养各级行政干部，光绪三十二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学政于式枚联名上奏朝廷，获准开办广东法政学堂，入学对象是本省官吏及各府、厅、州、县保送的绅士，内分初级法律本科、法科速成科、政治本科、理财本科等。1912年改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3年改为广东公立法政大学，次年并为广东大学法学院。为了加强警政，宣统元年（1909年）创办广东公立警监学堂，1913年改为广东公立监狱专门学校，1929年改为国立广东法科学院。这两间学校，后来均并为广东大学法学院，最后改为中山大学法学院。

关于科技学校：为了引进西方工业技术，清光绪三十二年创办两广高等工业学堂，内分机械科、应用化学科。同时创办测绘学堂，培训测绘技术人员。次年创办广东蚕学馆，因为广东出口货物最大宗是蚕丝，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宣统元年广州西医组织的“光华医社”为争取医务卫生主权，创办光华医学院。与此同时，中国西医钟宰筌等与美国医生达保罗创办广东公立医学堂，初期私办公助，后改为公立，并改名为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宣统二年，创办广东农林讲习所，内分农科、林科，后改为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培养高级农业、林业人才，后并为广东大学农学院。1918年，粤汉铁路局创办广州铁路专科学校，学生多为铁路员工子弟，办了4期就停止。

关于综合性大学：清光绪二十八年，广雅书院改为“广东省大学堂”，校长称为“总理”，后改称“总教习”。当时教育制度尚未完善，学科设置、课程安排、学生管理均与书院差别不大，学校只设修身、国文、数学、格致（自然科学）、英文等科。两年后改名为“两广高等学堂”，总教习改称“监督”。1912年改为省立第一中学。其后，广东省陆续创办了一些高等专科学校，1923年，孙中山建议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为两广速成师范馆）的基础上，合并广东公立法政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成为国立广东大学，设文、法、农、理、工学院。其后将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前身为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并入为医学院。1925年孙中山逝世，为纪念他的功绩，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又把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并入为工业部。^①

关于中小学校：光绪二十八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当时广东着眼于大中学堂，没有人去创办小学。^②次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小学都要上“修身”、“讲经”等课，内容为儒家经典，而且课时最多。还规定中学以府立为原则，有条件的州、县能设立一所更为相宜，小学堂以府、厅、州、县设立为原则，大城镇也可设立。^③政府鼓励私人办学。这时省会广州府起带头作用，创办南海县官立高等小学堂、番禺县官立高等小学堂，梅县、香山等县接着响应，渐次推广至全省。^④当初在广州创办的中学，较知名的有：

① 曹思彬、林维熊、张至编：《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黄佐：《广东省中小学制度的变迁（1902~1937）》，载《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二辑，1964年版。

③④ 王炳然等：《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光绪二十八年的广府学堂，其前身为越秀书院，后改为广府中学；光绪三十三年南海官立学堂，其前身为西湖书院，后改为南海县立中学。由于公立中学校少，由地方社团、绅士名流或个人筹资创办的私立中学，在解决社会需要上有很大作用。其中知名的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时敏学会创办的时敏学堂，为中国最早的学校之一，其学生有金曾澄等人，后改为时敏中学。光绪二十八年，由吴道镛、丁仁长等创办的教忠学堂，4年后改为教忠师范学堂，为广州最早的师范学校，后改为教忠中学。光绪三十年，由黄绍平、马励芳夫妇创办的坤维女学，后改为坤维女子师范学校、坤维女子中学，陈铁军曾在该校就读，是早期较有声誉的女校。光绪三十一年，南武公学会创办的南武学堂，后改为南武中学，广东体育界早期知名人士多在此校毕业。

关于教会学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在广州创办医院和学校。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国教会在广州长堤创办博济医院。咸丰五年（1855年），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孙中山曾在此学习。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教会学校一度受到市民的抵制。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广州教会学校有所增加，以至延及全省。很多教会学校的资金，并非来自西方教士，绝大部分由岭南人士筹集。例如私立岭南大学，其前身为格致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年）由美国传教士香便文（B. C. Henry）、哈巴（A. P. Happer）在沙基金利埠（今六二三路）创立，曾一度停办。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美国传教士尹士嘉（O. F. Wisner）复办，院址设在四牌楼福音堂（今解放中路），次年迁往花地萃芳园，后暂迁澳门，聘请著名举人钟荣光协办校务，改名岭南学堂。光绪二十九年迁往广州康乐村。由于钟荣光多次向海外募捐，

并获政府积极赞助，才得以大规模增建校舍，增添设备，其后组成私立岭南大学董事会，孙科任董事长，钟荣光任校长，美国基金会处于协助地位。其后传教会把博济医院移交给岭南大学，岭南大学董事会为纪念孙中山，将博济医院改设为孙逸仙博士医学院，同时作为岭南大学医学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美国医生富马利创办广东女子医学院；光绪三十一年，美国人夏葛募捐建筑校舍，改名夏葛医学堂；其后美国人柔济捐建附属柔济医院，端拿夫人捐建端拿护士学堂，最后并为岭南大学医学院分院。辛亥革命前，西方教会还在广东各地创办一批中学，其中在广州的有真光、培英、培道、培正、圣心、青年会、协和、中德、圣三一等中学，^①其中培正中学的建校费用，全由中国的浸信会教友募集，并非来自外国教会。1925年，北京政府规定：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课，外人捐资办学应作为私人办学请求政府认可，校长应是中国人，中国人应占校董事会名额的半数以上。从此，国人掌握了岭南教会学校的教育自主权。

^① 曹思彬、林维熊、张至编：《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八章 群贤接踵 硕果丰盛

——独树一帜的学术研究

古代岭南的学术研究，由于历史原因，落后于中原地区，可是具有地方特色。到了近代。由于经济繁荣，加以对外文化交流和民族危机感的影响，岭南急起直追，与中原及各地并驾齐驱。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图富强，争相招聘人才；由于鸿儒硕彦四方讲学，黄河流域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岭南尚在草昧状态。汉、唐经学昌盛，朝廷设立太学，作为最高学府，所以学术中心在京师长安、洛阳。岭南僻处一隅，西汉末年虽已出现经学大师，但后继乏人。宋朝理学崛起，岭南早受薪传，在明朝出现江门学派。其后理学流于空谈义理，于事无补，逐渐衰微。明朝中期至清朝后期，儒家强调经世致用，崇实黜虚，是为实学，清朝岭南的“实学”成绩显著。至于史学，历代均甚重视，到了本世纪初，梁启超以其博学宏才，为中国近代史学奠定基础，在全国史学界有重大影响。

一、历久不衰的经学

儒家主张“尊君”，其重要经典之一《春秋公羊传》提出“大一统”的观念^①。所谓“大一统”，就是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应由帝王统治。非常明显，这种观念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所以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设置五经博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政府官员大多来自儒生，出身寒微的儒生公孙弘精研《春秋公羊传》，竟被汉武帝封侯拜相^②，打破了汉初由公侯贵族出任丞相的传统。此后历代相承，人们刻苦攻读儒家经典成为仕途捷径。两千年来，经学一直受到社会重视，岭南也不例外。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以西汉博士讲授的经书，根据师徒父子口语相传，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经，它由学官传授，成为官学。后来社会上又逐渐发现一部分儒家经典，用战国时的篆文写成，称为古文经，它由民间私人传授，重视训诂，汉朝对此长期不设博士，没有学官传授成为私学。今文经和古文经不仅是书写的文字不同，对经文的解释也有很大差异。再者，今文经和古文经都重视师法和家法，在传授时各立门户，形成派别。西汉末年，岭南广信（县治在今广东封开县）人陈钦，师事黎阳（县治在今河南浚县东）人贾护，学习《春秋左氏传》，陈钦与“国师”刘歆同时，但“别自名家”^③，其学问“直接虞卿、荀况、张苍、贾谊、贯公、贯长卿、张禹、尹更始、尹盛、翟方进、胡常之

①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② 班固：《汉书·公孙弘传》。

③ 范晔：《后汉书·陈元传》。

一脉，源远流长，尝撰为《陈氏春秋》以自别”^①。王莽曾向陈钦学习《春秋左氏传》，并任命其为馱难将军^②。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25—55年），陈钦之子议郎陈元继承家学，对《春秋左氏传》加以训诂，他和桓谭、杜林、郑兴等齐名，曾积极上疏申述，使《春秋左氏传》被立为官学^③，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春秋左氏传》是古文经，被立为官学，意味着古文经学受到光武帝的重视，其间陈元起了很大作用。对此，今文经博士为之哗然，公卿大臣群起反对，以致《春秋左氏传》不久被废除。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到当时岭南学者对经学界的影响。陈元之子陈坚卿，史载“有文章”^④，但其经学成就不详。灵帝熹平（172—177年）末年，番禺人董正精通《毛诗》、《礼记》、《仪礼》、《周礼》、《春秋》，居乡授徒讲学，南阳郡（郡治在今河南南尚阳市）车遂慕名千里前来受教，可见其影响甚大^⑤。

三国时，广信人士燮年少游学洛阳，师事颍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人刘子奇，对《春秋左氏传》和今、古文《尚书》都有研究，还给《春秋》作注释，曾任吴国卫将军、龙编侯、交趾太守，其弟士壹、士黼、士武分别担任合浦、九真、南海太守，可是他在岭南形成一股势力。由于待人宽厚，礼贤下士，数以百计的中原士族为逃避战乱而前来投靠^⑥，因而促进岭南经学的发展。晋朝南海人黄颖曾任儒林从事，注释《周易》，惜其生平事迹不详^⑦。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

②③④ 范曄：《后汉书·陈元传》。

⑤ 阮元：《广东通志·列传一》。

⑥ 陈寿：《三国志·吴书·士燮传》。

⑦ 魏征等：《隋书·经籍志》。

隋唐以“科举”取士，海阳（今广东潮安）人赵德是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进士，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任潮州刺史，称赞他“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①。故委任赵德主持州学，赵德作为经师，培养了一批人才，但没有留下经学著作。曲江人刘轲，是元和末年（820年）进士，曾任宏文馆学士、洛州刺史，撰《三传指要》，对《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加以论注，还撰有《翼孟》等书^②。

宋朝岭南经学著作比前代增多。增城人古成之是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进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四川绵竹令，撰《易疏删定》。此后作者相继，见于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的记载，宋朝岭南有《易》类著作6种、《礼》类著作3种、《春秋》类著作1种、《孝经》类著作1种、“四书”类著作5种，但是没有《诗》、《书》类的著作，这颇耐人寻味，因为士子读经，一般是先读《诗》、《书》，这时岭南无人为之训诂笺证，难以理解。北宋期间，侧重章句注疏的经学逐渐为高谈性命义理的理学所取代。明朝以前，岭南的经学著作现均失传。

清朝初期，满族统治者为了镇压汉族的反抗，大搞文字狱，滥杀无辜，士人备受摧残。到了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学者为了明哲保身，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致力于古籍和史料的考证、整理以及语言的研究，岭南学者也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六年（1817—

① 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

② 阮元：《广东通志·列传二十一》。

1826年),江苏仪征人阮元任两广总督,随同前来的幕僚,其中江苏甘泉(今扬州市)人江藩,是著名经学家惠栋的再传弟子,撰写《国朝汉学师承记》,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得阮元赞助出版并作序,在广州刊行;其后撰写《国朝宋学渊源记》,于道光二年(1822年)完成,七年(1827年)刊行。江藩编写这两本清朝学术史,未能秉公评论,有意表彰汉学(经学)、贬低宋学(理学),虽有阮元的支持,却引起阮元另一位幕僚、安徽桐城人方东树的痛斥,方是著名文学家姚鼐的高足,热心宣扬程朱理学,为此撰写《汉学商兑》^①,指出:“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此书几经修改,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刊行。这场论战,牵涉面较广,江藩、方东树均非岭南人,但事情在岭南发生,两人在广州共同参加编纂《广东通志》,岭南人士亦介入议论,因此也可算是岭南学术史上一件要闻。其后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外患日深,国家多难,人们要求变法,于是主张改革的今文经学乘时而起。

致力于今文经学、精研《春秋公羊传》的南海人康有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曾去香港旅游,获悉西方近代文明,其后大量购阅有关西方文化的书籍,从而认为社会在变化,国家制度也应该随之改革。但是古文经学奉行“恪守祖训”,反对变法,为此,他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广州出版《新学伪经考》,提出:当初秦始皇焚书,只是烧毁民间藏书,“但欲愚民而自智,非欲自愚。”因此官府所藏,“未尝焚烧”。后来发现的古文经传,乃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方东树传》。

“歆以宗室子佐莽篡汉”；由于古文经学助王莽建立新朝，应该称为“新学”；古文经传出自刘歆伪造，应该称为“伪经”。王莽提倡复古，康有为撰写此书，目的借口反对王莽，从而反对守旧，提倡革新，为变法维新制造理论根据。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出版《孔子改制考》，把孔子尊为“托古改制”的始祖，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改革当时弊政，假托古代圣王言论而创作的文献。他在书中坦率表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尽管《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有些论点出于武断，自相矛盾，但用意是打破思想束缚，企图实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其作品于戊戌变法期间，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于古书真伪的辨别，也下了一番功夫，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尤其是《新学伪经考》，在考证古书方面：颇受俞樾、崔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的称赞^①。

康有为还利用东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中的“三世说”，把封建社会称为“据乱世”，资本主义社会称为“升平世”，而把消灭家庭、阶级、国家，实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称为“太平世”，同时发挥《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并掺杂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意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等观念，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撰成《大同书》，1913年在《不忍杂志》发表部分内容。康有为于1927年去世后，由其弟子钱定安在1935年全文出版，此书是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

^① 《新学伪经考》，附录，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华书局，1956年第一版。

文献，主张在现代化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财产，建立人人平等、自由的大同社会。岭南的经学研究，至此在历史上作出显著的贡献。

二、自成一派的理学

儒家经典原属先秦作品，经过汉朝经学大师加以注释、讲解，读者才易明白。这些经学大师为了炫耀自己博学，解说经文不厌其详，甚至冗赘难读。例如，西汉《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来解释《书经》第一篇《尧典》中的“尧典”两字，又用三万字解释《尧典》第一句“曰若稽古”4字^①。读者不胜其苦，像这样的经学研究，于国于民毫无补益，势必走向没落。经过在唐末五代的剧烈动乱后，到了宋朝，儒家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加强国家统一，宣扬封建礼教，对于经书不再侧重训诂，而是探求其中微言大义，即物穷理，研究宇宙本原和认识真理的途径，了解世界的规律性和人类本性等问题，对此，后人称为理学或道学。理学重视纲常，提倡名节，当然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岭南也是如此。

理学的创始者周敦颐（1017—1073年），湖南道州（今道县）人，世称濂溪先生，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刑狱，理学在这时传入广东，后来广东好些书院命名为濂溪书院，以示纪念^②，书院是宣扬理学的重要场所。南宋时，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福建建阳讲学期间，曾来广东揭阳、潮州、韶州等地访友、旅游，对广东的理学发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二章，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三版。

^② 阮元：《广东通志·宦绩录》。

展有很大影响，广东有些地方大员如广州知州廖德明、德庆知府刘燊等，^① 以及潮阳乡贤郑南升、郭叔云等，^② 都是朱熹的学生，他们均热心文教事业，积极宣扬理学。在各方推动下，广东士人也北上寻师，如南海人简克己于孝宗时前往湖南衡阳，师事理学名家张栻数年，张栻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简克己学成回粤，张栻称赞其“精确有守”，乡邑都对其表示敬礼，廖德明还请其到州学讲学。^③ 另一位南海人陈春华，曾去江西象山（今贵溪）师事理学名家陆九渊，陆是象山学派创立人，与朱熹的考亭学派相抗衡，陈春华学成告别时，深受陆九渊的称誉^④。东莞人李用钻研周程理学近30年，设馆授徒，世称竹隐先生，撰《论语解》，究明伊、洛奥旨，探溯洙、泗源流，邑人李昂英向朝廷进呈此书，奉旨在全国印行，并被授为校书郎，李用说：“著书岂为干禄计哉！”不愿做官，理宗特赐“竹隐精舍”匾额，以表彰其高风亮节。^⑤ 其子李春叟，家居授徒，岭海名士多出其门，朝廷赐号“梅外处士”。^⑥ 番禺人梁百揆，博览群书，精研理学，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进士，以直谏不容于时，回乡归隐，在禺山书院讲学，世称端懿先生^⑦。海阳（今潮安县）人王大宝，高宗建炎初年进士，赵鼎贬至潮州，王大宝经常听赵鼎讲解《论语》；任连州知州时，适逢张浚谪居连州，张浚之子张栻是理学大师，与父同住，王大宝又得以聆听张栻讲学，因而在理学上大有进益，后任礼部尚书，著有《经筵讲义》、《周易证义》等^⑧。

在理学的熏陶下，南宋末年，广东不少士人毁家纾难支

① 阮元：《广东通志·宦绩录》。

② ③④⑤⑥⑦⑧ 阮元：《广东通志·列传》。

持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抵抗外族入侵。理学家东莞人李用鼓励其婿熊飞起兵勤王，熊飞牺牲后，余部由许之鉴率领前往福建汀州（今长汀县），与文天祥部会合，景炎三年（127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今广东海丰县五坡岭遭元军突袭，许之鉴被俘后不屈殉国^①。

元朝时候，广东继续有人宣讲理学。新会人罗蒙正主持古冈书院，从学者甚众；门人张栝，世称象山先生，主张为学以明理为要，诗文以典雅为本，不事巧琢，其弟子不拘学之深浅，皆能识其大要^②。东莞人黎献学识渊博，世称拙翁先生，他按照朱熹白鹿书院的学规来教导弟子，远方之士闻风而来，影响不小。

到了明朝，岭南的理学大有进展，其中最著名的学者要推新会陈献章（1428—1500年），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年）举人，时19岁，次年赴京考进士，中副榜，乃入国子监博览群书，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再考进士，又复落第，景泰五年（1454年）绝意科举，前往江西抚州崇仁县，拜理学家吴与弼为师学习程朱理学，历时半载，其后归乡授徒。他虽然师从吴与弼，但其理学思想后来独树一帜，开创“江门学派”，著有《陈献章集》。清初黄宗羲《明儒学案·崇仁学案》说：“白沙（即陈献章）出其（即吴与弼）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即吴与弼），当为别派。”《明史·儒林传》也说：“元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近人认为：陈献章“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儒心学的先河，在中

^{①②} 阮元：《广东通志·列传》。

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和作用”^①。

关于陈献章的理学思想发展，他在《复赵提学佥宪》中说得很清楚：“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按为虚龄）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原委也。于是焕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②他采用佛教徒的静坐方式，摒除各种杂念，从而悟出“夫学贵自得”^③、“以自然为宗”^④的道理。

陈献章的“学贵自得”，绝非随意所之，悠然自得；乃是提倡刻苦用功，不存侥幸心理，不搞投机取巧，才能实实在在取得真正的收获。早年他在吴与弼处学习，吴就勉励他要勤奋向上。他在《李文溪文集序》中说得很清楚：“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⑤功力不到，当然一无所得。

陈献章的“以自然为宗”，主张效法自然，遵守自然规律。他在给门人的诗《示湛雨（即湛若水）》中说：“有学无学，有觉无觉。千金一瓠，万金一诺。于维圣训，先难后获。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鸟飞鱼跃。得山莫杖，临济莫

① 章沛：《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④ 《陈献章集》卷二。

③ 《陈献章集》附录二《陈白沙先生年谱》。

⑤ 《陈献章集》卷一。

喝。万化自然，太虚何说？绣罗一方，金针谁掇？”^①要了解这诗的意思，最好还是引用湛若水《白沙子古诗教解》的说明：“有学、有觉二句，皆谓溺于记诵、滞于见闻者，虽有学如无学，虽有觉如无觉也。千金一瓢，《鹞冠子》：中流失船，一瓢千金。此借引以言本心也。言学当超于言语之外，而致力于不睹不闻之体，《中庸》所谓天下之大本也。大本立则有一瓢千金之重，此言一诺，则重于万金矣，如曾子唯一贯之旨是也。然必先用功艰难而后获。果能先难后获，则天理流行。其真机活泼，水到渠成，无非鸢飞鱼跃之妙。将见万化皆从此出，如太虚之无言，何用如得山、临济二僧以杖喝为教者乎？又借引绣罗，以比千变万化皆从本心应用，然则金针在我，又谁掇乎？盖佛氏所谓莫把金针度与人者。以金针比心，此心人人各具，人亦不能掇之于我，释氏可谓不识心者矣。”^②简言之，陈献章提倡“以自然为宗”，就是要顺其自然，坚决摆脱名利的引诱，保持自我的主张和操守，这样才能够“水到渠成，鸢飞鱼跃”。不论是“学贵自得”或“以自然为宗”，关键在于“自觉”，所以陈献章在《与湛民泽》（即湛若水）的信中说：“学无难易，在人自觉耳。”^③

陈献章的宇宙观，他在其重要作品《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中提出：“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曾足与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④又说：“物囿

① 《陈献章集》卷四。

② 《陈献章集》附录一《白沙子古诗教解》（湛若水）。

③ 《陈献章集》卷二。

④ 《陈献章集》卷一。

于形，道通于物，有目者不得见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状之以天则遗地，状之以地则遗人，物不足状也。”^①在此，陈献章认为：“道”超越于天地之上，成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它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囊括一切，贯通万物，成为万物中共通的东西；它是可以认识的，如果认识了“道”，就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扰，成为自己的主宰。至于怎样才能认识“道”，他在《与林缉熙（即林光）书》说：“夫人所以学者，欲闻道也。苟欲闻道也，求之书籍而道存焉，则求之书籍可也；求之书籍而弗得，反而求之吾心而道存焉，则求之吾心可也。”^②又说：“终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不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③由此可见陈献章高度强调“心”的作用，一切在我。他鼓励人们去“得道”、“求理”，不受物欲的束缚。

由于陈献章的学术思想比较开放，因而不为当朝权贵所看重。《明史·儒林传》说：“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这评语值得研究，在全国范围，陈献章的影响有限，但就岭南来说，陈献章的功绩不小，尤其是他培育了一批弟子，如华盖殿大学士梁储、南京通政司左参议张诩、户科给事中贺钦、庶吉士邹智、监察御史陈茂烈、国子博士林光、两浙盐运使史桂芳。其中最突出的是湛若水，曾任南京礼、吏、兵部尚书，足迹所至，便建造书院奉祀其师陈献章。湛若水弟子甚多，世称甘泉先生，当时与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齐名。湛若水提倡“随处体验天理”，王守仁认为

① 《陈献章集》卷一。

② 《陈献章集·陈献章诗文续补遗》。

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白沙学案》。

这是“求之于外”；王守仁提倡“致良知”，湛若水认为“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①。对此，人们称湛若水之学为“广宗”，王守仁之学为“浙宗”。虽然湛、王两家学说不同，但友谊甚好，“学于湛者，或毕业于王，学于王者，或毕业于湛。”^②也有门人从中调解，提出：“湛之体认天理，即王之致良知也。”^③

湛若水很尊重其师陈献章，并热心宣传白沙学说，然而对其师强调“静坐”，则不以为然，他曾与人说：“静坐，程门有此传授，伊川（即程颐）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然此不是常理。……有执事与人时，如何只要静坐？使此教大行，则天下皆静坐，如之何其可也？”^④这使人想起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湛若水比亚里士多德进了一步，他宣扬老师的正确观点，而否定其不正确的观点，这很值得人们学习。

三、颇有特色的实学

明朝立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大兴文字狱，才俊之士无辜受戮，岭南名人也有一批被杀，这就严重影响学术研究的正常开展。前人评论为：“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伪，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⑤面对这种情况，有识之士为了经世致用，不能不改弦易辙，提倡实学，岭南邱

① 张廷玉等：《明史·儒林传·湛若水》。

②③④ 黄宗羲：《明儒学案·甘泉学案》。

⑤ 《明史·儒林传》。

濬（1420—1495年）就是其中的先驱人物。

邱濬与陈献章、黄佐（1490—1566年）为明朝岭南三大学者，他是琼州府下田村（今海南省琼山县府城乡）人。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学识渊博，勤于著述，曾任礼部尚书、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少年时代就关心国家大事，入仕以后，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比前更多，因此“胸怀经世济民”的抱负^①。他鉴于宋朝真德秀所著的《大学衍义》只探讨儒家经典《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而没有论述“治国”、“平天下”，于是广泛收集经史百家中的材料，附以个人意见，在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撰成《大学衍义补》一书，共160卷，每卷开始均有“治国平天下之要”七字，内分“正朝廷”、“固邦本”、“制国用”、“崇教化”、“慎刑宪”、“严武备”等12目、119条，其中“固邦本”、“制国用”详论利民富国等项，对蕃民生、制民产、重民事、宽民力、愍民穷、恤民患、除民害、择民长、分民牧、询民瘼，提出一整套主张，同时对贡赋、经制、市余、铜楮（即货币）、山泽、征榷、傅算、鬻算、漕挽、屯营，也发表一系列建议。我国古代长期执行“重农抑商”政策，对此，邱濬不仅重视农业，还重视手工业和商业，他说：“人各持其所有于市之中，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②其义是：发展生产和做好贸易工作，人们便会生活富足。又说：“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为国矣。”^③“君必得民然后可以

① 《明史·邱濬传》。

② 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制国用》·《市余论》。

③ 邱濬：《大学衍义补》卷十三《固邦本》·《蕃民之生》。

为君，是君一日不可无民也。”^①此书还有很多精辟见解，因而受到明孝宗的嘉奖，并下令有关部门抄录副本，交书坊刊行。明神宗在万历年间（1573—1619年），又下令再版，还亲自撰写序文，可见此书在明朝中期颇受重视，其思想对后世产生很好的影响。

到了清朝，满族统治者初期对汉族残酷镇压，讲学著书者稍不谨慎，便会触犯刑网，而且祸及子孙，番禺屈大均便是一例，因此岭南学术界在较长时间内陷于沉寂的局面。

仁宗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江苏仪征人阮元任两广总督，他按照任浙江巡抚时在杭州孤山创办“诂经精舍”的做法，于道光四年（1824年）在广州越秀山南麓创办“学海堂”（旧址在今市第二中学），并明确宣称：“本部堂建学海堂，为课通省举贡生监经解诗古之所”，“且课举业者，各书院已大备，士子皆知讲习，此堂专勉实学。”^②首先树立规模，从此开创了岭南士子重视学术研究、讲求经世致用的新风气。其后广东巡抚蒋益澧于同治六年（1867年）在越秀山南麓创办菊坡精舍，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广州西村创办广雅书院，均礼聘才德兼备之士，先后培养出大批重视实学的人才。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近百年内，广东重视实学的知名人士有：

曾钊（1793—1854年），字敏修，又字勉士，南海人，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生，曾任合浦县教谕、钦州学正。治学态度严谨，所读之书，一定要校勘错字漏句。阮元看见他校勘的《字林》，十分赞赏，聘为“学海堂”学长，撰著有

① 邱濬：《大学衍义补》卷十六《固邦本》·《恤民之患》。

② 林伯桐：《学海堂志》。

《周礼注疏小笺》、《诗说》、《诗毛郑异同辨》、《毛诗经文定本小序》、《毛诗考异》、《毛诗音读》、《虞书命羲和章解》、《论语述解》、《读书杂志》和《面城楼集》。^① 所辑佚书有：汉杨孚《杨议郎著书》及《异物志》，晋刘欣期《交州记》，刘宋王韶之《始兴记》。光绪二十一年（1841年），英国殖民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妄图进犯广州，他曾协助两广总督祁项，在南海、番禺两县组织团勇三万六千人，日夜训练，加强防务。光绪二十三年（1843年），祁项打算修复虎门炮台，他进呈《炮台形势议》十条。后在廉州招抚海盗^②。由此可见其治学以经世为务。

林伯桐（1775—1844年），字桐君，番禺人，嘉庆六年（1801年）举人。由于丧父在家侍母，不再应试，“教授生徒百余人，咸敦内行，勉实学，粤督阮元、邓廷桢皆敬礼之。”^③ 被阮元聘为学海堂学长，主张“通经致用”，对经学、音韵、地图和地方风俗礼仪都有研究，所著《修本堂丛书》，已经刊行的有《毛诗通考》、《毛诗识小》、《史记蠡测》、《供冀小言》、《古谚笺》、《冠婚丧祭仪考》、《公车见闻录》、《修本堂稿》、《月亭诗抄》，未刊刻的有《两粤水经注》等20余种，多已散佚，仅存书目及凡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被授予德庆县学正，不久病逝。

谭莹（1800—1871年），字兆仁，番禺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咸丰九年（1859年）赏赐内阁中书衔。历官肇庆府学教授、嘉应州学及化州州学训导等职，曾任学海堂学长及粤秀、越华、端溪书院监院，著述甚丰。

①② 赵尔巽等：《清史稿·曾钊传》。

③ 赵尔巽等：《清史稿·林伯桐传》。

陈澧(1810—1882年),字兰圃,世称东塾先生,番禺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举人,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学海堂肄业,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学海堂学长,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任河源县学训导。咸丰三年(1853年)被聘为东莞县龙溪书院山长,同治六年(1867年)主持广州菊坡精舍。其治学态度是把经学、理学予以融会贯通,破除门户之见,曾说:“汉儒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①他对经学、史学、文学、数学、地理、音韵、乐律、书法等都有研究,主要著作有《东塾集》、《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弧三角平视法》、《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水经注提纲》、《切韵考》、《声律通考》等100多种。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建议设险防守,水师与水勇并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在南海县横沙村协助当地办理团练,防御外敌入侵。

在这前后,还有李黼平、赵均、吴兰修、熊景星、徐荣、桂文灿、马福安、吴应逵、侯康等整理典籍文献,持有针砭时弊的批判精神,满怀富国强兵的经世思想,因而实学成为从理学通向近代新学(西学)的中介和桥梁。

四、富于开拓的史学

岭南的史学,虽然早在东汉就已出现,但是作者寥若晨星。及至晋室南渡,尽管岭南不设侨置郡县,然而中原士人眷恋故土,此辈伪造中原与岭南的关系,以寄乡思,使岭南古史蒙上一层光怪陆离的面纱,产生不少误会,至今尚未彻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陈澧传》。

底澄清。宋、元以前的岭南史学著作大都失传。明、清两朝，岭南史学出现蓬勃繁荣的大好局面。

东汉章帝建初年间（76—83年），南海（今广州）人杨孚被荐举为贤良，后任议郎，曾撰《南裔异物志》^①，现仅存清朝曾钊的辑本，为中国第一部地区性物产志。三国时，吴国陆允撰《广州先贤传》，^②为岭南第一部人物志，已佚。晋朝初年，南海人王范被荐举为广州大中正，当时秘书丞司马彪对史学很有研究，曾著《九州春秋》，流行全国，但是此书关于岭南的记载不够精确，王范于是搜集史料，撰写《交广春秋》，这是岭南第一部地方史，于太康八年（287年）呈给晋武帝，因内容详尽，受到众人称赞，“自是名动京师”。^③其后，南海人黄恭认为《交广春秋》仍有不足之处，乃撰《王氏交广春秋补遗》，^④又名《交广记》。这两书后均不传，部分内容见于酈道元《水经注》。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某些南下士人著书立说，随意臆测，信口雌黄，顾微（一作裴渊）的《广州记》便是例证，此书久已散佚，现存元朝陶宗仪辑本。该书记载多是神怪无稽之事，如说：“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故图其像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楚国最强盛时，其势力未能越过五岭，何来广州属楚？“云昔”两字就很不负责任，事情越搞越离奇，到了唐朝，扶风（在今陕西省）人马摠于宪宗元和四年（809年）任岭南都护、本管经略使，他在军政之暇，搜集旧闻，撰写《通历》说：“周夷王八年（公元前887年），楚子熊渠伐杨粤，自是南海事楚；有楚庭”。^⑤查周夷王八年

①③④ 阮元：《广东通志·列传一》。

② 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二》。

⑤ 引自阮元：《广东通志·古迹略》。

在“春秋时代”（公元前 722—前 481 年）之前 165 年，那时楚子熊渠僻处豫西鄂北，尚属蕞尔小邦，怎能越过长江、五岭，在数千里之外的广州孤零零地建立一座城市？这个极为明显的伪史，却在岭南大地盛传 1 000 多年，“楚庭”之说至今不衰，造成认识混乱，俗人的浮夸心理真是可笑。至于《通历》一书，明朝已不全。

研究历史必须熟悉地理，所以古代的图书分类法“经、史、子、集”，把地理书归入史部。隋唐时候，中国出现大一统局面，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很重视地理图籍的编著。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 年），循州（州治在今广东惠州市）刺史樊子盖撰《岭南地图》，^①唐朝广州有人撰《图经》，屈璆撰《地志》，后均失传。因岭南风物与中原等地不同，故唐人喜撰岭南物产志，惜多散佚，现存仅段公路撰《北户录》、刘恂撰《岭表录异》。段公路是唐穆宗时（821—824 年）宰相段文昌之孙，曾在广州任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是书当在广州时作，载岭南风土颇为赅备，而于物产为尤详，征引亦极博洽。”刘恂于唐昭宗时（889—904 年）任广州司马，任期届满，唐祚也将倾覆，因此留在广州，撰写《岭表录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溯粤东舆地之书，如郭义恭《广志》、沈怀远《南越志》，皆已不传。诸家所援据者，以恂是编为最古。”又载：此书“盖不特图经之圭臬，抑亦苍雅之支流，有裨多识，非浅鲜也”。原书久已散佚，清初学者从《永乐大典》等书中加以裒辑，近人鲁迅（周树人）根据《太平御览》等 20 种著作予以校勘。段公路与刘恂以外地人士记述岭南情况，其观察事物的角度可能与当地人士有所不同，故

^① 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

其记述自有可贵之处。

五代时，胡宾王撰《南汉国史》，后改名《刘氏兴亡录》。宋朝周克明撰《伪南汉书》，均失传。宋朝王中行撰《广州图经》，佚名的《广州新图经》，李木撰《南海图经》，以及韶州、循州、英德府、惠阳、潮州、潮阳、肇庆府、南恩州、德庆府、封川、高州、化州、廉州、钦州、雷州、琼州、吉阳军、桂阳、连州、南雄州等地，均有人撰写《图经》，^①有的《图经》由地方官领衔，可见宋朝对舆地著作的重视。王靖编修《广东会要》，陈岷、方大琮分别编修《南海志》，上述著作均失传。王靖、陈岷、方大琮都曾任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这就开创了由地方大员领衔、文人集体执笔修志的先例。

元朝陈大震撰《南海志》，现存残本。明、清两朝，广东史学比较发达。明朝广东共修志162种，^②现存约30多种。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广东巡按监察御史戴璟主编《广东通志》72卷，为广东现存最早的地方通志。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黄佐撰《广东通志》70卷；此外还著有《广州人物志》24卷、《罗浮山志》12卷以及《广州府志》70卷（已佚），他是有名的学者，在史学方面贡献尤为突出。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郭棐、王学曾、袁昌祚同修《广东通志》72卷，郭棐还著有《粤大记》、《岭海名胜志》、《四川通志》、《右江大记》、《宾州记》等。这时传记著作也受到重视，王渐逵撰《岭南耆旧遗传》，欧大任撰《百越先贤传》，霍尚守撰《粤东名臣志》等。

清朝广东修志（省、府、州、县、乡土）共两百多种。圣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吴兴祚主编《广东舆图》12卷。

①② 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金光祖等修《广东通志》30卷。雍正九年（1731年），郝玉麟等监修《广东通志》64卷。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张嗣衍修、沈廷芳辑《广州府志》60卷。道光二年（1822年），阮元修《广东通志》334卷。这时私人修史也有很大成绩，如屈大均撰《广东新语》、《皇明四朝成仁录》，仇池石撰《羊城古钞》，崔弼撰《波罗外纪》，范端昂撰《粤中见闻》，梁廷楠撰《南越五主传》、《南汉书》、《夷氛闻记》、《海国四说》，并主持纂修《广东海防汇览》、《粤海关志》等。

清朝末年，由于西学东渐和帝国主义入侵，对我国史学界产生很大震动。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高呼“史界革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发表《中国史叙论》，提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从而开展对封建史学无情的批判。次年，他发表《新史学》，提出：“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他高度强调要建立新的史学体系，其后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续编》等史学名著，创立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并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担任导师，培育出一批著名的历史学者。

第九章 才士辈出 鸿篇相继

——反映现实的文学创作

岭南的文学创作，虽然起步较迟，但是品种繁多，在继承中原及各地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前进而不断创新，因而富有地区特色，也随着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而日益繁荣。

岭南的古代作者，多是散文诗词并举，为便于叙述，只好侧重其某方面的特长。再者，在漫长的古代岁月中，大量的各地知名文士先后来到岭南，如韩愈、苏轼、苏辙、汤显祖、朱彝尊、王士禛等，限于篇幅，概不介绍。

一、朴实明畅的散文

岭南的散文，其特点为朴素平实，明白晓畅，不事修饰，重在实用。明朝蕲州（在今湖北）人张邦翼辑《岭南文献》32卷，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文语》中评论说：“先是时，吾粤有《岭南文献》一书，吾尝病其文不足，献亦因之。”为此，他编纂《广东文集》300多卷，由广州知府刘茂榕等资助出版，后因卷帙浩繁，从中精选，名为《广东文选》，共40卷。乾

隆时，顺德人温汝能（1760—1814年）辑《广东文海》66卷，搜罗略备，但是汉、唐、宋、元作者仅30位，明朝180多位，清朝50多位，至乾隆时止，因而挂漏不少。民国初年，番禺吴道镛（1853—1936年）在前人基础上，辑成《广东文征》，共240卷；其后番禺张学华增补，收录自汉朝至清朝的作者712位，作品分为16类：一，敕、制、诰、命；二，上书、表、启、状；三，奏疏；四，策议；五，书；六，论辩、考说；七，序；八，题跋；九，记；十，碑；十一，墓碑、表志；十二，传状；十三，祭文、诔；十四，赋；十五，箴、铭、颂、赞；十六，杂文。堪称各种文体俱备。

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认为：“南越文章，以尉佗（即赵佗）为始，所上汉文帝书^①，辞甚醇雅。”又说：“论者以文帝赐佗书，纯作家人父子语，不用欺，亦不示恩，所谓以德服人；然亦佗明哲炳于先几，故能变逆为顺，以相安于无事耳。噫！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哉。”但是赵佗《报文帝书》这篇名作为何人所撰，后世不得而知。确凿可考的散文作者，最早见诸史籍是东汉初年的广信（今封开）人陈元，他给光武帝的《请立〈左传〉疏》^②，立论平允：文辞优美，其中驳斥范升等人的观点，持之有据，说理透彻，故其建议能为光武帝接受。其后和帝时，出动大军征伐匈奴，南海杨孚《谏止用兵疏》^③，全文仅百余字，言简意赅，引经据史，颇有说服力，惜不为和帝采纳。灵帝时，曲江郭苍曾任荆州从事，撰《桂阳太守周府君碑》，称颂桂阳太守周君光疏浚昌乐水道，

① 此信节录载于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全文载于班固《汉书·南粤传》。

② 载于范曄：《后汉书·陈元传》。

③ 载吴道镛、张学华：《广东文征》。

便利航运。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说：“从事碑文甚奇古。六泷山水之胜，形容殆尽，其才亦扬雄之亚云。”逮及三国两晋南朝，天下扰攘，岭南士人极少任职朝廷，故乏章奏谏议之作；且政局长期动荡，边陲之区，文教不振，作者零落。

到了唐朝，曲江张九龄（678—740年），字子寿，玄宗时曾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号称贤相。他是岭南历史上最杰出的才士，当时号称“燕（燕国公张说）许（许国公苏颋）大手笔”之一的燕国公、宰相张说，就经常赞誉张九龄是“后出词人之冠也”^①，可见时人对他的推崇。他撰写的《曲江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评价为：“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许之下。”《新唐书·文艺传》载徐坚之言，谓其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今观其《感遇》诗作，神味超轶，可与陈子昂方驾。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徐）坚局于当时风气，以富艳求之，不足以为定论。至所撰制草，明白切当，多得王言之体。”这评语堪称公允全面。讲究“时用”，不求“富艳”，成为岭南的文风。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著名文学家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任潮州刺史，到职后盛赞海阳（今潮州市）赵德，他们来往的时间不长，但是交情很深，韩愈把自己的文章送给赵德，赵德辑成《昌黎文录》，并撰序大加称颂。但赵德其他文章未能传之后世^②。

其后，曲江刘轺，字希仁，以文名世。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中书侍郎的马植，盛赞刘轺的文章同韩愈、柳宗

① 欧阳修等：《新唐书·张九龄传》。

② 吴道镛：《广东文征作者考》。

元一样。可见岭南文士，在张九龄之后，就要数刘轲，惜其散文大多散失，仅流传十余篇，载于《全唐文》，清朝阮福辑为《刘希仁文集》，伍崇曜刊于《岭南遗书》之内^①。番禺郑愚，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进士，撰《郑愚集》，今佚^②。桂阳（今连县）刘瞻，字几之，宣宗大中（847—859）初年进士，懿宗咸通十一年（860年）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昌公主病亡，懿宗滥捕太医韩宗绍等及宗族数百人入狱，刘瞻上疏反对，即日被罢免相位，并被贬为驩州（在今越南荣市）司户参军事。《旧唐书·刘瞻传》载其《谏捕翰林医官疏》，义正词严，读之令人敬仰。五代时，连州（州治在今连县）黄捐，后梁末帝龙德二年（922年）进士，曾任南汉尚书左仆射，因《谏南汉主建南薰殿疏》忤旨，退居永州（今湖南零陵县），著《桂香集》，今佚^③。番禺钟允章，南汉高祖时进士，曾任尚书左丞参政事，才思敏捷，诗文创作甚多，因而名播远近^④。

宋朝初年，增城古成之颇享文誉，是宋朝广州第一位进士。当时岭南文风未盛，他大力提倡，有《古成之集》，已佚^⑤。

北宋期间，岭南散文影响最大的要推曲江余靖（1000—1064年），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曾任知制诰、工部尚书。在朝敢于直言，任集贤校理时，范仲淹因忤宰相吕夷简，横遭贬逐，谏官、御史都不肯主持公道。余靖挺身而出，上疏营救，结果和尹洙、欧阳修一样被贬，因而知名于世。欧阳修称赞他：“为人质重刚劲，而言语恂恂，不见喜怒，自少博学强记，至于历代史记、杂家、小说、阴阳、律历，外

①②⑤ 吴道镛：《广东文征作者考》。

③ 梁廷楠：《南汉书·黄捐传》。

④ 吴任臣：《十国春秋·南汉·钟允章传》。

暨浮屠、老子之书，无所不通。”^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迹其生平树立，要不失为名臣。其文章不甚著名，然狄青讨平侬智高，靖摩崖作记，以旌武功，当时咸重其文。尝奉命使辽，作《契丹官仪》一篇，颇可与史传参证。他如论史、序潮诸作，亦多斐然可观。以方驾欧（欧阳修）、梅（梅尧臣），固为不足，要于北宋诸人之中，固亦自成一队也。”这个评价很公允，所著《武溪集》，内容除古诗、律诗外，主要是制诰、状、启等实用性文字。“其文章不甚著名”，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当时在岭南则无人能出其右。

南宋期间，岭南散文名家要推增城崔与之（1158—1239年）和番禺李昉英（1201—1257年）。崔与之字正子，曾入太学，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登第，是广东第一个由太学生考中的进士。曾任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理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右丞相，均力辞不就。作品由后人辑为《崔清献公集》，又名《武溪集》。其《论人才用舍行政得失疏》，乃带病时所写，结构严谨，用语晓畅，理宗“览奏嘉叹”^②。稍后的李昉英，字俊明，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曾任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晚年归隐广州城北文溪之畔，其著作由门人李春叟辑为《文溪集》，伍崇曜刊入《粤十三家集》之内。李春叟在《文溪集序》中说：“先生昭代伟人，……刚方正大之气，蟠郁胸次，泄而为文，光芒自不可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昉英盖具干济之才，而又能介然自守者，……其文质实简劲，如其为人。”宋末，区仕衡、陈大震、李春叟、赵必瑑、梁起、张镇孙等均有散文作品流传，但篇帙

① 欧阳修：《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

② 脱脱等撰《元史·崔与之传》。

无多。

元朝崇尚武功，统治时期较短，岭南文坛荒芜，作者寥若晨星。顺德梁陌谦撰《野泉集》，新会人罗蒙正撰《希吕集》，东莞人陈颖撰《山中日课》、黎伯原撰《渔唱集》皆失传^①。

明朝岭南经济、文化比前代发展，因而散文创作也比前代繁荣，见于载籍的作者达300家之多^②！初期以顺德孙蕡（1337—1393年）为最著，《明史·孙蕡传》称其“性警敏，书无所不窥，诗文援笔立就，词采烂然。”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进士，曾任翰林典籍，参预编修《洪武正韵》，累被贬抑，仕途坎坷，曾为大将军蓝玉题画，蓝玉居功自傲，为太祖所忌被杀，孙蕡也株连处死，因此著作多散佚，门徒新会黎贞辑其诗文为《西菴集》。黎贞字彦晦，号秣坡，曾被人诬陷，以致远戍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市）达18年之久，放回后在乡讲学，门徒甚多，世称秣坡先生，陈献章盛赞说：“吾邑以文行海后进，百余年来，秣坡先生一人而已。”其著作迟至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才由后人刊刻成集，复遭散佚，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再由其后人搜辑重刊，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本掇拾于残阙之余，其菁华已不概见矣。”

明朝中期，岭南散文名家辈出。邱濬撰写的记、序、表、奏，其门人蒋冕等辑为《琼台类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他“记诵淹洽，冠绝一时，故其文章尔雅，终胜于游谈无根者流，在有明一代，亦不得不置诸作者之列焉。”稍后的陈

① 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

② 张学华《广东文征旧序》。

献章，文风独具一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诗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议；偶然率意，或粗野不可向迹。至今毁誉亦参半。《王世贞集》中有《书白沙集后》，曰公甫（即陈献章）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出法与体与题之外者，可谓尽兼其短长。盖以高明绝异之姿，而又加以静悟之力，如宗门老衲，空诸障翳，心境虚明，随处圆通，辨才无碍，有时偶词鄙语，冲口而谈，有时妙义微言，应机而发，其见于文章，亦仍如其学问而已。虽未可谓之正宗，要未可谓非豪杰之士也。”这个评语很全面、中肯；因为理学家的文章有说教气味，欠缺文采。陈献章的门徒多达106人^①，散文风格各异。其中：顺德梁储，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会元，著作多不留底稿，散佚不少，其后人辑为《郁州遗稿》，主要是奏疏，“虽辞乏华腴，而义存规谏”^②。增城湛若水（1466—1560年），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很热心于讲学，所撰《甘泉集》，“语录居十之九，诗文其余赘耳”^③。语录多是说教的产物。

与邱濬、陈献章齐名的学者黄佐，字才伯，号泰泉，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少詹事，他对编写地方志有重大贡献，在散文上也有显著成就，撰《泰泉全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语为：“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文章衔华佩实，亦足以雄视一时。岭南自南园五子以后，风雅中坠，至佐始力为提倡，如梁有誉、黎民表等皆其弟子，广中文学复盛，论者谓佐有功焉。”黄佐的弟子不少，在文坛很活跃。《明史·黄佐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学语》。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存目》。

传》载：“佐弟子多以行业自饬，而梁有誉、欧大任、黎民表诗名最著云。”

同黄佐一样致力于地方志的郭秉，字笃周，南海人，师事湛若水，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曾任四川布政使、光禄寺卿，学识渊博，著作甚多，文笔简洁生动。

后人争议较大的散文作者为霍韬（1487—1540年），字渭先，号渭厓，南海人。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会元，曾任礼部尚书，作品由其后人辑为《渭厓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韬性强执谬戾，不顾是非，……其他文亦皆争辩迫急，异乎有德之言。前有伦以谅、金立敬序，誉之甚力，盖一其乡曲，一其年家子也。”这个评论值得考虑。《明史·霍韬传》认为：“韬学博才高，量褊隘，所至与人竞。帝颇心厌之，故不大用。先后多所建白，亦颇涉国家大计。”这明显指出霍韬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树敌不少。其作品很关心国计民生，不能说是“异乎有德之言”。《明史》所下结论是可信的。

出身寒微的南海伦文叙，字伯畴，号迂冈，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连中会元、状元，曾任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侍讲，撰《迂冈集》，“为文宗韩（愈）、扬（雄），悠长宛转，蔚有真趣”^①；长子伦以谅，字彦周，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解元，十五年（1520年）进士，曾任南京通政司参议，撰《石溪集》，“为文不求奇而理自足，句不求琢而格自工”^②；次子伦以训，字彦式，号白山，正德十二年（1517年）连中会元、榜眼，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撰《白山文集》，“为文词，

①②阮元：《广东通志·列传》。

意畅神适，非人所能及”^①；季子伦以诰，字彦群，号穗石，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曾任南京兵部武选司郎，撰《穗石文集》，“为文下笔数千言立就”^②。父子四元，“海内科名之盛，无出其右”^③。皇帝特赐“中原第一家”石牌坊，至今犹存。还令人感到奇异的是，在南海县，伦氏父子是黎涌村人，霍韬是石头村人，梁储是石碛村人，三村相邻，距离不过5华里左右，“五里四会元”^④，传为美谈。

不致力于撰写文章，却以文章知名于世的要属海瑞（1514—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琼山（在海南岛）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举人，曾任南京右都御史，撰《海瑞文集》。其《治安疏》一文，即后人所谓“海瑞骂皇帝”，作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至今犹盛传其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孤忠介节，实人所难能，故平日虽不以文名，而所作劲气直达，侃侃而谈，有凜然不可犯之概。当嘉（靖）、隆（庆）间士气颓茶之际，切墨引绳，振顽醒聩，诚亦救时之药石也。”对海瑞作品的社会影响给予极高评价。

明朝后期，国家多难，祖籍东莞的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主动请缨防守辽东，为图挽救危局，堪称鞠躬尽瘁，最后含冤被诬，竟遭寸磔而死。他能诗善文，戎马倥偬，多为奏疏之作，后人感其忠义，辑为《袁督师遗集》。其作品语皆朴实，感人深切，如《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情深义隆，足慰忠魂。南海邝露（1604—1650年），字湛若，曾游历广西岑、蓝、胡、侯、黎五姓土司辖区，归而追述见闻，撰《赤雅》一书，《四库全书

①② 阮元：《广东通志·列传》。

③④ 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

总目提要》称其“词藻简雅，序次典核，不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下，可称佳本”。

清朝初期，岭南散文名家首推番禺屈大均（1630—1696年），字翁山，早岁师事陈邦彦（1603—1647年），投身反清斗争，曾一度削发为僧，后还俗，尝游历荆、楚、吴、越、鲁、燕、晋、秦等地，所至与通人巨儒交往，名声大振，散文集有《翁山文外》，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借古讽今，指物喻志，作品富有民族意识，只因清初屡兴文字狱，其诗文好些被毁。稍后，曲江廖燕（1644—1705年），字人，绝意科举，布衣终老，撰《二十七松堂集》，颇多独到见解，能言人所不能言，其《明太祖论》：“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这由于：“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他把封建帝皇的愚民政策揭露得淋漓尽致。

清朝中期，经济较前发展，统治者对汉族的高压政策有所改变，岭南文坛一片繁荣，作者众多，比较著名的有顺德温汝能（1760—1814年），字希禹，号谦山，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举人，曾任中书科中书，撰《谦山文抄》。新宁（今台山）吴应逵，字鸿来，别字雁山，乾隆六十年（1795年）举人，撰《雁山文集》。嘉应州（今梅县）吴兰修，字石华，嘉庆十三年（1808年）举人，曾任信宜县教谕，撰《石华文集》。南海曾钊，字勉士，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曾任合浦教谕、钦州学正，曾筑“面城楼”，藏书数万卷，撰《面城楼文存》。番禺张维屏（1780—1859年），字子树，号南山，又号松心子，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曾任江西南康

知府，撰《松心文集》。顺德梁廷楠（1796—1861年），字章冉，道光十四年（1834年）副贡生，曾任澄海训导，撰《藤花亭文集》。番禺陈澧（1810—1882年），撰《东塾集》。南海朱次琦（1807—1882年），撰《九江集》。此外还有林明伦、邵咏、何梦瑶、劳孝舆、罗天尺、苏珥、邓淳等。上述诸人，其影响均未能超越岭南之外。

清朝后期，岭南出现了两位名闻全国的散文作者，即康有为（1858—1927年）和梁启超（1873—1929年）。康有为从事宣传变法维新运动，写了大量的政治论文，洋溢着丰富的爱国热情，内容充实，说理透彻，运笔纵横捭阖，构思汪洋恣肆，采用中外典故和排比句法，形成一种新的文风，言人所不敢言，使读者受到很大感染。其散文后人辑为《康南海文钞》。

梁启超曾师事康有为，其散文成就在康有为之上。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华，倡导“文界革命”，其作品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他评论自己的散文特点是：“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偶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为新文体。……其文条理明畅，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魅力焉。”^①这个评语确有自知之明。其作品全部辑为《饮冰室合集》。

二、气势雄直的诗篇

岭南的诗，作者之众，作品之多，在岭南散文之上。而且，诗人多数也擅长散文。揆其原委，屈大均《广东新语·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诗语》认为：“叶石洞（即叶春来）^①云：东广好辞，缙绅先生解组归，不问家人生产，惟赋诗修岁时之会，粤人故多高致乃尔。”这是指富有资财的退休官僚而言，岁时集会，组织诗社，可以促进诗作活动。但也应该看到，岭南盛行民歌，为诗作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再者，岭南诗作的旺盛期，多在宋末、明末和清末，国家多难，社会动荡，诗人目睹时艰，慷慨悲歌，见诸吟咏，遂成佳什，故岭南诗作很少萎靡颓废之音。清朝王士禛《池北偶谈》明确指出：“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处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洪亮吉的《论诗绝句》认为：“药亭^②、独漉^③许相参，吟苦时同佛一龕。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所以早在明朝时候，胡应麟《诗薮》对于独特的岭南诗风，称之为“岭南诗派”。到了清朝，诗坛盟主朱彝尊、王士禛也持同样的看法。

由于战乱、气候潮热使书籍难以保藏和手抄本不便流传等多种原因，岭南诗作大量散失。对此，前人热心进行辑佚、整理的工作。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年），顺德梁善长编选《广东诗粹》，番禺凌扬藻编选《岭海诗抄》；嘉庆年间（1796—1820年），番禺刘彬华编选《岭南群雅》，顺德温汝能编选《粤东诗海》，南海伍崇曜在谭莹协助下辑刻《楚庭耆旧遗诗》，道光年间（1821—1850年），番禺黄子高辑录《粤诗搜逸》；清末民初，顺德何藻翔编选《岭南诗存》。经过这些辑佚工作，使后人能对岭南诗作有较多的了解。

岭南的诗人，始于西汉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时

① 叶春来，字化甫，归善（今惠阳）人，撰《石洞集》，《明史》有传。

② 即梁佩兰

③ 即陈恭尹

的番禺张买。据明朝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载：张买“侍游苑池，鼓棹能为越讴，时切规讽”。可惜其诗作失传。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认为：东汉和帝（89—105年）时，南海杨孚撰《南裔异物志》，书中的“赞”为四言韵语，“亦诗之流也。然则广东之诗，其始于孚乎。”这是岭南现存最早的诗作。

南朝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5年），番禺冯融任罗州（州治在今广东化县）刺史。当时罗州位处边陲，少数民族较多，尚未十分开化，据史籍记载，冯融“能以礼义威信镇于俗，汲引文华士，相与为诗歌，蛮中化之。”^①他任用一批文士，利用诗歌进行政治教育，收到很好的效果。其后，曲江侯安都“为五言诗，亦颇清靡”^②，惜已失传。在陈文帝时任司空，多次与著名诗人褚玠、马枢、阴铿、张正见、徐伯阳、刘删等交往，“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③。南海刘删被称为“岭南英奇”，陈宣帝太建初年（569年）任临海王长史^④，诗文多散佚，唐朝欧阳询等辑《艺文类聚》，收录其诗9首^⑤。

唐朝是中国诗作的鼎盛时期，而张九龄则是唐朝岭南最杰出的诗人。初唐诗作，尚有六朝遗风，格调绮丽颓靡，武后时，陈子昂挺身而出，以汉魏风骨，力矫齐梁陋习。接着张九龄也致力于开创唐代诗作新局面，其诗风和雅清淡，所以明朝胡震亨《唐音癸签》说：“张子寿（即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即张九龄）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清朝施补华

①④ 阮元《广东通志·列传》。

②③ 姚思廉：《陈书·侯安都传》。

⑤ 陈永正：《岭南历代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峴佣说诗》也认为：“唐初五古，犹沿六朝绮靡之习，唯陈子昂、张九龄接汉魏，骨峻神竦，思深力遒”。可见张九龄的诗作在唐朝有其深远影响，并对其后岭南诗派的形成、发展起了启迪作用。

晚唐的岭南诗人，以邵谒、陈陶较著名。邵谒为翁源人，懿宗咸通七年（866年）入国子监，《全唐诗》收录其诗1卷、32首，称其“工古调”。陈陶不详其乡里，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游学长安，后隐居于洪州（今江西南昌市）西山，《全唐诗》录其诗2卷，172首。他们生当乱世，诗作均能反映民间疾苦。五代的岭南诗人要推黄损、孟宾于，均为连州（今连县）人。黄损撰《桂香集》，已佚，现存诗4首。孟宾于是后晋高祖天福九年（944年）进士，曾任南唐水部郎中，撰《金鳌集》，已佚，现存诗8首^①。宋朝陈尧佐《金鳌集序》认为孟宾于的诗：“如百丈悬流，轰轰洒落苍翠间，清雄奔放，望之竖人毛骨，自五季诗人以来，未有过宾于者也。”

唐朝和五代的岭南诗作，大多失传，清朝黄子高辑《粤诗搜逸》，除张九龄、邵谒、陈陶外，所得唐朝五代岭南诗人仅20位、完整的诗篇33首^②。《全唐诗》所录唐朝五代诗人达2200多位、诗篇48900多首，对比之下，岭南诗作散佚较多。岭南宋诗也有类似情况，近人何藻翔《岭南诗存》指出：“广东宋诗存者尤鲜，崖门兵燹，版籍荡然，元、明均尚唐音，无人收拾。”

北宋岭南诗人，以余靖的成就最大，风格清劲质朴，因受张九龄影响，故后世岭南诗坛，奉张九龄、余靖为宗。只因北宋初期，盛行“西昆体”，人们模拟唐朝李商隐的作品，

^{①②}陈永正：《岭南历代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追求词藻，堆砌典故，内容贫乏，使诗作走入歧途。到了北宋中期，欧阳修倡导诗风改革，余靖是响应者之一，所以清朝温汝能《粤东诗海》称赞余靖之诗，“骨格清苍，吾粤宋诗无出其右。”

南宋岭南诗人，以崔与之、李昉英较知名。崔与之处于南宋后期，目睹时局艰危，忧国爱民，勤于政事，其诗多抒发抱负之作，情深意挚，苍劲激昂。清朝梁善长《广东诗粹》认为：“七言古体，宋崔与之高华壮亮，犹有唐人遗音。”李昉英早年深受崔与之器重，不畏强暴，敢于犯颜直谏，诗如其人，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语为：“诗间有粗俗之语，不离宋格，而骨力遒健，亦非靡靡之音。盖言者心声，其刚直之气，有自然不掩者矣。”

南宋末年，元军入侵，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转战岭南，因而岭南涌现不少爱国诗人，或投军从戎，毁家纾难；或奔走呼号，志图匡复。其中较著名的有东莞袁玘、赵必瑑、李春叟、何文季、陈纪和香山（今中山市）马南宝等。宋端宗于景炎二年（1277年）航海避敌，途经香山，马南宝献米一千石饷军，并以自己住宅作为端宗行宫，其后与元军作战，被俘不屈，壮烈牺牲^①。赵必瑑作为宋朝宗室，文天祥在惠州，他曾任摄惠州军事判官，后见情况欠佳，即辞官回家^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必瑑治邑有惠政，属宗邦沦丧，慷慨从军，其志可取。沧桑以后，肥遁终身，其节亦不可及。诗文篇帙无多，在宋末诸家中，未为颖脱，然体格清劲，不屑为靡靡之音。”“肥遁”一词带有讽刺意味。

① 黄淳等撰：《厓山志·马南宝》。

② 黄淳等撰：《厓山志·赵必瑑》。

元朝岭南诗坛荒芜，作者零落，作品散佚。顺帝时，新会人罗蒙正曾任高州文学，清朝温汝能《粤东诗海》评论其诗：“圭臬盛唐，元气浑然，调高字响”，对明初岭南诗风有很好的影响。

明朝初年，南海孙蕡（1338—1394年）、王佐（？—1375年）和番禺赵介（1343—1389年）、李德、黄哲（？—1375年）在广州南园抗风轩（今文德路广东中山图书馆南馆）组织“南园诗社”，为岭南最早的诗社，世称“南园五先生”或“南园五子”，孙蕡曾任翰林典籍，其诗清园雄浑，被胡应麟誉为岭南诗派之始^①；王佐曾任给事中，其诗雄俊丰丽；赵介是平民，其诗刻厉奇崛；李德曾任广西义宁教谕，其诗静穆淡远；黄哲曾任东平府（在山东）通判，其诗清劲雄直。他们与以高启为首的“吴四杰”、林鸿为首的“闽十才子”，同创明朝一代风雅之宗。由于明初大搞文字狱，孙蕡、赵介、黄哲因事株连，死于非命；王佐、李德及早辞官归家，幸免于难，但他们的诗作大多失传。嘉清四十四年（1565年），闽人陈暹辑刊《南园五先生诗》。

明朝中期，岭南诗人接踵而至。世称明代广东三大学者琼州邱濬、新会陈献章、香山黄佐均为著名诗人。邱濬身居显职，学问渊博，其诗法度严谨，典雅清丽^②。陈献章虽是理学家，其诗颇受人推崇。温汝能《粤东诗海》认为：“理学名儒，多不以诗见长，而本性原情自然超妙，朱晦翁（即朱熹）后推吾粤白沙（即陈献章）一人。论者谓白沙蜚英腾茂，黎秫坡（即黎贞）有以倡之。顾秫坡质实近俚，白沙美秀而

① 胡应麟：《诗藪·续编》。

② 陈永正：《岭南历代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文，不可同日语也。”黄佐对广东文献研究卓有成就，其诗雄直奇丽，意蕴深厚。温汝能《粤东诗海》认为：“其诗体貌雄阔，思意深醇，旗鼓抒发，群英竞从。”朱彝尊也认为：“岭南诗派，文裕（即黄佐）实为领袖，功不可泯也。”^①“南园后五先生”多是其门徒。

顺德欧大任（1516—1595年）、梁有誉（约1521—1556年）和从化黎民表（1515—1581年）、南海吴旦、番禺李时行，继“南园五先生”之后，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在广州南园抗风轩成立诗社，世称“南园后五先生”或“南国后五子”。欧大任曾任工部虞衡郎中，撰《欧虞部诗文全集》，其诗温厚雅驯。梁有誉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撰《比部集》，其诗意趣沉实。黎民表为嘉靖十三年（1534年）举人，曾任河南布政使参议，撰《瑶石山人稿》，其诗平和典雅。吴旦为嘉靖十六年（1537年）举人，曾任山西巡察司佥事，撰《兰皋集》，其诗清新俊逸。李时行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曾任南京兵部主事，撰《驾部集》，其诗夷旷冲淡。他们受当时李攀龙、王世贞提倡文学复古运动影响，不免有拟古之迹，但尚能重视反映社会现实。其中梁有誉驰名岭北，与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等被称为“后七子”（孝宗弘治时〔1488—1505年〕，出现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前后七子提倡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影响明朝诗坛约近百年之久。

在这期间，岭南还出现一些诗社，如越山诗社由番禺王渐逵（1498—1558）、南海伦以训创立；王渐逵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撰《青萝集》，其《铁桥》一

^① 陈永正：《岭南历代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诗，朱彝尊认为可追踪唐朝许碯阆苑花前之作^①。浮丘诗社由南海郭棐、王学曾创立；王学曾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曾任光禄丞，撰《入楚吟疏草》等。

明朝后期，岭南出现了一批爱国诗人。其中“南园旧社”，由南海陈子壮（1596—1647年）、陈子升（1614—1692年），番禺黎遂球（1602—1646年），顺德欧主遇、欧必元、黄圣年，高明区怀瑞、区怀年，从化黎邦城以及籍贯未详的黄季垣、徐棻、僧通岸等12人创立，世称“南园十二子”。陈子壮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曾任礼部右侍郎；桂王在肇庆即位，任东阁大学士、总督四省军务，清兵占领广州，他进行反攻，兵败被俘，壮烈牺牲，诗作多散佚，后人辑为《陈文忠公遗集》，伍崇曜的“跋”语为：“先生诗，轮囷兀冪，古色苍然，望而知为端人杰士。”陈子升为子壮弟，桂王任为兵科右给事中，后隐居乡间，撰《中洲草堂遗集》，其诗多悲慨之音。黎遂球为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举人，南明唐王隆武二年（1646年）任兵部职方主事，在江西赣州与清兵巷战牺牲，撰《莲漪阁集》，其诗格调高华骏杰。欧主遇为天启七年（1627年）副贡，明亡隐居，撰《自耕轩诗集》。其余诸人于明亡后多隐迹不仕。

被誉为明末“广东三忠”的陈邦彦（1603—1647年）、张家玉（1615—1647年）、陈子壮均能诗。陈邦彦起兵抗清，兵败被俘，凌迟处死，撰《雪声堂诗文集》，温汝能《粤东诗海》评语是：“吾粤诗笔老健，无逾陈岩野（即陈邦彦）。先生身著大节，诗亦力企大家。感时之作，气啮长虹，骨凌秋隼，直摩少陵之垒而拔其帜。”张家玉为崇祯十六年（1643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传目三》。

年)进士,南明唐王在福州即位,曾任翰林侍讲。永历元年(1647年)与陈邦彦、陈子壮等起兵抗清,战败投水自尽。后人辑其作品为《张家玉集》,诗以《军中遗稿》最著,罗应垣《军中遗稿序》认为:“率皆贯虹喷碧之语,读之令人惜其遇,悯其志,而复壮其气魄,如对岷山之碑,不觉堕泪。岂非忠义之言,鏖在人心,自难磨灭者欤?”

明末清初,鼎革之际,岭南有一批诗人投军从戎,勇赴国难,壮烈牺牲。但也有些诗人在短期反清之后,不仅同入仕清朝的诗人关系密切,有的还接受清朝地方大员的馈赠,得以过着较好的物质生活。他们虽然仇视清朝,但歌颂清朝地方大员,并认为自己保持了民族气节,真是十分矛盾。至于入仕清朝的诗人,后人也给以谅解,不予苛责。

清朝初期,番禺屈大均、顺德陈恭尹、南海梁佩兰(1629—1705年)被称为“岭南三大家”。从此正式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岭南诗派。闽人林枫《论诗仿元遗山体》:“岭南诗派屈梁陈,一代风骚鼎足身。”岭南诗作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屈大均的作品有《翁山诗外》、《道援堂集》、《翁山诗略》。其诗慷慨雄奇,寄托深远,能反映人民疾苦与民族灾难,其创作理论为:“余尝以《易》为诗,颠倒日月,鼓舞风雷,奔五岳而走四溟,使天下万物皆听命于吾笔端,神化其情,鬼变其状,神出于无声,鬼入于无臭,以与造化者游于不测。”^①陈恭尹为陈邦彦之子,曾奔走江南及湘、鄂、豫等地,联系抗清力量,撰《独漉堂集》。其诗“既豪迈雄奇,而又蕴藉含蓄”^②,富有民族意识。为此,屈、陈的著作遭到清廷禁毁,但

① 屈大均:《六莹堂诗集序》。

② 刘斯奋、周锡馥:《岭南三家诗选》。

仍有部分流传至今。梁佩兰号药亭，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撰《六莹堂集》，其诗多酬赠和吟咏景物之作。陈恭尹、梁佩兰与南海程可则及番禺王邦畿、方殿元、方还、方朝（1675—1734年）合称“岭南七子”。程可则（1624—1673年），字湟溱，顺治九年（1652年）会元，曾任桂林知府，撰《海日堂集》，其诗后人誉毁不一，沈德潜《清诗别裁》誉为：“俊伟腾焯，声光熊熊”。檀萃《楚庭稗珠录》毁为：“诗格调甚卑，出语多率易，近体尤甚”。王邦畿字说作，明亡不仕，撰《耳鸣集》。其诗感伤时事，寄托遥深。方殿元字九谷，康熙三年（1664年）进士，曾任江宁知县，撰《九谷集》，沈德潜《清诗别裁》认为：“九谷著《环书》，自成一子，欲究天人窍奥，余事乃作诗人也。然高华伉爽，依傍一空，品不在岭南三家下。”其长子方还撰《灵洲集》、次子方朝撰《勺湖集》，因侨寓苏州，故被称为“吴下二方”，皆有诗名。

乾隆时，反映民族矛盾的诗作逐渐减少。顺德黎简（1747—1799年），字简民，无意仕进，授徒为生，撰《五百四峰堂诗钞》，王昶《湖海诗传》认为：“其诗峻拔清峭，刻意新颖，言人所不能言”。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岭南诗人辈出，番禺张维屏、香山黄培芳（1779—1859年）、阳春谭敬昭（1774—1830年）被称为“粤东三子”。张维屏辞官回乡后任学海堂学长，成为广东诗坛领袖，撰《松心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写了一批歌颂广东人民反帝斗争的诗篇，刘彬华《玉壶山房诗话》的评语是：“南山诗出入汉、魏、唐、宋诸大家，取材富而酝酿深，气体则伉爽高华，意致则沉郁顿挫。”黄培芳字香石，曾任乳源、陵水教谕，撰《岭海楼诗文钞》。黄乔松《香石诗钞题辞》称赞其诗“如秋菘春韭，

味出自然，要皆和平中正之音，而以清真为主。”谭敬昭字康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撰《听云楼诗草》，黄乔松《康侯诗钞题辞》称其诗“如风水相遭，自然成文”。

其后，南海谭莹、朱次琦，番禺陈澧、梁鼎芬（1859—1920年），顺德简朝亮（1851—1933年）等，目睹帝国主义入侵，痛恨内政黑暗腐败，发为诗歌，颇多感慨苍凉之作，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危机与人民苦难。

清朝后期，康有为、梁启超发起戊戌变法运动，也是“诗界革命”的主要人物。“诗界革命”首先由梁启超提出，继由嘉应州（今梅县）黄遵宪（1848—1905年）打开“诗界革命”新局面。黄是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曾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美国三藩市总领事、驻英国使馆二等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共十多年，由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因而接受西方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变法维新，撰《人境庐诗草》，其诗汪洋恣肆，颇具特色，富有爱国主义色彩。在创作上，其《杂感》一诗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主张用通俗语言写诗；要求将“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为维新派的政治服务。至于“诗界革命”的内容，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认为：“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他们躬行实践，康有为之诗，气势磅礴，意境宏阔。梁启超之诗，感情奔放，直抒胸臆，力图打破传统的束缚。

三、属辞雅健的词作

岭南的词，作者与作品均少于诗。据古籍记载，岭南词人最早是五代南汉国连州黄损^①，现存词作仅《望江南》一首。其后的作者，不见记载。直到南宋光宗时（1190—1194年），才有崔与之以词名世，因被称为“粤词之祖”，其词豪放雄浑，开创了以“雅健”为宗的岭南词风。

崔与之生当南宋后期，外有强敌，内多骚乱，作为守土大员，忧国忧民，见诸吟咏。近人唐圭璋编《全宋词》存其词两首，一为《水调歌头·题剑阁》，是任成都知府、本路安抚使时所填，此词感情深挚，表现了守边御敌的决心。另一为《贺新郎·寿转运使赵公汝燧》，乃酬酢之作。稍后有李昉英，撰《文溪词》一卷，现存30首，其词风格峻健，言近旨远。南海刘镇，字叔安，号随如，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进士，世称“随如先生”，有《随如集》，已佚，现存词26首，明朝杨慎《词品》誉之为“南渡填词巨工”。南宋末年，赵必瑛、陈纪均善于填词，颇多故国之思。

元朝岭南的词作失传，明朝岭南的词作也不多。论者谓明朝以经术取士，导致词学衰落，诗亦如是。其实这与明初大兴文字狱，无辜屠杀诗人有关。直至明朝中期，我们才看到岭南的词作。邱濬之词，韵致颇佳，其《酹江月·和东坡韵题〈赤壁图〉》，别出心裁，着力刻画苏东坡的豪放情怀，给人以不袭前贤的感觉。陈献章撰《白沙词》，格调清新，其《渔歌子·钓鱼效张志体》，描写岭南水乡的渔民生活，情景

^① 朱庸斋选、陈永正注：《岭南历代词选》。

鲜明，近人张德瀛《词征》评语为：“结响骚雅，使刘后村见之，当不敢嗤为押韵语录。”东莞祁顺（约1434—1498年），字致和，号巽川，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进士，曾任江西左布政使，撰《巽川集》，其词朴素无华，情真意切。霍韬、霍与瑕父子皆能词，霍韬之词，刚健豪迈，其《水调歌头·古边情》，慷慨激昂，充满爱国热情。霍与瑕字勉斋，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曾任广西佥事，撰《勉斋集》，其《菩萨蛮·癸亥李太华死事》，苍凉悲慨，感人至深。番禺韩上桂（1572—1644年），字孟郁，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举人，曾督饷辽东，抗御清兵，因功被提升为建宁（在福建）同知，撰《朵云山房稿》，目睹时艰，词多感伤。明末陈子升等人，饱经世乱，词多悲慨。

清朝词学振兴，超越元、明两朝。据叶恭绰《全清词钞》不完全统计，岭南词人有140余家之多。当时词坛有浙西词派、阳羨词派、常州词派等，岭南较少受其影响。清初岭南词家首推屈大均，撰《骚屑词》，又名《道援堂词》，现存373首。他生当明、清递嬗之际，社会动荡，身世屯蹇，故其词慷慨悲怆。近人张德瀛《词征》的评论：“屈翁山词，有《九歌》、《九辩》遗旨，故以《骚屑》名篇，观其《潼关感旧》、《榆林镇吊诸忠烈》诸阕，激昂慷慨，如蒯通读《乐毅传》而涕泣，其遇亦可悲矣。”陈恭尹词作甚少，多属咏物寄意、思念救国之篇。梁佩兰撰《六莹堂诗馀》，其词绵邈幽峭，风格迥上^①。他既眷恋明朝，又出仕清朝，因此其作品充满感情上的矛盾。番禺释今无（1633—1681年），撰《光宣台词》；梁无技撰《南樵集》；鹤山易弘撰《坡亭词抄》；他们的词作

^① 朱庸斋选、陈永正注：《岭南历代词选》。

均充满浓厚的民族意识。

清朝中期，顺德张锦芳（1747—1792年），字药房，号花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撰《逃虚阁诗馀》又名《南雪轩诗馀》，其词善写景物，抒发乡情。顺德黎简撰《药烟阁词抄》，其词平淡自然。顺德黄丹书（1757—1808），字廷授，乾隆六十年（1775年）举人，曾任开平县训导，后主讲越秀书院，撰《胡桃斋诗馀》，其词豪迈峻爽。番禺吕坚（1742—1813年），字介卿，乡居贫士，撰《迟删集》。上述诸人合称“岭南四家”，本是诗人，但其词均有特色。以诗人而兼词家，其间最著者为陈澧，撰《忆江南馆词》，谭献《篋中词续》对其评语是：“填词朗诣，洋洋乎会于风雅，乃使绮靡、奋厉两宗，废然知反。”可见备加推崇。与陈澧同时的，吴兰修撰《桐花阁词钞》，清朝陆以湑《冷庐杂识》认为：“《桐花阁词》清空婉约，情味俱胜，可称岭南词家巨擘。”嘉庆、道光年间，岭南词人首推张维屏，撰《听松庐词钞》，清朝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认为其词“秀隽不凡”。谭莹以《岭南荔枝词百首》为两广总督阮元所赏识，撰《辛夷花馆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陈澧等人写了大量反帝爱国的诗词。咸丰、同治年间，番禺沈世良（？—1880年）、汪琮（1828—1891年）、叶衍兰（1823—1897年）被称为“粤东三家”。沈世良字伯眉，撰《楞华室词钞》，其词婉丽凄清。汪琮字玉泉，撰《随山馆词》，其词典雅深稳。叶衍兰字兰台，咸丰六年（1856年）进士，曾任户部郎中，撰《秋梦庵词钞》，其中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的词作，读之令人悲愤沉痛。

清朝后期，番禺梁鼎芬，字星海，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曾任湖北按察使，撰《款红楼词》，擅长小令，钱仲联

《近百年词坛点将录》评为：“吐语幽窈，芳兰竞体。”其《菩萨蛮·和南雪丈甲午感事》10首，是关于甲午中日战争的纪事之作，传诵一时。南海潘博（1874—1916年），字若海，号弱庵，曾积极参加维新变法，撰《弱庵词》，其词悲凉慷慨。顺德麦孟华（1875—1915年），字孺博，号蛻庵，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人，康有为弟子、女婿，积极参加维新变法，撰《蛻庵词》，其词婉约深秀，与潘博齐名。新会梁启超也有一批词作，辑入《饮冰室全集》，其词慷慨激昂，风格豪迈。作于甲午中日战争时的《水调歌头》，充满高度的爱国激情，尤脍炙人口。

四、后起之秀的小说

岭南很迟才有人创作小说。宋朝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书类》载：“刘轲《牛羊日历》一卷。”下注：“牛僧儒、杨虞卿事，檀欒子、皇甫松序。”前人认为是“传奇”之作，但是明朝胡应麟《四部正讹》认为：“《牛羊日历》，诸家悉以为刘轲撰。其书记牛僧儒、杨虞卿等事，故此命名。按轲本浮屠，中岁慕孟轲为人，遂长发，以文鸣一时，即纪载时事，命名诘应乃尔，必赞皇之党，且恶轲者为之也。案《通鉴·注》引作皇甫松，松有恨僧儒见传，或当近之。”此说甚为有理。而且，《牛羊日历》失传，早期作品已不可考。根据现存资料，岭南在清朝有人创作小说。岭南小说的特点，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倾向，反映国家民族的灾难，揭露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因而在短期内便风行海内外。

嘉应州人黄岩（约1751—约1830年），字耐庵，号花溪居士，曾在广州行医，撰《医学精要》、《眼科纂要》等，兼

工诗文，有《花溪草堂诗文稿》，未刊刻，后多散佚。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撰《岭南逸史》，共28回。其内容为：明朝万历年间，潮州府程乡县（今梅州市）少年才子黄逢玉同两位仆人外出探望姑母，途中与罗浮山隐士张秋谷之女贵儿订婚，又与从化县嘉桂岭瑶王李小鬣、德庆州天马山瑶王梅英之姐梅映雪分别结婚，引起两位瑶王之间的抢婚战斗。其后张贵儿被火带山土匪所掳，黄逢玉向广东巡抚缩朒申诉，巡抚竟诬黄是天马山奸细，关入南海县狱，为此两位瑶王出兵攻打巡抚。黄出狱后，劝服两位瑶王归顺朝廷，并率领瑶兵在张贵儿及其女友谢金莲协助下，消灭火带山等地土匪，被封为东安侯，娶张贵儿为妻，小鬣、映雪、金莲为妾，六子登科，最后黄与四位夫人白日升仙。全书思想庸俗，格调低下，但是痛斥明朝官吏贪污腐化，社会风气败坏，有借古讽今之意；描写瑶民攻打巡抚，也反映了历史上岭南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具有地方特色。

署名为“庾岭劳人”，真实姓名不详，撰《蜃楼志》，又名《蜃楼志传奇》，24回，现存最早刻本刊于嘉庆九年（1804年），内容为：明朝嘉靖年间，广州十三行商总苏万魁及其子苏吉士、粤海关监督赫广大、匪首摩刺、苏吉士业师李匠山、义士姚广武等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表现和富商、贪官、土匪、义士之间的矛盾斗争，是第一部反映早期洋商和海关官员的作品。粤海关在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才设置，明朝嘉靖年间只有广东市舶提举司，且两者之间的性质、工作方式也略有不同，这显然是借古讽今之作。再者，故事情节明显具有岭南色彩，反映了作者的封建知识分子立场。

南海吴沃尧（1866—1910年），字小允，号趸人，因家居佛山，故又称“我佛山人”。曾祖吴荣光（1773—1843年）是

嘉庆进士，曾任湖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为著名书法家；祖父吴尚志，曾任工部员外郎；父吴升福，在浙江宁波巡检任上病故，家道中落，这时吴沃尧只好前往上海谋生，曾任江南制造局抄写员，并经常为报纸撰写小品文。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前往日本，为上海广智书局同横滨《新小说》社联系出版发行事宜。次年任汉口美国创办的《楚报》主笔，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兴起，即毅然辞职返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一月，与周桂笙等创办并主编上海《月月小说》杂志，次年又主持广志小学，宣统二年（1910年）病故。其重要作品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20回，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发表于《新小说》杂志，至宣统元年（1909年）完稿。小说以改良派人物“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体，贯串了近两百个小故事和众多的人物，反映了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后这20多年间，作者亲闻亲见的中国官场、商场、洋场及社会各个角落的种种怪现象。其重点则在官场，因为官场黑暗腐败造成祸国殃民，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所以此书出版后立即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九命奇冤》，36回，光绪二十九年发表于《新小说》。是根据嘉庆年间安和（真名钟铁桥）所著《警富新书》改编而成，它演述雍正年间在广州郊区石井发生的一件著名公案，事因梁、凌两家本是亲戚，因“风水”问题发生纠纷，凌贵兴恃财欺人，竟雇人纵火烧死梁家8口，梁天来向各级官府告状，凌贵兴便向各级官府行贿，梁家不仅败诉，而且仗义作证的乞丐张凤也被官府打死，造成九命奇冤。最后梁家上京告御状，雍正皇帝派钦差大臣前来查访，终于昭雪冤案。此案在历史上确有其事，至今石井潭村乡民尚能忆述：乾隆五

十九年（1794年），欧苏撰《鬻楼逸志》记载此案，但是官府打死张凤和告御状，则是小说家所渲染。吴沃尧《九命奇冤》较安和《警富新书》高明之处：在思想上，《九命奇冤》着重揭发贪官污吏的罪恶；而《警富新书》则劝人安分守己。在技巧上，《九命奇冤》吸取外国文学表现形式，在小说开端采用倒叙手法，描写凌家杀人放火，然后才追述事件的前因后果，曲折多变；《警富新书》则结构混乱，主题陈腐。因此《九命奇冤》出版后，曾风行一时。

此外，吴沃尧还著有《痛史》（未完）、《恨海》、《两晋演义》（未完）、《电术奇谈》、《瞎骗奇闻》、《上海游骖录》、《劫馀灰》、《新石头记》、《糊涂世界》、《发财秘诀》、《云南野乘》（未完）、《最近社会齷齪史》（未完）、《情变》（未完）、《剖心记》（未完）、《活地狱》（补李宝嘉未完成的三回）等长篇小说，《黑籍冤魂》等12篇短篇小说，《中国侦探案》、《我佛山人札记小说》等数种笔记，《新笑史》、《新笑林广记》、《俏皮话》、《滑稽谈》等笑话、寓言，戏曲《曾芳四传奇》、《邬烈士殉路》以及序跋、传记、评点等，他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1910年），在短短七年的业余时间内创作出上述大量作品，成就斐然可观，其作品内容多为揭露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控诉帝国主义暴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但在政治上倾向维新派，有其局限性。

黄小配（1872—1912年），名世仲，笔名禺山世次郎、黄帝嫡裔，番禺县崇文乡（今广州市芳村区）人。早年就读于佛山书院，后因家贫来广州谋生，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转赴马来亚、新加坡，在保皇会人士邱菽园主办的《天南新报》任记者、编辑，后因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参加兴中会员尤列领导的中和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回香

港，在陈少白创办的《中国日报》任记者，次年与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鼓吹民主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参加同盟会，与郑贯公创办《有所谓报》，又名《唯一趣报》。宣统三年（1911年）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民国元年（1912年），在广州任枢密部参议，后任省民团总局局长，同年5月被陈炯明杀害。其重要著作有：

《洪秀全演义》54回，未完稿，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905—1907年）在香港《有所谓报》、《少年报》连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中国日报》社出版单行本。全书着重歌颂太平军的英勇反清斗争，内容并不符合历史真实，但是文句简洁，故事生动，在当时起到了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作用。

《宦海升沉录》，又名《袁世凯》，22回，宣统元年（1909年）在香港《实报》社出版单行本，内容以袁世凯为中心人物，通过描述甲午中日战争、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直至光绪、慈禧去世这十多年间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从而揭露清朝的腐败黑暗。在写作上，把西欧小说的技法与中国小说传统技法互相融合，人物描写也颇有特色。

此外，黄小配还著有《大马扁》，内容是批判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指斥康有为是“骗子”；《五日风声》，内容是介绍广州“三·二九起义”；以及《陈开起义》、《廿载繁华梦》、《宦海潮》、《岑春煊》等小说和政论、粤剧剧本等。

梁启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在日本东京创办《新小说》月刊，次年移至上海出版。内容以小说为主，兼载诗词戏曲，作品内容大都与时局及社会问题有关，思想上倾向改良主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停刊，共出24期。他鼓吹“小说界革命”，其《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提出：“欲

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高度强调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曾撰政论体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发表于光绪二十八至二十九年（1902—1903年）的《新小说》月刊，仅5回，未完稿，内容是强调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枯燥无味，艺术性不强。此外有翻译小说《世界末日记》、《十五小豪杰》，创作剧本《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成就不算显著。

苏曼殊（1884—1918年），名戡，字子谷，学名玄瑛，后为僧，法号曼殊，香山县沥溪乡（今属珠海市）人，光绪十年（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其父苏杰生为旅日华侨茶商，生母若子为日本人，原是苏家婢女，生曼殊后离开苏家，不知去向。曼殊自幼由庶母日人河合仙抚养，6岁随嫡母黄氏回香山，次年入私塾，13岁随姑母赴上海学英文，15岁随表兄林紫垣至日本横滨，入华侨创办的大同学校，三年后考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次年转入成城学校习陆军，这时结识冯自由、陈独秀等革命派人士，参加旅日学生革命组织，遭到表兄林紫垣反对，断绝接济，因此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回国，曾任苏州吴中公学教师、上海《国民日报》翻译，报社被清廷查封，同年10月至香港，后转往新会慧龙寺为僧，不久离寺出游，来往于中国、日本、暹罗（即泰国）、印度、锡兰（即斯里兰卡）、香港、新加坡、爪哇等地，过着亦僧亦俗的生活，他能诗善文，兼长绘画，通晓英、法、日、梵语，参加南社，向往民主革命，因情绪悲观，生活颓废，暴饮暴食，民国七年（1918年）在上海病故，享年34岁。除用浅近文言翻译英国拜伦、法国雨果等人作品外，主要著作有：

《断鸿零雁记》，中篇小说。民国元年（1912年）刊于《太平洋报》，内容描述主人公三郎与雪梅的婚约，因三郎家

道中落，雪梅继母毁约，强迫雪梅嫁与富户，三郎愤而出家为僧。其后三郎赴日本寻访生母，得遇姨表妹静子，两人相爱，但三郎认为自己是僧人，不宜结婚，于是潜逃回国。其后得知雪梅不愿做富户媳妇而绝食自杀，因此下定决心终身不娶。故事情节带有自传成分，其中亦流露浓厚的民族意识。类似言情小说，尚有短篇《天涯红泪记》（未完）、《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内容均属爱情悲剧，用浅白的文言文写成。其《惨世界》一书，共14回，名为翻译，只是大部分取材于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并非全部照原文翻译，也不能说是创作，内容为攻击清政府，鼓吹武装革命和实行暗杀，成书于光绪二十九年，遭到清朝官员查禁。

此外，清末以来，岭南报刊发表很多小说创作，良莠不齐，难以罗述。

五、异彩缤纷的说唱文学

屈大均《广东新语》载：“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节长声，自回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因此，岭南的说唱文学很早就兴旺繁荣，它流传于广东、广西的岭南方言地区和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美洲的粤籍华侨聚居地。

粤曲 用广州方言演唱，它来自粤剧。约于清朝道光初年，因粤剧不能满足广大农村群众的需要，乃出现以粤曲清唱为特点的“八音班”，人数不多，常到农村演出。同治、光绪年间，“八音班”有所发展。这时还出现失明女艺人（俗称

盲妹)的自弹自唱,她们穿街过巷,或在茶楼旅馆卖艺,以后又有专业伶人的登台演唱。粤曲讲究唱工,唱多白少,没有化装,不带表演,容易在群众中普及。除用管弦乐器伴奏外,也有兼用锣、鼓等打击乐器伴奏,唱腔、曲调与粤剧基本相同。主要曲目有:《百里奚会妻》、《辨才释妖》、《黛玉葬花》、《六郎罪子》、《弃楚归汉》、《鲁智深出家》、《附荐何文秀》、《雪中贤》等八大名曲。

粤讴 用广州方言演唱。其起源传说不一,明朝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谓:张买在西汉孝惠帝时“能为越讴”,这“越讴”是否后来的“粤讴”,令人置疑。清朝张廷玉等撰《明史·孙蕡传》载:明初孙蕡在京师(今南京),“讴吟为粤声,主者以奏,召见,命诵所歌诗,语皆忠爱”。看来是用粤语吟诗,并非歌唱“粤讴”,因孙蕡《西庵集》中没有“粤讴”。比较可靠的说法,是清朝嘉庆年间冯询、招子庸在“木鱼”、“南音”等说唱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这在唱词句格、音乐旋律上都有明显痕迹。冯询为番禺人,其“粤讴”作品已失传。招子庸(1789—1846年)为南海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举人,曾任山东潍县等地知县,颇有政绩,能文善画,于道光八年(1828年)出版《粤讴》,内容多为诉说男女爱情之作,共121首。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和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均予以很高评价,曾任香港总督的金文泰(C. Clementi)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把招子庸《粤讴》译成英文传至欧洲,认为它与希伯来民歌有同样价值。葡萄牙人庇山曾把它译成葡萄牙文^①。此后作者群起,题材也较前广泛,用于宣传反帝爱国,鼓吹民主革命,当时报刊经常刊载

^① 招子庸撰、陈寂评注:《粤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粤讴”，以满足读者要求。著名“粤讴”作者有珠海梦馀生（即廖恩焘），撰《新粤讴》；香迷子辑《再粤讴》；还有郑贯公和黄鲁逸等。

木鱼 用广州方言演唱。大约在东晋南朝期间，佛教传入岭南，教徒诵经礼佛的“变文”、“宝卷”等词曲与岭南的民歌融合，产生了唱“木鱼”。它属于“弹词”体系，和外省的“鼓词”、“评话”有血缘关系，在农村广泛流传，尤以在妇女中传播较广。广州方言地区的妇女，过去经常举行类似北方“香堂”、“香会”性质的活动；除敬神外，主要是演唱“木鱼”，如《观音出世木鱼》等。演唱时，大都没有乐器伴奏，只是敲打一个用硬木挖空中心制成的“木鱼”，以掌握节拍。这既非佛教徒的念经，也有别于一般民歌。内容除与宗教有关外，还有历史故事、神怪传说、儿女私情、家庭伦理等，其作品约有500部，长篇居多，唱词以七字句为主，唱腔简洁朴素，轻柔清雅，抒情达意有独到之处，没有固定的拍子，只是基本旋律大体固定就行。主要曲目有《花笺记》、《二荷花史》、《背解红罗》等。

龙舟 用广州方言演唱。它的起源传说有二：一说是清朝乾隆年间，顺德县龙江乡一位破落子弟首创，因珠江三角洲是水网地区，乡人靠渡船来往，艺人便在渡船上说唱龙舟歌；手持一个形同杖头木偶的木雕龙船，胸前挂着小锣小鼓，边唱边敲，内容以神话故事和劝善祝颂为主，使旅客在途中不感寂寞，因而颇受欢迎。另一说是清朝康熙年间收复台湾后，天地会等民间团体利用“龙舟歌”宣传反清复明，胸前挂的锣、鼓分别代表日、月，也就是明朝的“明”字，手持木雕龙舟是“自家兄弟”的标志。当初称为“龙朱歌”，意谓真龙天子姓朱，后因过分露骨而改称“龙舟歌”。它的音乐曲

调、唱词结构与“木鱼”大体相似，不需进行唱腔设计和伴奏，说唱极为方便，基本上是吟诵式，循字取腔或因字成腔，节拍限制不甚严格，腔调朴素粗犷，富有乡土气息。传说曲目丰富，有《八仙贺寿》、《仙姬送子》、《昭君和番》、《三聘孔明》等。辛亥革命期间，出现“社会龙舟”或称“政治龙舟”，如宋四郎撰《社会龙舟庚戌年广东大事记》，用以评论时局，发表政见，鼓吹革命。

南音 用广州方言演唱。约起源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有三种说法：一是在木鱼、龙舟的基础上，吸收扬州弹词等曲种的音乐曲调发展而成；一是广州说唱艺人对扬州弹词进行加工提高而成；一是外省南词班的音乐声腔传入广东，与木鱼、龙舟结合而成。南音的唱词严谨、整齐，行腔婉转悠扬，旋律优美动听。通过节奏、声腔的变换，能够表现各种思想情绪，抒情叙事兼长，为有闲阶层的文人雅士所欢迎。作品多是吟风弄月或酬酢消遣之类，具有积极意义的较少，因而逐渐为群众所冷落。主要作品有：《客途秋恨》，作者缪银，字兼山，号莲仙，浙江杭州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举人，曾游历燕、齐、吴、越、皖、豫、闽、粤，在广东26年，以教书卖文为生，长期处于半失业状态，因而处境困阨。传说他与珠江艇妓麦秋娟相恋，别后写成此曲。《叹五更》，作者何惠群，顺德人，内容为描写一个妓女在夜间一更至五更之中，哀叹自己的不幸。作品很有广州地方特色，表达了作者对被迫害与被侮辱者的同情，有其进步意义。

客家山歌 用客家方言歌唱。基本格式为七言四句体，近似竹枝词，通常以四句为一首，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内容较多的则以若干首为一篇，但每首仍为四句，成为一个段落。讲究尾句押韵，一首一韵。注重修辞，多衬词，腔调繁多，旋

律比较平直。内容分抒情、叙事。叙事题材较广泛，反映历史事件的如《长毛歌》，叙述民间故事的如《廖昆玉》、《才子宋湘》等。

潮州歌册 用潮州方言朗唱。它从弹词演变而来，因此具有弹词的某些特点。语言通俗、形象、生动，一般是七字四句构成一组，用一韵，每组转韵，也有两三组用一韵。故事性强，情节起伏转合，曲调抑扬顿收，与潮剧有密切关系。内容多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忠孝节义、因果报应等故事，其中相当一部分宣扬爱国思想、廉洁公正和褒善贬恶。流行于民间的潮州歌册有数百部，长篇每部约二三十卷，如《双白燕》有26卷，每卷歌文300多组，1000多行，全歌3万多行，以每行七字计，约20多万字，中篇如《双驸马》6卷，全歌8000多行。短篇如《蓉娘》，分上、下集，共200多组，900多行^①。

^① 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广东省戏曲和曲艺》，内部资料，1980年。

第十章 百花齐放 各呈异彩

——融合创新的艺术流派

岭南的艺术接受中原各地及外来影响,结合本地的特点,经过长期改造、融合、创新,自成派系,独具一格,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因此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

一、绚丽多姿的地方戏剧

岭南地区丘陵起伏,河汉纵横,古代交通不便,形成众多的方言,各种方言都有自己的戏剧,用以表演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当地人民的生活。因而地方戏剧品种繁多,主要有:

粤剧 它是全国大剧种之一,用广州方言演唱,流行于广东、广西的广州方言地区和香港、澳门,在美洲、欧洲、澳洲和东南亚采用广州方言的华侨中也有演出。“粤剧”一词在清朝光绪中期才出现,其起源约在明朝中期,早在嘉靖年间,江西弋阳腔传入广东,到了清朝初期,徽剧、湘剧和其他剧种也陆续传入广东。粤剧吸收了弋阳腔、徽剧、湘剧、昆曲、秦腔、汉剧、祁剧、桂剧等剧种的唱腔,以后又加入南音、龙

舟、木鱼、粤讴等广东民间曲调，于雍正前后汇合形成粤剧，具有自己的特色。唱词结构基本上是7字句和10字句，后来发展为长句和自由句格。唱腔有高亢激昂，为武生专用的大喉；有稳重厚实，为小生、文武生专用的平喉；有清园委婉，为旦角专用的子喉。曲调有正线、反线、乙反线，既能慷慨昂扬，又能哀怨悲叹，富于表演力和感染力。伴奏乐器也不断增加，除运用二弦、三弦、高胡、月琴、琵琶、笛子、沙鼓、高边锣等民族乐器外，还运用扬琴、小提琴、大提琴、萨克斯号等西欧乐器，使伴奏功能大大提高，增强戏剧效果。在表演上，原先分为末、净、生、旦、丑、外、小、贴、夫、杂等10个行当，各有传统表演程式，后来演变为生、旦、文武生、武生、公脚、小武、六分、拉扯等独特行当。文武生是粤剧表演的台柱，既能做文戏，也能做武戏，还能唱大喉，为其他剧种所少见。在服装、化妆和舞台布景方面也很讲究。传统剧目近3000个，较为流行的有“最古江湖十八本”、“新江湖十八本”、“江湖十八本”、“小江湖十八本”、“八大曲本”等。

潮剧 它是广东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又名潮州戏、潮音戏、潮州白字戏，用潮汕方言演唱，流行于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台湾的潮语居民地区，在东南亚等地的潮语华侨中也有演出，为广东历史最悠久的剧种，它从宋、元南戏衍变而来，明朝中期已相当成熟，称为潮调、潮腔，有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重刊的《班曲荔镜戏文》和稍后的《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为证，前者演陈三与黄五娘相恋，后者演金花牧羊，两者均为潮汕、闽南流行的民间故事，编为戏剧，四五百年来盛演不衰。潮剧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大量吸收当地民间艺术和民间音乐，因而音乐声腔、表演艺术日趋丰富，相传潮剧三步进、三步退的台步，来自水上居民

的舞蹈；潮丑侧身跳跃的手法腿法，仿自乡间的纸影戏。潮剧的音乐，兼收南戏、弋阳腔、昆腔、梆子、二黄及当地民间音乐，如潮州大锣鼓、潮阳笛套锣鼓、庙堂佛事音乐等各种乐曲和演奏组合，构成特有的地方色彩。潮剧的舞台配音、伴奏，是潮剧重要表现形式，一出戏从开场到散场，乐队都不停歇，有唱伴唱，无唱配音；幕与幕之间也有配音，除了锣鼓乐队，最有特色为管弦乐的配音，组成以弦索为主的“弦诗乐曲”和以唢呐、笛为主的“牌子曲”。潮剧声腔的主要形式是帮腔，或称帮声，即演员唱到最精彩的一段或在某一唱词的句末，由后台众人帮唱，用以衬托演员的唱腔，渲染舞台气氛，其声调柔曼清扬，达到抒发感情、深化性格的效果。潮剧唱词古朴典雅，善于运用方言、俚语、歇后语等，形象生动。唱腔舒缓低回，抒情优美。生、旦表演轻歌曼舞，机巧灵活，程式严谨。丑行分工细密，表演丰富。舞台美术具有乡土特点，戏服喜用潮绣，并采用民间的画屏、灯屏、剪纸、抽纱等精巧工艺，风格别致。传统剧目有1 300多个，多取材于民间故事，较少历史题材。

广东汉剧 它是广东主要地方剧种之一，旧名外江戏、兴梅汉戏，用客家方言演唱，流行于广东东部、北部和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的客家方言居民地区，在东南亚等地的客家方言华侨中也有演出。它和福建汉剧相同，以二黄、西皮为主要声腔，来源于清朝雍正、乾隆时候（1723—1795年）到广东演出的“徽班”（即徽剧）。因而其表演程式与京剧、湘剧、祁剧、湖北汉剧等剧种大同小异，但也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其伴奏音乐分“文乐”（管弦乐）、“武乐”（打击乐）两大类：“文乐”有头弦、二胡、三弦、横箫、大小唢呐等，其后逐渐增加扬琴、提胡、秦琴、椰胡、琵琶、古筝、芦笙、大

提琴，音色比前丰富，“武乐”有大苏铜（铜锣）、战鼓、大鼓、边鼓、小锣、碗锣、铜金（乳锣）、檀板、号头（吊喇子）、大小钹等。其中头弦、大苏锣、号头是广东汉剧特有的伴奏乐器，头弦是领奏弦乐，用硬木作筒，外形与潮剧二弦相似，但构造不同，适合伴奏成人假声，发音清脆高尖；大苏锣是主要的打击乐之一，锣的直径约两市尺半，用布裹松木棒敲击，锣声响亮，敲击也有讲究，边敲边抚，敲抚兼用，音色柔和，深沉肃穆，声波悠长，不甚喧嚣，配以较为缓慢、平稳的腔调，衬托温文柔静的戏剧气氛，十分和谐。号头是配器之一，音色高尖雄壮，常用于开场前作闹台与结束信号。广东汉剧的脸谱有100多种，以黑、红、白三色为主，角色行当很齐全，有生、旦、丑、公、婆、净（红净、乌净）等六行七当。“生”有文小生、武小生、文武小生、短打小生、娃娃生，“旦”有青衣、正旦、花旦、武旦、彩旦，“丑”有官袍丑、短衣丑、童子丑、武丑、女丑，“公”有白须老生、乌须老生、掺白老生、武老生，“婆”有贫婆、丑婆、富贵婆。各行当唱腔均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传统剧目据称有800多出，题材相当广泛。

琼剧 它是广东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又是海南岛的大剧种，出自海南岛琼州（州治在今琼山县），故称琼剧，又称海南戏，用海南方言演唱，流行于广东雷州半岛部分地区和海南岛，在东南亚等地的海南话华侨中也有演出。大概在明朝后期，海南岛和广东大陆的贸易相当兴旺，因而潮汕一带的高腔剧种传入海南岛，同当地语言、音乐相结合，后来又受粤剧较多的影响，演变而成琼剧。琼剧的乐器，最初只有锣、鼓、笛，称为“锣鼓吹打”，其后增加二弦、二胡、椰胡、月琴、秦琴、三弦、长短管等，再后又加进西洋乐器，共30多

种，其中竹胡、二胡、二弦、大小唢呐、大喉管、短管均可当主乐，大小唢呐有别于其他剧种的乐器，能衬托欢乐、悲怨的戏剧气氛，为观众所喜爱。琼剧的行当，最初只有生、旦、净、丑4大行，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才发展为生、旦、净、末、丑、杂6大行。其后再细分，生有正生、贴生、小孩生；旦有正旦、贴旦、花旦、彩旦、妈旦（婆脚）、夫人旦、正武、贴武、三武、武旦、弓马旦；净有大净、二净（大二花脸）；末叫杂仔，有文杂仔、武杂仔；丑有文丑、武丑；杂脚也叫杂经头，即万能佬倌，为各行当病事假时的总贴脚色。扮演皇帝的，必须是杂脚，因此杂脚被奉为班中的“皇帝”，权限仅次于班主。其表演艺术，文戏以唱为主，武戏以打为主。由于琼剧长期在空旷广场演出，所以名角都重视唱功，忽视细腻的表演。武功属南派（少林派），使用铁、铜武器，还掺有杂技、魔术。传统剧目很丰富，经改编、移植和创造，有1500多出。

除上述四大地方剧种之外，岭南还有一批小型地方剧种，例如，在广东东部沿海的海丰、陆丰县一带，就流行“正字戏”、“西秦戏”、“白字戏”。正字戏在明朝中期出现，1975年潮安县凤塘公社修水利时，从古坟中发现一册完整的手抄剧本，卷首题《刘希必金钗记》，卷末题《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卷下，“宣德七年（即1432年）六月日在胜寺梨园置立”（出土本现存潮安县博物馆），可作确证。它可能从福建或江西结束，由福建“正音戏”（又称四平腔）、安徽“青阳腔”发展而成，用当地方言演唱，在演出风貌上，具有古朴粗犷、雄浑优美的艺术特色。剧目分文戏、武戏两种，文戏有剧目170多个，武戏有剧目2400多个。“西秦戏”又名“乱弹班”，历史悠久，约于清朝中期从福建南部沿海地

区传入广东，主要流行于海丰、陆丰、惠阳及潮州、汕头等地，也流行于香港、台湾及东南亚。西秦戏行当齐全，做工丰富，粗细兼优，脸谱多姿，艺术风格接近秦腔、徽剧，其音乐唱腔自成体系，文戏（又名曲戏）剧目音乐丰富，善于表达人物情绪和场面气氛，委婉、悲壮咸宜；武戏（又名提纲戏）剧目多用大锣、大鼓、大唢呐，雄伟浑厚，各有所长，共有剧目1 000多个。“白字戏”是明末清初潮剧流传到海丰、陆丰后，受当地方言、民间音乐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剧种。海丰、陆丰位于珠江三角洲与韩江三角洲之间，宋朝以来封建文化较为发达，民间祭神祭鬼必定演戏，历代相承，形成了重视戏剧的社会风气。明、清两朝，潮剧、正字戏、西秦戏、粤剧、木偶戏、皮影戏等先后传入，剧种剧团众多，演出频繁，加上当地的民间艺术十分丰富，如渔歌、舞灯、跑旱船、英歌、担花篮、游鳌山等表演，均给白字戏以营养，这就使白字戏更有特色。其音乐唱腔，很多和潮剧相同，但又有自己独特之处。唱时有帮腔，有的只帮一句中句尾的三字，有的全句都帮，有的每一句曲的句尾都帮，有的前台不唱，全由后台帮唱。擅长演儿女情谊，载歌载舞，富有生活气息，短打用南派武功，舞台美术简朴，便于流动。传统剧目的文戏有两百多个^①。

在广东北部，流行“花鼓戏”和“采茶戏”。花鼓戏以乐昌为中心，它于明末清初来自湖南。在粤东演变成“英歌”（即秧歌），在粤北演变为“春牛”，再发展为“乐昌花鼓戏”。它是外省花鼓戏与粤北民间小调、山歌、渔鼓融合，逐渐形成具有粤北山区牧歌风格，活泼纯朴的戏曲。最早的乐昌花

^① 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广东戏曲和曲艺》（内部资料），1980年。

鼓戏由单人演唱，可化装也可不化装。后来扩大为一小旦、一小丑的表演说唱，称为“对子花鼓”，继而发展为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戏”。最后，行当比前丰富，增加了正旦、彩旦、婆旦、花面、老生，表演能力也有较大提高，不仅擅演短戏，而且能演长剧。采茶戏是粤北客家地区的小戏，以前称为“唱花鼓”、“唱花灯”、“大茶”、“采茶”，多由旦、生、丑三人演出，俗称“三角班”。它流行于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大约在明末清初传入粤北，并不断吸收当地方言以及“春牛”、“纸马”、“花灯”、山歌等民间艺术，形成粤北采茶戏。又因艺人的文化素养不同，所以同样的剧目、唱腔，在表演上形成曲江、英德、南雄、连山、连南、连县等不同流派。道白、唱词采用粤北客家方言，通俗诙谐，生动形象。表演艺术吸收粤北民间舞蹈、武术的技巧。舞台美术因陋就简，朴素轻便。主要道具是扇子（男黑女白），女角还有手绢、小篮、绣花具等，常用乐器有堂鼓、大文锣、钹、小锣、胡琴等。传统剧目有 100 多个^①。

在广东西部，有“贵儿剧”、“白戏”和“雷剧”。贵儿戏源于怀集，约在两百年前，每年春节才演出，故又称“春色”，是一种娱乐兼贺年性质的活动，表演日期从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元宵节止。在未形成戏剧之前，当地民间艺人表演狮舞、麒麟舞、马舞、寿星公与龟鹿鹤、八仙贺寿、采茶等，这些民间艺术形式统称“贵儿”。其后接受采茶戏、粤剧的影响，演唱有表情动作、故事曲折的剧目，内容多属历史题材和民间传说。它不受演出地点限制，随处可以演出，道具也很简单，不需布景、配景和乐器伴奏，剧本多不分场次，

^① 广东省戏剧研究室主编：《广东戏曲和曲艺》（内部资料），1980年。

基本上是清唱，唱词全为七言偶句。戏剧中的感情处理，由演唱者根据唱词内容而定腔调，喜则唱得欢快，怒则唱得激愤，悲则唱得低沉，做功尚未形成流派。“白戏”即“粤西白戏”，用粤西白话（即当地的广州话）演唱，大约始于清朝雍正年间，演出形式有木偶剧和舞台剧两种，流行于广东廉江、遂溪和广西合浦，剧目主要取材于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唱词通俗易懂，保留民歌的格式，均为七字句，乐器为胡琴、月琴、笛子（兼吹唢呐），另有一人敲击高边锣、小提鼓、大钹及大小木鱼，演奏风格近似北方的梆子戏，在粤语区域的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中比较少见。“雷剧”流行于雷州半岛，是由雷州民歌发展而成的剧种。雷州民歌源远流长，明末清初，雷州盛行民歌对唱，每逢节日或喜庆活动，歌手会集，即兴而唱，随问随答，互相唱和，后因有女歌手加入，男持一扇，女持一扇一巾，边舞边唱，轻松活泼，其中根据当地真人真事，加唱一段“劝世歌”，劝告世人去恶从善。艺人农闲到各地演出，只受群众招待吃宿，补助旅费，不收戏金（戏票）。乾隆时受粤剧影响，添置戏服、乐器、道具。嘉庆时，歌班演唱变成戏曲表演，脱离农业劳动成为专业剧团，演出要收戏金（戏票）。因雷剧与粤剧、琼剧交流较多，故剧目除取材民间传说外，多从粤剧、琼剧中进行移植^①。

在珠江三角洲，除流行粤剧外，还有顺德的“大棚戏”，属于提线木偶戏。因唱曲时，不仅台上唱，台下观众也帮唱，当地土话称“大家”为“大棚”，故名大棚戏。据老艺人回忆，大棚戏源于南北朝的木偶戏，当初专为用于神诞、庙会、祭鬼、消灾等演出，流行地区除顺德外，还有邻县番禺、新会、

^① 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广东戏曲和曲艺》（内部资料），1980年。

中山等地，剧目只有历史题材，与粤剧的剧目大致相同，演出主要在小舞台、临时舞台，后已逐渐接近失传^①。

广东各地的木偶戏，有杖头、铁枝、圆身纸影、提线、布袋等形式，分别用粤剧、潮剧、广东汉剧、琼剧等剧种的声腔、音乐演出，也有少数用当地民歌土调演出。它们均有悠久的历史 and 浓郁的地方特色，从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文物看，中国在西汉初年已有木偶戏，据说在宋朝已传入广东，但无明确记载。宋朝广州是中国主要对外通商口岸，各地商人纷纷前来广州贸易，这时传入木偶戏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海南岛的木偶戏，《海南岛志》认为：“元代海南岛已有手托木偶班，来自潮州。”到了清朝，广东各种木偶戏均有很大发展，因为它轻装简载，多属半艺半农组织，容易推广，演出剧目大多与粤剧、潮剧、广东汉剧、琼剧四大剧种的传统剧目相同，故颇受群众欢迎^②。

二、悠扬动听的各种器乐

岭南的器乐多种多样，曲目丰富，演奏精彩，风格独特，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在国内外都受到好评。主要器乐有：

广东音乐 是我国著名的大乐种之一，在世界乐坛有其地位，不仅流行于广东各地，而且影响遍及全国和海外华侨聚居地。它本是丝竹音乐，起源没有确切记载，一般认为其前身主要是粤剧过场音乐和烘托表演动作的乐曲，所以过去有“过场音乐”、“过场谱子”、“小曲”等名称。按乐曲长短，分为“大调”和“小调”。初期以粗弦硬弓、发音响亮的“二

①② 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广东戏曲和曲艺》（内部资料），1980年。

弦”为主要乐器，辅以三弦、提琴（即大板胡，并非西洋提琴）、月琴、笛子，称为“五架头”。以后受“江南丝竹”影响，改用二胡（钢丝弦）为主要乐器，这就出现以二胡、扬琴、秦琴的“三件头”，和再加上洞箫、椰胡的“五件头”。再后，所用乐器发展至数十种之多，吹、弹、拉、打均有。其早期乐曲，音符较疏，节奏变化较少。后来其旋律有所发展，音色清脆明亮，曲调流畅优美，节奏明快清新，声韵悠扬动听。在曲调进行中，有多种装饰音型，称为“加花”，使旋律更加自然谐和，流畅丰富，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它是一种标题性音乐，传统乐曲约300首，主要有表现风俗图景的《赛龙夺锦》、《平湖秋月》、《山乡春早》、《雨打芭蕉》等，有描绘生活情趣的《渔樵问答》、《渔歌晚唱》、《饿马摇铃》、《鸟投林》等，有歌颂向往幸福的《孔雀开屏》、《双飞蝴蝶》、《春风得意》等，有反映欢乐情绪的《步步高》、《娱乐升平》等，也有哀叹人生不幸的《昭君怨》、《双声恨》等。它不断吸收国内外其他乐种的长处，从而能够广泛地表现各种题材。

潮州音乐 潮州音乐有悠久历史，可分潮州锣鼓乐、潮州弦乐、潮州细乐，流行于潮汕地区。潮州锣鼓乐是吹打音乐，有潮州大锣鼓、潮州小锣鼓、潮州苏锣鼓、潮州花灯锣鼓、潮州鼓畔音乐。潮州大锣鼓以大鼓、斗锣、深坡（大锣）为主，伴以管弦乐器，大约在清朝咸丰年间于潮州形成，当初脱胎于“潮剧”，并吸收“正字戏”音乐，以长杆喷呐领奏，刚柔相济，明快跳跃，变化多端，悦耳动听，曲目很多，最著名的有18套，多为戏曲、历史题材。演奏形式有两种：一是在戏台演奏，称为“牌子套”；一是在行进中演奏，用于节日欢庆、迎神赛会，称为“长行套”。由潮州大锣鼓派生出

潮州小锣鼓、潮州苏锣鼓。潮州小锣鼓使用小鼓、小钹、大小唢呐、横笛等乐器，没有成套的传统曲目。潮州苏锣鼓又名“八音”，使用苏锣、苏鼓、月锣、抗锣、大小钹、大小唢呐等乐器，演奏的曲目多为潮汕地区汉剧吹奏曲牌。潮州花灯锣鼓历史较短，是民间游赛“花灯”（汉族民间歌舞）时的鼓乐班，规模可大可小，因而使用的乐器也有多有少，后已逐渐式微。潮州鼓畔音乐是过去潮州迎神赛会所演奏的锣鼓乐，使用锣、鼓、木鱼、锭子、子母音磬、鼓脚钹、椰胡、秦琴、竹笛等，演奏潮州民间流行乐曲。

潮州弦乐在潮汕地区比较流行，是群众自娱性演奏，用高音拉弦乐器“二弦”领奏，伴以柳胡、扬琴、二胡、三弦、琵琶等，一般不用锣鼓，只以木板击拍，乐声细腻温柔。如在演奏时使用清音、花音、玩指等技巧，可使乐曲富于变化。曲目有《潮乐十大套》。潮州细乐是潮州民间独奏和三五件小乐合奏的统称，常以三弦、琵琶、琴、筝等乐器为主，有时也增加其他弦乐器，以加强演奏效果。

广东汉乐 又名客家音乐、汉调音乐、儒家音乐、中州音乐等，流行于广东、江西、福建的客家方言地区。在香港、澳门和东南亚也有演出。它主要分“儒乐”和“中军班”两大类，“儒乐”即“儒家音乐”，用管弦乐器演奏，乐器可多可少，通常用头弦领奏，合奏乐器有笛、笙、提胡、洋琴、三弦、椰胡、琵琶等，并用木板击拍，或加碰铃；也有只用筝、琵琶、椰胡，俗称“筝琶胡三件头”。“儒乐”是群众自娱性音乐。“中军班”又名“八音班”，使用吹打乐器，以唢呐为主，笛、笙、弦乐合奏，配以苏锣、小锣、碗锣、乳锣、钹、椰子、摇板等，所以又名“锣鼓吹”、“鼓乐家”。“中军班”是职业性乐队，一班少则3人，多则20余人，受雇作为仪仗性

乐队，在婚丧喜庆等场合演奏。

广东汉乐曲目丰富，相传有 600 首（套），部分已失传。曲目大体分为典礼音乐、牌子曲、风俗小调、戏曲音乐及其他等五类，特点是古朴典雅，形式多样，既有秀丽流畅、轻清雅淡的乐调，也有色彩浓重、庄严肃穆的曲牌。某些粤东民间小调、佛曲、大锣鼓和汉剧的乐器演奏，经过融合吸收，也成为广东汉乐的一部分。

三、享誉国际的岭南美术

岭南的美术，历史悠久。在广东曲江县狮子山石峡文化遗址内，曾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约 3000 年的陶器，上面装饰有夔纹、云雷纹、方格纹，可见岭南在原始社会已有美术作品。到了战国时期，岭南进入青铜时代，现已出土的本地铸造青铜器，多用人物、人面、藤纹、席纹来装饰。1983 年在广州市区象岗发现西汉初年的南越文王墓，墓室有彩绘壁画，这显然是受内地封建贵族墓葬的影响。其后岭南历代画家辈出。清末民初，番禺学者汪兆镛撰《岭南画征略》，其子汪宗衍加以增补，为唐朝至清朝的岭南画家 602 人立传，除文士外，还包括闺秀、释道，岭南画坛堪称人才济济，但在全国知名的较少。对此，汪宗衍《岭南画人疑年录》解释：“吾粤画家独具风格，而僻处岭南，性不好标榜，故怀绝艺者多湮没无闻。”所以古代岭南画作颇多失传。到了清末，番禺高剑父等创立岭南画派，成为近代中国画的一个流派，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从而蜚声国际画坛。

岭南画家知名于世的，首推唐朝南海人张询，字正言，家贫力学，擅长绘画，因参加科举考试，未能及第，于是久住

长安，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攻入长安，他随驾前往四川成都，在昭觉寺依靠休梦长老，休梦请他在该寺大慈堂的三堵墙壁上，绘早、午、晚山景，名为《三时山》。后来唐僖宗来该寺游览，对这三幅壁画大加称赞。五代时，前蜀高祖王建的太子王元膺想把它移往东宫，限于技术，不便搬动，可见这《三时山》壁画颇为人们所赏识^①。

汪兆鏞认为：“岭南画家，唐僧徽画龙，宋白玉蟾画梅、竹，皆著称于世。厥后名流妙墨，纷起迭兴”^②。唐朝僧徽，南海人，其姓名身世已不可考，画作亦失传。他善于画龙，是因为唐末名僧齐己《谢徽上人见惠二龙障子以短歌酬之》：“近有五羊徽上人，闲工小笔得意新，画龙不夸头角及须鳞，只求筋骨与精神。徽上人，真艺者，惠我双龙不言价，等闲不敢将悬挂，恐是叶公好假龙，及见真龙却惊怕。”^③ 这诗对僧徽画龙予以极高的评价。宋朝道士白玉蟾，原来姓葛名长庚，字如晦，本是福建人，由武夷山来到广东雷州，过继给白氏，改姓名，字以阅，渡海至琼州，号琼山道人、武夷散人，善写隶、篆、草书和画梅、竹。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被召至杭州，封紫清真人，在太乙宫任职，以后不知所终。

元朝岭南文献没有关于画家的记载。明朝画家辈出，名士如陈献章（白沙先生）、黎民表、霍韬、海潞、黎遂球、陈子升、陈恭尹、张家玉等，均善绘画。屈大均《广东新语·艺语》评价明朝的画家：“李子长画猫，梁市南、陈全人白描

① 阮元：《广东通志·方技传》。

② 汪兆鏞编纂、汪宗衍增补，周锡馥点校：《岭南画征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全唐诗》卷八百四十七。

佛相人物，袁道生山水，黎叔宝印章，黄仲亨印钮，皆粤东之所贵也。尹伯阳花鸟，能曲尽其情状，稍惜笔重耳。凡写生必须博物，久之自可通神。古人贱形而贵神，以意到笔不到为妙。粤东以翎毛（即鸟雀）名者颇众，若吕纪、林良、张穆之皆神气生动，不甚著意，设色如生，故可贵。林良祖（效法）黄荃、边景韶，而枯荣之态、飞动之势似过之，章皇帝（即明英宗）尝召良为待诏，一时画苑称雄。”又说：“有官能者，香山千户所小旗，生有巧思，欲与林良抗衡，所画鳞鬣亦精绝。又有张千户善画松，白沙有歌云：‘张侯画松人不识，松不画横惟画直。上干青霄下盘石，倒卷苍龙二千尺。神物安可留屋壁，变化虚空了无迹。不然恐遭雷斧阹，左手执弓右持戟。取胜无过万人敌，侯莫画松费笔力。’张千户松不多有，观此歌亦可想见其妙矣。穆之尤善画马，尝畜名马曰铜龙、曰鸡冠赤，与之久习，得其饮食喜怒之精神，与夫筋骨所在，故每下笔如生。……穆之画鹰及兰竹亦善。他若写山水者彭伯时、赖白水、英白石，花卉者赵裕子，兰者杨宪卿，竹者梁森琅、梁文震，皆一时高手。”

上述各人，林良的成就最大。他字以善，南海人，擅画花果、禽鸟、树石，着色简淡，继承南宋院画的笔法，遒劲飞动，墨色灵活，是明代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作家之一。现存作品有《鹰图》、《双鹰图》、《凤凰图》、《芦边双鹈图》、《柳塘游鸭图》、《灌木集禽图》、《山茶白羽图》、《松鹤图》等。其画颇为人们赞赏，当时名士李梦阳撰《林良画两角鹰歌》：“百余年来画禽鸟，后有吕纪前边昭。二子工似不工意，吮笔决眦分毫毛。林良写鸟只写墨，开缣半扫风云黑，水禽陆禽各臻妙，挂出满堂皆动色。空山古林江怒涛，两鹰突出霜崖高，整骨刷羽意势动，四壁六月生秋飈。一鹰下视睛不转，已

知两眼无秋毫。一鹰掉头复欲下，渐觉飒飒开风毛。”对林良的画鹰大为称颂。林良少时家贫苦学，曾为广东布政司的差役。代宗景泰年间（1450—1456年），某日，左布政使陈金^①向别人借阅名画，林良在旁评论这名画的瑕疵，陈金听了大怒，要鞭打林良，林良表示自己也擅长绘画，陈金当即要林良临摹一幅，林遵命献技，陈金大为惊奇。从此林良之名，在官绅之间广泛传播，后来林良被任命为北京工部营缮所丞，入直仁智殿，改任锦衣卫镇抚。其子林郊，字子远，能继承家学，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年），皇帝下诏考选全国画士，林郊获第一名，授直武英殿锦衣卫镇抚^②。

清朝岭南画坛比明朝更为繁荣，一批诗人、学者如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张锦芳、黎简、黄培芳、崔弼、吴荣光、招子庸、熊景星、徐荣、梁廷楠、陈澧、苏仁山、苏三朋、李文田等，均擅长绘画，甚至富商伍崇曜画梅花、显宦许应騄和许应鏘画花鸟山水，也为世人称赞。还有黎琼、谢静婉、吴尚喜、张秀端等数十位女画家。清朝前期，岭南画家驰名全国的是黎简，字简民，又字未裁，性好山水，曾来往罗浮（东樵）、西樵二山，因自号二樵，又号石鼎道士，顺德县弼教村人，其住所名为五百四峰堂，取罗浮（东樵）四百三十二峰与西樵七十二峰合称之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32岁才考中秀才，43岁选为拔贡，正拟北上赴试，恰遇父丧，从此绝意科名，靠授徒、卖画维持生计，贫病交迫，但是诗名、画名远播，当时名士翁方纲、王昶、李调元、黄景仁等对他评价很高。黄景仁《题二樵为周肃斋明府作放鹤

^① 明朝广东地方大员有两位陈金，一是代宗景泰年间广东左布政使陈金，浙江上虞人；一是武宗正德年间两广总督陈金，湖北应城人。

^② 阮元：《广东通志·方伎传》

图》：“二樵笔如铁裹棉，爱画独柳秋滩边，枝枝叶叶带风色，坐令山水生清妍。一琴一鹤一童子，使君宦况清如此。呼童放鹤拿舟行，淡淡斜阳天拍水。其人与画皆千秋，令我悄然思旧游：梅花夜舫孤山寺，芳草春江鄂渚楼。”^①他擅画山水，苍润见长近似元朝浙江画家吴镇，淡远萧疏有如元朝江苏画家倪瓒。因而向他求诗、书、画的人很多，但是如果不合他的心意，即使愿出巨金，他也不肯动笔。嘉庆四年（1799年）去世，寿仅五十有三。

清朝后期，岭南画家最著名的是番禺居巢、居廉兄弟。居巢（1811—1865年）字梅生，号梅巢，因住所名为“今夕庵”，故自号“今夕庵主”。幼承家学，工于诗词，兼及金石、书画。画花鸟效法清初江苏恽寿平（南田）；画山水师事浙江余奏言（子鸿），余奏言得清初江苏名画家王原祁的真传。又曾游幕广西，故其画颇得江山之助。清人汪谷庵题其画集：“空山无人，落叶如雨，抱琴独来，静与秋语。脱然蹊径，深林徐步，微闻斧声，樵子何处？溪云半销，忽见疏树，孤鹤在旁，聆此秀句。”冯询的评语为：“爱君墨宝重于金。”^②可见其受时人的称颂。堂弟居廉（1828—1904年），字士刚，号古泉，因住番禺隔山乡（今广州河南沙园），故别署“隔山老人”，自幼父母丧亡，家贫失学，遂向居巢学绘画，擅画花鸟、草虫及人物，设色妍丽，笔致工整，尤长指头画。子槎，女少兰，妻袁顺，均能画。清同治三年（1864年），居巢、居廉在广州河南建筑“十香园”，不久，居巢病故。次年，居廉在此设馆授徒，他重视写生，强调师法自然，培养一批美术人

^{①②} 汪兆镛编纂、汪宗衍增补，周锡馥点校：《岭南画征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才，其中最著名的是高剑父、陈树人。

高剑父（1879—1951年）名峯，字爵庭，番禺人。父、祖世医，均能书画。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13岁跟居廉学画，17岁去澳门入岭南学堂，跟法国画家麦拉学素描，28岁考入日本东京美术学院，学东、西洋画法，同时参加同盟会，并于1911年参加“三·二九”广州黄花岗之役。1912年于上海创办《真相画报》。在此前后，还和陈树人等出版《时事画报》、《平民画报》，宣传民主革命。后在广州创办春睡画院、女子图画刺绣学校。并在广州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授。他曾去南洋群岛（即马来群岛）、越南、缅甸、印度、锡兰、不丹、锡金、尼泊尔和伊朗、埃及等地游历、绘画，并在东京、横滨、神户、朝鲜、上海、南京、杭州、广州、香港等地举办个人美术作品展览。曾获意大利万国博览会金牌奖、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牌奖、巴黎万国博览会最优秀奖。在比利时百年博览会上，其《江关萧瑟》、《绝代名姝》得分最高。参加柏林中国美术展览的《松风水月》，由德国政府购藏^①。他的画善用色彩或水墨渲染，别具一格。

高奇峰（1889—1933年）名嶙，是高剑父胞弟，少年时候跟高剑父学绘画。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跟随高剑父东渡日本，向田中赖璋学绘画，并参加同盟会。1912年在上海主编《真相画报》，1918年回广州，在广东工业学校工作，并自设美术馆，招收学员，后在岭南大学任教，1933年因病去世，仅44岁。

陈树人（1884—1948年）名韶，番禺人。因筑室于广州东山和番禺隔山，自称“二山山樵”。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① 周锡馥著：《岭南画派》，广州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

年)，他 16 岁时向居廉学绘画，并结识高剑父、高奇峰。次年在香港主编《广东日报》，又与高剑父、潘达微、何剑士等人编印《时事画报》，其后参加同盟会，曾往加拿大等地从事民主革命宣传，并先后在北京、天津、太原、桂林、阳朔和四川峨嵋、三峡、剑阁等地写生。其《岭南春色》，1931 年在比利时万国博览会上获最优等奖，《红叶》于 1942 年由中国教育部的购买赠给印度政府，《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为法国国立博物馆购藏，《紫云》为柏林国家博物馆购藏，《绿竹》、《桃花》分别为莫斯科、列宁格勒（彼得堡）的博物馆收藏^①。

由于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的画风相同，他们在继承中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吸收日本、欧洲画法和摄影的优点，对中国历代各派画家进行去芜存菁，兼容并蓄，强调师法自然，重视写生，注意画面整体的色调，色彩鲜丽，提倡绘新题材，认为新事物皆可入画，从而形成具有民族风格的现代新国画，被称为“岭南画派”。高剑父、高奇峰多年从事美术教育，培养出大批知名的美术人才。

四、急起直追的广东书法

屈大均《广东新语·艺语》说：“吾粤先辈多善书。”这话有点含糊不清。因为岭南在汉晋期间未见有书法名家的记载。隋唐以科举取士，科举考试重视书法，这促使我国出现大批书法能手，很多诗人、学者均以书法著称。可是岭南天气温热多雨，纸张容易虫蛀霉坏，加以改朝换代之际，岭南每多兵燹，所以在明朝以前，不仅墨迹难以保存，即碑刻亦

^① 周锡馥著：《岭南画派》，广州文化出版社，1987 年版。

易损毁，这就增加人们研究岭南古代书法史的困难。

岭南的书法家，最早见于史籍的，是南朝陈朝的曲江侯安都，姚思廉《陈书·侯安都传》：“安都工隶书。”侯安都以战功起家，位极人臣，擅写隶书，可谓罕有，所以见诸记载。至于一般文士，挥毫濡翰，份所应为，虽有佳作，未必著录。所以自汉至元，长达一千多年，岭南书法家除侯安都之外，史籍所载，只有唐朝张九龄，宋朝古成之、崔与之、李昉英，元朝赵东山等达官名流，寥寥数位，这乃是字以人传，并非书坛荒芜之故。

到了明、清两朝，广东对外贸易比以前有所发展，市场经济繁荣，出版事业兴旺，公私著述汗牛充栋，书法家的真迹也便于流传于世。其中明朝首推陈献章。他早期学唐朝欧阳询、褚遂良的书法，继仿晋朝王羲之、王献之和宋朝苏轼，最后自成一家。他撰《书法》一文，畅叙心得：“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手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吾所以游于艺也。”^①这是他把书法与修身养性及哲学认识相结合而得出的论点。又因他常住乡间，毛笔不易购买，遂采用当地的山茅制笔，称为“茅龙”。其门人张诩撰《白沙先生行状》说：陈献章“能作古人数家字，山居笔或不给，至束茅代之，晚年专用，遂自成一家。”^②屈大均《广东新语·艺语》也说：“白沙晚年用茅笔，奇气千万丈，峭削槎枿，自成一家，其缚秃管作擘窠大书尤奇，诸石刻皆亲视工为之，故慈元庙、浴日亭、庄节妇诸碑，粤

^{①②}《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人以为宝。”又说：陈献章的得意门生湛“甘泉亦能大书，南京燕子矶有‘天空海阔’四字，刻绝壁上，旁一诗有云：‘新秋窈窕题诗还。’其梅关、五仙观、浴日亭三碑，人争拓之。”除湛若水之外，陈献章的门生赵善鸣、邓翘、萧文明、梁储以及湛若水的门生王渐逵等人，也擅长书法。

与此同时，学者和显宦霍韬、黄佐、海瑞皆以书法知名于世。海瑞刚直廉洁，敢于为民请命、平反冤狱，因而其书法为人们所珍藏。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海刚峰之强项，其笔法奇矫，亦可观。”据说由于海瑞名气太大，人多摹仿，传世的手迹“每多膺作”^①，笔者于1964年秋在海瑞故乡海南岛琼山县五公祠内，有幸得见海瑞的题诗碑刻，其行书清秀流畅，与山东省所藏《送别帖》之运笔拘谨，大不相同。黄佐以硕学鸿儒知名当世，书法功底深厚，其门生黎民表、黎民衷、黎民怀（号称“三风”）^②等继承师传，亦擅书法。

明朝末年，抗清志士袁崇焕、陈子壮、黎遂球、陈邦彦、陈家玉、邝露的书法均为人们所重视。他们在国家危亡之秋，挺身而出，壮烈牺牲，英雄气概，见于楮墨。其中南海邝露（1604—1650年），字湛若，擅长各种书体，相传他年少豪放，负才不羁，为诸生时，督学使者以“恭、宽、信、敏、惠”为题考试，邝露以真、行、篆、隶、八分五种书体作文，使者不以为然，贬黜置于五等，邝露大笑而去^③，不复应试，前往广西，在岑、蓝、胡、侯、槃五姓土司境内，为瑶族女主云辇娘书记，撰《赤雅》一书，记录当地山川风俗，文辞可观。

① 陈永正：《岭南书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汪兆鏞编纂、汪宗衍增补，周锡馥点校：《岭南画征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 仇巨川：《羊城古钞》。

随后游历吴、楚、燕、赵，赋诗数百首，才名大起。南朝永历二年（1648年），被荐任中书舍人，两年后奉使还广州，适逢清兵攻城，他和诸将同心坚守，历时十月，城陷遇害。

明末清初的岭南名士屈大均、陈恭尹、彭睿壻、陈子升、张家珍、张穆、梁佩兰、程可则、王隼、廖燕、庄有恭等均擅长书法。其中顺德彭睿壻，字闻自，号竹本，身处鼎革之际，家破国亡，终身隐居，谢绝交游，致力书画，以书法入画，也以画法入书，尤工草书，变化多端而不失矩度，堪称大家，惜罕为世人所知^①。

清朝皇帝及皇室一批贵族均爱好书法，因而岭南书坛亦受影响。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体变》认为：“国朝（即清朝）书法凡有四变：康（熙）、雍（正）之世，专仿香光（即明朝书画家董其昌）；乾隆之世，竞讲子昂（即元朝书法家赵孟頫）；率更（即唐朝书法家欧阳询）贵盛于嘉（庆）道（光）之间；北碑（北朝碑版）萌芽于咸（丰）同（治）之际。至于今日（光绪），碑学益盛，多出入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即赵孟頫）亦蹶躩伴食焉。”（蹶躩是小步走，伴食是在职不做事，意即赵孟頫的书法在清朝光绪年间也不甚盛行了）

对于清朝岭南的书法，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行草》认为：“吾粤书家有苏古济、张药房、黎二樵、冯鱼山、宋芷湾、吴荷屋、谢兰生诸家，而吴为深美，抗衡中原，实无多让。”现分别简介如下：

苏古济即苏珥（1699—1767年），字瑞一，号古济，顺德人，乾隆三年（1738年）举人，与罗天尺、何梦瑶、劳孝舆

^① 陈永正：《岭南书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同为广东督学惠士奇赏识，称为“惠门四学士”。隐居授徒，能诗善文，其书法简朴旷达，不受羁束，《清史列传·苏珥传》说：“珥文与书称二绝，皆见重于时。”

张药房即张锦芳（1747—1793年），字粲夫，号药房，顺德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诗、书、画都有很好造诣，与冯敏昌、胡亦常合称“岭南三子”，又与黎简、黄丹书、吕坚合称“岭南四家”。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评语是：“粲夫淹贯群籍，通《说文》之学，分隶得汉人之法，兼娴绘事，出其余技，足以辉映一时。”他的隶书很出色。

黎二樵即黎简（1747—1799年），阮元《广东通志·黎简传》称赞他的书法“得汉晋人意”；《顺德县志·黎简传》则说：“书笔本天授，更寝馈晋唐善刻，成家在苏（轼）、黄（庭坚）间，隶体则全宗‘石经’，不参他法。”

冯鱼山即冯敏昌（1747—1806年），字伯求，号鱼山，钦州（今属广西）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刑部河南司主事，性好游历，遍游名山大川，回粤后，曾主讲端溪、越华、粤秀书院。他的书法，在青年时即为广东督学翁方纲所赏识，“以王羲之、王献之为本，吸取黄庭坚、米芾的笔意，豪纵而不失温雅。”^①

宋芷湾即宋湘（1756—1826年），字焕襄，号芷湾，嘉应州（今梅州市）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解元，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云南曲靖知府，湖北督粮道。又曾任广东惠州丰湖书院山长、广州粤秀书院院长。他用竹叶、蔗渣制笔，书法自成一格，清朝刘彬

^① 陈永正：《岭南书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华《玉壶山房诗话》评论他的书法：“襟抱豪迈，故挥毫洒翰，皆具倜傥权奇之概。”李蟠《岭南书风》指出：“芷湾宋湘宗海岳（指米芾），亦往往入北海（指李邕），故近吴兴（指赵孟頫），风靡一时，不知其少时仍习率更（指欧阳询）也。”他能融合众家之长，故有可贵之处。

吴荷屋即吴荣光（1773—1843年），字伯荣、殿垣，号荷屋，又署白云山人，南海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曾任湖广总督，为道光年间名臣，曾与名书法家刘墉、阮元、翁方纲等人交往，得益不浅，收藏金石拓本3 000多种，其书法初学欧阳询，旁及苏轼，为一代大家，且诗画俱精。撰有书法专著《帖镜》、《筠清馆金石录》，刻有《筠清馆法帖》。清朝简经纶《琴斋论书》评论为：“公藏书最富，平生于金石拓本题识良多，南帖北碑，纵横驰骤，岂止一家一体，故其掷笔便有金石声，良由所学者优，所得者博。”李蟠《岭南诗风》说：“谁谓筠清笔太偏？率更胎息又苏仙。兰亭取势寻波磔，金石渊源入晚年。”予以全面的评价。

谢兰生（1760—1831年），字佩士，号澧浦，别号理道人，南海人，嘉应七年（1802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其后主讲粤秀、越华、端溪、羊城等书院。《清史列传·谢兰生传》称赞他：“幼聪敏，博雅好古，工诗文。与张如芝、黄培芳齐名，诗宗大苏（即苏轼），出入杜（甫）、韩（愈）两家。古文沉实浑厚，具有典则，兼工书画，书法颜鲁公，擘窠大字，无出其右。”他自述学习书法的心得，在《自题临褚本〈兰亭〉》中说：“予写《兰亭》（即王羲之《兰亭集序》），多宗褚（即唐朝褚遂良）法，虽不能至，而略有依仿，不至土木形骸。”他除了广泛临摹古代名家书法之外，还把画法融于书法之中，他撰写《书诀》，认为书法要“用力在笔尖，为字

之筋，有筋者顾盼生情，血脉流动，如游丝一道，盘旋不断。”他就是按照这个理论来挥毫的。

除了上述诸人之外，康有为非常推崇其师朱次琦，《广艺舟双楫·体变》说：“先师朱九江先生，于书道用工至深，其书导源于平原（即颜真卿），蹀躞于欧（即欧阳询）、虞（即虞世南），而别出新意。相斯所谓鹰隼攫搏，握拳透爪，超越陷阱，有虎变而百兽踈气象，鲁公（即颜真卿）之后，无其伦比，非独刘（墉）、姚（鼐）也。”朱次琦是谢兰生的门徒，得名师指引，可惜他在去世之前，对自己的著作不满意，手稿全部烧毁，而他平时又很少替人写字，因此其真迹很少流传。

康有为本人也擅长书法，曾获朱次琦传授执笔运腕之技，初学欧阳询楷体，其后推崇汉魏六朝碑帖。他的书法多用“圆笔”，别有一格。清朝包世臣撰《艺舟双楫》四卷，其中两卷评论文章，两卷评论书法，故名“双楫”。其评论书法提倡学习北碑，对后世书风颇有影响。对此，康有为撰《广艺舟双楫》六卷，专论书法，特别推崇北魏碑版，并阐述书派源流，其中虽有臆说之辞，品评前人书法也带有偏见，但仍属一本重要的书法理论专著。他的岭南门徒梁启超、梁启勋、潘博、陈荣衮、江孔殷、林纘统、曹毅、张伯桢等也是书法家。他的外省弟子如刘海粟、徐悲鸿等则更为知名了^①。

除了康有为称誉的书法家之外，一批清朝诗人、学者如陈昌齐、梁鸾如、谭敬昭、黄培芳、张维屏、陈澧、李文田、汪璠、居廉、吴道镕等的书法，也为世人所推许。

^① 陈永正：《岭南书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十一章 藏于名山 传之宇内

——发展迅速的出版事业

中国首创印刷术，由此产生出版事业，这对人类智慧的积累，知识技术的传播，各种讯息的交换，均有巨大的作用。其后印刷术外传，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

岭南何时从中原等地传入印刷术，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出版事业对岭南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首先，它使岭南地区更好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岭南和内地的文化交流，加强了民族凝聚力；其次，它保存大批乡土文献，促进岭南文化繁荣，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就使中华文化更为多姿多彩；再次，出版工作吸引了大批学者参加，不仅保证出版物的质量，也有助于岭南学术水平的提高；最后，岭南出版业的兴盛，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推动社会不断前进。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均与岭南有关，就是确证。

古代的出版业实行自由经营，所以岭南的私家、官府、书院、书坊均刻印书籍。到了近代，岭南在全国最早出版报刊，首创通讯社，并采用机器印刷。

一、岭南印刷术探源

印刷术的起源，有人认为是先秦的印玺，广州在西汉初年南越文王的墓葬品中，不仅在墓主身上发现龙纽金印“文帝行玺”、覆斗纽玉印“赵昧”等阴刻篆书印玺五枚以及殉葬者所用印章如“右夫人玺”、“左夫人印”、“泰夫人印”、“景巷令印”等多枚。同时，在墓中叠置丝绢的附近，还发现两件青铜铸造的印花凸版，其纹样和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图案非常接近，是彩色套印纺织品的工具^①，虽与出版书籍无关，但有助于印刷技艺的提高。

也有人认为，印刷术起源于秦汉碑刻，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粤北乐昌县有《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碑，歌颂桂阳太守周憬治理武溪水道的功绩^②。碑刻拓本属于印刷品，称为石本、碑本^③，但拓本起于何时，无从查考。还有人认为，印刷术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道教的木刻符箓，这时岭南盛行道教，葛洪在广州附近的罗浮山著《抱朴子》，其中《登陟卷》就记载有18种符箓。

不少人认为，隋朝已有印刷术。明朝陆深《河汾燕闲录》提出：“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594年1月5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如果属实，则全国均奉旨刻印佛经，岭南自不例外。对此，清朝王士禛持不同意见：“予详其文义，盖雕者乃像，撰者乃经，俨山

①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辑《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阮元：《广东通志·金石略二》。

③ 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识》，中华书局，1962年版。

(即陆深)连读之误耳。”^①他认为佛像是雕塑而成,其实亦可刻版。唐朝冯贽《云仙杂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云仙杂记》又名《云仙散录》^②,宋朝张邦基:《墨庄漫录》谓《云仙散录》乃南宋王铨伪作,但并无具体证据^③。因此,玄奘曾否刻印佛像,难以确认。可以肯定的是,唐朝中期已有印刷品,因为甘肃敦煌莫高窟有保存的实物,其中最多的是佛教印刷品。当时不少日本佛教徒前来中国,日本真人元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天宝十年(751年),鉴真和尚来到广州,那时广州“开元寺有胡人造白檀华严经九会,率工匠六十人,三十年造毕,用物卅万贯钱,欲〔将往〕天竺;探访使刘〔巨鳞〕奏状,勅留开元寺供奉,七宝庄严,不可思议。”有人据此撰文认为:这比在敦煌收藏、后被英人盗去(现存伦敦博物馆)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木刻本《金刚经》,“还要早150多年,由此可见,当时广州的印刷出版业已经相当发达了。”^④但是,“九会”一词,有人解释是“三段三面雕像”^⑤。倘从上下文义细加推敲,“白檀华严经九会”似是佛像,疑非佛经。

根据文献记载,岭南刻印的书籍,最早是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郭之美著《罗浮山记》1卷^⑥。据《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引宋朝《洞天书录·刻书》:“凡刻书之地有三,

① 施廷镛:《中国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小说杂类一》。

③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近时传一书,曰《龙城录》,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铨性之伪为之。……又作《云仙散录》,尤为怪诞,殊误后之学者。”

④ 枫林:《广州早期的出版业》,载《南方日报》,1981年5月24日。

⑤ 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⑥ 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

吴也，楚也，闽也。……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这说明宋朝广东刻印书籍，在全国有其地位。当时广州、潮州、惠州、韶州均有人刻印书籍。

按照惯例，民间生活常用的日历等物刻印较早，少数人用的经书刻印较迟，所以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冯道提出刻印“九经”时在奏章中说：“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无经典。”^①由此推知，岭南的出版情况也应如是。日常需用的印刷品，通常不会见诸记载。而且，岭南气候温热潮湿，书籍容易虫蛀霉坏，加以屡经兵燹，大量书籍被毁，所以岭南的出版情况难以确考，但是可以估计，在北宋郭之美刻印《罗浮山记》之前，即唐末五代，岭南应有刻印出版业出现。

二、扬名后世的私家刻本

岭南的出版活动以私家刻书为最早，也以私家刻书为最好，因为私家对刻书有独特的积极性。

随着宋仁宗时郭之美刻印《罗浮山记》，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谭粹著《罗浮集》10卷，由宝积禅寺刻印^②。看来木刻印刷与佛教宣传有密切关系。宋朝末年，李昉英著《文溪存稿》20卷，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由其门人李春叟为之刻版，但刻印质量较差，现在流传的是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年）李昉英后人的重刻本。李春叟刻印本质量较差，主要是财力不足之故。

^① 《册府元龟》608卷。

^② 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

岭南私人刻书以清朝为最盛。曾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说：“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①他提出刻书可以名传后世，乃是经验之谈，某些富家愿出重金聘请学者访求古籍，由良工镌刻书板，其原因盖出于此。广州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为全国对外贸易的惟一港口，出现财力强大的“十三行”贸易垄断集团，其中某些巨富均聘请知名学者参加编纂工作，以雄厚资金来大量刻印书籍，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称赞此辈刻书“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他把这些富商致力出版事业，与14至16世纪意大利等国早期资产阶级所掀起的思想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等量齐观，可见其评价之高。这时宋明理学已进入穷途末路，空疏迂阔，无补于世，代之而起的“实学”强调经世致用。“实学”是理学通往“新学”（近代西学）的桥梁，所以有人称为“早期启蒙思潮”，当时富商刻印的书籍，多为“实学”作品。富商中的突出人物有：

伍崇曜（1810—1863年），原名元薇，字紫垣，商名绍荣，广州府南海县人，其父伍秉鉴，为“十三行”中之首富怡和行行主，他继承巨产，欢喜结交文人学士，在学海堂学长、粤秀书院监院谭莹协助下，初期纂辑刻印乡土文献，计有：《岭南遗书》第一集至六集，始于明朝黄瑜《双槐岁钞》，终于清朝释成鹫《纪梦编年》，收书61种，凡348卷；《粤十三家诗集》，始于宋朝李昉英《文溪诗集》，终于清朝易宏《灵华阁诗略》，收书13种，凡191卷；《楚庭耆旧遗诗》两集，前集

^① 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附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为清朝陈昌齐至李秋田等 19 人诗作，后集为吴兰修至伍宗泽等 19 人诗作，共 74 卷。其后，伍崇曜命名编纂上述丛书的所在为“粤雅堂”，刻印《粤雅堂丛书》，从道光三十年至光绪元年（1850—1875 年），历时 25 年，分初编、二编、三编，共 30 集，收书 213 种，凡 1 347 卷，侧重孤本秘籍，因而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得以流传于世。这套丛书的初编、二编各书跋文，署名伍崇曜，多为谭莹手笔，议论精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三编刊印时，伍崇曜、谭莹均已去世，由伍绍棠撰写跋文。此外，伍崇曜还刻印王象之《舆地纪胜》200 卷、张月霄《金文最》120 卷；共刻书 290 种，凡 2 280 卷，内容涉及经史考证、天文、地理、金石、数学、音韵、传记、书目及诗文集，范围很广^①。

潘仕成（1803—1873 年），字德畬，广州府番禺县人，为“十三行”中的同孚行潘正炜族人。道光十二年（1832 年），参加顺天乡试，为副贡生。当时北京地区饥荒，他捐赈巨款，获钦赐举人。后因捐制火炮、水雷及帮办洋务，加布政使衔。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特旨补授两广盐运使，因本地人不宜在本地任职，坚决推辞，后改授浙江盐运使，但未赴任，晚岁因盐务亏损以致破产，不久去世。他早年资财雄厚，乐善好施，在广州荔枝湾畔兴建“荔香园”，又名“海山仙馆”，占地广袤，亭榭楼阁，备极华丽，为岭南园林之冠。他在馆中经常接待名士，谈论学问，辑刻《海山仙馆丛书》，收书 63 种，凡 488 卷。这套丛书的《例言》明确提出：“诸书或前人汇选，或坊肆通行，或家塾所藏，购求易得者，无庸收入。其书数

^① 李春光：《粤雅堂丛书述略》，载《广东出版史料》第二辑。广东新闻出版局编，1991 年。

医药调变种植方外诸家者流，亦有可观，不妨兼采。惟游戏无益之作，文虽精妙，多从割爱。”又提出：“诗集美不胜收，仅略存一格。讲武之书为当务所急，四夷记录亦足广见闻，固不嫌于人弃我取。”因此这套丛书，除经史考证、传记、书目、音韵、文字训诂、诗词文集之外，还有数学、医学、天文、地理、机械制造等作品。如德国人汤若望口授、焦勳笔录《火攻挈要》，意大利人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利玛窦口授、李之藻演绎《同文算指》、《圆容较义》，葡萄牙人马吉士《新释地理备考全书》，英国人合信与华人陈修堂合著《全体新论》（医书）等。上述各书附以大量插图，是其特色。他把西人著述辑入丛书之内，开风气之先，可谓独具慧眼，这大概同他长期帮办洋务、捐制西式武器有关^①。

这时，广州不少学者也纷纷刻印丛书，均为其本人著作。如陈昌齐撰《赐书堂全集》（又名《陈氏遗书》），收书8种，凡27卷；曾钊撰《面城楼丛刊》，收书3种、19卷；林伯桐撰《修本堂丛书》，收书12种、93卷；梁廷楠撰《藤花亭十七种》，收书17种、95卷；又撰《海国四说》，收书4种、14卷；吴兰修撰《岭南丛书》，收书4种、13卷；张维屏撰《张南山全集》，收书12种、146卷；陈澧撰《番禺陈氏东塾丛书》，收书5种、34卷；桂文灿撰《南海桂氏经学丛书》，收书16种、64卷；徐绍桢撰《学寿堂丛书》，收书12种、89卷；邹伯奇撰《邹征君遗书》，收书10种、9卷；汪琮撰《随山馆全集》，收书7种、31卷；潘飞声撰《说剑堂著书》，收书14

^① 李绪柏：《潘仕成与〈海山仙馆丛书〉及其他》，载《广东出版史料》第二辑，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编，1991年。

种、14卷，以上仅列其荦荦大者，至于卷帙较少的丛书及诗文集，实在难以枚举。这些丛书的刻印，形成岭南学术事业的繁荣局面^①。

与此同时，一些任官多年的藏书家，也以其珍藏秘本刻印丛书，如：方功惠辑《碧琳琅馆丛书》，收书45种、285卷；冯兆年辑《翠琅玕馆丛书》，收书92种、137卷；李光廷辑《守约丛书》，收书63种、160卷；金武祥辑《江阴丛书》，收书38种、118卷；又辑《粟香室丛书》，收书38种、178卷。这些丛书也使不少罕见之作得以传世。

值得提出的是，清朝同治八年（1869年），新会陈焯之聘请李文田等校勘、独资刻印“二十四史”3243卷，刻工精美，纸质优良，诚属难得。

三、显示政绩的官府出版

宋朝统一全国，鉴于唐末五代骄兵悍将割据称雄的混战局面，实行崇文黜武。加以生产力比前提高，为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当时广州是全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市场繁荣，财力宽裕，地方大员执行朝廷政策，重视文化教育，热心刻印书籍，也就理所当然。

根据现存史料得知，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廖德明任广州知州，设立“师悟堂”，刻印朱熹《家礼》和程颢、程颐的著作^②。这“师悟堂”当是早期的岭南出版机构。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曾噩认为四川刻印的

^① 李绪柏《清代广东所刻丛书初探》，载《广东出版史料》第三辑，广东新闻出版局编，1992年。

^② 脱脱：《宋史·廖德明传》。

郭知达《集注杜诗》36卷纸质较差，字句缺误，不能令人满意，于是由管理财政的广南东路转运使出资刻印，聘请进士陈大信等人校勘，故此书校对准确，刻工精良，用纸上乘，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称为善本，可见这时广州刻印书籍已达到较高水平。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刘克庄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他同提举常平李鉴发起刻印真德秀《文章正宗》，委托官员卢方春等设局刊印^①。这是岭南出版史上一件大事，因为书局的出现，说明官刻书籍已由政府设置独立的出版机构，专职办理，这对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宋朝重视编纂刻印地方志。司马光《河南志序》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调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者知其利害。”盖因中央政府通过方志可以了解各地概貌，地方大员也可凭此熟悉当地情况。岭南何时编纂刻印方志，无法得知，现在可以查考的是：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陈岷任广州知州，重视城防工作，加筑翼墙，修葺孔庙、州学，主持编纂刻印《南海志》^②；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方大琮任广州知州，维修广州城楼，创办禺山书院，也主持编纂刻印《南海志》^③。

广州州学是一州的最高学府，为配合教学需要，因而刻印书籍，现可查考：广州州学于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刻印真德秀《文章正宗》20卷、续集20卷，淳祐十年（1250年）刻印胡寅《叙千古文》。宋末元初，元军四度攻入广州城，战斗十分激烈，城内的南海县学、番禺县学均毁于兵火，这两间县学曾否刻印书籍不得而知，因为宋朝岭南刻本全部失

^① 刘克庄：《后村集》。

^{②③} 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

传。

元朝在岭南建立政权仅数十年，官府很少刻印书籍。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陈大震奉广东道廉访使陆义斋之命，重修《南海志》，但这个刻本到明朝已残缺不全。

明朝各地遍设学校，需要大量书籍。这时岭南的农业、手工业较前发展，对外贸易活跃，市场经济繁荣，有助于出版事业的兴旺，因而刻印书籍超过宋、元两朝。据明朝周弘祖《古今书刻》载：明太祖洪武元年至穆宗隆庆二年（1368—1568年），广东布政司、按察司和广州府、南雄府、廉州府、惠州府、肇庆府、雷州府、潮州府、韶州府、琼州府均刻印书籍，共50部，多为经史及理学著作，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然其记载似欠完整，例如，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刻印戴璟《广东通志初编》40卷，嘉靖四十年（1561年）刻印黄佐《广东通志》70卷，均未叙录。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以后，岭南刻书更多，只因明末清初的战乱，很多书版被毁失传。

清朝统一全国后，重视发展经济，广州对外贸易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全国垄断地位，雄厚的物质基础，促使刻印书籍进入鼎盛阶段。当时封疆大吏热心文教事业，其中最突出的是阮元于仁宗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张之洞于德宗光绪十年（1884年）先后担任两广总督，在广州大量刻印书籍，上行下效，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这时广州不仅刻印学术价值较高、卷帙浩繁的众多丛书，由一百数十卷至数千卷不等，而且刻印技术显著提高，可以套印多种颜色，眉批、夹注颜色不同，阅读时非常醒目，因而广州刻印的书籍畅销各省，步入全国出版业的前列。

清朝在实行“同（治）光（绪）新政”期间，各省先后

设立官书局，刻印书籍，其中五间知名的为金陵、浙江、苏州、淮南、崇文官书局。有人以为，岭南的官方书局，始于同治七年（1868年）设立的广东书局^①。其实不然。早在嘉庆十年（1805年）二月初七日，清仁宗鉴于西方殖民者以护商为名，派兵船前来岭南，因此下令给两广总督那彦成：“那彦成到任后，惟当遵照节次谕旨，修明武备，整顿营伍，使奸徒闻风自远，以慑外夷，而靖海疆，方为不负委任。”为了配合海防工作，后来广州设立广东海防书局，聘请学者陈鸿墀、梁廷楠、曾钊、林柏桐、吴兰修为纂修，编写刻印有关书籍，其中最著者为《广东海防汇览》42卷、《粤海关志》30卷。嘉庆二十三年（1817年），两广总督阮元设局编纂刻印《广东通志》，聘请学者陈昌齐、刘彬华、江藩、谢兰生任总纂，吴兰修、曾钊、刘华东、胡傅、郑浩若、余倬、崔弼、吴应逵、李光昭、方东树、马良宇任分纂，凡334卷，至道光二年（1822年）完成。这期间，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两广总督署刻印任兆麟《有竹居集》5种16卷。文宗咸丰十年（1860年），两广总督劳崇光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学海堂的《皇清经解》书版大部分被毁，于是聘请学者郑献甫、陈澧、谭莹、孔广镛为总校，在广州城西长寿寺（位今长寿路）设局刊印《皇清经解》，并略有补充，共1408卷，至同治元年（1862年）完成。同治三年（1864年），朝廷下令各省进呈地图，广东巡抚郭嵩焘在广府学宫（今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设局绘制刊刻《广东图志》。上述书局、局似属暂设机构，书籍编纂刻印完毕，随即解散，以后才过渡为常设出版机构。

^① 李绪柏：《清代广东所刻丛书初探》，载《广东出版史料》第二辑，广东新闻出版局编，1992年。

广东书局由两广盐运使方濬颐等创办，方不久离任，由两广盐运使钟谦钧主其事，刻印《十三经注疏》（附考证）347卷，《通志堂经解》收书144种、1792卷，《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收书37种、238卷，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谦钧因病引退，广东书院随之结束。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文明门外聚贤坊创办广雅书局（今文德路中山图书馆南馆），由两广盐运司综理局事，先后聘请学者陶福祥、廖济群等为总校，李肇源、屠进、陶浚宣、何翰章、王仁俊、吴翌寅、黄涛、沈葆和、丁树屏、黄士凌、潘元杰、史悠咸、罗忠济、许之璇等为分校，皆学识渊博之士，故校勘精审，版本完善，很受社会人士称赞。其中刻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收书148种、2923卷；《钦定全唐文》1000卷；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746卷；以及一批珍本秘藏，共刻书200多种、9000多卷，主要为经史、地理及诗文集，光绪三十年（1904年）停办。1920年，徐信符抽取广雅书局所刻版片大小相同者，汇编为《广雅书局丛书》，共161种、2366卷。当初广雅书局刻书堪称在全国影响最大。

四、促进教学的书院刊印

古代书院因教育与学术研究的需要，必须储存一批书籍，以供师生研阅。财力充裕的书院，进而刻印书籍，出版发行，为弘扬传统文化作出贡献。岭南的书院也是如此。刻印书籍需要巨额资金，所以广州的几间大型书院，刻印书籍较多；省内其他州府的书院，经费并不充裕，刻印书籍较少；至于各

县书院，则仅收藏该县县志版本；个别书院刻印当地先贤的文集，作为纪念^①。

宋元时期，岭南的书院刻印何种书种，已不可考。明朝中期，广州崇正书院刻印书籍较多，所刻《诗经》、《汉书》、《后汉书》、《宋史》、《蔡中郎集》等，校勘精良，历来为收藏家所重视。

清初，屈大均在广州城南创办三间书院，讲学其中，并刻印发行自己的著作，其中以《广东新语》最畅销，从潘耒所作序文得知，康熙年间至少出版两次。其后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均有翻刻。

广州的书院，刻书最多的当推学海堂，先后刻印的书籍有：《皇清经解》（阮元辑），收书 183 种、1 408 卷；杜佑《通典》200 卷；乾隆敕编《续通典》144 卷、《皇朝通典》100 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附存简明目录 230 卷；《古经解汇函》、《小学汇函》（钟谦钧辑），收书 37 种、283 卷；《十三经注疏》（乾隆钦定）416 卷；以及史地、诗文集等共 38 种、3 000 多卷。其中《皇清经解》由道光四年（1824 年）开刻，历时五年，至道光九年（1829 年）才刻成，手工印刷后，装订为 360 册。所刻书版共 109 架，由学长（即校领导人）保管，如果书坊愿意前往刷印，每刷印一部要交纳版租及看守茶资白银一两二钱四分。因所刻书版藏于堂内文澜阁，故称为文澜阁本。刻版时，在堂内启秀山房校勘，所以又称为启秀山房本。学海堂的学长全是著名学者，知识渊博，校勘认真，刻印书籍质量均属上乘，颇享盛誉。

广雅书院本身不刻印书籍，由广雅书局专职从事此项工

^①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8 年版。

作。菊坡精舍刻印《通志堂经解》(纳兰性德辑)收书144种、1792卷,以及《古经解汇函》、《小学汇函》、《十三经注疏》^①。上述书籍一说由广东书局出资刻印,但书版藏于菊坡精舍^②。还刻印宋朝陈旸撰《礼书》150卷、《乐书》200卷和其他书籍,共约近3000卷。应元书院刻印《朱子语类》,粤秀书院刻印课艺。肇庆府端溪书院刻印先贤诗文集较多;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印《端溪丛书》20种,装订为18册。外界人士有欲印书者,可自备纸墨,每印一册交版费银六厘,但不许携版出院印刷^③。

五、牟取厚利的书坊雕镌

岭南刻印书籍当以书坊为最多,书坊又称书肆、书林、书堂、书棚,类似现在的书店。其目的在于追求利润,因此欲论刻书质量,亦以书坊为最差。

近代广东著名藏书家徐信符《广东版片纪略》认为,明朝“隆庆、万历而后,乡先哲遗著其属于家刻者,多属写刻,字体端正,不至令人望而生厌。从来镌工之美恶,视乎书法之优劣。明末清初,如邝海雪(即邝露,字湛若)之《峤雅》,其原刻本甚精美,为湛若自书,而督人雕刻,虽原本杂用奇字,辗转假借,体多晚俗,不尽可为典要,然其字有体势,锋棱活动,非良工不易为。梁朝钟《喻园集书》,用颜柳体,端严有度,楷体亦甚精工。……以技术言,家刻本皆写刻不俗,惟坊刻本则庸恶陋劣,漫无别择,且坊间所售,止

①③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② 钟谦钧:《古经解汇函序》。

学馆所诵习，洎科场应用之书。”道理很简单，家刻本作为名山事业，传之永久，为此精益求精。而坊刻本在于市场效益，如果讲究刻工，势必增加成本，难以打开销路，纵有销路，获利也会减少。

据林子雄编《广东书坊录（明清部分）》载，从明朝嘉靖十六年（1537年）至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374年间的不完全统计，广东有书坊326间，可谓遍布省内各地。这些书坊以楼、堂、馆、阁、轩、园、斋、记、号、局、院、庄、店、坊、栈、山房、书屋等为名，其业务范围十分广泛，除刻印经、史、子、集之外，有的还刻印小说、剧本、唱词、日历、医药、符篆、佛经、道藏以及日常所用印刷品。唐朝柳玭《柳氏家训·序》：“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銮輿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①这种情况想必各地都存在，广东的书坊也不会例外。

广州城内书坊众多，有的历史悠久，长达百年以上。在这期间，尽管广州城经历帝国主义者进行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摧残，但业主祖孙数代仍然苦心经营，例如，书坊比较集中的西湖街，业主刻印书籍的年代，经查核得知，心简斋从清朝乾隆四十七年至光绪二十五年（1782—1897年），长达115年，富文斋从清朝嘉庆十九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14—1901年），长达87年。有的书坊刻印专业性的书籍，如专印医书有广州的福兰堂、云林阁、翼化堂、宏经阁、佛山的翰文堂、文光楼、元吉轩、宝华阁，肇庆的景福局，潮州的聚

^① 转引自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唐明宗纪》注文。

贤堂、同文善堂等；专印史籍有广州的木天阁、文汇堂、业文堂，佛山的文林阁、文盛堂，新会的三贤书屋，潮州的瑞文堂等，专印小说的有广州的青云楼，佛山的会元楼、三元堂、福文堂，东莞的萃英楼等，专印诗集有广州的广文堂、聚升堂，潮州的有文楼、文在堂，江门的临江阁，高州的富文楼等；甚至刻印民歌、族谱、年谱、舆图、金石、算学、占卜、农学，也有专业性的书坊^①，这种分工有助于刻印技术的提高。值得一提的是，清朝苏州书商把书稿携到广东顺德县马岗乡刻成书版，该乡男女老少都会刻字，并刻得很好，其后书商把书版运回苏州印刷，作为苏州版本出售。由此可见，广东刻版技术受到外地的重视^②。

清穆宗同治十一年（1872年），广州开始设立机器印刷厂。由于木版刻印书籍成本高，效率低，不够美观，难以储运，因而逐渐为机器印刷所代替。生产工具的改进，导致生产组织的变革，封建社会私家、官府、书院刻印书籍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新型书坊，即近代化的出版机构逐渐兴起。

六、传播新知的近代报刊

木刻印刷书籍在宣扬封建文化、巩固封建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机器印刷的报纸、期刊则对近现代人们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最早和西方人士接触的岭南地区，也最早出版了起源于西方的报纸、期刊，用作精神武器来推动社会前进。

^① 林子雄《广东书坊录（明清部分）》，载《广东出版史料》第三辑，广东新闻出版局，1992年版。

^② 枫林：《广州早期的出版业》，载《南方日报》，1981年5月24日。

岭南人民最早创办的报纸，是新会伍廷芳于咸丰八年（1858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外新闻》，篇幅很小，分类记事。至于内地最早出版的报纸，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广州创办的《羊城采新实录》，内容不详。光绪十年（1884年），广州创办《述报》，由多宝大街海墨楼石印局承印，每日出四版一小张，报道中外时事，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每月汇编成一卷，名为《中西近事汇编》。当时正值中法战争期间，该报发表大量消息和言论，痛斥法国侵略越南，赞美中国人民英勇抵抗，谴责大臣贻误戎机，坚决反对主和滥调，因而很受读者欢迎，可惜不够一年便停刊。光绪十二年（1886年），邝其照在广州华宁里创办《广报》，志在匡补时弊，因揭露科场黑幕曾被人捣毁。到了光绪十七年（1891年），广东当局以“妄谈时事”封闭该报，但邝其照并不气馁，把报社迁到沙面东桥西路，改名《中西日报》，由英商出名办理，继续批评时政，清吏无可奈何，只好拘捕出售该报的小贩，后因南海县令裴景福入股，迁往朝天街开业。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孙中山在该报发表《拟创立农学会书》，准备在广州起义，这时该报发行量最大，远销越南、新加坡、美国三藩市等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该报发表义和团获胜、八国联军战败的消息，帝国主义者迫使广东当局查禁，该报乃改名《越峤纪闻》。当《广报》停刊时，劳际胜、武子蹈等在广州沙基大街创办《岭南日报》，宣传爱国反帝思想。其后《博闻报》等相继创办，宗旨与《广报》相似。

为救亡图存，鼓吹变法维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康有为、何穗田等在澳门创办《知新报》；次年，潘衍桐、黎国廉在广州十八甫创办《岭学报》（旬报），接着又创办《岭海报》（日报），广东学政司曾发函要各县童生订阅。这些报

纸对推动戊戌变法起了很大作用。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很重视宣传工作，为避免清朝迫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香港士丹利街创办《中国日报》、《中国旬报》，号召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鼓吹民权思想，驳斥保皇谬论，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中国日报》社址也是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其后，同盟会员郑贯公在香港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进行革命宣传，影响甚好。但这些宣传革命的报纸，也受到广东地方大员与港英当局勾结，进行各种迫害。光绪三十年（1904年），广州创办中兴通讯社，是国人最早自办的新闻通讯社。

革命必须宣传。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止，同盟会先后在广州创办15种报纸，其中包括潘达微主编的《时事画报》、《时谐画报》、《平民画报》。这些报刊在清朝的残酷统治下，有的很快被迫停刊，有的编辑被捕入狱，但对促进岭南人民的政治觉醒，产生良好作用。与此同时，岭南还出现一批以营利为主的商业报纸和保皇派报纸。

据不完全统计，1884—1911年，在27年间，广东地区先后出版的中文报刊157种，其中在省内各地出版日报69种（广州最多），半周报、五日报、周报各1种，画报7种，期刊43种；在香港出版的32种（不包括外文报刊），澳门出版的3种^①。新闻事业的兴旺，促进岭南文化的发展，它使广大读者眼界开阔，了解国内外形势，容易接受新思潮，激发爱国热情，广东成为革命策源地，报纸作出不少贡献；它为文艺作品的发表提供广阔园地，大量刊登诗词、小说、说唱文

^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学、剧评、政论、美术作品，有助于一批诗人、作家、学者、艺术家的成长；它及时提供各种经济消息，使岭南城乡贸易得以活跃。广州有些报纸还兼办书局、学校，如《安雅报》与安雅书局、明强学堂，《时敏报》与时敏书局、时敏学堂，《羊城日报》与开新书局、新少年学堂，都是三位一体，互相配合，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文化水平。

辛亥革命后，岭南的报刊业发展很快，1912年，仅广州出版的报纸便达30种^①。由于中国政局不久就为帝制余孽、封建军阀所操纵，因此人民未能享受言论出版自由，岭南的出版事业只能在崎岖的道路上蹒跚前进。

^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十二章 同声异调 顿挫抑扬

——互不相通的方言土语

中国地广人多，各个地域的文化发展不平衡，加上远古时代有难以计数的种族、部落，这就产生各种方言、土语。秦朝统一全国后，实行文字统一的政策，这为语言的统一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广东与中原等地在语言上仍有明显差异，以至外地人士初到广东，在语言上顿生茫然之感。

广东原是百越族聚居之地，分支繁多，方言原本就不少。秦朝以后，由于逃避战乱、商业经营、仕宦讲学、军队驻防等原因，历代均有各省人士前来广东，这就产生本地方言与外地方言混合形成的语言，主要是广州话、潮州话、客家话三大类，至于小范围的方言则有数十种之多。即使是广东人，也不可能掌握广东的全部方言。

一、流行较广的广州话

广州是广东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广州

话在全省流行，但主要在广东中部、西部约 60 多个县、市，以及广西部分地区、香港、澳门和东南亚、澳洲、美洲的广州籍华侨中使用。它是广东诸方言中最主要的一种。

广州话过去称为广府话，因为从南朝开始设置广州都督府，简称广府。又因广东省治在广州，广东简称为粤，所以广州话称为粤语、广东话、省城话。此外，还有人称之为“白话”。它是汉语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客方言）中语言现象复杂、保留古音特点和词语较多的一种方言。

早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任嚣、赵佗率领大军进驻番禺（今广州市），当时番禺只是珠江漏斗湾内百越族的居民点，面对大海，还未建城，可见居民不多。任嚣来到才首次建城，取名“番禺”，从字面解释，“番”与“蕃”、“藩”相通，有“屏藩”之意；“禺”与“隅”相通，作“区域”解。“番禺”二字，意即“边远地区”或“保卫边远地区”。因为“番禺”远离京城，所以任嚣用这两字作为地名。任嚣的籍贯已不可考，赵佗是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①。真定原属赵国，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 228 年），秦军统帅王翦吞并赵国，赵佗可能在这时加入秦军。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 223 年），王翦率兵击灭楚国，攻占江南地区。其后任嚣、赵佗挥师进驻岭南，由此推知，秦军使用的语言，当是北方方言。而番禺土著居民百越族使用的语言，则近似今天的壮族方言。清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广东瑶、壮二种，瑶乃荆蛮，壮则旧越人也。”因此广州话与壮族方言有血缘关系。笔者在广西北部与壮族人士交谈，对方就认为广州

^①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

话与壮族方言相近。由此可知，广州话是在古代百越族语言的基础上，长期吸收中原和各地方言融合而成。

有人认为：在秦始皇派兵岭南之前，已有一些中原汉人进入广东、广西。促成粤语的出现和形成，首先不是秦时的移民，而是楚人南迁，楚方言流传、扩展的结果^①。这个论点值得商榷，因为：一、粤语以广州城区的语言为标准音，广州附近至今尚未发现先秦时期楚国文化遗存，可见楚国人当时尚未来到番禺（广州）。二、与楚国邻近的广东、广西北部，语言比较复杂，广东北部主要流行客家话和少数民族语言，只有小部分人使用粤语；广西北部不使用粤语。三、先秦时期楚国与岭南之间有五岭阻隔，交通极不方便，所以岭南出土的楚国文物不多，不会有很多楚人南迁。综上所述，可见粤语的形成，决非在秦军到来之前因楚人南迁导致楚方言流传、扩展的结果。

据司马迁《史记》中《秦始皇本纪》和《南越列传》的记载，秦军进驻番禺没有经过战斗，因此不需动用很多兵员，随后的移民是“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②，可以肯定其人数也不多。因此秦军不能用北方方言取代百越方言。要在岭南立足，秦军在好些方面必须和当地人士打成一片，岭南当时没有文字，作为语言的三要素，即语音、语汇、语法，百越语言不能不受北方方言中语法、语汇的影响；而在岭南的秦军，其语言中的语音也不能不受百越语音的影响。对此，清朝阮元《广东通志·輿地略》指出：“古称缺舌者（言语难通），为南蛮、瑶、岐诸种是也。自秦以中土人与赵佗，风俗

①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已变。东晋、南宋衣冠望族，向南而趋，占籍各郡，于是言语不同。省会（即广州）音柔而直，歌声清婉可听，唯东（莞）、新（会）各邑，平韵多作去声。韶（关）、南（雄）、连州地连楚、豫，言语大略相同，其声重以急。惠（州）之近广（州）者，其音轻以柔，唯齐与灰、庚与阳四韵，音同莫辨。兴宁、长乐（今五华县）音近于韶（关），谓‘我’为‘哎’，广（州）人呼为‘哎子’。东至潮（州），语同闽，有音无字，与广（州）人语多不通。肇（庆）、高（州）、雷（州）、廉（州）土音略与省会（广州）相合，而舌本强。广州呼人曰‘个’、畜曰‘只’，而诸郡相反。琼岛（海南岛）孤悬海外，音与潮（州）同，杂以闽人，间有与廉州相似，类广西梧州音者，名西江黎语云。”这对岭南语音作了扼要的概述。但是对广州话何时定型，却未提及。

岭南自秦军进驻后，两汉 400 多年之间，一再派遣重兵前来平定叛乱；东晋南朝，中原战乱频仍，流民大批南迁；唐朝重修大庾岭山路；宋朝整治北江水道；1000 多年来，中原及各地人士络绎定居广州，广州话逐渐定型。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疍人，以舟为室，浮海而生，语似福（建）广（东），杂以广东、（广）西之音。”这是广东音（即广州话）见诸记载之始。现在称为“水上居民”的疍人，古代分布于福建、广东、广西沿海港湾及珠江三角洲，其语言似广州话，因为过去广州长期有大量“水上居民”。

广州话的特点是：它保留了部分古汉语，如，“看”称为“睇”，“站立”称为“企”，有一些古越语的残余和方言字，外来语也较多，如，“小店”称为“士多”、“出租汽车”称为“的士”，等等。在语音方面：广州话的声母数目有 20 个，这和普通话差不多，但韵母和声调比较复杂，韵母有 53 个，比

普通话多三分之一；声调有8个，即平、上、去、入四声中，各分阴、阳，有人认为是9个，即入声分高、中、低。在语汇方面：有些用词和普通话略有不同或完全不同，如，“荸荠”称为“马蹄”、“冰箱”称为“雪柜”；有的复合词的词序颠倒过来，如，“公猪”称为“猪公”、“整齐”称为“齐整”。在语法方面：广州话和普通话也有一些差异，如，“你先吃”说成“你吃先”、“我比你大”说成“我大过你”。三者之中，主要差别在语音。

广州话历史悠久，流行的地区广阔，因而各县、市使用的广州话，均略有差异，最突出的是台山、新会、恩平、开平（俗称“四邑”）使用的台山话（又称“四邑”话），与广州话有较大差异，很多广州人也听不懂台山话，但是语言工作者仍然把台山话列入广州话的范围之内。

二、系属闽南的潮州话

潮州话又称汕头话、福佬话，一般称为潮汕方言，简称潮语，它主要流行于广东省东南部10多个县、市，以及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的潮汕籍华侨中。尤其是泰国华侨，很多人会讲潮语。

广东潮汕地区邻近福建南部，福建人不断移居广东，因此潮语受福建话影响，属于闽方言中的闽南系，其远祖和吴语有关^①。对此，明朝王士性《广志绎》解释说：“潮（州）为闽越地。自秦始皇属南海郡，遂隶广（东）至今。……潮

^① 李新魁：《广东闽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载《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3、4期。

(州)在南交之外,又水自入海,不流广(东),且既在广(东)界山之外,而与汀(州)、漳(州)平壤相接,又无山川之限,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州)同,而其语言又与漳(州)、泉(州)二郡通,盖惠(州)作广(东)音而潮(州)作闽音,故曰潮(州)隶闽为是。”原来早在远古时候,现今潮汕地区的土著居民属闽越族,流行壮侗语或苗瑶语。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先后破灭,其族人不断南迁闽、广;秦、汉时期,中原人士相继移入;唐、宋、元、明均有大量闽人前来定居,因而到了明朝,潮语才最后定型^①。

潮州话的特点是:它保留了古闽语的一些特点,实际上也是古吴越语、古汉语的特点。和广东西部的雷州话、海南岛的海南话有某些相近之处,但和广州话、客家话差别很大。在语音方面:潮州话有声母18个;韵母比较复杂,一说有77个,一说有79个,一说有90个。这大概是使用潮语的县市不同而出现的地域差异。声调有8个,即平、上、去、入四声各分阴、阳两类。有音而没有字的情况比较多,方言字也比较多;有些字音,单读时有其声调,称为“本调”,若与其他字连起来读,其本调却要改变,这现象称为“连读变调”。同时,在潮州话中,“文白异读”比较突出,即一个字的读音称为“文读”,谈话时这个字音称为“白读”,两者并不相同。在语汇方面,潮州话使用的古词较多,如:“眼睛”称为“目”,“游泳”称为“泅”。有很多本方言特有的词语,如:“起床”称为“走起”,“自我表扬”称为“旌功”。有些单音词重叠后,可作形容词,如“猴猴”形容人瘦弱,“柴柴”形容人的样子呆板。由于对外交往,也有不少外来语,除英语

^① 林伦伦:《潮汕方言与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外，因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人较多，所以吸收了一些马来语，如“手杖”称为“洞角”，“饼干”称为“罗的”，等等。在语法方面：潮州话也有其独特之处，词头、词尾有一些常用的前缀、后缀，以加强感情色彩，前缀有“老”、“阿”等，后缀有“团”、“仔”、“伙”、“鬼”、“头”等。名词、动词、形容词重叠使用，使词语表示不同的含义或增加生动性。如，“仙仙”表示“不懂世事的樣子”，“拼拼拍拍”表示“出力干事”，“野样野样”表示“难看”，“条条直直”表示“有条不紊”，等等。

潮语流行的各县、市的语音，也有微细的差异。

三、接近普通话的客家话

客家话又称梅县话，个别地方称为俚话、麻介话，等等。在广东省内，客家话使用人数在广州话、潮州话之下，居第三位，但覆盖面积仅次于广州话。它在广东省主要流行于东部、北部，10多个县、市，以及西部和沿海县市部分居民中；其他省（区）、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侨中，也有人使用客家话。

客家话一说在宋朝、一说在明清时期定型。有人提出，客家从东晋由中原南迁时，曾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居留，故曾受当地语言影响，客家话比较接近江西的赣方言，也有人认为比较接近两湖方言。又因早期客家和畬族共同聚居，所以彼此间语言有很多共同之处。清朝客家学者黄遵宪认为：“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语言不少变。有《方言》、《尔雅》之字，训诂家失其意义，而客人犹识古义者；有沈约、刘渊之韵，词章家误其音，而客人犹存古音者。”所谓“犹存古音”，清朝学者陈澧说：“客

音多合周德清《中原音韵》”。^①周德清是元朝江西高安人，音韵学家，于泰定元年（1324年）撰《中原音韵》，后来北曲作者、演员唱曲，正音咬字，多以此书为依据。

客家话的特点是：保留一些古语和中州音韵，如，“黑”称为“乌”，“中午”称为“昼”。除了本方言特有的词语外，还借用其他方言和外来语。在语音方面：客家话有声母19个，一说是17个；韵母74个；声调6个，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在语汇方面：客家话的用语，单音词比较多，如，“浇灌”称为“沃”，“木柴”称为“樵”。本方言特有的语汇较多，如，称雄性动物为“牯”，称雌性动物为“嫫”，称儿子为“赖”，称麻雀为“瓦弄必”，等等。在语法方面：客家话和普通话有差异，和广州话、潮州话也不一样。如，“我比他胖”说成“佢比佢过肥”，“妹妹吃着饭”说成“阿妹食唐逮饭”。

客家人强调：“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但在实际上，客家人的住地比较分散，因而各地的客家话仍有不少差异。

四、各种小范围内的方言

广东三大方言（广州话、潮州话、客家话）的分布，并非各据一方，泾渭分明，而是互相交叉，彼此混合。在广州话方言区，有不少人说客家话、潮州话；在客家话方言区，有不少人说潮州话、广州话。而且，在三大方言区中，还有一些少数人使用的方言，它因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长期保存。

在广东东部、北部的山区，居住着畲族、瑶族、壮族，他

^①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们各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至于居住在城市中的满族、回族，则使用当地的语言。广东北部的韶关市、曲江、乳源、仁化、乐昌、南雄、连县、连山等8县市使用“曲江话”，或称“韶州土话”、“老韶关话”。曲江话流行的地区不广，但其语言分支有15种之多，它不属于广州话或客家话，但又兼备这两者的特点，具有悠久的历史。这是因为韶关地当南北交通要冲，历代从中原等处进入岭南的人士，由此再分散到广东北部各县市居住，这就形成自具一格的曲江话。

在广东沿海地区，古代驻军防守。明朝在今海丰、陆丰、惠东一带设立“卫所”，从浙江、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征调军队前来屯垦。本来，海丰、陆丰濒海处使用潮州话为主，山区使用客家话；惠东使用客家话为主，有些地方使用广州话，而驻军的方言则比较复杂。驻军在屯田垦荒过程中，必然经常和当地人士接触，从而形成独特的方言，称为“军话”。“军话”使用的人数不多，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在惠州市一带，流行广州话和客家话，最后成为两者混合的方言，当地人称为“本地话”，又名“惠州话”。有人认为它属于客家话，也有人认为它属于广州话，总的来说，它比较接近广州话，现仍未有最后结论，但没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独立的方言。

在中山市的东北和南部的沿海地区，从宋朝至明朝，不断有福建人前来定居，分别来自闽中、闽东、闽西、闽南，因而带来了闽方言和客家话，又吸收了当地广州话的某些特点，形成中山闽语，仅流行于中山市境内的沙溪、大涌、张家边、南朗、三乡、隆都等区镇。它以隆都的语音为代表，所以又称“隆都话”。

在广东西南沿海部分地区和雷州半岛，流行雷州话，简

称雷语。雷州话同潮州话、海南话都是闽南方言的分支。溯自唐、宋时期，福建人沿着中国海岸南迁，进入现今广东潮汕地区的饶平、澄海、潮阳、南澳、揭阳、揭西、普宁、惠来、海丰、陆丰、汕尾等县市，也有一些人先后来到珠江口西侧的中山，并西迁至阳江、电白、茂名、高州、吴川和雷州半岛上的湛江、遂溪、徐闻、海康等地，还渡海来到海南岛。雷州话虽然与潮州话都从闽南话分离出来，但是存在差异，因为当初福建移民来到广东阳江以西的沿海地区和雷州半岛后，接受当地土语的影响，从而自成一支。各地流行的雷州话，其间也略有不同。

海南岛沿海地区流行海南话，它和雷州话比较接近。海南岛古称琼州，因此海南话又称琼文话，这是以文昌县的文昌话为标准音之故。海南岛中部的五指山区，居民主要是黎族、苗族，他们各自使用本族的语言。

在广东流行的广州话、潮州话、客家话、雷州话、海南话，均创造了灿烂的语言文化。在说唱文学、民歌、戏剧方面都有显著成就。其中粤剧、潮剧、广东汉剧、琼剧成为广东四大剧种，粤剧在全国也有其地位。

第十三章 岭峽毓秀 江海钟灵

——美不胜收的名胜古迹

岭南地区是旅游者的乐园。它背倚五岭，面临南海，名山有罗浮、西樵、鼎湖、丹霞，大川有东江、北江、西江、韩江。林壑幽深，碧波萦回，山水相映，风光旖旎，加以名胜古迹很多，使人思接千载，胸怀万里，游兴盎然，流连忘返。而且交通方便，气候适宜，没有真正的严冬，也没有持续的酷暑，全年均适宜出游，它有不少著名的土特产，可供游客解颐裹腹，满载而归。在此度假、疗养，心旷神怡，有益健康。它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它是长期对外对内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之处，可资观瞻者历历在目；在近代，中国不少重大事件均在此发生，英雄志士的高风亮节，令人不胜景仰之至！由此可见岭南的旅游文化，颇足称道。

一、浩气长存的革命遗址

作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广州，是富有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尤其是近百多年来，革命前辈在此进行英勇

壮烈的斗争，因而许多革命遗迹永远成为旅游者瞻仰、怀念的地方，这是广州的骄傲与光荣！

广州市北三元里的山岗上，市政府于1950年10月建立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碑文是：“一八四一年广东人民三元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它纪念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三元里附近103乡（村）人民自动组织起来，用刀、矛和农具于1841年5月30日痛歼英国侵略军的功绩，三元里的“三元古庙”，就是当年“平英团”聚众议事的旧址。

市区越华路小东营5号，有一栋四进三间的青砖平房，它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于辛亥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即公元1911年4月27日）发动武装起义的秘密指挥部，黄兴率领敢死队100多人由此出发进攻两广总督署，震撼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成为武昌起义胜利的前奏。现在这幢平房辟为“三·二九广州起义指挥部旧址”。这次牺牲的72位烈士（实际不止此数）丛葬于先烈路黄花岗。1918年，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捐资修建了庄严雄伟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面积16万平方米，园内松柏长青，繁花似锦，亭台池榭，错落其间。园内还有史坚如墓、邓仲元墓、杨仙逸墓、潘达微墓、冯如墓等。先烈路还有庚戌新军起义墓，庚戌年农历二月十二日（1910年3月22日），由同盟会员倪映典发动清朝驻广州燕塘新编陆军（即新军）3000多人起义，在牛王庙附近（今先烈路）与清军激战，指挥官倪映典阵亡，牺牲了数十人，均葬于此墓。

在越秀山南麓，高耸着雄伟庄严的中山纪念堂，为宫殿式建筑物，重檐八角，红柱黄墙，宝蓝色琉璃上盖，高49米，建筑面积3700多平方米。堂西有孙中山纪念馆。这里原是清朝督练公所，辛亥革命后改为督军衙署。1922年5月5日，孙

中山在此就任非常大总统。中山纪念堂现为广州人民集会和举行大型艺术演出活动的重要场所。

离市区东南 20 多公里的黄埔长洲岛, 1924 年 5 月, 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 (俗称黄埔军校); 学习时限六个月一期, 至 1926 年底, 在此共办 4 期, 毕业的学生共 4 981 人。北伐开始后, 第五期军校学生随营北上。旧址现存校门、孙中山纪念碑和他住过的楼房, 楼内现设黄埔军校史料陈列室, 附近有东江阵亡烈士墓及烈士纪功坊。

在中山四路的“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1953 年修缮复原, 辟为纪念馆。该所始创于 1924 年 7 月, 每届培训 1 个多月或 4 个多月, 第一、二届所址在越秀南路惠州会馆, 主任分别为彭湃、罗倚园; 第三、四、五届所址在中山三路东阜大道 1 号, 主任分别为阮啸仙、谭植棠、彭湃, 第六届所址在番禺学宫 (即今址), 主任改为所长, 由毛泽东担任, 此届在 1926 年 5 月开学, 9 月结束, 学员 327 人。先后六届共培训达 800 名农民运动干部。

在文明路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党委旧址, 又称粤区委、两广区委。1924 年底, 中共广东区委扩大后在此办公, 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西南部和海外地区党的工作。1927 年“四一二事件”后, 广东区党委转入地下活动。旧址设有关于中共广东区委史料的陈列室。文明路还有广东省博物馆和广州鲁迅纪念馆。

在越秀南路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 原为惠州会馆。1925 年 5 月,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后, 大力发展工会组织, 统一领导广东、香港的工人运动, 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上海“五卅”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 支援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

的斗争与北伐战争。1927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往湖北汉口，旧址于1958年修缮复原后辟为纪念馆。附近有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位于东堤东园横路，原是荒废的东园游乐场。1925年6月19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此领导20多万香港工人和广州沙面洋务工人进行长达16个月的罢工，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并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发展。旧址现经修缮复原，辟为纪念馆。

在中山三路红花岗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是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英勇就义之处，1957年由政府兴建为松柏苍翠、庄严雄伟的大型陵园，面积26万平方米，园内有“广州公社烈士之墓”，陵园东部有中朝人民友谊亭、中苏人民友谊亭，还有温生才、林冠慈、陈敬岳、钟明光“四烈士墓”。园内开凿了宽广的人工湖，湖边有嘉树、时花、奇石，风景绮丽。陵园西部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先烈东路的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它纪念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在上海英勇牺牲的十九路军烈士。这次激战1个多月，使日本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陵园入口处建有凯旋门式的花岗石门楼，园内有雄伟的纪念建筑群，高约20米的圆柱型花岗石纪念碑和先烈纪念馆。

从广州市驱车北上，可到花县官禄布村的洪秀全故居。清仁宗嘉庆十九年（1814年），洪秀全出生于花县福泉水村后不久，即全家迁此。太平天国金田村起义后，故居被清政府所毁，现复原重建。

二、年湮代远的古建筑物

广州建城2200多年，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建筑物，吸引了

不少游客。

旅游者来到广州，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雄伟巍峨的白云山，山顶常有白云缭绕，以此得名。它由 30 多座山峰组成，面积 28 平方公里，主峰摩星岭，海拔 372.3 米。登山远眺，全城景色尽在眼底。山中古迹很多，历来成为广州的游览胜地。山麓有濂泉寺，寺左的蒲涧，相传为秦朝郑安期（即安期生）隐居之所。白云山南麓的余脉越秀山，高约 70 米，因西汉初年南越王赵佗在此筑台而得名。明成祖永乐初年天都指挥花英在此兴建观音阁，故俗称观音山。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 年），永嘉侯朱亮祖在山顶兴建镇海楼，楼高五层，俗称五层楼，1929 年辟为“广州市立博物馆”，1950 年改为“广州博物馆”。半山原有越秀楼，1920 年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时在此居住，陈炯明叛变时被炮火所毁，旧址后建立“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观音阁旧址建立“中山纪念碑”，高 37 米。越秀山木壳岗有明末绍武君臣冢和虎贲将军王兴墓。越秀山西南麓的三元宫，是岭南著名的道教寺观，为晋怀帝时广州太守鲍靓始建，初名“越岗院”，历代多次重修，明朝万历年间改用今名。

广州著名的佛教“四大丛林”是光孝寺、华林寺、六榕寺、海幢寺。光孝寺位于光孝路，是岭南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据传最初是西汉南越王赵建德的故居。三国时，相传虞翻在此讲学，病故后家人施宅为“制止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 年）改用今名，从东晋至唐朝均有印度高僧来寺传教，对中国佛教有一定影响，寺内古建筑物很多，具有独特的华南古代建筑艺术风格。华林寺位于下九路西来初地，始建于南朝梁武帝普通元年（520 年），一说大通元年（527 年），相传当时印度名僧达摩来此传教，因名“西来庵”，达

摩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此寺在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年)扩建后改用今名。六榕寺位于六槎路,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大同三年(537年),初名“宝庄严寺”,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改称净慧寺,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苏轼见寺内有六株老榕树,题写了“六榕”两字,因此人们称为六榕寺,寺内的“花塔”,八角九层,高57.6米,登高可俯览全市景色。海幢寺位于南华中路,原为南汉时的千秋寺,清朝初年加以扩建,现改为海幢公园。

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教建筑物之一是广州光塔街的怀圣寺,它以怀念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圣人)而得名,据传为早期来华传教的阿拉伯人阿布·宛葛素所建,相传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因寺内有高36.3米的圆柱形砖塔,原名邦克塔,俗称光塔,故此寺也俗称光塔寺,“邦克”是波斯语的音译,为教徒举行礼拜前登塔召唤徒众的唤词。塔址为唐朝“蕃坊”所在地,因而此寺成为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史、建筑史与伊斯兰教史的重要古迹。相传阿布·宛葛素在广州去世后,葬于桂花岗,是为清真先贤古墓,墓室上圆下方,内成洞形,在内诵经、讲话,回声响亮,俗称“响坟”,陵墓附近是历代知名伊斯兰教徒墓地,为广州的伊斯兰教古迹之一。

中国天主教最大的以高直尖顶为特色的哥特式建筑物,是广州一德路的圣心大教堂。它由法国普行善会出资兴建,因用花岗石建成,俗称“石室”。清同治二年(1863年)奠基,历时25年建成。教堂南北长78.69米,东西宽35米,高度由地面至塔顶为58.5米,所有门窗都以红、黄、蓝、绿等深色图案玻璃镶成,避免室外强光射入,使室内光线柔和,形成慈祥肃穆的宗教神秘气氛。

广州著名的宗祠建筑陈氏书院，俗称陈家祠，位于中山八路。它既有中国建筑的传统形式，又富有广东地方的工艺装饰特点，始建于清德宗光绪十六年（1890年），4年后建成，共三进五间、九堂六院，有大小19座建筑物，布局严谨，虚实相间，厅堂轩昂，庭院宽敞，所有堂、院、廊、厅以至门窗、栏杆、屋脊，都饰以石雕、砖雕、木雕和陶塑、铁铸等工艺品。这些精湛的艺术品生动传神，题材广泛，丰富多彩。因此它在1959年被辟为“广东民间工艺馆”。

在广州市区的珠江两岸，有一系列古建筑，首先，在黄埔新港对面，即狮子洋南岸的莲花山，它有40多座山峰，其中麒麟峰的圆形大岩石，像一朵大莲花，上有“莲花石”三字题刻，因此得名。主峰有一座九级八面的莲花塔，建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高50多米，莲花塔之北的山顶有莲花城，建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面积约1万多平方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在此设防。太平天国起义时，广东红巾军首领陈显良也曾在此驻扎。山麓有巨大的岩洞，还有大批奇岩怪石，其中狮子岩形如狮子，屹立于狮子洋畔，是观赏日出和海景的好所在。从黄埔新港溯流而上，可到黄埔附近波罗江畔的南海神庙，俗称波罗庙，它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年），当时这里是广州外港，中外商船均在此停泊，历代帝王均派大员到庙致祭立碑，祈求海船顺风 and 外贸兴旺，因此留下不少石刻，有“南方碑林”之称。再溯流而上，即在城区附近（城墙在1920年拆除），有两座高塔，均在珠江南岸，一为赤岗塔，位于赤岗的红砂岗上，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工程未半而费用告绌，被迫停工，至天启年间（1621—1627年）才竣工，八角九级，内分17层，高50多米，塔基八角均镶有16、17世纪西方人形象的托塔

力士，神态生动，是广州明朝石雕佳作，也是明朝对外交往的实物资料，塔刹已不存；另一为琶洲塔，位于珠江中的琶洲，传说水中常有金鳌浮出，故又名海鳌塔，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年才落成，八角九级，内分17层，高50多米，塔基八角，均镶有高0.5米，宽0.5米的石刻托塔力士，力士呈跪状，头顶塔，双手或单手托塔，刻工古朴，塔刹已不存，塔北原有北帝庙；塔西南有海鳌寺，均已倾毁。现在琶洲已和珠江南岸连成一片陆地^①。

显示广州城有悠久历史的建筑物，是位于解放北路象岗的南越王墓，它是目前岭南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西汉前期彩绘壁画石室墓，是南越国第二代国王“文帝”赵昧的陵墓，距今2100多年，墓地现辟为博物馆。作为反映神话传说的建筑物在市中心区惠福西路的坡山五仙观，过去名为“岭南第一楼”。传说在2800多年前的周夷王时候，有5位仙人穿上5种不同颜色的衣服骑着5只羊，各拿一支谷穗送给这里的居民，并祝福说：“愿此闾閻（市镇），永无饥荒。”说完腾空而去，5羊则留下来变成石块。现存的五仙观大殿及山门始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是岭南目前保留为数不多的明朝木构建筑。殿内的大钟，高3.04米，口径2.08米，重约5吨，铸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是岭南现存最大的铜钟。

三、罗浮青葱韩江萦回

从广州东行到达博罗县，县城西北的罗浮山，又名东樵

^① 广州市文物志编委会：《广州市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

山，享有“南粤名山数二樵”的美誉，为广东四大名山之一（其他为西樵山、鼎湖山、丹霞山）。它由罗山和浮山组成，地跨博罗、增城、龙门三县，蜿蜒 250 公里，大小峰峦 432 座。主峰飞云顶，海拔 1 296 米；山中悬岩怪壑，飞瀑幽泉，风景优美。东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 年），葛洪在此采药炼丹，著书行医，建立道教理论，后人在这兴筑道教寺观；南朝梁武帝时在这兴筑佛教庙宇。现有冲虚古观、葛洪炼丹灶、洗药池等古迹。从博罗东行到惠州市，市区附近的西湖，原称丰湖，由丰、镗、平、菱、南 5 湖组成，一脉相通，南北约 6 公里，东西约 4 公里，面积约 24 平方公里，湖水北通东江，西南群山耸翠，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 年），苏轼与妾王朝云、子苏过，在惠州谪居，后来朝云病故，葬在湖边。湖区现有朝云墓、六如亭、苏堤、东新桥、西新桥等遗迹，湖内洲渚交错，有红棉水榭、百花洲、点翠洲、泗洲塔、九曲桥等景物。泗洲塔建于唐朝，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毁圮，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重建。

由惠州市东去，可到海丰县，1927 年 10 月，彭湃等在此成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现有海丰红宫（原为孔庙）、红场（原为体育场）等革命史迹。由海丰车行到汕头市，市南的岩石，面积约三四平方公里，大小峰丘 34 座，最高为香炉山，山顶两块巨石，高约数丈，色似古铜，状如香炉，云雾弥漫，有如香烟缭绕。此外还有“青龙吐珠”、“桃花涧”、“杏园远眺”、“十四曲”、“西洞泉声”、“老龙洞”诸景。由汕头市溯韩江北上便到潮州市，市东广济桥又名湘子桥，是古代名桥之一，始建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 年），历时 57 年建成。桥东笔架山，有纪念唐朝文学家韩愈的韩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 年）。市区甘露坊的开元寺，始建于唐玄

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是一组比较完整的四合院式的建筑群，寺内有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铸造的大铜钟、元朝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年）雕刻的陨石香炉、明朝的金木雕千佛塔等文物。韩江上游的梅县市，城东阴那山的灵光寺，本名圣寿寺，相传在唐朝懿宗咸通年间（860—874年），高僧潘了拳来此修建茅寮，他死后人们兴建佛寺。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扩建后改今名，占地2万多平方米，布局严谨，结构巧妙，殿内香烟缭绕，而在寺外看不见一丝烟缕，殿后古木参天，而殿顶不留一片落叶，是建筑工艺上一项创造。

四、北江沿岸名刹多

从广州溯北江而上，首先来到清远飞来峡，又名清远峡、中宿峡或禺峡，峡长9公里，为北江小三峡之一（其他是盲仔峡即浚阳峡、香炉峡），沿岸72峰，以飞来寺、藏霞洞、飞霞洞景色最胜。飞来寺又名峡山古寺，在飞来峡南段，始建于南朝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被称为中国佛教“第十九福地”，传说此寺是由安徽舒州延祚寺在风雨之夕飞降此地，因而得名。唐朝裴铏所作传奇《孙恪》（又名《袁氏传》），即以此寺为背景。藏霞洞与飞霞洞都在飞来峡中段，距飞来寺4公里，藏霞洞建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是道教寺观。飞霞洞建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标榜儒、释、道合一。两洞建筑物规模庞大，四周峰峦险峻，怪石流泉，山瀑天成，还有仿刻的古人题字。由此再溯北江而上，来到英德县，离县城1公里的南山山麓，沿北江岸边的石刻绵延150多米，有唐朝到清朝的摩崖石刻70多处，内容丰富多样。县南15公里的碧落洞，前后两个洞口互相贯通，溪流流经洞底，洞长

约 80 米，东北向洞口高约 20 米，西南向洞口高约 10 米，东壁和西壁有石刻 60 多处，洞内有蜕仙台、望仙亭诸胜；洞外峰峦四合，风景秀丽。

由英德继续北上可到韶关市，市南 20 公里的南华禅寺，是中国佛教著名寺庙之一，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天监三年（504 年）。唐高宗仪凤二年（677 年），禅宗六祖慧能主持该寺，发展禅宗南派，因此有“祖庭”之称。寺庙建筑屡经兴废，现尚保存唐朝卓锡泉、六祖真身像、千佛袈裟和宋朝灵照塔、木雕罗汉等古迹、文物。

由韶关市乘火车北上，可到乐昌县坪石镇，在火车站附近有一座金鸡岭，由 3 块大石垒成，高约 6 米，长约 20 米，状如昂首欲啼的雄鸡。此岭四周陡峭，雄伟险峻，登上岭顶，可纵览湘粤山川，附近还有“万古金城”、“一线天”、“老鹰岩”、“狮子岩”、“石窗”、“姐妹岩”等红砂岩绿林景色。

由韶关市乘汽车北上，可到仁化县丹霞山，它以“奇、险、美”著称，是地理学上“丹霞地形”的代表，此山名胜古迹可分上、中、下三层，上层有长老峰、海螺峰、宝珠峰，远看三峰耸立，如船似龙，蜿蜒变化，以海螺峰为最雄峻，凌霄摩天，百峰俱伏；中层为“别传古刹”，清初澹归和尚（原名金堡，南明遗臣）在此建寺；下层为“锦岩洞天”，内有塑像。此山峰林陡峭，红崖丹壁，上有历代题刻，山麓有锦江萦绕，清澈见底，风景优美。

由韶关市东北行，可到南雄县，城北约 6 公里处有珠玑巷，据传南宋时有一批南下移民在此居住，以后散居广东各地。珠玑巷北约 20 里的梅关，古称秦关，又称横浦关。西汉初年，将军梅锷在此驻守，因名梅岭。汉武帝元鼎五年（前 112 年），裨将庾胜筑关，因名大庾岭，形势雄峻，是秦汉以

来由广东前往中原等地的交通要道。关楼有匾额，北面为“岭南第一关”，南面为“南粤雄关”，还有明清碑刻，登关远眺，五岭山脉烟岚缥缈，浚江、凌江奔流而去，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由韶关市西行，可游览连县的连江三峡，连江即湟川，古称湟水，又名小北江。连江三峡为龙泉峡，又名龙涎峡，两岸陡峭，飞瀑高悬，故名龙泉，烟雾缥缈；楞伽峡又名贞女峡，奇石高耸，相传为秦朝贞女所化，峡壁有宋朝嘉泰二年（1202年）疏通水道的刻石，史料价值很高。羊跳峡，形容两岸山崖相距甚近，山羊可一跃而过。当地认为：连江三峡，碧波激湍，滩声抑扬，可与长江三峡比美，湟水澄澈，景物清奇，可与漓江共论。连县附近的乳源县云门寺，是佛教禅宗五宗之一云门宗的发祥地，创建于五代后唐同光元年（923年），现寺内尚保存南汉大宝元年（958年）《大汉韶州云门山光泰禅院故匡真大师实性碑》，大宝七年（964年）《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弘明大师碑记》两块重要石碑。寺前有观音山，寺后有桂花潭、出米石、九仙岩、慈悲峰、钟鼓石等山水名胜。乳源与连县之间的阳山，城北有贤令山，因唐朝韩愈被贬来此而得名，山上石刻亦以韩愈字迹为最可贵。此外还有宋朝县令张本中、清朝书法家符翕的手迹。

五、祖庙、西樵和鼎湖

从广州西行至佛山市，市内的“祖庙”始建于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是供奉北帝的神庙，现存前殿、正殿、庆真楼、锦香池、万福台5部分，面积3 000多平方米，多为明、清建筑，颇具地方特色，尤以装饰工艺精巧华丽著称。

由佛山市西南行，可到南海市官山镇的西樵山，它原是古火山，周边长约13公里，主峰海拔345米，有72峰、36岩洞、207泉眼，半山有云泉仙馆，原为明朝“玉楼书院”，雄伟壮观，“飞流千尺”瀑布为天然奇景之一，此外还有天湖、石燕岩等名胜。明、清两朝，不少学者如湛若水、霍韬等在此讲学，康有为在此读书，因而名声大著。由官山镇北上，可到三水县芦苞镇，芦苞祖庙原为地藏庵，始建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元、明、清三朝多次重修，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分别改建为北帝、观音、文昌三庙，统称胥江祖庙，北帝庙居中，作为主庙。1947年，文昌庙因堤围崩决被大水冲毁，现仅存北帝、观音两庙。北帝殿屋脊的“双龙戏珠”陶塑装饰品，为清代石湾陶器名家文如壁所制，造型优美，十分珍贵。两庙内外的陶塑、木雕、砖雕、石刻等装饰工艺，瑰丽精巧，可与佛山祖庙比美。祖庙从落成之时开始，每隔30年一小会、60年一大会，会期为小会6天、大会半月，时间在农历十月。每年正月初四举行演戏酬神和“抢炮”等活动。

由三水县溯西江而上，来到肇庆市，市北有七星岩风景区，东北有鼎湖山避暑胜地。七星岩由阆风、玉屏、石室、天柱、蟾蜍、仙掌、阿坡7座石山组成，彼此相距不远，犹如北斗七星，以此得名。石室岩的石室洞，阿坡岩的双源洞，内贮湖水，可乘艇游览。七星岩三面环水，湖水面积约460万平方米，被蜿蜒交错的湖堤划分为波海湖、中心湖、东湖、湖光湖、青蓬湖、里湖6个大湖，堤旁林荫覆道，银湖黛峰，交相辉映，风景优美，山麓堤畔建有亭、台、楼、阁40多座。七星岩附近的鼎湖山，包括鼎湖、莲花、三宝、凤来、鸡笼、优虎、青狮等10多座山峰，主峰鸡笼山，海拔1000米。山顶

有湖，本名顶湖山，有水簾洞、鹅潭、葫芦潭等8处瀑布。山间林木茂密，高等植物达1700多种，其中有些是世界稀有的珍贵植物，因而近年被联合国有关机构列为国际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107万亩，山中龙兴寺（即白云寺），是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弟子智常创建，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在旧址重建，清朝咸丰、光绪时两次重修，寺内的古梅、古桂有数百年至上千年的历史。在莲花峰南的庆云寺（即莲花庵），创建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清朝加以扩建，可容僧众数百人，寺后的白茶树，为开山祖师建寺时手植；又有斯里兰卡菩提，也是佛门宝树。寺旁有飞水潭，瀑布高100多米，飞流直下，惊湍四射，成为奇观。半山亭附近有“日本入唐留学僧荣睿大师纪念碑”。

从肇庆再溯西江而上，可到德庆县城以东的悦城龙母祖庙。建庙年代失考，初名五龙庙，因庙后有五龙山，庙前为西江，据传此处原是龙母墓地，所以建庙。宋朝称为孝通庙，明、清两朝多次修建，两廊四进，中有香亭、正殿，后有妆楼、碑亭，其中石雕的龙柱和松鹤花柱，技艺精湛，气派雄浑。殿脊和檐口的陶瓷装饰，采自石湾名窑，制作古雅，整座庙宇体现了南方古建筑的高超艺术。

六、名园、古寺及其他

在广州之南，有广东清朝四大名园，即番禺南村的馀荫山房、顺德大良镇的清晖园、东莞博厦村的可园以及佛山的十二石斋（此斋后已废圮）。此外有好些古寺以及历史名胜。

番禺市馀荫山房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占地约2000平方米，具有苏杭庭园建筑艺术的特色，园内亭、台、池、

馆的分布，借助游廊、拱桥、花径、假山、围墙和绿荫如盖的林木，穿插配置，虚实呼应，形成曲折起伏、回环幽深、隐小若大的庭苑结构，令人心旷神怡。由番禺市西南行，可到顺德市大良镇，镇内清晖园建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它仿照苏州园林风格并吸收其建筑特色而建成。从门外看，平庸无奇，进门之后，别有天地，园内有笔生花馆、内庭、书楼、船厅、惜荫书屋、碧溪草堂等建筑物，池塘、假山互相衬托，花木、竹丛、蕉林点缀其间，景色幽雅含蓄。由大良镇南行，可到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于1866年在此诞生，故居为中西结合的赭色砖两层楼房，故居旁边，现建有陈列馆。

在顺德市西南的新会县，县城北面的圭峰山，方圆40里，山麓有玉湖，面积8万平方米，环湖建有亭台、水榭、楼阁，长桥接岸，四周峰峦叠翠，葵林拥簇。郊区天马村天马河中的小洲，有一株枝叶婆娑、根茎相连的巨大古榕树，覆荫面积达1万平方米，数以千计的白鹭、灰鹭、麻鹭栖息其间，交飞成阵，鸣声啾啾。1932年作家巴金两次来此游览，发表《鸟的天堂》一文，因而人们称此地为“小鸟天堂”。离“小鸟天堂”不远的茶坑乡有梁启超故居，现辟为“梁启超先生故居陈列室”。新会县南境为西江出海口之一，口称崖门，山称崖山，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南宋赵昺君臣在此殉国。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巡按御史徐瑁在此修建大忠祠、全节庙（又名慈元庙）、义士祠和杨太后陵墓等。新会县西南的阳春县，城西有崆峒山，因甘肃岷县、平凉县和河南临汝县都有崆峒山，它被称为第四崆峒山。外看石林起伏，紫翠夺目，进入洞内，深广约百米，上下层叠如巨厦，并有石柱撑持，大洞和小洞相通，明室与暗室连接，多姿多

态的钟乳石，有如飞禽走兽。洞中的钟鼓石，左叩左应，右叩右应，左右叩则一岩皆应，悦耳之声胜于钟鼓。这里还保存元、明、清各朝的摩崖石刻，十分珍贵。由阳春西南行到湛江市，此地湖光岩是一个火山口湖，约形成于百万年以前，湖面 360 万平方米，水深约 20 米，环湖皆山，绿树成荫，紫岩挺立，有楞严寺、白衣庵等古刹，依山临水，盎然成趣，岩上有不少古代石刻。

在广州东南的东莞市，城西博厦村的可园建于清咸丰八年（1858 年），面积两千多平方米，园内有 7 座楼阁，主体建筑名可楼，共有 19 个厅、15 间房，大小门户 140 多个，左回右折，互相沟通。建筑物分西南、东北两组，中隔庭园，缀以花台、花径、假山，回廊相通，构成整体。当年名画家居廉在此留下不少诗作。市南太平镇为珠江出海咽喉，有虎门要塞。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在此屡挫英国侵略军的进犯，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现在沙角、威远炮台可供参观。太平镇还有虎门销烟池，清道光十九年（1839 年），林则徐在此销毁英、美烟商交出的鸦片 237 万多斤。附近有虎门人民抗英纪念馆、鸦片战争虎门人民抗英纪念碑，以及义勇之冢、节兵义坟，烈士的英雄事迹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景仰。

附录 岭南古代文献主要书目

二十四史

- 资治通鉴 (宋) 司马光
续资治通鉴 (清) 毕沅
明通鉴 (清) 夏燮
十国春秋 (清) 吴任臣
读史方輿纪要 (清) 顾祖禹
南裔异物志 (汉) 杨孚
南州异物志 (三国吴) 万震
广州记 (晋) 顾徽、一作裴渊
南方草木状 (晋) 嵇含
始兴记 (南朝宋) 王韶文
北户录 (唐) 段公路
番禺杂记 (唐) 郑熊
南迁录 (唐) 李德裕
岭表录异 (唐) 刘恂
岭外代答 (宋) 周去非
萍州可谈 (宋) 朱或
南汉书 (宋) 周克明

- 南海百咏 (宋) 方信孺
輿地记胜 (宋) 王象之
南海志 (元) 陈大震
百越先贤传 (明) 欧大任
岭海名胜志 (明) 郭棐
粤大记 (明) 郭棐
岭表奇观 (明) 佚名
粤剑编 (明) 王临亨
广州人物志 (明) 黄佐
广东新语 (清) 屈大均
南越笔记 (清) 李调元
粤东笔记 (清) 李调元
南越游记 (清) 陈炯斋
羊城古钞 (清) 仇巨川
粤觚 (清) 钮琇
粤中见闻 (清) 范端昂
粤游日记 (清) 王钺
岭海见闻 (清) 钱以恺
粤东金石略 (清) 翁方纲
岭南丛述 (清) 郭淳
广东考古辑要 (清) 周广
岭南杂记 (清) 吴震芳
楚庭稗珠录 (清) 檀萃
光孝寺志 (清) 何厚宣
海珠志 (清) 李瑄朗
白云越秀二山合志 (清) 陈际清、崔弼
波罗外纪 (清) 崔弼

- 南海百咏续编 (清) 樊封
南越五主传 (清) 梁廷楠
南汉书 (清) 梁廷楠
南汉纪 (清) 吴兰修
南汉地理志 (清) 吴兰修
广东文征 (清) 吴道镕
广东文海 (清) 温汝能
广东诗海 (清) 温汝能
广东诗粹 (清) 梁善长
岭海诗抄 (清) 凌扬藻
岭南群雅 (清) 刘彬华
粤诗搜逸 (清) 黄子高
楚庭耆旧遗诗 (清) 伍崇曜辑
〔道光〕广东通志 (清) 阮元
〔康熙〕广东通志 (清) 金光祖
〔雍正〕广东通志 (清) 郝玉麟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 (明) 戴璟
〔嘉靖〕广东通志 (明) 黄佐等
〔万历〕广东通志 (明) 郭棨
〔成化〕广州志 (明) 吴中、王文凤
〔嘉靖〕广州志 (明) 黄佐
〔乾隆〕广州府志 (清) 张嗣衍
〔同治〕广州府志 (清) 戴肇辰

后 记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内颇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是在土著文化基础上接受我国各地文化并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晶，是岭南人民在漫长历史中辛勤创造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内容极为丰赡。可惜此书的编写极度仓促，尽管我已停止参加很多社会活动，甚至放弃于1997年7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的“第35届亚非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但仍无足够的时间执笔。因此有关岭南的科技、建筑、手工业、饮食、服饰、风俗、宗教等评介，只好待再版时补充。

我能够编写《岭南文化》，首先要感谢作家、学者刘逸生先生，早在1961年，先生指示我应钻研广东文献，并面嘱应向广东文献专家冼玉清教授请益，因此才有日后的收获。我还要感谢广东中山图书馆林子雄先生和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陈泽泓先生、李仲伟先生的鼎助，他们在百忙中拨冗为我提供配图及参考资料，并予积极鼓励，隆情厚谊，令人难忘。

关于岭南文化的研究，近年群彦濡翰，各献瓊琛，好些专著的出版，对拙作的编写甚有帮助，谨致谢意。

袁钟仁

1998年春节

编者后记

“中国地域文化丛书”计划出二十四种，前十二种已出，后十二种是我接手之后出版的，其中包括原来计划出版的和新增加的种类。

为了出版全套丛书，社里决定用公开征稿的方式来征集书稿。现在回想起来，这套书的确是在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有关同志的全力配合下，才得以全部问世的。

“征稿启事”刊出之后，许多作者应征与我联系。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我请作者们写出某一地域文化的概述，拟出书稿的内容要目，甚至写出部分章节。从1996年年底至1997年年初，我接手并完成这套书下半部分的组稿工作，每天的工作基本上是在看信和写信，十二种书目，每种都收到四五份或更多的书稿要目及概述，几个月内前后回信不下百封。我认真审阅了每一份来信，经过反复比较和推敲，并与部分作者电话联系，了解情况，最后从中选定了十几位作者。这一过程是组稿工作的关键过程，繁重而复杂，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编辑学识水平和工作能力的重要考验。从前只是随手翻阅过社里出版的同类读物，对地域文化的内容和理论基本上是一窍不通。这次选定作者，大体上是根据以往的书稿写作

经验，从书稿要目内容的丰富程度、理论的高度以及体例的完备程度入手来选定的，最后的结果虽然不能说十分理想，但可以说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十几位作者毕竟是从几十位作者中反复甄别、筛选出来的。

许多作者来信，询及全书是否需要统一的体例和写法，对此我早有考虑，复信作答：全书不需要统一体例和写法，只要作者充分占有材料，理论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能用文化学的理论分析和驾驭这些材料，写出来的东西自然会有成型的体例。何必选定一套呆板的体例来束缚作者的手脚呢？作者们完全同意我的想法，纷纷表示同我合作既省事又愉快，放手干了起来。

十二种书稿大体上是一个作者写一本，也有几位作者合写一本，这种情况往往是我和其中的主要作者共同选定其余的合作者，最终组成一个写作班子。其中许多书稿要目的内容和体例，是我与作者反复探讨和磋商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当最后一份出书合同签订之后，我长出了一口气，全套丛书最为艰难的组稿阶段毕竟过去了。

中国实在是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是个地域文化的大花园，各种花卉争奇斗妍，美不胜收。今天中国境内各个省、自治区的行政区域，与自古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有些是大致吻合的，也有一些是不相吻合的；有些区域的地域特点较为明显，有些则不那么明显；有些区域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变化较大，有些区域则相对稳定。二十四种书所写的二十四个文化区域，有些略有交叉，如燕赵和三晋、中州和陈楚等等，但也有些区域是经过认真调查、反复推敲之后才确定的，如陇右文化。陇右是个比较宽泛的地域概念，大致包括今甘肃全境、宁夏、青海和新疆部分地区。

从地域上看，陇右介于新疆和陕西之间，文化上应属于从三秦文化到西域文化整个西北文化带的中间环节，因此，陇右文化既与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差别。与西域文化相比，陇右文化具有更多的汉族文化特征；而与三秦文化相比，它又更多地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可以说，陇右文化是中原华夏汉文化与西域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并重新组合的一种文化，是一种自成体系、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陇右文化与西域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一样，也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内的文化。因此，它完全有资格列入“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之中。还有一些题目存在类似的情况，同样经过一番推敲，最终确定了后十二种书稿的题目。有些地域相毗邻、内容有交叉的书稿，我在处理时注意删除了交叉和多余的内容，因而突出了该地域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

除了文字内容之外，我要求作者大量收集一些有关地域文化的图片，置于书前。这些资料包括文化、服饰、建筑、戏剧、陵墓、古迹等等，与书中的文字内容相对应。前十二种书增补了一些图片，后十二种书全部配齐图片。从前不了解，如今干起来才大致了解一些编排图片的要领，起码有三点，一是要考虑图片内容的编排顺序，二是要注意几张图片放在一起时内容、位置、颜色之间的关系，三是要力求图片的面数等于四的倍数。此外，还要为图片撰写简明扼要的题目和说明。这几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好在过去出版“教育家”和“帝王传”等书时，在别人的指点下，有过一点编排图片的实践，因此今天做起来，不那么费力。但编排水平实在不高，所以图片编排的效果如何，只好让大家去评判了。

二十四本书，作者的水平不等，编辑们对书稿的要求有

别，作者的写作时间也不同，诸多因素造成书稿的质量水平参差不齐。许多作者不同程度地运用了文化的理论，来驾驭和分析文化资料，写出了水平较高的书稿；部分作者则仅仅罗列了地域文化的材料，未做深入的探讨。还有的作者由于时间仓促，不得不赶出“急就章”，但在结语中却将某一地域文化的许多问题一一提出，不仅十分在行，而且颇有深度。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许多作者会写出更高水平的地域文化专著。全套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某些特点和水平，是砖是玉，读者自会评判。而高水平的评判本身即可推动整个地域文化的研究进程。如果这套书的问世，能使更多的人加入到研究地域文化的行列中来，那么这套书的出版目的就算达到了。

赵中男

1997年10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章

绪论

- 一、岭南的得名
- 二、岭南的范围
- 三、岭南的自然环境
- 四、岭南的土著民族
- 五、岭南文化的形成
- 六、岭南文化的区域组合
- 七、岭南文化的特点

第二章 鸿蒙初开 大业草创——远古的岭南
文化遗存

- 一、令人惊喜的重大发现
- 二、洪荒窈冥的石峡文化
- 三、有争议的西樵山文化遗址
- 四、漫长的新石器时代
- 五、不发达的青铜文化

第三章 兼收并蓄 源远流长——吸引中原及
各地文化

- 一、伟大的和平进军
- 二、南越国、南汉国的功绩
- 三、乱世每多南迁客
- 四、外来官员的勋劳
- 五、四方贤俊聚南疆

第四章 互相促进 共同提高——长期对外文
化交流

- 一、扬帆南溟溯自秦汉
- 二、通航西亚在于魏晋南朝
- 三、直达东非畅说隋唐

四、舳舻相接喜叙宋元

五、远驶欧美共话明清

第五章 忧国爱民 与时俱进——提倡改革、
革命的政治思想

一、要求整顿吏治

二、倡议维新变法

三、发动武装革命

四、最早宣传社会主义

第六章 赤胆忠心 气贯长虹——悠久的爱国
主义传统

一、维护国家统一

二、抵抗外族入侵

三、高举反帝大旗

四、热心乡邦建设

第七章 为国育才 济世利民——迎头赶上的
教育

一、政府主持的官学

二、民间兴办的私学

三、教育与学术研究结合的书院

四、仿照欧美教育制度的学校

第八章 群贤接踵 硕果丰盛——独树一帜的
学术研究

一、历久不衰的经学

二、自成一派的理学

三、颇有特色的实学

四、富于开拓的史学

第九章 才士辈出 鸿篇相继——反映现实的
文学创作

一、朴实明畅的散文

二、气势雄直的诗篇

三、属辞雅健的词作

四、后起之秀的小说

	五、异彩缤纷的说唱文学
第十章	百花齐放 各呈异彩——融合创新的艺术流派
	一、绚丽多姿的地方戏剧
	二、悠扬动听的各种器乐
	三、享誉国际的岭南美术
	四、急起直追的广东书法
第十一章	藏于名山 传之宇内——迅速发展的出版事业
	一、岭南印刷术探源
	二、扬名后世的私家刻本
	三、显示政绩的官府出版
	四、促进教学的书院刊印
	五、牟取厚利的书坊雕镌
	六、传播新知的近代报刊
第十二章	同声异调 顿挫抑扬——互不相通的方言土语
	一、流行较广的广州话
	二、系属闽南的潮州话
	三、接近普通话的客家话
	四、各种小范围内的方言
第十三章	岭峤毓秀 江海钟灵——美不胜收的名胜古迹
	一、浩气长存的革命遗址
	二、车湮代远的古建筑物
	三、罗浮青葱韩江萦回
	四、北江沿岸名刹多
	五、祖庙、西樵和鼎湖
	六、名园、古寺及其他
附录	岭南古代文献主要书目
后记	
编者后记	

附录页